母女同游美利坚

茹志鹃 王安忆 著 1983.8.30 - 12.27

（母）

茹志鹃

一九二五——一九九八

当代作家

（女）

王安忆

一九五四生于南京

当代作家

中信出版集团

版权信息

书名:母女同游美利坚

作者:茹志鹃,王安忆

ISBN:9787508693606

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



茹志鹃照片



王安忆照片

游美百日记

茹志鹃

一九八三年秋，我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活动，于八月三十日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，从北京出发去美国。美国，在某些人心目中，是个天堂；在某些人眼里又是一个地狱；在某些人看来，是西方文明的先驱；在某些人看来，又是蛊惑人心的妖巫，有着各种可怕的着色糖衣迷药和不可抗拒的神秘魅力。总之，它有点像迷宫。我和吴祖光、王安忆三个不懂英语的人，向“迷宫”飞去了。

美国一百二十天

王安忆

脑子里除了遗憾，便是空白了。我不明白美国，我越看得多，就越是不明白。一边是移民们赠送的雕像，感谢新大陆收容了劫后余生的难民，一边是飞机轰炸格林耐得岛；一边是充满活力的牛仔裤，一边是大麻；一边是快乐的爵士乐，一边是精神崩溃的精神病患者；……这就是美国，这又不是美国。这是美国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一点都不知道。

Bye—bye，America。

1983年8月30日 晴

北京时间下午五时抵东京机场，我们在机场休息一小时又登机。在昏黄的夜色中，飞机横渡太平洋，包抄落下去的太阳，向圣弗朗西斯科（旧金山）飞去。越飞天越黑，越飞天又渐亮，越来越亮，终于在北京时间二十一点多，赶上了太阳，天大亮了。

我的手表上是三十日半夜两点，旧金山正是三十日上午十一时。我们一下飞机，首先见面的是一群十一二岁的美国男孩子。他们耐心而固执地跟着我们租借来的几辆行李车，绝不让别人染指。这车子是我们用一美元一辆租来的，退还时每辆可以取回二角五分，估计他们紧抓不放的正是这二角五分的小费。当我们把行李卸在路边，果然，他们很快取走了五辆推车，不过还留下三个孩子守着我们的行李。因为来接我们的汽车不够，要临时叫车，行李又搬动了几个地方。孩子们又拼力地帮着搬，让他们不搬也不行，最后形成我们和孩子们搬行李的争夺战。十只大箱子，我们人有五个（去讲学的萧乾夫妇和我们同行），我心里以为，不过是几步路的挪动，我们自己慢慢搬完全可以对付，不愿花这意外的开销。经过一连串动作的较量（语言不通），坐上汽车时，我们和孩子们都已筋疲力尽。给了他们一人一元的小费，三个孩子很高兴地道了谢，话不懂，但声音听得出来是由衷的。

住领事馆不远的查理旅社，是中国人开的。旅社不大，但很干净。整个三层楼只看见进门处柜台上一个工作人员。

傍晚去吴祖光房间，无意间瞥见上楼第一间房门口，有一美国男青年叩门，门开了一条缝，里面是一位用浴巾裹着身体的女青年，他

们轻轻说了两句话，那男的便返身下楼去了。我估计很可能我无意中妨碍了人家，立即慌慌张张地拐进吴祖光同志的住房，他有位同学正在那里叙谈。我定下心来一想，不由哑然失笑。这是在美国，以中国人之见来猜度美国人，也许暴露的恰恰是自己的中国习俗。

晚上，安忆的小学同学周海瑞和他弟弟来访。他依稀仍有小时模样，不过已有了白发。他在一边念书一边打工，还要供弟弟上学，生活得不容易。晚饭时，陈若曦带给我一位同胞的问候，使我又高兴又感慨。安忆迫不及待地去看旧金山夜景了，我便洗澡上床。现在已是北京的三十一日早上九点，旧金山是三十日的晚上十点。我疲劳至极地躺着，却不能入睡。

1983年8月30日 晴

这是很长的一天，我们追着太阳飞，从地球的这端到了那端。今天有三十九个小时。

北京——上海——东京——旧金山。

萧乾伯伯招呼我过去看富士山，他是应爱荷华大学邀请去讲学的。很幸运与他同行。我、妈妈、吴祖光伯伯一行三人均不懂英语，而萧乾伯伯则有一口漂亮的剑桥英语。原先并不知道和他同路，紧张得很，身边放了两部沉重的字典：《英汉词典》和《汉英词典》。现在好了，可以一身轻松地去看富士山了。

一片云海，云海中有一座小小的岛——这便是富士山了。

现在我在旧金山。

下了飞机等行李，等到了行李又等办入关手续。手续办了很长时间，那位海关工作人员奇怪我姓王，妈妈却姓茹，问我结婚了否？是姓丈夫的姓？我说结婚了，仍姓自己的姓。他始终也没明白过来。

中领馆的陈领事来接，萧乾伯伯的朋友来接，吴祖光伯伯的朋友也来接。行李多，人也多，手忙脚乱。一个十来岁模样的男孩子冲着我一笑，便从我手里接过了行李车，另外又有几个孩子一拥而上，接过了我们的行李，真是势不可当。我们表示不需要他们帮忙，他们就对我们笑，却并不松手。行李多，车子不够，要叫出租车；谁上谁的车，需要分配安排；人多，口杂，好一阵忙乱，孩子们则已经镇定地挣得了每人一元的小费离去了。

这几天，过路客人多，大使和大使夫人也来了旧金山，领事馆住满了，只能住在领事馆附近的一家台湾人开的小旅馆。

晚上，莫名其妙地被请吃饭。过后才知道，是吴祖光伯伯的朋友画家侯北人先生作东。在一家中国餐馆，老板姓田，是山东人，今天特为我们开店办席，办了两大桌，团团地坐满了人——有一位赵伯溪先生和他的太太。他是一个豪爽的先生，喜爱戏剧，主持了一个“海运”剧社，今年还去中国演出了一趟。今天除了他，还来了好几位剧社的先生、太太。有陈若曦女士，她是久已闻名的了。有《蒋经国传》的作者江南先生……另外，还有一位从北京来的音乐家魏立。

她，是我知道的，是我国少有的年轻女指挥中的一个。记得她原是铁路文工团的，一九七四年，她们团曾经来徐州演出，我当时尚在徐州文工团拉大提琴，曾坐在剧场，看见过她指挥乐队的背影。不曾想，将近十年之后，在这里面对面地坐在了一起。她看到我很亲热，说：“原以为这里遇不到一个熟人呢！”她一直和我坐在一起，告诉我怎么要汽水，要说：“Seven up”；告诉我千万别在美国客气，美国人不懂客气；告诉我她在这里的生活；还告诉我，她来这里三年得到的一个体会是：“一个艺术家，第一要有祖国，第二要有世界。”

“第一要有祖国，第二要有世界。”我重复了一遍，使劲点点头，我想我是很早就懂得了。

从饭店回到旅馆，便试着给周海瑞打电话，这电话号码是我来美之前他写信告诉我的。可我不相信能找到他，因为我们十几年没见面了啊！可是，电话通了。

“我找周海瑞。”我说。

“是王安忆吧！”他大声说，一下子就猜出是我，那也许是因为——我想——现在，这个地方，不会有人知道他小时候的名字了。六六年，他把这名字改了，因为他发现他居然和“海瑞罢官”的海瑞同

名。当他改了名字之后，我们就再没接触过，所以，我只知道他叫周海瑞。

“我在旧金山。”我说。

“真的？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也说不出来，我把字母念给你，你自己拼吧。C，H，A，R，L……”

“哦，和我是一条街，你那里是同性恋区。再过半小时，我就到你那里，我借一辆车，带你去兜兜。”

过了半小时，他来了，还带着他弟弟，一个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生。他好像变了，又好像没变，因为，我实际已经有点记不清他的模样和声音了。

我们走出旅馆，门口站了几个年轻人，挤在一起，好像在商量什么。其中一个把上衣脱掉，露出裸着的背。我看看他们，问周海瑞："他们在干什么？鬼鬼祟祟的？"他回头看看："没干什么。外国人的怪样子多呢，你很快就会看惯的。"街上很静，人不多，汽车静静地然而飞快地流过去，那气氛总有些神秘。"这里是同性恋区？"我问。"是的，那几家酒吧和咖啡馆里全坐着同性恋。""挺可怕的。""你不必害怕。同性恋区的治安最好了，他们决不伤害别人。他们都是上等人：律师、医生、艺术家。他们不会来碰你的。""那么别人也不碰他们了？""旧金山的副市长就是同性恋，他得了好多同性恋的票数呢。同性恋在这里能受到保护，所以外面有些同性恋也迁到这里来。""在别的城市，同性恋要受到干涉吗？""那也不，这是他们自己的事，谁管得着。不过，最近发现了一种同性恋的性病。很讨厌！我们这是去金门桥。""好的。"

金门桥，是太平洋和旧金山海湾的分界线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孔桥。我们停了车，走上了桥。已是十二点了，雾气很重，风很有些寒意了。"这里很凉快。"我打了个寒战。

“你冷了。”他们都笑了。“这里的气候很好，冬暖夏凉。”

走着，走着，走不过去了。桥的人行道被一扇铁门拦住了，可是人行道旁边的车道却畅通着，汽车静静地、飞快地流过去。“我们下了车道绕过铁门再上人行道吧。”我建议。

“不行不行，这怎么行！”他们异口同声说，带我折回了头。“这是规定。”

“可是并没有人看着呀！”我强调理由，然而回头看看，铁门那边的人行道上，果然没有一个人影。

他们带我去渔人码头，唐人街，百老汇……店铺里亮着灯，却关着门，街上很少有人。一家店门口，有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的男人来回踱着，慷慨激昂地说着什么。“是神经病。”他们告诉我。“哦。”“美国神经病很多。”我回头看看，他挥着手，还在演讲。“美国最有钱的是医生，医生中最有钱的是精神分析医生。”“这恐怕是一门很先进的学科。”“我看并没什么了不起，只不过是有耐心听病人啰唆，发牢骚。比如，一个人心里有什么不愉快了，便找精神分析医生诉说一番，说出之后自然畅快一些。”“那他何必花钱找医生呢？”“找谁呢？谁有时间去听他的废话，大家都很忙。”

马路对面，有个男人大声地吆喝着。“他好像是在叫我们。”我说。他们停下脚步听了一会儿，都笑了。“干什么？”我追问。“那是表演脱衣舞的地方，他正在拉人进去看呢。”我很好奇，“我们能进去看吗？”“你吃得消？”他们俩都有些吃惊地看着我，我有些害怕了：“那么算了。”

“该回去了，一点了。”

我们找了车，上车了。

“我们明天一早就走了。”我告诉他。

“还来吗？”

“回国总是从这里走。”

“能多呆几天吗？”

“我想能的。”我说，“我们的同学，有到过这里的吗？”

“没有，从来没有。”

“……你还记得她吗？”我提起一个同学。

“当然记得。”他兴奋起来。一连串地想起了很多同学，有的在上大学，有的大学毕业了，有的去了香港，有的在黑龙江和农民结婚了，还有两个，早早地死了：一个是肝癌，一个是脑膜炎……

“我们已经十几年没联系了。”

“十几年了。”

这时候，我清清楚楚地记起了他的样子和声音。他是我们班上威信极高的中队长，他总是那么严肃，甚至说相声的时候也十分严肃，然而大家仍然报以热烈的笑声和掌声，因为他有着极高的威信。

飞机下降时，耳膜受到压力，听人说话、自己说话，像隔了一层云雾，朦朦胧胧。旅馆的地、墙、天花板，全是塑料似的材料制作的，一间屋子像个玩具盒子，渔人码头的售货亭前坐了一个女人，那发色、肤色，完全像个假人，而她却是真的，走到她跟前，她忽然动了起来。这一切，都给人一种恍若梦中、不真实、不确切的感觉。

8月31日 晴

一早起来，把房租结算了。一个房间两张床，租金是三十三美元，加上两元小账，共三十五元。昨天从机场到旅社的汽车费是二十元，又是两元小费。两笔开支是五十七元，还不算其他费用。美国的一般生活水准，由此可见一二。

从旧金山到丹佛，在丹佛换机到爱荷华，从机场到爱荷华市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汽车路程。华苓和陈映真一起来接我们。这两位都是久闻其名而未见其人的作家：一个是能把姑娘的感情写得出神入化、若隐若现的作家，本人却是快人快语，娇小的个子，豪爽的风度，眉宇间还深藏着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坚毅之气；另一个是外秀内更秀，从容、坦诚、真挚，怀着一种不能不令人折服的信任感。

到达我们住的“五月花”公寓，已是下午五时许，接待人员一见面，就给了我一大堆的数目字：房间号码；信箱号码，需要向左转几次，向右转几次，再转到什么号码；电话号码，打本地前面须加拨几，打外地前面须加拨几；星期几是收垃圾的日子，星期几的晚上有电影；使用洗衣机需塞多少分币……搅得我头昏眼花，干脆什么也不去记它，今后用什么记什么吧！

这是一幢大学的宿舍楼，各国来的作家都集中住八楼，一人一间卧房。房里一床一灯一柜，一个大衣橱将房分隔为二，衣橱后面是一靠壁的长桌，上方有长排日光灯。这是学生用功的地方了，现是我们的工作室。两间卧房当中有一卫生间，一厨房。卫生间内有两个洗脸盆，一个用拉帘隔开的浴盆，一个隔开的抽水马桶，两人合用可以同时进行梳洗，互不妨碍。厨房，亦是用餐的地方，有长桌长椅，有煤

气灶、水斗、冰箱。水斗的下水孔很大，旁有电钮，一开，孔内有刀旋转，可将剩菜、骨头等弄碎冲走。灶上方有一吸气罩，烧菜时可将油烟热气吸出，因此灶边的墙，可保持干净。使用煤气也不必划火柴，每一眼灶壳里都留有一星火苗，只需把煤气一开火便着了，关掉时火种仍然不灭。这些小而实用的地方，颇有些现代化的意思。

华苓家离此很近，出大门左转弯，爬上一个山坡，就看见隐在绿树里面一幢红色的房子，门上有中文“安寓”二字。进门上楼，便见迎面的墙上，挂满了大大小小、各国各式的脸谱。一个大客厅当中，在炉前、窗下、楼梯栏杆旁，组成了三个中心。一个酒吧柜后面是餐厅，餐厅后是厨房，前是落地窗，开出去便是回绕客厅的一弯木结构大阳台。屋檐角上是一挂铁马风铃。风声叮当，爱荷华河在远处闪烁，我们举起了杯，为五千年的故国，为未见过面的故人。谢谢啊！华苓，是你织造的这一夜，可以载入史册的一页。唉！兄弟姐妹，相见忒难，忒难，须远渡重洋！太湖旁，白塔下，何处不可话故乡？唉，我的同胞，同行。安格尔因风湿转到耳朵，痛得十分厉害。因为我们去了，他勉强起来和大家见面。此时此地说来，这位男主人算是少数民族，也算是中国的女婿。他紧紧依傍着华苓坐着，不断地说：“我要是没有你，我怎么办呢！”美国人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，诗人更善于将它溢于言表，于是这夜晚显得更加富于幸福的团聚色彩。

8月31日 晴

丹佛——爱荷华。

到丹佛时，对了一次表，朝前拨了一小时，到塞德莱比茨（Ceder Rapids）时，又朝前拨了一点，到爱荷华了，又拨快一点。一时上，糊里糊涂，再不明白什么是标准时间了。这时间大约是根据太阳与地球的角度制定的，更加精确。可我还是疑惑：标准时间呢？

晚饭，是在聂华苓女士家里吃的，因为我们的冰箱里空无一物，明天上午才能去采购。她家在我们住的“五月花”公寓后面的一座小山的山腰上，古朴而雅致，木板的阳台正对着郁葱的树林和爱荷华河。房间的墙上挂着各种民族的形形色色的脸谱，安格尔先生喜欢脸谱，还挂着安格尔先生年轻时的照片，他出第一本诗集时，报刊上的评论文章。那时他又年轻又英俊，如今虽然老了，却仍充满了活力。只是近来身体不好，病了很久。医生说是风湿从肩膀转到了耳朵，头疼得要命，下午刚刚打了五针，一直在昏睡。到九点钟才醒来，硬是起床同大家闲聊。他对我说，他很高兴能有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作家参加今年的“写作计划”，又说，他很惊讶我穿的这件连衣裙，难道这么漂亮的连衣裙现在在国内也能穿了吗？我告诉他，这件远不是最漂亮的呢！他说他七八年第一次去中国，中国男男女女都穿着蓝灰衣服，分不出男和女。我说，如今你要去中国，恐怕也分不出男和女。男孩子留长发，女孩子则剪得很短。

来聂华苓家吃晚饭的，还有台湾的两位作家：陈映真先生和七等生先生，香港的潘耀明先生，还有一些为“写作计划”工作的留学生：一位Esther小姐，是从台北来的，在这里读英语。她的英语很好，专为

我们中国作家作翻译。一位张怡，从北京来的，学西班牙语。还有一位从上海来的叶先生，他今天特别高兴，说是三喜临门，一是生了一个女儿，二是得了硕士学位，三是结婚十周年。

聂华苓的小女儿蓝蓝也带着她的女儿安霞来了。蓝蓝是搞现代舞的，经常去中国，今年八月，我们还见了一面呢，那时，她对我说：“来吧，爱荷华的秋天最美了。”现在还不是最美的时候，可是那爱荷华河上的落日，落日下的树丛，也是美得可以了。而蓝蓝却叹气：“爱荷华是太宁静了，舞蹈要动力。”她想离开，却离不开。她是她父母身边唯一的孩子，安霞则是唯一的外孙女儿。

将近十一点时，我们几个人一起慢慢地走回“五月花”公寓，这是一幢学生公寓，我们包下了第八层，我和妈妈住一单元，每单元有两套卧室和工作室，一套洗澡间和厨房。吴祖光伯伯和香港的潘耀明先生合住一个单元。潘先生在参加“写作计划”的同时还在爱荷华大学的英语专科班进修，他要在美国学习两年。他比我们早半个月住进“五月花”，对这里比较熟了。一进“五月花”，他便带我们去看信箱，教我们开信箱。每个单元有一个信箱，每个信箱有一个密码，朝右转多少又朝左转多少，要求转得十分精确，差那么一点点都不行，都会前功尽弃，要从头再来。潘先生开了几次也没成功，却大有一股不成功不罢休的决心，可时间实在太晚了，还有一大堆的东西要收拾整理。大家只好劝说他下次再试，他才丢下手，表情却有些沮丧。

回到屋子，刚往壁橱里挂了几件衣服，忽然听到了尖利的警报声，那声音十分刺激人的神经。打开门，见走廊上方的警报器正发射着红光。潘先生从门里走出，跑到楼梯口张望了一下，然后过来对我们说：“下楼，走下去，不要坐电梯。”说罢又转身回去招呼吴祖光伯伯“逃窜”。我们赶紧从楼梯下了楼。一层层走下去，不断有学生从屋里出来，赤着脚，光着膀，穿着睡衣，一个个兴高采烈的。走到楼下，外面已聚了满满的一堆人，两辆消防车停在门口，蓝灯红灯旋转着，放出奇光异彩，加上学生的热烈情绪，很有点过节的气氛。原来

是六楼有两个男生吸烟，点着了被单，烧了起来。火，很快就灭了，可欢腾的人群却久久不愿散去。

一点多才睡下。时差在折磨人，疲倦得出奇，精神却亢奋得出奇。

这屋子好像全是由塑料制成的，十分闷热、窒息。我觉得这种房子不好，我还是喜欢砖木结构的房子。可是，就这么一个地球，能提供多少木头和泥土呢？人类在地球上，还没找到最好的生存形式。

爱荷华很热，比旧金山起码热十度，我觉得。

9月1日 晴

上午十时由曼瑞和来自马来西亚的学生钟敬堂（他们都是受雇于“写作计划”的工作人员）带我们十几位同时到达的作家把得到的支票（我和安忆用一份）去存在银行。美国人习惯用支票，身边不带十元以上的现金。然后大家带支票本去超级市场，购买一星期的食品、饮料。规定是一星期开车来购买一次。

爱荷华是个以大学为主的小城，全市人口听说是六万。可是超级市场并不少，而且有好几家。东西应有尽有，蛋和鸡最便宜，一打最大的鸡蛋，是八角六分，稍小一点的是七角多。一只洗得干干净净、白白嫩嫩的鸡，只一块多美金，而一块豆腐却要六角。最吸引人的是水果，无论是葡萄、西瓜、橘子、香蕉，都很完美硕大，倒像是静物画里的东西。超级市场里没有我们的主食，所以又去了一个南朝鲜人开的小店。作家许世旭是南朝鲜东方语言学院的院长，曾在台湾学习过六年，能用中文写作，说得一口中国语。他为人随和风趣，和我们同去小店买东西时，十分得意，好像他就是这个店的主人。这个店的面积不大，但品种相当齐全，从大米、糯米、赤豆、粉丝起一直到黄鱼、明虾全有。这是一个家庭开的店，商品一律自取，出门算账，然后由他们帮你把东西送上汽车，俨然是一家小小的超级市场模样。

采购回来，已是下午一点三刻了。可能是怕我们自己做饭不方便了，钟敬堂带我们上麦当劳，尝尝美国人常吃的汉堡包。汉堡包是一只带盖的塑料方盒，内盛一只热的夹肉面包，外送各种甜甜酸酸的作料。味道不怎么样，但可以吃得相当饱，价钱是一元五角一只。

一大筐旧炊具，旧碗筷，都是上一届“写作计划”的作家留下来的，我们找到了几个小锅，几只茶杯。锅，大部分是没有盖子的，杯碗大部分是塑料的。总算找到了一只有盖的牛奶锅，一只完好的小咖啡壶。晚上煮了一锅粥，吃京冬菜和乳腐，香甜可口极了。安忆的胃口稍稍恢复了一些。

9月1日 晴

窗前是爱荷华河，还有一片树林，汽车在公路上快速地驰着。

九点钟去玛利家吃早饭。玛利和她的先生彼得是印度人，黑黝黝的，又结实又漂亮。玛利专负责照管我们生活的，而彼得是大学的副教授，是国际“写作计划”的顾问。在他们家吃早饭的除了我们，还有一位阿根廷的女作家，一位保加利亚的漂亮的诗人，一位加纳的黑人作家……总之，昨天才到还没有来得及采买食品的人全在他们那里吃早饭。人太多，只能一批一批地吃，玛利负责做饭，彼得与客人聊天。玛利一锅又一锅地煎鸡蛋，彼得则一遍又一遍地叙述一扇门的故事——这扇门装错了，一打开门，人正好走进了壁橱。

吃过早饭，Alex——一个马来西亚的华裔留学生，也是“写作计划”的工作人员——开车带大伙儿去市中心办事，先到银行存款。

走进银行，上楼，来到一个会议室。墙上挂了一排照片，全是此银行的大股东。屋子中央放了一个大大的长圆桌子，桌子上已分别放好几份文件。一位先生请我们坐下，向大家表示谢意，然后便一个一个地帮着办手续。他们不断地对我们说：“谢谢。”事毕，还要请我们喝咖啡，而我们只不过每人在此处存了一千五百美金罢了。

领了一些现款，绝大多数存了支票，另外，又办了一张卡。这卡可以在任何时间里从任何一架取钱机里取现款，这取钱机到处都有。只是，必须在心里默记住自己的号码。只有两天，我就必须在心里默记住两个号码了，一个是信箱暗码，一个是取钱的号码。

然后，去买东西。先到一家“东西商店”，是一对南朝鲜夫妇开的。里面都是东方食品：日本的，朝鲜的，也有台湾的和我们大陆

的，比如四川榨菜、天津冬菜、豆腐乳。又到另一家名叫“伊戈尔”的超级市场，买了很多水果、蔬菜、肉、饮料等等，装了满满一手推车。店大、人少、货多，令人兴奋不已。人和商品如此接近，可以任意翻看、挑选，而决不受人干涉、呵斥，实在叫人高兴。

中午，Alex和Esther带我们去吃汉堡包。原来汉堡包就是两片热面包夹一块炸牛肉或者炸鸡，装在一个小小的精巧的盒子里。这盒子十分好玩，汉堡包的味道却实在不怎么样。忍不住想起了我们的肉包子，由肉包子又想到了油条。

吃罢午饭，又开车去一家卖日用品的商场买拖鞋。这商场叫“K Mart”，好像美国很多地方都有K Mart，这里的东西比较便宜一些。一进去，就出不来，逛了两小时，虽然只买了一条牛仔裤。牛仔裤挺合适，只可惜不是名牌。名牌是“Lee”。这是一位最早创牛仔装的老板的姓。买的是减价货，减价的原因只是因为腰间没有打褶。上海现在正在兴没褶的，这里却又要有褶的了。看来，历史真是螺旋形地上升。而眼下最时兴的牛仔裤是一种用机器拉得发白发毛、旧得厉害的裤子，还很贵，因为它花的劳动时间多。商品五光十色，衣服挂在那里，任你挑，任你试，方便得很。我们习惯了远远地望着商品，挤来挤去地买东西。在这里真是舍不得离去了。可是，这里没有拖鞋，得上别的地方买。来到一个小店，买到了拖鞋。那小店里的东西也很多，光是发夹就有几十种，看得人眼花。隔壁有一家店，门口挂着牌，五天之内每件商品减价五元。要不是妈妈拉住我，我又要进去了。那么多你并不需要的东西在诱惑着你，消费简直成了人的本能，尤其是女人的本能，Alex说：“女人会花钱啊！”

9月2日 晴

上午和安忆去爱荷华河对面的公园散步。地方很大，又没围墙，因此也分不清哪是公园里，哪是公园外。这里保存着原木垒墙，木片为瓦的原始小木屋，有网球场，游泳池，多处风格各异的儿童游戏场，到处有木桌木凳，可供人休息、野餐，有可烘烤东西的铁灶架，有大树，草地，就是看不见人。

晚上华苓在家举行酒会，宴请所有与会作家，共有三十多位。

9月2日 晴

早上起来，人昏昏沉沉的。抬头看看是人造纤维的天花板，低头看看，是化纤的地毯，趴在窗口，窗台的化纤气息传来，心里一阵恶心。吃过早饭，和妈妈出去走走。沿着河，过了桥，到公园去。公园很大，很安静，没有围墙围着，也没有门，不晓得哪里是边缘。草地很厚，露珠把脚打湿了。树木很高大，小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。公园里有网球场，有游泳池，有很多木桌木椅木棚子，木桌边上总竖着一个铁架子，像是一个烤炉。还有好几处儿童乐园。乐园的风格不一样，有一处全是用似乎没有修整的圆木和汽车轮胎组成的，有一种返朴归真的趣味。公园里几乎没有人，很幽静。走了一会儿，却不知道回去的路了。胡乱走了一气，终于碰见了一个人，便上前问路。居然使他听懂了我的话，并且我也猜懂了他的意思。看来他很愿意为我指路，说了很多，说了很长时间。我只听懂：朝左、朝右。居然走了回来，十分得意，似乎这么点英语可以打天下了。

上了楼，一长条走廊静悄悄的，门关着，好像没有一个人。脚踩着地毯，连自己的脚步声也听不见，显得空寂。实际上，我知道每个门里都有人。人，被墙分隔着。

下午，跟潘耀明搭学校的公共汽车去市中心，先到邮局买邮票。买邮票的人并不多，却排着队，秩序井然。走出邮局，一辆汽车开过，是一种小小的旅行车，司机座后头有个小小的车厢。车厢门开着，只见里面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个男女学生，两条白白长长的大腿挂在车厢外。潘耀明告诉我：“今天是星期五，周末，学生们都开车去郊游了。”一边说一边过马路，拐角上忽然转过一辆车，我吓得三步并两步冲了过去，他在后面追我：“不要紧，不要紧。”

“怎么不要紧，车已经开到跟前了。”我说。

“它不敢撞你的，在这里是车让人，不是人让车。它撞了你赔不起的。”

“可我还是被撞了，也许死了。”我说。

“它不会撞你的，它会让你的。”他反复说。

拐角处又来了一辆车，我赶紧止步，却见车里的人微笑着朝我挥手，意思是请我先过。

他带我走进一个大商场，名叫Old Capital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分上下层的市场，有服装店、鞋店、饼干店、花店，饼干香味和花香融合在一起，发出一种又温暖又热闹的气息。楼上有麦当劳、咖啡馆、酒吧、电影院、游艺室。潘耀明有心想请我玩一玩电子游戏，可他似乎从来没玩过，不知从何下手去玩，周游了一整个游艺室，也没能把二十五分的硬币丢下去。为了不使他为难，我就说：“算了，我并不喜欢玩。”于是他便收起了硬币，带我去喝东西。咖啡座正临着街，竖百叶窗把街景划成一条一条的，街上很热闹，学生们跑来跑去，汽车开来开去，今天是周末。

晚上，所有的作家都在聂家聚会，来了很多很多人，认都认不过来。遇到爱德文，有人要给我作介绍，他阻止了，说：“我们已经是很熟的好朋友了。”其实我们只见过两次面。刚到爱荷华时，他在汽车上迎接我们，他大声地叫着我的姓“王！”然后便要亲我，我吓了一跳，本能地躲掉了。我不习惯这种礼节，可我看出他是个热情的好人。他是“写作计划”的总管。

有一个艺术系二年级的大学生，叫海尔，他是“写作计划”办公室里为我们开车的。他拉着Esther挤到我身边，说要和我说几句话。他问我：“喜欢美国吗？”我说：“我刚来，不知道。可是我已经喜欢爱荷华了。这里很美，人很友好，路上遇到陌生人，他们也对我说‘Hi’！”他说：“因为你看上去很友善，我问别人：‘你喝什么？’别人都不理我，

只有你对我笑笑。”我笑了，说：“你多大了？”他说：“十九岁——”Esther只翻了半句话，然后拉住我说：“他问你的年龄，别告诉他。”“不能告诉他？”我问。我想告诉他，因为我比他整整大十岁。”“不能告诉他。”Esther说完又回过头去和他说什么，好像他们在吵什么，听不懂，该不是为我的年龄吧。

他们对我的年龄和身份都困惑不已，常常问我：“你是作家？”或者：“你是学生？”一位女士，曾是王蒙的英语教员，她告诉我她是怎样和王蒙上课的：“教两小时英语，喝两小时的酒。”她对我说：“你应该和年轻人在一起。”说着把我领到她女儿跟前，想把我准确地归类。可她女儿只有十九岁，又高大又健美，是音乐系二年级学生，她的男朋友站在她身边，那是个细细长长、老是笑着的男孩。问他：“为什么老笑？”他说：“这儿都是作家，我不会写，只会笑，就只好笑了。”“想当作家吗？”他环视了一下周围，说：“看起来，作家已经足够了。”

确实，作家是够多了，挤了满满一客厅和一阳台。日落时，阳台前飘来一只大汽球，汽球正在上升，吊篮里的旅行家向我们挥手呼唤，我们也对他挥手叫喊，祝他快乐，多多地遇上危险而又绝处逢生。

9月3日 晴

晚上，七十年代初期从台湾、香港来美的留学生吕嘉行、谭嘉两位请吃晚饭。吕嘉行现在大学做职员，谭嘉为了孩子、家庭，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。这真是一个中国型的女性，温文尔雅，低声慢语，贤良温柔。他们现在已摆脱了打工的局面，买了一幢房子。买时价值五六万，据说现在可值十五六万。他家有一个很大的客厅，两个卧房，还有一个游泳池。最近又修了一个很大的储藏室。谭嘉说，他们扩建的目的，是想把它卖掉。

“把它卖掉，想回去看看。”

吕嘉行老家是山东，在大学搞的是电脑，但业余爱好文学，曾发表过诗。其中有一首《冰岛》，我记得第一段是这样的：“当人们问起，冰岛那个地方怎么样？我总是说，那地方像月亮，像月亮一般的荒凉，到处都是冰冷的土丘，围绕着她的，是终年暖不起来的海洋。”最后一节是：“……我不能离开这儿，冰岛就是我的家乡。”

晚饭，是我们来爱荷华吃得最舒服的一餐。中国菜、饭，很清淡。特别是他们自己钓来的鱼，清蒸，鲜美异常。

9月3日 晴

早上，我们去散步，顺着爱荷华河，一直走到萧乾伯伯住的爱荷华House，这是这城里唯一的旅馆，也是学校的旅馆。这城是大学城，一切设施都与大学有关。路上有很多人在跑步，一个小伙子跑到我们身后，大声地喊："Hi！"吓了我们一大跳。在旅馆的走廊上，遇到一个上海来的留学生在打工，收拾客房，每小时工资是四元二角美金。旅馆楼前的草坪上，有一对新人在结婚，许多亲戚朋友在祝贺他们，并没有什么仪式，也没带什么食物，只有一大盆鲜花。草坪边坐着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，头发梳得很整齐，穿着一身挺挺的西装，打着领带，皮鞋锃亮，脸上的表情却很严肃，好像在生气。我看着他，他也抬起眼睛深沉地看着我，然后严肃地说："Hi。"我绕过去看新娘，看了之后却失望，新娘不漂亮。可是，并不是说只有漂亮的人才能结婚的呀！

离开新人朝前走，走过艺术馆，周围有很多雕塑，奇奇怪怪的。一个铁铸的轮胎下一丛铁铸的蘑菇；几根废钢管拖曳在地；几块水泥板……是不是因为世界太过于整洁了，于是人们怀念并喜欢起零乱？

晚上，吕嘉行、谭嘉夫妇请全体中国作家吃饭。吕嘉行是爱荷华大学的普通职员，谭嘉本是学文学的，可读完了硕士之后，为了孩子便不再读博士了。他们家很漂亮，很舒适，有一个游泳池。聂华苓一进门就叫："你们改建过了吗？太好了。是要定居了吧！""恰恰相反，是为了要卖出去。"谭嘉说。

陈映真和潘耀明都跑去游泳了，我跟出去看，看了心里便痒痒起来。谭嘉说她有一件新的游泳衣，专为客人准备的。我说，我不穿美

国的三点式游泳衣。池里的人说："大陆的女孩子真封建。""什么封建不封建，我不穿嘛！"谭嘉说："不是美国式的游泳衣，我也从来不穿那种，这对我不合适。"她拉我进房间，果然拿出一件连身的。于是赶紧换上，拿了毛巾跑出去了。

池水很蓝，池边上围着一圈篱笆，篱笆外是青青的菜园、树、房子。房子后面，停着半轮落日，渐渐地，只留下一片金红的晚霞。

七等生和南朝鲜的许先生也来了，许先生说一口漂亮的有点山东口音的中国话，他写作也是用汉语写的。我们都把他当中国人。七等生很自负："我什么姿势都会游也会跳水。"于是他跳下水，游出许多似是而非的姿势。潘耀明极谦虚地向他请教如何跳水，在他的指导下跳了下去，他不屑地看了一眼，说："你不是跳下去的，是栽下去的。"潘耀明便爬上来重新跳。

我对谭嘉说："你们真是太好了。"谭嘉温和地笑笑："可我们并没有家的感觉，虽然我们已经来了十几年。我们还是要回去的，至少要回去看看，我们是中国人。这房子买下的时候是四万，后来修了游泳池。人家都说我们这房子卖不出去。因为买得起游泳池的看不上这房子，看得上这房子的却又买不起这游泳池。所以最近我们下决心重建了。我们以后要回去，等孩子大了。"他们两个孩子很可爱，而且全说着标准流利的国语。这很不容易，大家都夸他们。谭嘉说："这全是因为爸爸太凶了。"吕嘉行说："在家里，他们对我们说英语，我们不回答。否则，不要一个月，他们就会把中文全忘了。"

9月4日 晴

昨天是星期六，今天是星期天，明天九月五日，是美国的劳工节。一连三天休息，学生们都带着睡袋，开了车出去玩了。平时，深夜窗对面河边，不时传来青年们大笑大嚷的声音，今晚更甚。

中午钟敬堂开车带我们三个去吃意大利饼，一位李小姐也陪着同去，五个人吃了五客自取的生菜，两个中等大的煎饼，啤酒，可乐，外加小费共五十美元。五十美元，近人民币一百元，在我国可以吃一桌酒席了。据说这请吃饭的钱，是“写作计划”报销的。意大利煎饼里面有大量的“芝士”，安忆吃不惯，只尝了一小块。多下来很多，都装了盒子，由钟敬堂带回去。在美国，带回餐桌上剩下的食物，好像还是一种美德。

昨天把一只鸡煮了一锅汤，却一直没机会吃它，就约了陈、钟、李、吴祖光、潘耀明一起来吃晚饭，另外加了番茄炒蛋。潘也拿了两盘干干净净的菜来，陈端来一锅没烧烂的红烧肉煮鸡蛋。大家吃了米饭，喝了菠菜鸡汤——真奇怪，这鸡一下锅就烂，就是不鲜也不香。不过大家还是感到很满足，老老少少围坐一桌，像中国的中秋，或春节的团圆饭。

晚饭后，大家去华苓家看录影带，今晚演的是一部美国三十年代电影，得过好几项金像奖。题名说不上来，内容是叙说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，受了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，后来代表美国的工人社会党，去苏要求第三国际的承认，而第三国际却把他关起来，后来放他出来送到远东去作宣传，最后死在苏联。好像是个真实的人物，故事通过各人回忆、通过与其妻的离合组成。有些细节显得不真实，是甩开了大

环境而突出强调起来的，失去了分寸。艺术一旦失去分寸，就成了宣传，就会引起人的反感。这是一条真理，一条规律，不论在东方在西方都一样。

华苓家的二十四寸落地遥控电视机，是放在楼下大厅，也可能是她的写作间。淡黄长毛地毯，三面是中国名家字画，一面是玻璃墙。里左角是一张大书桌，桌上，地下，都是书。在这里，人们赤着脚，可以躺在沙发上，也可以卧在地上，喝着啤酒、可乐。可以看书，可以看电影录像，也可以什么也不看。这里不算是豪华的，但是够舒服的，可以说是舒服得接近奢侈了。可惜人的肢体不能膨胀开来，无论是躺是卧，只能占一个地方。吃呢！人的胃更是有限。人，为了这样的生活，可以不惜一切的去追求，去拼搏，去竞争。在这过程中，把一切都奉献，一切都失落了，久而久之，便产生“我在哪里？”“我为什么活着？”“活着又为什么？”……

一种思潮的产生，恐怕不是凭空由文人骚客想出来的。美国青年人的失落感，也绝不是因为吃饱饭没事干而撑出来的。由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，人和电子计算机、电脑展开了竞争。中国的生产方式还处于古朴阶段，特别是农业。近几年来，考大学恐怕是竞争最力的一个地方，但离失落感也还遥远。

9月4日 晴

今天人很乏，起来吃了早饭，又一头栽倒睡着了，直到十一点多，Alex来带我们去吃意大利脆饼（Pizza）。

这是一个极精致的餐馆，一座红房子，铺着红格子的桌布，侍者穿着红色的衣服，戴着红色的船形帽。吃过Pizza，还有权利以极便宜的价格买一只红色的装运动器具的提包。Pizza还算过得去，然而这好吃的程度远远比不上它的名声和它所需要的代价。我觉得美国吃东西，声势很大，亮晶晶的杯啦，亮晶晶的刀叉啦，鲜花啦，烛台啦，可内容却有点贫乏。不过，我喜欢这里的气氛，很安静，很清洁，侍者很有礼貌。

Alex告诉大家，今天晚上八点钟，他来车接大家去和写作班的学生们见面。这写作班是爱荷华大学的一个研究院，是保罗·安格尔早在“写作计划”之前创办的。记得，一九八〇年在北京文学讲习所，我就听保罗·安格尔和聂华苓介绍过它，美国有很多如今已盛名于世的作家、诗人来自于它。大家关心地问：“是去吃晚饭呢，还是吃过晚饭去？”Alex说：“没有晚饭，不过总有东西吃的，大家稍微吃点晚饭去吧。”于是，大家的表情都有些失望。我对身边的七等生说：“晚上你要不开伙，来我们这里随便吃点面条好了。”不料他认真了起来：“有饭吗？”“烧饭也很方便。”“那么就吃饭吧，我只吃一碗饭就够了。”“好的。”“我六点钟来。”一下子，连时间地点都确定了。然后，妈妈又邀请了在座的各位。

晚上六点，大家都来了，潘耀明和吴祖光伯伯带来了一个火腿丝，一个鱼松，陈映真带来一锅没有煮烂也不红的红烧肉：七等生空

着手，有点不好意思，可他立即发现了一个弥补的机会——我们没有筷子，而他有，立刻回身去拿了一大把筷子，大家这才坐定。吴祖光伯伯说：“像这么傻吃，非胖不可。”

美国人最怕的便是胖了，辛辛苦苦地长跑，辛辛苦苦地节食。商店里专有去糖分的白糖、饮料，去脂肪的牛肉、牛奶。减肥，成了一个社会运动了。

夜里两点钟，公寓门口，正好在我的窗下，停了一辆小汽车，几个男女学生和一条狗，在那里发疯，大声地叫喊，拼命地狂笑，实在叫人生气。我一定要学会一句骂人的英语：“滚开！”看来，这和“Hi”一样的有用。

9月5日 阴转晴

C这人很潇洒，很随便，也很谦逊，给人一种信任感。前几天买了一条旧卡其裤，嫌热了，就把两只裤腿一剪，变成了短裤，毛乎乎的裤脚也不缝一缝。前两天就穿着这样一条短裤，下面趿了一双拖鞋，去出席华苓的酒会了。当时觉得很好玩，今天看见一个美国女学生，也穿了一条毛边短裤，原来这是一种流行的时髦款式。在服装店里，还有成排的被机器拉制得发白的牛仔裤，价格比新的还贵。据说，这也是对中产阶级的一种无声抗议。真的，如果这种款式一流行，而且流进中产阶级的社交场所，那么，那些衣冠楚楚的人，一定会显得很"戆"。反过来说，在发展中国家，老百姓上街不是买新衣服，而是买一条被机器拉得发白的毛边裤子，也是不可思议的。试想一下，《黑娃照相》里的黑娃，不是想买一件簇新的红色球衫，而是想买一条这种最时髦的旧劳动布裤子。这不是有点滑稽了吗?

今天一天都很清闲。晚上，潘耀明炒米粉干给大家吃。在中国作家里，他的烹调技术最好，因此也就最辛苦。吃完以后，一群炎黄子孙在他房里席地而坐，拍了一张照。

半拉子中国人许世旭在新加坡华文作家会上，认识萧军，并录有萧军女儿唱的歌，他放录音给大家听，于是从歌唱谈到民族化问题。陈直截了当表示他主张民族化，并叙述了他这种感情的来历。台湾在日本统治下多少年，现在又成为美国老板的劳工市场；到处是西方音乐和歌曲，偶然听到一个富有东方味的，可是再一听，又是日本的。他苦笑了一下，结束了他的话。

台湾人对日本的憎恨，已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。从文学作品看，也反映了这一点。而大陆和日本人民，却已是莺语樱花时期。

9月5日 阴转晴

夜里好像下了几滴雨，天有些阴，凉快了不少。据说今年的爱荷华是空前绝后的炎热，整个美国也都发疯似的热，华盛顿至今还热得死人。今年中国也热，上海、北京都是前所未有的热。看来，这是全球性的气候混乱。

大家都在议论一件大事，一架南朝鲜民航飞机，被苏联打下了。飞机上有二百多名旅客：二十五名美国人，其中有一名议员；三十几名台湾人；其他均是南朝鲜人。大家谈了很久，神色都有些黯淡。

下午，许先生通知大家，那爿东西店今天特地为我们开门。今天本是不营业的，因为过节——美国的劳动节——奇怪，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本是出自芝加哥工人罢工，而如今美国自己却不过“五一”，而过“九五”。今天放假，邮局不收信，清洁工不收垃圾，餐厅不开。东西店特为我们开，全是看在许先生的面子上，他们是同胞。过了一会儿，老板、老板娘就开着车来接我们了。在店堂里，遇见一对台湾小夫妻，男的在读统计，女的因为怀孕休课了。那女孩子长得很秀丽。看到陈映真，他们都大吃一惊，他们以为陈映真还关在绿岛呢。当他们得知我是从大陆来，都一怔：“从大陆来？”“是啊！”我说。“从大陆来？”他们又问了一遍。“是啊！”他们露出一种又高兴又困惑的表情。我向他们伸出手，他们立即握住了。大家说：“这是历史性的握手。”那男学生说：“可惜没带照相机。”

时差造成的感觉还未消失。我发现这种感觉决不是明确的颠倒，而是，乱七八糟。突然之间，一阵疲倦袭来，极想睡觉；忽然之间，

情绪莫名的亢奋，怎么也睡不着了。叫人摸不着头脑。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正常起来。

越想越奇怪，今天是美国劳动节，凭什么？问谁谁也不知道。

夜里，风大极了，闪电从窗掠过，一阵阵耀眼的蓝光，叫人觉得，即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了，比如：地震。

9月6日 晴

一大早，火警又响了起来，大家站在门口犹豫，是否要跑下楼去。可总觉得不太可能在一星期里发生两次火灾，并且似乎气氛也总有点不够。正犹豫，警报却停息了。后来听人说，是由于台风。台风也会引起警报？这声音实在是太令人胆战心惊了。

吃过午饭，我独自背着照相机去公园玩。这里真安静，小松鼠在绿茸茸的草地上跳来跳去，一点不怕人。草坪那边，两个男学生赤膊躺着晒太阳，其中一个穿着大红的短裤，在阳光下闪着极鲜艳的光。我站住脚，决定用风衣垫着照相机自拍。正垫着，那“红短裤”笑盈盈向我走来。原来我垫照相机的架子是一个水龙头，他要喝水。这里，冷水是可以直接喝的，可是热水管里的热水却绝对不能喝，用热水洗了碗还要用冷水冲一冲。等他喝了水，干脆请他替我按一张了。他很乐意，和我说起话来。可我听不懂，很不好意思，说了声“对不起”就仓皇离去了。跑到路边，路上开过一辆车，开车的人朝我笑笑，说：“Hi”我朝他挥挥手，不料他将车停了下来，我猛然醒悟，我是作了一个近似搭车的动作。不好意思，只好装成一无察觉的样子，头也不回地径直走了，心中则是十分抱歉。

下午三点半，在聂家阳台上开会，介绍全体工作人员和大家认识。我认识了将要为我们开课的英语老师。她是翻译班的研究生，长得非常漂亮，高高的个子，长长的脖子，褐色又带点金黄的头发剪得很短，眼睛是蓝色的，有时候又是褐色的，显得有点神秘，笑容很矜持。我觉得她太漂亮了，漂亮得有点难以接近。

开完会后，和七等生、Esther一起上城里寄信。妈妈把一个本应该让爸爸寄给我们的信封装上了寄给爸爸的信。因为美国和中国写信封的规则正相反：我们是把收信人的地址姓名写在上面，而他们则写在下面。就这样，我们花了四十美分给自己寄了一封完全不需要的信。时间已是四点四十，据说邮局五点半关门，这是七等生在旧金山得来的经验。学校的巴士等不及了，步行吧，据说只需要二十分钟，然而却走了三十多分钟。到了那里，门已经关上，原来，爱荷华城的邮局是五点整关门的。幸好，门外有自动出售邮票机。信是寄走了，只是陈映真托我买的十元钱邮票没法完成了。身边只有两张一元的钞票，在换零钱的机器里换了两元钱的硬币，这机器只和一元的钞票换硬币。替他买了一套邮票，挑了一套霍桑的纪念邮票。他是作家嘛！然后，我们去冰淇淋店吃冰淇淋。冰淇淋店有点像油漆店，几十桶不同颜色的冰淇淋排在玻璃柜下。七等生说："我请你们客。"Ester说："不要，咱们来美国规矩，各人吃各人的。"七等生说："才这几个钱，我请算了。""就因为钱少，才不要你请。"我们说。于是各人买各人的，这是我来美国后所吃到的最好吃的东西。店门外的街上，有着石桌石椅，一只松鼠从这张石桌上跳到那张。星条旗下了半旗，据说是为了那乘坐南朝鲜飞机失事的国会议员。

回"五月花"的路上，我问七等生："你为什么要叫七等生呢？好奇怪的名字。"他说："也没有为什么。上初中的时候，在家闲着无聊，每星期我就出一张纸的刊物，画些图画，写些东西，有一些是抄来的。每周出一张，一张白报纸。一直出了五十多张。后来，在一次特大水灾中，被洪水冲走了。""真可惜。""出这刊物时，我就给自己起笔名：七等生。纯属为了好玩。"

"为了好玩？"

"为了好玩。"

9月7日 晴

前天夜里下了一点雨，天气马上转凉。但到下午转晴，满屋仍是西晒太阳，热不可耐。一个小小的冷气箱，似乎丝毫不起作用。

“写作计划”今天组织大家去参观校园。“五月花”公寓前每小时有四班免费交通车，可以载你到城里任何一个学科大楼去。只要在车子的线路上，可以要求随时停车。

其实爱荷华市整个就是一个大学。几个学科分布在全市。所以哪里都是校园。大概是要考试了，马路旁的草地上、树荫下、车站边，好多个学生都在看书，看卡片。这是来这里以后，第一次看到学生的用功劲儿。平时看到的是划船，打网球，骑自行车，跑步，晒太阳。

学校有很大的图书馆、学生中心、音乐厅、银行、百货商场、餐馆、咖啡馆、冰淇淋店、超级市场。我们住的“五月花”公寓，只是学生宿舍的一种。这里另有一些单幢房子，学生可以租一间，也可以租一套，视各人经济力量。房子的样式都不一样，一幢幢掩映在绿荫后面，十分精致小巧。李小姐就住在这一单幢楼里，据说里面的设备、条件，还不如“五月花”，所有的房客合用一个厨房。

因为是个大学城，年轻人居多，衣着随便，大街上常有打赤膊骑自行车的，活跃，健康，有股子青春气息。

安格尔被误诊了。他不是风湿痛，而是耳朵里长东西，需要开刀。聂华苓一定很着急，中国朋友们不知怎么才能安慰她。

安忆今天参加了英语学习班。

9月7日 晴

夜里很冷，几乎是冻醒过来的。又没有勇气从床上起来关冷气，因为我害怕接近冷气机。然而不去关它，它就将继续制造冷空气，下了半天的决心，才爬起来关了它。我发现我们屋里的冷气机，在天热的时候不起作用，天冷了才起作用。真可气。

下午却又热起来，热极了，据说有八十几度。我不知道华氏八十几度等于摄氏多少，只觉得相当的热。

和Esther在门口等车，大家一起去参观校园——也就是参观爱荷华城，这是个大学城，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大学生。一些学生在长跑，一些学生骑自行车飞驰而过，远远的，河上有几只小船在漂。

“这里的大学生老是玩，从来没见他们学习，像你边上的这个人，我很少见到。”我说。

Esther回头看看她边上的人——一个皱紧眉头翻看卡片的男孩子：“我边上的这个人马上要考试了，这是他最痛苦的时候。”

车来了，把我们载到市中心，旧日的首府——五角楼——现已是学校的一幢楼。楼前的大草坪上，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学生，远远看去，像花儿一样。一个摇轮椅的女孩子从草坪前过去，她长得十分清秀，有些削瘦。她的轮椅很漂亮，很轻便，用电钮，转动十分轻便灵活——我想起我的一个舅舅，他中风瘫痪之后，始终没得到一辆合适的轮椅。假如他有一辆轻便的轮椅，可以经常地从他那小屋子出来晒晒太阳，逛逛，也许他还可以多活几年；我还想起我的一个也是坐轮椅的朋友，听说他想要一辆有马达的轮椅——我只是听说，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表示过……

“美国大学也收残疾学生吗？”我问Esther。

“收啊，他们的学费还可以少一些，因为有残疾人的福利基金。恐怕录取分数线也是另一种标准。爱荷华是特别照顾残疾学生的。比如，有专门供他们进出的门，他们的轮椅一到跟前，那门便自动开了。好多别州的残疾学生都想来这里念书。”

我们一起参观了学校图书馆，又去参观“写作计划”的办公室。“写作计划”送我们每人二十本书，自己到书库里去挑。书库很小，一次只能进五个人，乱哄哄的。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轮到，只能绝望地站在人群中。爱德文递给我一个纸箱，把我推了进去。他是个很好的人，他很真诚、热情，看到我，总是又惊又喜的样子。我很惭愧，我没能够作出相应的表情来回答他的热诚。我请求他让Esther陪我进去，他也答应了。可是里面的书很有限，大多是诗，而且是相当著名的诗人作品，可惜我不是诗人，也不懂诗。挑了很久，才挑够二十本，其中有乔治桑的自传小说，惠特曼的原版《草叶集》。我希望我能学会英语。面对这么多书，眼馋得很，可是只有会英语，才能拥有它们。

在办公室里，看到了他们复制出来的我的《小院琐记》，是从《中国文学》英文版上复制的。我对Alex说：“我的作品复制出来了，你是不是可以交给写作班的老师，请他看看。”我想去写作班听听课，这写作班的历史比“写作计划”还更长，据说白先勇就是从那里出来的。Alex的表情似有些为难：“我已经送给那老师看了，可他还没有给我答复，可能因为从中文翻成英语，有些东西……”他支吾起来，而我也明白了。可能他们对我的作品不满意，觉得我还不够格。我毫不认为我不够他们的标准，我只是沮丧，我们与外界的沟通实在是太不够了。我真想使他们了解我们、我们的作家和作品。可是我觉得这里的人并不渴望了解我们，只是不断地向我们表现他们。我应该找一些机会表现我们自己，可我是太不善于此道，“中国周末”的活动又因为经费紧张取消。而且，语言不通。

明天上午英语课就要开始了，许先生问我去不去，我说：“当然去。”他又问妈妈去不去，妈妈说：“不去了。”许先生于是就发表了一个见解：“一个人应该以不学外语而骄傲。”我只是笑笑而已。在这里，常常有这种感觉——由于不会英语，不得不把自己关在门里。自然，这是美国，应该说英语。可是作家之间呢？来自那么多不同的国家，为什么只承认英语一种语言呢？其实，中文，是被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运用着。而且，中文有着极大的魅力，一个字就是一个境界——然而，对这境界，我究竟又了解了多少呢？尽管我说汉语。我忽然沮丧起来，真正地沮丧起来。

晚上，看了七等生的一个小小的短篇，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着：

“无疑是往日的一个偶然的机遇所种下的裂创根植在心底里，当时，他们在一条草径，谁也不知道对方是谁，互相之间，也没有恶意的预备，在相遇的瞬间才知道是误会，但已经不免互相被对方的形貌惊讶了起来……那时，他现在清晰地记得，正是一个浪漫的，无责任的，快乐的，自由的年代，是常常与一群人在一起的时代。”

看了这一小篇，我们似乎对这个人有了一种了解，联想他小时候自个儿办刊物等等。我想：这个人从小就习惯生活在自己的心境里，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寻找乐趣和安慰。自己苦闷自己，自己娱乐自己，自己折磨自己而又自己温暖自己。自己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角落，全被他细致地寻找、体味、搜察，不断地发掘出一点新鲜的、陌生的东西。他和自己生活在一起，他和人群不协调。下午，他一下车便离开大伙儿自个儿走了。

9月8日 晴

今晚西德来的女作家过生日，看样子，年纪当在四十以上。保加利亚的作家来邀我们去她房里坐坐。我们带了礼物去时，她房里已乱哄哄挤满了各国作家，她已喝得差不多了。房间里极热，又挤了那么多人。她汗流满脸，头发都披挂下来，抓着我直说话。她的英语不怎么样，我更是不怎么样，只听懂她八〇年来过中国，到过北京，上海；而且在上海还爱上了一个叫做“白银”的人。

“白银”是谁？我搜遍了脑海，也想不起有这么一个人。问她是否年轻，她说，不，年纪很大了。不知是她酒后的幻觉，还是真有那么一位同胞，老来交了桃花运。

9月8日 晴

下午三点半，去参加美国当代诗歌的讨论会，Esther坐在我身边，为我作翻译。这里有五位卓有成就的诗人。保罗·安格尔住院了，他要开刀。至今才发现，他的耳朵疼根本不是因为风湿，而是一种很毒的细菌，进了耳骨。因此，今天就只到了四位。

第一位叫Gerald Stern，他谈到美国诗歌的政治化，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倾向。接着，他朗读了美国当代著名诗人Williams的一首诗。诗的大意是：美国的历史——不停地为国际事务烦恼，介入别人的战争之中。而美国最好不要成为世界事务中的圣者。诗人呢？只需要自己和美国本身结合，不要理喻其他。

第二位诗人是个黑人诗人，名叫Haki Madhubuti，这是个不迎合学院标准的诗人，强调原始性、自然性。谈到美国现实中一些违反自然的畸形现象，比如同性恋，指出，美国是最不文明的国度。他读了自己的一首诗，这首诗是写给一位失望后终于离世而居的诗人，这诗人以为诗是无足轻重的。他告诉诗人：诗可以联络代与代、文化与文化，它沟通人们的记忆，是人和生物的核心。

第三位诗人说：有人视美国无历史，又误以为历史为文化，于是便得出结论，美国无文化，只能从其他文化吸收灵感。他认为美国的根在本土，美国的诗的对象——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性。他的名字是James Galvin。

第四位诗人，Marvin Bell说，美国诗歌的主题是真实。他读了自己最近的一本诗集中的几首诗，其中一首的大意是不断地不停地走，

走；生，生；长，长；尽管日常生活中没发生什么特殊的事件，可是这么活下去，终会有一扇门打开。

他们的报告就此结束，然后就开始提问和回答。有人问："现代诗人都写一些微不足道的题材吗？"一位诗人回答："现在诗人的题材又逐渐开始扩大，回到荒原，上帝。"一位黑人女学生说："黑人的受压迫的愤怒，只要喊出来便是抒发感情的诗。应该参加政治运动，才能有政治激情，写出激情的诗。"诗人回答她："有政治激情的诗人是因为投身于这运动，而并非为了有诗情而投身运动。社会的责任感每个人都应该有，而不仅仅只是诗人。如何处理政治题材才是真正的重点。"

"写作计划"的一位土耳其诗人说："现在的诗比读者多。"诗人说："这说明诗成了生活的一部分。"又有人说："好像诗里面只有人生的痛苦，诗只能处理痛苦。"

"没有啊！"诗人们回答，"然而痛苦是人生的副产品，我们希望，只理会单纯的美，可是芝加哥现在就有人饿肚子，无法回过头去。"

讨论会结束了，只两个小时。然后，大家一起去喝饮料，聊天。一位翻译班的台湾学生小陈坐在我身边大谈人生——人生中的苦恼有多么多，负担多么重，不能再人为地制造了。为什么要有别离——我说："一个中国分为两半是很难受。"他则打断我的话："我不谈中国分离的问题。"他说他是诗人，把他发表在台湾诗刊《秋风》上的诗给我看，大意是一个学生被关在图书馆里，从窗户看到桥上有一个姑娘走过。七点钟了，要回"五月花"了，许先生提出沿着河走回去。他很喜欢爱荷华河，称它为"爱河"。小陈和Esther便陪着我们走。小陈一路上大发诗情："爱荷华河里的每一个漩涡都是一个问号，问我们：你在哪里？""小松鼠的尾巴告诉我们什么？它的四只脚着地，尾巴却永远不着地，这就是它告诉我们的。"当Esther看到枫叶，过去采却又发现那不是枫叶而退回来的时候，他说："这是个象征，你以为是爱情，结果不是。"Esther忍无可忍地说："你能否暂时忘记你是个诗人半小时？"

晚上，已经洗过澡了，有人敲门。原来，一位西德女作家今天生日，邀大家全去。我们匆匆忙忙地换了衣服，拿了一点小礼物，赶了去。一屋子的人，她已经喝醉，泪汪汪的。吴祖光伯伯的女儿小霜正从印地安那大学来看他，也跟大家一起去了。她和一位保加利亚诗人攀谈起来。当他知道小霜是学花腔女高音的，便说："我有位朋友，是个很有名很有名的花腔女高音，她的名字是，我忘了。"

今天一整天，被诗人们弄得天昏地暗的。

9月9日 晴

中午一时的大太阳下，公路对面的草地上，平展展地铺了一条浴巾，上面躺着一个光着上身的男青年，当然是学生。他两手垫在脑后，一动不动地躺着。谁能告诉我，这位美国青年在想什么？……一个穿短裤的女学生，横过公路，走近去，又走远去了。

美国的生活方式，这也是一种。是我们不理解的，但不能说是不健康的。

傍晚，学校举行艺术“前奏”晚会，有该校舞蹈系的艺术表演，画展，爵士乐队，可以跳舞。还供应一个野餐盒，咖啡，甜点。门票是十三元，地点在音乐厅。

当我们走到音乐厅前的草坪上，便有拿着大串彩色气球、画着白脸的男女小丑，蹦蹦跳跳地前来引路。一进入大厅，心里便顿感吃惊。在两棵室内树后，正有一裸体女子，在甩着长发进行独舞。一些穿着整整齐齐的绅士淑女，端着盘子在旁欣赏。找了一个缝隙再仔细一看，原来并不是裸体，而是穿了一件肉色紧身舞衣，正跌滚跳跃，跳着现代舞。内心不禁对自己刚才的那一惊，有点害羞起来，中国人不敢面对一个灯光下的肉身。我，也难免于此。

第一次看到现代舞，只看到舞者合着音乐，甩发，跳跃，做出各种姿态。很不懂，没有芭蕾那种美感，也没有中国舞那种模拟各种生产动作，让人一目了然。我看那些站在一边欣赏的人，也未必懂。这里只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交际场所，那舞蹈不过是一种点缀。蓝蓝是舞蹈系的教授。她说这是系里的一个学生，跳得不怎么样。蓝蓝说，在这舞蹈系学习数年，拿到硕士学位的人，能进入专业舞团的约百分之

四左右，其他的则需改行做秘书或职员，或结婚在家做主妇。大学毕业之后，失业问题对青年还是一个威胁。

凭票领来了野餐盒子。就餐的桌凳，楼上有，室外草地上也有。我们中国人，包括许世旭，都去室外，用两张桌子并起来，一起围桌而坐。盒子里有一只烤鸡腿，一只面包，一份生菜，一杯洋山芋芝士，一小串葡萄。美国的鸡可能是用激素催肥的吧！不香，不鲜，味同嚼“渣”，这也是一种对违反自然的惩罚吧！没办法，弃之虽然可惜，但也无法下咽。

晚饭后去美术展览馆。展品不多，有些展品真还不如公园里的一些室外雕塑呢！那里有一件作品印象特深，是一只钢铁制成的旧轮胎，斜斜地竖在地上。在“轮胎”着地处，钉有许多铆钉似的钉子；像钉子，又像是黑色的蘑菇。再从远处一看，这两者形成了一个花圈，那黑色的花，从花圈上垂挂下来，给人以美感，也给人以启迪。试图去解释它，可能是不聪明的，可是它仍给我一种联想，联想到路程和归宿。

9月9日 晴

下午，是集体购买东西。海尔开车带我们去，车开得飞快，把我们拉到一个叫Hy-Vee的地方，停住了。这个地方我们谁都没来过，我们一直是在Eagle买的，因此谁也不肯下车。海尔对我们解释：“这里，确是第一次来，可是可以试试。”于是，大家疑疑惑惑地鱼贯下车，走进了商店。然而满架的商品全是日用百货，没有食品。于是张惶失措地打听着：“food?”“food?”“food?”原来“food”在隔壁的商场。对这里不熟悉，可还是把要买的都买全了。我们和许先生进行得最快，许先生又要求海尔带我们去一趟东西店。他绕了好大好大的圈子才找到“东西店”。面对这么多七嘴八舌的人，又紧张又茫然，有点可怜。当人们全部上车，车子开回“五月花”时，他又犯了一个错误，本应当开到后门，可以拿手推车把东西推进电梯，而他却开到了前门，没有车子，还要走一大段台阶。看他这么辛苦，也不好责备他了。

晚上六点钟，大家一起前往Hancher。Hancher是一个剧院，爱荷华大学的艺术中心。今天晚上，这里有一个大学的晚会，题目为——Art’s Overture，翻成中文，则是“艺术的序曲”或是“艺术的序幕”，似乎不太通顺，反正就是表示，是一个即将开始艺术生涯的艺术家的预备时期，这是艺术系的晚会，而今天是爱荷华大学一个传统的艺术节，每年九月里举行一次——有人告诉我们。

走进大厅，舞蹈系的学生正在表演现代舞——一个女孩子，裸着身子做出一系列动作，这远不是舞蹈，而似乎是企图直接地表现某一个意念、哲理、思想的动作。蓝蓝告诉我，这是学生们自己创作的舞。地下室在放电影，可惜已经放完了，我们到晚了。

“这几天在写什么呢？”陈映真问我。

“什么也没写，只是想多看看，另外，还想学英语。多会一门语言，就好像自己的世界多开了一扇窗。”

“是的，多开了一扇窗，假如今天，这扇窗不开，我们怎么能看到这一切呢？”他抬起手在前面划了一下。前边是爱荷华河，夕阳照着河水，野鸭子在河里呷呷呷地叫。“在台湾，要想看野鸭子，必须走很远，带着望远镜，悄悄地躲在树后边。”

“我看了一些台湾作家的作品。这些作品反映的生活非常狭小。其实，台湾的生活，还是有很多危机，为什么作家感受不到？而作家总是有头脑的。”

他笑了，夸奖我：“这个问题提得好，你很聪明。”

凭票领了盒饭，这是很丰盛的一盒饭，有白脱蛋糕，炸鸡，色拉，还有一串葡萄——这是最好的，其他的东西都很难吃。一边吃一边骂美国菜——真笨啊，多好的东西，给糟蹋了。蓝蓝注视着潘耀明：“你的脸为什么这样黄？”

“他太辛苦了。”我们说，“他学习很用功。”

“英语学得怎么样啊？”蓝蓝关心地问。

“我的英语发音不准，老师说。”

吴祖光伯伯说：“你的中文发音也不准，你对老师说。”

大家都笑了，他的福建口音很重，使得他的普通话和英语都有点怪。我们笑，他也笑，一点不生气，他很厚道。

一位背着一大串汽球的小丑来到跟前，用夸张的手势，邀请我们跟他去参加联欢。于是，我们站起身，随着他，沿着河，走回到博物馆前的平台。爵士乐队开始演奏，强烈欢快的节奏，把人们的情绪一下子鼓动了起来，人们便开始跳舞，很开心。大厅里又在供应甜点心，一人一份cheese蛋糕，太腻了。Esther说：“吃这一份，明天一天

都不能吃东西啦。”这里的食品都是高脂肪、高糖、高蛋白。妈妈说我这几天已经胖了。

“你的未婚夫在香港？”我问Esther。

“不是未婚夫，是男朋友。”

“你得了学位以后就结婚吗？”

“不知道呢。我们要分开这么久，谁知道见了面以后能不能互相适应。来到美国以后，我有了一些变化。我不知道，带了这些变化，我们是否还能融洽。”

“有一些什么变化？”

“我的独立性好像强了。过去，我很依赖别人。而到了这里，什么都要靠自己，什么都要自己考虑，自己决定，自己解决。没了钱，本可以写信回家去要，可是却不好意思起来。这里的学生都打工，自己供自己读书，都是很小的孩子。”

“学习苦吗？”

“苦，可这是正常的。”

音乐越来越强烈，人们跳得越来越起劲。

“你会跳舞吗？”我问她。

“不会。我的男朋友很会跳，我和他认识，就是在他举办的一个舞会上。”她还是很想念他的，我看出。

潘耀明想学跳舞，我带他下去跳了一会。我惊讶他真是一点都不会，我不明白香港这种地方居然会有不会跳舞的人。“难道你认为香港人一天到晚在跳舞？”他说。

小丑们背上的汽球都解下来系在栏杆上，人们都去摘。我们想要，又不知怎么去要，要钱吗？我们可是身无分文。潘耀明过去试探，并不要钱。他先摘了六个，给我、Esther、小霜。一人两个。然后

又去摘了几个。第三次去时，他带来了一大蓬，是用打火机把线烧断一起摘下来的。这回，他开始体现国际主义精神了，在场的外国作家，每人都有。

今天又是周末。一周的学习结束了，学生们尽情地发泄一周以来压抑着的情绪。街上的爵士乐响得几里以外也能听到。汽车飞快地在路上行驶，一辆车停了下来，大声问道：“是谁在过生日？”房子前的台阶上，坐着一对对的男女学生，一个女孩子情不自禁地向我们的汽球扑过来，把潘耀明手里的三个要了过去。我们的汽球在这一路上出足了风头。

今天是他们最快活的日子，好像节日。而这节日是太多了，每周都有。快乐太多了，这地方有着太多的快乐。

9月10日 晴

安格尔开刀了，结果很好。创口比原来估计的要深，耳骨里感染了一种特殊的细菌，已近脑骨。

晚上潘耀明烧了菜，做了汤（是他从香港带来的极好的大花菇），请华苓来吃晚饭。这几天她为了安格尔的病，心力太累了。两天不见，她脸色又苍白又瘦削，憔悴了不少。但她仍然是那样高高兴兴的。蓝蓝说“老爹”在开刀前嘱咐了她许多话，妈妈哭了。蓝蓝说：“我从来没见妈妈哭过。”现在她毫无哭的痕迹，兴高采烈的样子。性格果然有点像她的生属——牛。

9月10日 晴

一早，就来到公园写日记。这里有一张红色的桌子，已成了我的写字台。树影在青草地上闪来闪去，松鼠在桌子上跳来跳去。爱荷华，像一个童话。

下午，去聂家，看吴祖光伯伯的话剧录像《风雪夜归人》。他从国内带来的录像带，因为型号与美国的不同，不能放。在旧金山时，那位京剧爱好者赵先生主动揽下来，为他翻录。赵先生是四十年代末从大陆来的，靠开洗衣机铺发了财，现在已拥有很多洗衣分店以及一个洗衣机械厂了。他收藏有很多录像带，几乎是一个小仓库，还拥有不少设备。“要迷就迷到底了。”他说。他为吴祖光伯伯翻录的片子日内已寄到，于是大家兴致勃勃地一起去看了。在这里，不容易看到大陆的电影、电视。台湾留学生多，有同学会，还有机会看一些台湾电影。然而，那翻来的片子是小号的，不能在聂家电视机上放映，需要再一次翻录。蓝蓝的姐姐薇薇来了，她在爱荷华附近的维斯康辛州念比较文学，正在写论文，是关于张恨水的。她是为安格尔老爹的病来的。她们都叫安格尔——老爹。她为大家开别的电视看，电视里正比赛网球，便谈起了胡娜。胡娜在这次比赛中，第二轮就被淘汰了，夺名次是一无希望。既然看不成《风雪夜归人》，那么就回去吧，别在这里打扰了。安格尔刚动过手术，还在医院，家人的心绪很乱。

我们慢慢走回“五月花”公寓。潘耀明决定晚上请客，一方面送小霜，她明天就走了；另一方面也请聂华苓和薇薇。

潘耀明做的汤鲜极了，大家赞不绝口，又一个个抱歉起来。“下一回该我请客了。”陈映真说。“你就烧红烧肉。”大家鼓励他，那是不红

的红烧肉。七等生的节目则是看不见蛋的蛋炒饭，他许愿道："下回我请大家吃'燕京'。""燕京"是街上一个中国餐馆，据说难吃得出奇，而又贵得出奇。许先生说："我请你们吃什么呢？"他很为难。他很骄傲他的下面条，然而除此以外便什么也不会了，不会开罐头，并且惧怕一切电器用具。他在家里什么也不干，这是朝鲜的传统，什么都是妇女来干。"可是我在外面做事呀。"他说。"你打电话给你太太，让她在电话里指导你做菜。不过，这样的话，每只菜的价值都要增加很多。"大家为他出主意。他想了一下说："我可以请东西店的老板娘帮我来做菜。""这是大手笔。"大家感叹，他微微笑而不语。

又谈起了那架飞机。苏联的态度很强硬，强调南朝鲜飞机进入了苏联领空，并且说，假如今后再发现这种情况，仍然要打，不会改变做法。而许先生说，南朝鲜飞机进入苏联领空是为了省油而取直航线，可是为什么苏联跟踪了两个半小时，他们居然一无回应呢？然而这究竟太悲惨了，二百多个无辜的旅客啊！

许先生伤心地说："我这次来之前就有不祥的预感。""哦？真的吗？"陈映真说，"假如以后你有什么预感一定要提早告诉我们啊！""真的，我真有预感。苏联是吃醋了，它是吃醋了。'老大哥'也不帮助我们。""老大哥？"我很奇怪。"美国啊，美国是南朝鲜的老大哥呀，他不叫打，我们就不好动手。""你们不要'老大哥'的允诺，脱离他们，打好了。""那是打不过的呀。"他认真地悲哀起来，一边吃着锅巴。

七等生也爱吃锅巴，他们已经不会用铁锅烧饭了，都是用电热锅，电热锅烧的饭没有锅巴。

晚上放大陆电影《西安事变》，其实已经看过了；可还想看，想看大陆电影。观众大都是中国学生，又大都是台湾学生。不知怎么，中途有一些人走了，是不是嫌太长了？潘耀明安慰我说："他们是去洗手间。"可是有一些人去了便没有回来。我希望他们喜欢这个电影，虽然我自己并不喜欢。电影结束，走出去，海尔一见我就说："good！"

他的表情很真诚。可是，在汽车上，很多很多人说：“太长了。”“Long long time！”

9月11日 阴有时有雨

朱妲丽（笔名小香婆）从她家打来电话，邀我去她那里，说是我们如去洛杉矶，就必经她家。相距千里，电话声音如在本市。

晚上，爱荷华州的第一银行，也就是所有作家在那里存钱的银行，为大家开酒会。从总经理到高级职员都成了酒会上的招待员。总经理是海军出身，在一九四五年随他的军舰到过上海。他带我和安忆参观了他的办公室，那里有那条军舰的照片。他很想再去中国看看。我猜，他去上海的话，还会有一些地方认得出来的，不过浦江公园门口的“华人与狗不能入内”的牌子没有了，确确实实没有了。

一下雨天气就骤然转凉，回来时都有点冷了。

9月11日 阴

下午，楼下发生了一桩事，一辆车轧伤了一条狗。那情形看起来是十分严重的。肇事的汽车停了下来，警车来了，狗倒在地上，围了一些学生。等我跑下楼去时，那条狗已被几个男生抬上警车，还捧给它一碗水，而它只是微微地抽搐，拒绝饮水。肇事者是个女人，紧张地绷着脸，一丝笑容也没有，给警察解释着，警察用尺子横来竖去的量了一会儿，然后，两辆车就一起开走了。那闯了祸的要赔款呢，据说。这里，狗的价值和人差不多。因此，他们一点儿不能理解中国人吃狗肉，他们听起来，就好像是吃婴儿肉似的。陈映真有个弟弟定居在美国了，有一次对孩子吹牛：爸爸当年是如何英雄，杀了多少条狗。孩子到学校吹给同学们听，同学们又回去吹给家长们听。从此，家长们都不让自己孩子与他接近了，还有人打电话给他父亲："你儿子说你打过狗，是真的吗？"好像他成了一个杀人凶手。

晚上，去第一银行参加一个招待会。因为我们的钱全存在这里，他们是为了表示感谢而为我们举办的。招待会就在银行里举行，今天星期天，不上班，就在办公桌上铺了白桌布，放了酒、饮料、cheese、面包，很简单的一点食物，没有什么排场，气氛却很亲切而轻松。银行方面参加招待会的是银行的职员和股东们，股东中有不少是医生，医生是很有钱的。有一位医生，曾在四六年去过上海，是跟一艘船去的，他是船上的医生。这是第一艘去中国的船，他则是第一个去上海的医生——他自己说。他又是搞艺术的，银行里的画、雕塑，都是他去挑选来的。他指给我们看大厅中央的一个高大的铜像——一个骑士，骑在马上。他告诉我们，这是唐·吉诃德。银行里布置得像个博物馆，有很多漂亮的装饰。角落里有一个磅秤，我去磅了

磅，一百十磅，等走的时候再去磅一下，看能重多少。Esther再三对我说："要当心，要当心，这里的甜食太肥了。"Alex每天只吃一顿饭，要上课，要工作，还要考试。"你可别饿昏过去啊。"我为他担心。"不会，我肚子里的脂肪太多了。"他说。真可怜啊。

经理带我们去他的办公室。他的办公室十分漂亮，挂着家人的照片和各种画。他也在四十年代去过上海，也是乘一条船去的，他指给我们看那条船的照片。他说那时候，上海人喜欢香烟，他去买东西都是用香烟换的。我们说，现在的变化可大了，什么时候再来看看吧。他摸摸自己的头发："那时候，它是黄的，中国人可喜欢它了。现在全白了。""白的也会喜欢的。"我们一起安慰他。

Esther昨晚上也去看电影，我问她有何感想。她先说："太长了。"然后说："当然，这电影是努力做到客观，对蒋介石的形象没有歪曲，不过，对他的人格……不过，我们也不太了解，距离很远啊！也可能后来他也有些变了，不能不变，没办法，就只有这么点地方了啊！"陈映真对《西安事变》大失所望，这是他看到的第一部大陆电影，他说："太幼稚了。"这不是好电影，我们有很多好电影呢！《天云山传奇》《骆驼祥子》《都市里的村庄》……我急急地向他介绍。我不愿意让他对我们的电影失望。虽然我自己常常失望。七等生在旁边说："有一些场面挺美的，比如在延安，那几个人吊儿郎当的。"他总是一个人在角落里，落落寡合的，先是喝酒，然后喝可乐，再然后就问："该走了吧？""你总是一个人。"我对他说。"说来说去总是说一样的话，说过几遍就不想说了。"过了一会儿，他又问了："可以走吗？"Esther说："作家们要一起走的。"他便叹气："唉！""你老是脱离集体。"我说。"集体？"他不明白。Esther解释："就是团体。""哦，团体。"他总算明白了。他们对"集体"这个词儿居然如此生疏，而我们，从幼儿园起就懂了。

又来了一对冰岛夫妇，丈夫是剧作家，带了一个孩子。这是个南美洲的孩子，他们领养的。他们并不在意这身份被公开，孩子自己也

知道，这与我们的习惯很不一样。这孩子有六七岁，很壮实，发型、行动、气度都像是个男孩，却穿了一条形状可疑的裙子。不会说英语，总是用一双黑黑的眼睛直直地看人。

9月12日 阴

今天去阿曼那。这是一个德国血统的美国小镇，安格尔的曾外祖父出生在这里。距离爱荷华有一个多小时的汽车路程，具体参观的是一家德国人开的家用电器厂。这里雇用的职工都是德国血统。在厂的周围有七个村落，也都是德国血统的美国人。这里有他们自己的餐馆、商店、羊毛织品厂。商店里出售的纪念品。也有许多德国产品。买了一只玻璃小铃，德国货，作为纪念。在他们的餐馆吃了饭。德国的饮食偏酸，但很有益。

这里是个小镇，比大城市幽静，草地更多，屋外的花圃空地更大，人更少，别的一切都大体相同。

这个地方是十六世纪德国的新教徒因反抗旧教的残酷统治，来到这里开发起来的。开始时只六七十人，以宗教首领为领袖，在这里安家，建设。有一个陈列馆，放映该村发展历史的幻灯片。据说他们之间团结友好，利益不外溢。早些年他们还不和别的民族通婚。现在虽已通婚，不过德国人的风尚习惯仍保持如初。

从陈列馆出来，不禁对德国人的民族团结精神产生一种敬意，同时想起於梨华女士说的："留学生的下一代，他们根本没有根不根这个问题，他们是完全百分之百跟美国认同。"对这话的代表性感到一些怀疑。恐怕未必是"百分之百"。既使你愿意"百分之百"，美国人是否"百分之百"地接纳你呢？最近不是出现了陈果仁的事吗？（按：华人陈果仁在底特律被白人父子俩活活打死。结果白人被判罚三千元了之。）奈何！

9月12日 阴

今天是极有意义的一天，我们去了Amana。

Amana——是一个社区。说起来话长。很久以前，德国的天主教里分支出一个教派，他们反对天主教的教义，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理论。他们不满于天主教的严格、压抑、专制，而认为上帝和人应该是亲近的，可以直接对话而无须媒介，认为世界应该平等，大人、孩子、男人、女人，都一样。人尽其能，按需分配，幻想了一个乌托邦。这社团遭到天主教的惨酷迫害，于是就陆陆续续地到了美国。先是到纽约，然后迁到中部的堪萨斯，最后到了爱荷华，那是一八五四年。他们在这里实践他们的理想，开办工厂、学校、商店，种植庄稼，喂养牲畜。男人女人一样劳动，孩子在家里，成立托儿所，选几个女人负责管理教养，这些女人得到同样的报酬。劳动所得一律公平分配。墓地里，无论孩子大人，都是同样的墓碑，以示一视同仁。开始时，这里不与外人通婚，可慢慢的，开始通婚了。现在这里的居民，全是德国血统，可是却不太会说德语。一共有七个村庄。Amana这个名字，据说是这个社区的始祖。有一日翻圣经，一下子翻到一页，上面写着Amana，是个福地。于是，便取了这个名字。现在，这里发展得很先进了，羊毛制品驰名全国，我们参观了一个制作冰箱、空调机、红外线微波炉的工厂。技术设备很先进，我们不太懂，只看出那工厂内外十分洁净。可是我不知道，现在他们这个社区的分配原则、生产原则是不是仍然“人尽其能，按需分配”，这里已经是一个商品社会了。

中午，在一个名叫“牛套”（Ox yoke）的乡村饭店吃午饭。店门前有着一具磨刀，一个吊桶，十分古旧的模样，是为了纪念那最初的时

期？“牛套”里面，墙上装着古朴的油灯，那油灯则是用电照亮着。上来的第一道汤就使我们对下面的菜充满了信心。菜果然不错，很清淡，很浓的酸味。这是德国菜，不过已经是美国化了的德国菜。“太酸了，受不了。”陈映真不能吃酸的，他期待着下一个菜，而下一个菜，更酸。他只能摇头了：“这是个爱吃醋的国家。”“所以一世纪打了两仗。”Alex说。

吃过饭，又去逛镇。这镇实在是太漂亮了。难道这就是乡村？这就是农家吗？——门前是绿茵茵的草地，一架长椅式的秋千，秋千旁有一架小马拉着车，车是花坛，里面栽着五色鲜花。商店很多，小小的，精巧而又返朴归真。我喜欢一个酒店，它在一个地下室里，灯光很幽暗，周围全是酒，像一个酒窖。

离开Amana，乘车回“五月花”。公路很直，田地很平整，车子开得很快。“到了美国，我只恨自己不是科学家。一个国家没有作家照样可以存在，要没有科学，就不行。”我对陈映真说。

“可是，自然科学假如没有人文的基础，科学会害人的。”他说。

我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。可是我想起了原子弹。

“做作家很不容易，作家是作用于人的心理构造的。”他又说。

9月13日 晴

有个记者招待会，我和安忆都未去出席。天转凉了，叶向东陪我们去买衣服，未选到适合我穿的，回来闲聊。

向东原住上海闸北区，所以谈起来倍感亲切。他已拿到了数学硕士，现攻读博士。他给我讲了一个关于“希望”的故事。

9月13日 晴

上午英语课。我，西班牙的卡罗，东德的汉斯是第一班，程度很低，许先生也来旁听了一会儿。第二班是那对冰岛夫妇和一个匈牙利的女作家。许先生对我说，这英语课没多大好处，那几位的英语都十分可怕，多听要听坏的，只有老师的英语可以听。那老师的英语很好听，人也长得真是漂亮。

下午，我们请小叶带我们去采购一点东西。回来之后，小叶在我们这里坐了一会儿。他谈了一些他的经历和遭遇。他是六十年代的高中毕业生，考大学时，功课全优，却因为家庭问题没被录取，后来去了煤矿，后来又调到中学当老师，再后来就到了美国。他是三十九岁来到美国的，奋斗了三年，他所希望的都一点一点实现了：大学，学位，房子……他说：我所希望的，只要努力都能得到。当然，这努力很艰巨，很辛苦。他在这里虽然有亲戚，是他的表弟，而他没有用过表弟的一分钱，只是请他在名誉上作经济担保人。他说："假如他是我的表哥，我兴许还可以用他一点钱，然而他是表弟。"

潘耀明回来了，脸黄黄的。今天他考试，结果不知道，自我感觉还可以。他读书读得太苦了，大家一致劝他："读个C就行了嘛！"美国的大学生，只满足于C，因此也只花C的力气。而他们班上，有不少人只考得F。有些人选课读书，只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学生身份而能留在美国。他们班上还有个日本女学生，怀了孕，她读书，只为了坚持在这里把孩子生下来。他们都是留学护照，必须读书才能留下来。而潘耀明是真的要读书，据说他出身很苦，没上过大学，能在香港这地方，得到目前这位置，那辛苦和努力是不言而喻的。他说，他刚进报馆做事时，只是一个校对，专门校对"狗经"。

9月14日 晴

下午，进行了一次“冒险”——自个儿搭学校巴士去EPB大楼，EPB大楼是英语系和哲学系的教学楼，“写作计划”的办公室就设在这楼里第四层。

中午，Esther打电话给我，说下午翻译班有个报告会，是一位圣第亚哥大学的美籍华人教授叶维廉来讲王维的诗的翻译。这位叶教授是台大的毕业生，曾在爱荷华大学的写作班读学位。他写诗，又是诗的批评家、翻译家，翻译中国的古诗和近代诗。中国的古诗究竟怎么才能翻成英文，翻成英文又是怎么样的？我想象不出。Esther在电话里给我指定了路线。三点钟时，我就勇敢地出发了。

在楼下等车时，遇到了那位爱尔兰诗人，一个面孔苍白削瘦、浅色头发、淡蓝眼睛，很温和的诗人。那天在Hahcher的晚会上，他极想跳舞，却又很羞怯，迟迟不敢上前邀请舞伴，最后，终于忍不住了，才站起身来。据说，他常常一个人躲在楼下门后看女孩子，也不敢大胆地看，只能悄悄地看，发现了漂亮的就悄悄走上几步多看几眼。他也在等车，是去图书馆，和我同一站下，心里稍稍安定了一下。他问我上哪儿去，我想了半天，才想出一个“教授”，只能告诉他，去EPB，来了一个中国教授。为了扭转被动局面，我反攻为守，向他发出问题：“你读过中国的诗吗？”他马上举起手中的一本精装诗集，说，这就是他正读着的中国诗，现代诗。他又指给我看了几个名字，可惜我一个也不知道，我实在对诗一窍不通，只知道个舒婷。于是就向他介绍了一通舒婷。他感兴趣极了，不断地“哦哦”地惊呼。到图书馆了，我跟他下了车，走了没几步，立即看到了Esther指示的那座小天桥，心里又落实了一点。在图书馆前与爱尔兰诗人分了手，走过天

桥，看见一幢大楼，是一个L形，心里又疑惑起来，就问了一个女生，她向我指点了路，EPB是那大楼的侧边。走进大楼，上了四楼，一出电梯，便看见了爱德文，我高兴极了，大叫一声朝他跑过去，一把抓住了他，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这证明我走对了。呀，我好伟大！要知道，我从来是不辨东西南北的。接着看见了华苓女士，又看见了叶维廉先生——这是一个清瘦的男人，个子不高，脸色有些黯淡，态度却很自信。也就是这自信使人不觉得他太难看。他的太太却很漂亮。然后，就见Esther急匆匆地走来了，她看到我，松了一口气，总算没走丢。

拿了一份翻译材料，是两首王维的译诗，一首是《山居秋瞑》，一首是《田园乐七首》中的一首。译诗挺有意思，把每一个意象都逐一地译了过来，比如："空山新雨后"，就译作——Empty mountain after fresh rains。每一个意象都没漏掉，可是那意象后面的境界呢？我不晓得外国人看到看不到。

叶教授谈到中诗和西诗的区别，谈到中诗的韵脚，谈了半天，一位美国诗人总结了一句："中国诗的韵脚是急促的，而西方诗的韵脚是拉长的，会使人睡觉。"大家都笑了。这两种文化是很难互相传达、互相沟通的，每一种语言呈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在这语言后面站立的是别个民族完全个别的历史、文化、经验、遭际……那天，Alex在我们那里吃饭时谈到美国拍的电视剧《马可·波罗》，是个大失败。最主要的原因是，他们一点儿也不了解中国，了解得很浅，为了弥补这不理解，便拍摄了大量的中国风光。当然，我们对美国也不了解。据说，在这里曾放过《第二次握手》，他们笑得快昏过去了。叶维廉教授谈到翻译的艰巨性，语言之坚牢，翻译就是和语言的战争——打出沟通。之后，Esther就很难为我翻译了，他的报告里充满了主义，新型的现代主义——语言显示出它又一坚牢性。

报告会结束后已接近六点，Esther带我去一个农人市场，每星期三下午才一次，很像中国的自由市场。在一个露天的广场，农人们把自

家种的东西带来卖。他们是开着汽车来，卖的东西有鸡蛋、蔬菜、水果、自作糕点、鲜花……我们先去买了一些鸡蛋，那鸡蛋是红壳的。妈妈总是说红壳的鸡蛋好，白壳的有腥味儿。那超级市场里的鸡蛋全是白壳。这里的鸡蛋比超级市场里的便宜。然后又去买糕点吃，糕点放在玻璃小柜里，干干净净。我挑了块二十五美分的巧克力蛋糕。太甜了，吃了一半就十分勉强了。有很多中国学生来买东西，大陆的、台湾的、香港的，见了好几个熟人。那位物理系的公费生小马，和他新婚的爱人一起来了，"来逛自由市场"——他说，我们都笑了。小马是山西人，他的爱人也是大陆的公费生。据说，他们是第一对在美国结婚的公费生。在他的婚礼上，有位美国教授说，他是爱荷华大学三十年来最优秀的学生。后来又遇到了台湾学生小亮和他的太太，他们开了一辆车，于是我和Esther就搭他们的车回去了。小亮夫妇俩都是学艺术的，小亮学摄影，他太太学美术设计。他们一直把我送到"五月花"门口。

晚上，和潘耀明一起散步，一直走到市中心。晚上的爱荷华很好看，灯光在清澈的夜空里闪烁，白天显得有点混浊的爱荷华河也清澈了起来。在Old Capital看到一件衣服，很好看，外面是毛线，里面有一层人造毛，毛线是白色的，肩膀和底边有咖啡色和紫色、粉红色组成的图案，滑雪衣的式样，很活泼，我很喜欢，试了又试。可是究竟太贵了，四十九美元。并且这已经是降过价的，原价要六十二元呢。女服务员过来伺候我试衣服，笑容可掬地问我："喜欢吗？"潘耀明在一边死命催我："买吧，买吧！"我说："买东西怎么能这么急，要多看，比较，选择。"我把衣服在衣架上放好，决定离开它，太贵了。

9月15日 阴，时有雨

今天“写作计划”召开了关于非洲文学的讨论会，发言的有尼日利亚、加纳、南非等五个国家的作家。这几位作家中，以加纳和南非的两位作家给我印象最深。加纳的作家，年纪较轻，循规蹈矩，很谦和，很听话，像一个很乖的大孩子。南非的女作家，从肤色上看，不太像是一个黑人，有五十以上的年纪，鼻翼两边的纹路特长，特深，是一副愁苦的面容。他们谈了语言、文字问题，写“外在和内在的结合”、写“人类的本源”等等文学上的问题，同时毫无例外地都谈了本国的社会，争取独立，国家尊严等等，成为他们的文学题材。

不能硬性要求文学服务于政治，但是作家生于斯、活于斯的社会，一定不可免地反映在作家的思想、心理之中，当然也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之中。

发言完以后，有人提问，亦有争辩、补充，南非的女作家哭了。可惜话不懂，靠翻译只听得一鳞半爪。

会后有酒会，我们没兴趣。回来捧着自己准备好的菜，去华苓家会餐。许世旭俨然已是中国人里的一员，他也去了。诗人叶维廉和他夫人也在，大家毫无拘束地吃了起来。我们包的馄饨生意尚好：C从昨天就经营起来的红烧脚圈，一扫而光。酒足饭饱之后，许世旭套着中国的腰鼓，跳起了朝鲜舞，七等生和蓝蓝对着跳踢踏舞。虽然跳得不怎么样，可是情绪饱满，像是那么回事。“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”虽然颇能表达情绪，但是需要十分的勇气和三分的技巧，能者不多。舞不能尽兴，于是歌。平时与歌绝无交往的萧乾，竟也唱了起来。不但唱，唱开了头而不可收拾，一首接一首地唱。大家一起以残缺的歌

词，不全的五音，高不成低不就的嗓子，唱童年时的歌、抗日时的歌、大家都会的歌、我们这一代的歌。唱得十分醉人，十分开心。许许多多逝去的岁月，竟然又流回了头。华苓会哼的歌，我也会哼，什么“小麻雀呀”、“怒发冲冠”、“苏武牧羊”、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”、“黄河奔流向东方”等等，等等。我们同庚，会唱一些同样的歌，这并不奇怪。奇怪的是C唱了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……”

歌，离开我已好久了。十年？二十年？我是唱过歌的。那时，是作为一种需要，一种希望，一种力量来唱的。在那些饥寒、困倦、疲惫、黑魆魆的夜晚。炮火烧红的村落，直立在破墙边的牛，雨落下来了，落在生死无界的战场上。那时倒有歌，轻轻地哼过许多歌。后来，后来歌就从我生活里轻轻地、不知不觉地溜走了。也许，是歌的力量不够了，也许是生活的担子更重了。需要的是腰脊的力，肩腿的劲，需要的是迈步，是行动。歌，在我看来，变成一种轻飘飘的，可有可无的，属于青年人抒发剩余感情的东西。

歌，发现我老了。

9月15日 雨

下午三点钟，有一个报告会——非洲当代文学。这是“写作计划”活动的第一个报告会。共有五位作家演讲，一位加纳的，一位尼日利亚的，两位埃及的，一位南非的女作家，她是剧作家、诗人，也是短篇小说家，她的作品是反映种族问题的，而她自己却并不是黑人。陈映真向她提问：“一般来说，黑人作家总希望得到白人的认同，而你，是一位白人，却期待得到黑人的认同，是什么力量促使你这么做呢？”她回答说：“我是个黑人。”陈映真诧异了，我们也都诧异了。原来她是黑白混血的，在南非，有色人种一律受歧视。然后，有人朗诵了她的两首诗，其中有一首写的是一些黑人和白人在酒吧玩，过了宵禁时间，黑人是不允许宵禁时间在外活动的，于是一位黑人姑娘对白人说：“你带我回家吧。”念诗时，南非女作家一直在流泪。一位埃及作家谈到阿拉伯的民族性：吝啬、受压抑之后的变态、没有创造性等等。巴勒斯坦女作家，漂亮的撒哈站起来大声地反驳，她的声音很粗，很哑，态度很凶。她说：“我现在搞不懂我究竟是什么人了。阿拉伯人？巴勒斯坦人？埃及人？为什么要作这种区别。而事实上，埃及人幽默，我也幽默……”她的意思大约是，劣根性并不能单纯以国家、民族来区别决定。另一位埃及作家阿里的话又引起一位听众的反感：关于小说要不要政治。争论的也很激烈。这个问题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。而我以为这样主义对主义，思想对思想，是永远争不出结果来的。应该小说对小说，那么就会发现，主张不要政治的小说中，优秀者实际上有着政治，主张政治第一的小说中，优秀者实际上并不完全是政治。政治究竟是什么？我也给他们吵糊涂了。

晚上，在聂家聚餐，我们每人带一个菜，我们做的是龙虾片和馄饨，潘耀明是汤，七等生是炸鸡，陈映真的——我揭开他的锅盖，他大声唱：“**0333 | 1— | —**”是肥肥的猪脚！今晚来了很多人，叶维廉夫妇，萧乾夫妇，吕嘉行夫妇，以及来帮忙的小叶，Alex，Esther。

楼上闹哄哄的，我们几个跑到楼下聂华苓的工作室里看电视。是卓别林的电影《淘金者》。暗暗的屋子里，卓别林在作着一连串的笑而辛酸的表演，身后，谭嘉和蓝蓝的表弟小球在聊天。小球是为了安格尔先生的病特地赶来的。

“你希望你的孩子将来做什么？做中国人，还是美国人？”小球问。

“我不管他，我随便他们。”谭嘉说，她的声音很柔和。

“你总有个希望。”

“要说希望，我希望将来能有一天，没有中国，也没有美国。”

“这有什么意思呢？你现在是怎么培养孩子呢？”

“我教他们中文。不管他们干什么，我都要叫他们记住，他们是中国人。”

“可是，我认识一些中国人，决定让他们的孩子以为自己是美国人，这样兴许能少些苦恼。”

“可是，我也认识一些中国人，他们从小说英语，自以为是美国人。当他们长大以后，忽然感到自己是中国人，于是进学校学中文，然而，晚了。所以，我要给我的孩子一个机会，多一种选择，当他们想当中国人的时候，他们会说中文，他们能够当中国人。”

“我现在看了台湾的电视，我都感到回去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我无所谓。我看透了一切富贵和贫穷。我亲眼看见过，今天钱多得不晓得怎么花，而明天，成了乞丐……”

楼上在唱歌，是蓝蓝的生日。



在安格尔和华苓的客厅，前排左起安格尔、陈丽娜、聂华苓、王安忆，后排左起陈映真、茹志鹃、许世旭夫妇



这是在茹志鹃王安忆母女居住的五月花公寓的厨房兼餐厅里，右一是吴祖光，中间一对夫妇是比尔和玛丽，他们照管作家的生活起居等各项事务

今天晚上，大家都好像发疯了。许世旭跳朝鲜舞，萧乾伯伯唱了很多他们青年时代的歌曲，这些歌，妈妈和华苓女士她们都会唱。他们有一些共同的歌，那是很久以前的歌。而我们年轻人没有，没有可以一起唱的歌。哦，想起了，有一个，《龙的传人》——

“遥远的东方有条河，它的名字叫黄河，遥远的东方有条江，它的名字叫长江……”

9月16日 晴

随大家一起去密西西比河。来爱荷华讲演的叶维廉夫妇也去了。他是来讲中国古诗的，安忆去听过。他也写评论，曾两次去过北京、上海，都未见到。

汽车所经之处都是平原，地里长着一些玉米。据说今年天旱，玉米长得不好。所谓的农村，实际无村，只是相距二三十里，有一幢别墅似的房子，房子附近必有附属设备，高的仓房、矮的车房、花圃、秋千，这便是农家了。四周是平原，是树林。按我的观念看，这是个叫天天不应、叫地地不灵的地方。冷清寂寞得无异于中国的和尚庙、尼姑庵。可是带我们来的艾理斯（他就住在附近的镇上）告诉我们，住在这里的人，相距虽远，实际他们天天在一起喝酒，他又向左后方一指说："有钱的人家都在那里，家里什么都有，包括直升飞机。"哦！当然，有汽车、直升飞机，距离就小得多，二三十里不算什么；打个比方，就像上海住隔壁弄堂一样的近邻了。

汽车开了一个多小时，才看见密西西比河。河水清澈，河里似有一个个树木茂盛的小屿，也许，只是曲折的对岸。据说河面最宽处有十里。过了河上一道大桥后，车子并不沿河行驶，而是开上了一条沙石公路。据说，这条路是美国南北战争时为了运输而开辟的。现在为了行驶大型农机，没有铺设水泥，每个星期平整一次。

路上，每人花五元，集资在一个小镇的店里买了肉排、茄汁黄豆。小店靠近一个加油站，生意不坏，在这里用餐的大部分是蓝领阶级、卡车司机等人。一份肉排，有长长的大骨头六七根（像中国的牛肋骨粗，但他们说是猪肋骨），还有大堆的炸土豆条。餐盘是丰富实

惠的。我们买了食物就装上汽车，说是带到河边去吃。可是还没看到河，车子就在一个树林边停下来了。林里有桌凳，我们把几张桌子拉到一起，把食物搬下车来，大家开始向肉排进攻，几乎同时，树下的蚊子便向我们猛攻。于是人吃肉，蚊子吃人。肉排上的肉不多，而且很硬，倒是那茄汁黄豆味道不错。用完餐重新上车时，叶维廉夫人的腿上被咬起了十来个红包。艾理斯的脖子上也鼓起了好几块。而且蚊子兴尤未足，竟然有不少跟上车来了。在车上赶了一阵蚊子，我们才算真正到了密西西比河边。

水清，河宽。实际上望不见彼岸，只见这里那里，一丛丛浓浓的林，绿绿的树，组成了密西西比河宽阔而不浩渺、静谧而不单调、迂回曲折、优美的河岸。我们穿过树林，踏着陈年的腐叶走向河边。河湾老树下，一位爷爷带着他的小孙子在钓鱼，远处停着他们的汽车。哦！谢谢啦，老人和小男孩，你们为我凑成了一幅画。

9月16日 晴

这是密西西比河。

在我儿时的印象里，这是条黑人的血和泪汇成的河。

密西西比河很平静，河岸是苍绿的树丛。当然，有一些岸边，已开辟了工业区，而在它另一些岸边却悄无一人，静悄悄的。据说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出没林间，那是不能捕猎的，除了野狗和鹿。鹿在这里是太多了，因此很贱。而野狗，本是这里最早的居民——印地安人的神，可是，印地安人现在已没有一点权利，因此也顾不上他们的神了，只好随它去了。河岸边，只遇见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，在钓鱼，密密的树丛遮掩着他们，树丛里还有一条翻倒的小木船。这里很幽静，这幽静被人用心保护着。

回爱荷华城的路上，在一个农庄的小店前停了车，大家纷纷下去买瓜。这里的瓜很便宜，比城里的超级市场便宜一半。女主人很高兴，说："这些作家们好像很喜欢这些东西，不知道他们明天还来吗？"

回到"五月花"，又跟上海尔的车去购买食品。妈妈很累，不去了，就我一个人，很忙乱了一阵。首先是找白糖，偌大个市场，怎么也找不到。向爱荷兰诗人打听，他把我交到服务员手里，服务员指点我在一个走廊，来回走了两遭，都没看见白糖。而这时候，我的车子却不见了，前前后后地找，找也找不见。忽听几个中国学生在讨论："这个车子好像不太像我们的。""那恐怕是我的了！"我插进嘴去，他们领我去看。果然是我的，我把我的车推走了，他们便开始找他们的了。走来走去，又碰见了他们，于是向他们打听白糖，他们四个人便

分头帮我找去了，人多力量大，终于找到了。在结账处，他们帮助我搬东西，借钢笔写支票，就这么熟悉了起来。他们的普通话说得很好，可一问，却都是来自台湾，刚来一个月，念机械。其中一位说："我的父母是从大陆来的。"我们便互相写地址姓名，其中一位用英语报地址，被其他几位喝住了："说中文，这里都能听懂中文。"他们四个人买了一大堆东西，也没汽车，不晓得他们怎么将东西运回去。

晚上，潘耀明、七等生和Esther一起去酒吧。潘耀明今天又考试。他终有一天要发疯的，大家都这么说。为了不发疯，他决定今晚要"疯狂一下"。于是我们找了个最最疯狂的酒吧。没进去，头就轰然胀大了，音乐声、人声，像潮水一般涌上来。门口站着两个人，一个检查学生证、身份证，这个州允许喝酒的年龄是十九岁，凡不到十九岁者均不许入内；另一个人则收费，一人交一元钱，这个酒吧很大，名叫"Fieldhouse"。分上中下三层，下层有一个舞池，男女学生跳着迪斯科，开心得不得了。坐着喝酒的大声谈笑，偶尔高兴了，就大嚷一声。那音乐越来越强烈，没有一歇空隙，让人的神经休息一会儿。永远是高潮。Esther说："吵死了，怎么挑这么个地方。"潘耀明则很高兴："难得嘛，洗洗脑筋。"Esther告诉我，这是大一大二的学生爱来的地方，大三大四的学生就喜欢安静一些的。她和七等生先走了，我和潘耀明坐到十一点多，走出酒吧，门口还排着长队接受检查，付钱，然后进来。

爱荷华城，好像在过节。街上满满的人，走来走去。一个男生走到我跟前，摊开胳膊拦住我，说："Excuse me！"潘耀明很紧张，跑过来问："怎么回事？""没什么，他很有礼貌。"我说。"到了周末，都发疯了。""他们挺能疯的。""美国人就爱引人注意。今天我看见一个男人，穿了一条裙子。一回头，把我吓了一跳，我笑了起来。他就得意得要命。"

我们一同沿着爱荷华河走回去，一边聊着天。我们开始讨论"写作计划"的办公室工作人员。我说："我很喜欢爱德文。"

“这个人很奇怪，他的太太比他大得多，也不好看，倒是个德文教授。他也搞德文翻译。她最近和另一所大学订了个十年合同，已经走了。爱德文也要走。”

“什么时候走？”我问。我挺舍不得他走的。

“大概要等这一期‘写作计划’结束以后吧。”

“他很好。”

“不过也很莫名其妙。我到这里时，他和他太太来接我，他说：‘明天请你吃饭，’可是到现在也没请。”

“也许他忘了，他很忙。”

“不会忘的。我每天中午，都在他们的办公室吃午饭，每天都有一个提醒他的机会。”

“美国人很忙。”

“我想请他谈谈，他答应，却永远没有空。他们把自己封闭得很紧，不让人家进来。”

到“五月花”，已经十二点了。在电梯上，碰到那位爱尔兰诗人和西德女作家，两人搂抱着，喝得醉醺醺的。尤其是那女作家，一脸油汗，眼神恍惚，脸上带着惘然的微笑，诗人则还算清醒，记得对我说一声：“再见，安忆。”

9月17日 晴

今天不想出去了。一个人在“家”看了一些台湾作家的作品。

原来许南村就是陈映真写评论时用的笔名。我喜欢陈映真的小说，恰恰也喜欢许南村的评论。他的评论总是用他的观点，以对台湾社会的分析来统率被评论的文章。所以即使没看过被评的文章，光读他的评论，也是会有启发的。他的许多作品，是我早就读过的，现在又读了他的系列小说《华盛顿大楼》第一部《云》。这是一个短篇小说集子，各篇的得失暂且不论（我也论不了），且从他的序言里，可见他的意图，他的思想、计划。

“企业为了有效地达成它唯一的目的，即利润的增大与成长，展开精心组织过、计划过的行为。这些行为，以甜美、诱人的方式，深入而广泛地影响着人和他的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。

“分析和批判这种影响，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。文学不应也不能负起这个工作任务。因此，《华盛顿大楼》系列作品，主要和基本地不在于对企业和它的行为做出分析和批判。文学和艺术，比什么都更以人作为中心与焦点。现代企业行为下的人，成为《华盛顿大楼》系列的关心的主题。

“在现代世界中，知识和技术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个国际性企业的手中。除了从企业提供给我们的大众传播中去获得部份的、片面的、包装过的、常常是不正确的咨询，人们对人和他所居住的世界，一无所知。因此，如果今日的作家还像过去一样，仅仅凭着对自己的‘天才’的迷信；仅仅凭着一时的‘才思’和灵感去写作，那么，他很快地便要成为那自以为一身锦绣的裸体的国王。正如同觉醒的消费者要

争取对于如山如海的商品的真相和实情的理解，作家首要的功课，是自觉地透过勤勉的学习与思想，穿透层层欺罔的烟幕，争取理解人和他的处境；理解生活和它的真实；理解企业下人的异化的本质。

“因此，《华盛顿大楼》系列小说，并不是‘反企业’的小说。不，它们简直与反不反企业是无关的。这些已经做成和将要做出来的小说，其实是一个时代的自然产物。……”

这是一位使命感极强的作家。他的眼光，不谓不远，不谓不深，不谓不透。这是他对台湾那个社会制度下，各国跨国公司纷纷挤进台湾这个消费市场、廉价劳动力市场的看法。他对台湾农村的看法，可通过他对农村诗人吴晟的评论来看。“从七七年到七九年间，吴晟对于城市消费文明强力地向农村浸透，表示了极大的关怀，随着大众消费时代的来临，台湾传统农村中俭约、谦抑、勤劳、朴实、正直、诚恳的风气和价值迅速地在农村崩溃；代之而起的是享乐、消费、对商品的贪欲、虚荣和损人利己这些消费社会所形成的意识和价值之变革……”

是的，我在这书案上向陈映真表示同感，同时作一点补充。我们希望农村里保持古老的纯朴、耿直，但同时也要改变那种每天把太阳从东背到西的劳作。牧童横笛牛背的风光，是一去不复返了。这个，也是时代的趋势，恐怕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。

看了他的《夜行货车》，真好。如果《将军族》是他前期作品的代表作，那么《华盛顿大楼》系列小说的首篇《夜行货车》，则是他后期作品的代表作。亲爱的同胞、同行，我在这里祝你一切顺利、如意。

9月17日 阴雨转晴

今天是极高兴的一天，我们去野餐！

说好十一点出发，可是等这等那，等到十一点半才开车。来到一块草坪上。这里有两个大木棚子，几个烤肉架子——我现在知道了，这种随处可见的铁架子是供野餐烤东西吃的，还有秋千、滑梯。天忽然下起雨来，雨点不很大，来得很急，但走得也很急，天又晴了。太阳很暖。

大家一起动手，把冰块和饮料倒在桶里；扎排球网；包玉米——把玉米剥好，抹上黄油，撒上盐和胡椒，包上锡纸；在铁架上放好煤球，再在煤球上倒上汽油，点起火来烤肉了。我只要了一个肉饼和一个半生不熟的玉米。吃完饭，大家就一起唱歌，彼得吹口琴，爱德文弹吉他，唱得好快活。那西德女作家则坐在一边，泪汪汪的。“她是怎么啦？”我说。“她有很多不顺心。”潘耀明说，“她到这儿来过不惯，想家。而且她来这里，她在德国的工作也许就要保不住。”“那她不要来好了。”我说。我不喜欢这个女人，神经兮兮的。

彼得放下口琴，叫我一起去打排球。我说我不会，他还是拉我去。起先，爱德文、潘耀明、我、芬兰女作家几个人在一边，打了两局，输了两局。后来，爱德文提出调整阵容，把Alex要过来，把我则推过去。而我一过那边，那边便开始输，输了一局。彼得把菲律宾诗人、印尼诗人几个年轻人叫过去，布置了一通，说些什么，我也听不懂。第二局开始了，我发现我们这边的战术好像有一个变化，那就是——当我要接球时，他们都从四面扑过来，从我这里救走这个球。我很惭愧，不过，令人欣慰的是，我发了几个漂亮的球，为我们这边挣

得了一两分。当然，我发球是站在界内网前，并且有两次机会，失了一球还可再补一球，这是两方都同意的，当我发过网一个球，那一片叫好声，也是双方都参加的。

玩得很开心。却也有一点不那么开心的。

潘耀明对Alex说："你帮安忆联系一些年轻的作家，交流交流吧。"Alex说："好的。不过，我要去问问，人家有没有兴趣。"我听了这话，心里第一句想回答他的便是："你还应该问问我有没有兴趣。"可我忍住了没说，因为我并不期待来这里向人家证明我自己，我只想多了解人家。我很好奇。然而终究有点不高兴。潘耀明沉思了一会儿说："在美国，在香港，你会明白文凭、学历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。"这些，我都没有，我只有小说。然而我的小说，他们看不懂，他们似乎只承认用英文写的。好在，说中文的有的是，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呢——似乎有点阿Q的味道了。然而我们是阿Q的子孙。

晚上，蓝蓝接我们去看她的录像带，是八一年中国周末的一个晚会。晚会的节目很丰富，是蓝蓝一手搞起来的。有中央舞校的教员许淑瑛的表演，她是蓝蓝请来进行中美舞蹈交流的。在国内从没听说过，因为她从不参加演出，只教学和编舞。然而她在美国却轰动得很。大家都迷上了她，她跳的朝鲜舞比朝鲜还朝鲜——这是南朝鲜女画家朱今嬉女士说的。今年，蓝蓝去中国，看到了许淑瑛，蓝蓝说："她变了，她身体很不好，衰老了，我忍不住哭了，我对她说：'你一定要去看病！'后来，我看了舞校学生的一台民族舞，我又哭了，我说：'你可以放心了，后继有人。'现在许淑瑛带了几个学生去西藏采风，那是她最后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。她是个优秀的舞蹈家。"晚会上，还有一个笛子独奏，演奏者是"文化革命"中从广州游泳到香港的，后来到了美国。他开了一个出租汽车行维持生计，业余时间组织了一个乐团搞演出。他有三个孩子，生活得不容易，好几次，有人偷他的汽车；他出去和人打，打得头破血流。他很想家，据说，那年，

毕朔望他们遇到他，问他想不想回去，他没开口就哭了。……演出很成功，结束时，全场起立，长久地鼓掌。哦，中国人啊！

外面下了一阵小雨，地，湿漉漉的。

9月18日 阴

下午和安忆、潘耀明一起去医院看望安格尔。这是美国大学最大的一所医院。楼下大厅像是银行，沙发摆出一个一个的中心：又像是一个漂亮的剧场休息厅，厅外草地上有室外茶座，有小卖部，有自动售餐处，有可供热饭的微波炉，有一切方便病人及其家属的设备。总之，像音乐厅、候机室、剧场休息厅，没有那份嚣杂，多了一份幽静，只是独独不像我概念里的医院。

安格尔住的是一间单人病房，病床边有无数的电线和电钮。有电话、遥控电视开关（电视机斜按在对面墙上）、电灯、电铃、调节床的电钮。床的各个部位都可以升起，可以放下，总之可以帮助病人改变各种睡的姿势。难怪这床下有那许多条条杠杠，从下面看，更像一台机床。

坐在床边闲聊，心里不由地想起去年，好像是春季吧，我曾坐在上海华东医院巴金先生的病床边。他因跌了一跤，股骨受伤，住进了医院。他见我们说的第一句话，就是：“现在真体会到‘打倒在地，永世不得翻身’的味道，很不好受。”原来他上了石膏，整日整夜只能平躺着。由于不能翻身，已影响到睡眠。现在看见了这张床，想起了巴金先生不得翻身的苦恼。

病人要开饭了，我们等着看看他的饭菜；是一小块排骨，一点洋山芋冷菜色拉，一小盒冷牛奶，一个梨。从伙食上看，不如上海的华东医院，记得那次巴金吃的是明虾，而且做得极香。

从医院出来，华苓请我们去中国餐馆翠苑吃饭。吃了很新鲜的鱼和虾。最后的余兴，是一盘饺子形的蛋卷，自取一只，咬开来，里面

各有一条签语，据说，我的一张最好，是：

Your dearest wish will come true.

9月18日 阴

凌晨三点钟，正熟睡，一阵电话铃响了起来，在深夜，显得有点恐惧。一接电话，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，咕里嘟噜说了一大串，在她声音后面，是一片混沌的人声和音乐声。我听不懂她的话，问她找谁，她问我："你是谁？"我说："你打错了。"她道歉了一声把电话挂断了。可我却清醒得再也睡不着了，等重新睡着再醒来时，已经好晚了。今天和潘耀明约好一起去图书馆的。他问我怎么起得这么晚，我就告诉他那个倒霉的电话。他说："她说什么？你一点没听懂？""没听懂。怎么？"据说七等生房里半夜时也有人打电话给他，是个男的，问他要不要女孩子，四十美元一天。

我们到学生中心去喝点东西，今天的天气很闷热，气压很低。学生中心里只有寥寥几个学生，脚跷在桌子上温习功课，桌子前有一张银幕，在演着一个什么侦探的电影。

"你的气量挺大的。"他说。"怎么？"我莫名其妙。"那天晚上，在华苓家里，许先生公布了你的年龄，你也不生气。""哦，这有什么。"我想起了，那天晚上，他忽然说："注意，我要发出一则紧急启事。今天在图书馆翻到安忆的资料，给了我一个大意外，她居然快满三十岁了。""要碰到美国人，那真要生气的。"他说。"可我并不是美国人。"我说。我是从心底里不生气。中国人没有隐瞒年龄的习惯嘛！我有我的习惯、我自己喜怒哀乐的理由，虽然在美国。"你很大方。"他夸我，我倒不好意思起来，深觉受之有愧。

在图书馆看报纸。很想看报纸。最近的《人民日报》也已经是八月二十六日的了，倒是《明报》什么的更近一些。上面有一些关于国

内的新闻——“安徽宿县几个农民炸鱼毒死了多少多少鱼苗”“上海杨浦区破获了多少多少地下客店”“万里对韩国飞机事件表态”——我立即拿给潘耀明看，因为不久前他还对大陆的不表态愤慨得很。在这里，对国际新闻忽然有了兴趣，而且这些新闻一下子变得简单易懂，与我们贴近了许多。潘耀明总是关心港币的价格，“又跌了！又跌了！”他忍不住地叹气：“唉，怎么回事呢？”

为安格尔先生买了一束花，我们说好下午去看他。

9月19日 阴有雨

原订今天去农家访问，因天雨改期。下午叶向东陪我们去购物，然后去他家坐了一会。

他是七九年自费来此读数学，已拿到硕士学位，现正攻读博士。前年妻子来了，儿子也来了。今年妻子生了一个女儿。女儿吃的奶粉，是免费供应的，儿子念小学也免费，这是年薪不到万元者皆可享用的。在中国语言里，就是困难户的意思。他已用一千六百元买了一幢活动房子，房子前后有铁丝拦出草地，房子是列车式的，一间接一间共有五间，约六十平方米。每月需交地价租一百元。他一边读书，一边打工养家。自己功课放在晚上做，做到一两点钟。我们说话时，他的儿子放学回来了。他儿子开始上学时，算术很好，英语不行，今年英语也得优了，邻座的美国小朋友反而要抄他的。他不肯，吵起来，老师反而批评他没有耐心。八岁的孩子长得很瘦小，很沉默，他已学会跟美国小孩打架，来保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和尊严了。

路上碰见许世旭，他在加州的朋友帮他申请到一个中国文学研究员的位子。他正在找房子，准备接老婆孩子来美。南朝鲜店老板帮他去找了半天房子，回来说，“五月花”公寓每房收二百三十五元一月的房租，并不便宜；外面三四百元一月，可以租到两房一厅，两个洗澡间，一个厨房。他准备等老婆来了住到外面去。

9月19日 雨转晴

本来说，今天上午去农庄。可是一大早天不好，下雨。Alex来电话说改日子了。然而不一会儿，天又放晴，并且热得厉害。爱荷华的气候真是的，我们这几天经常说这么两句话，一句是：“这么热啊，已经是九月中旬了。”另一句是：“这么冷啊，才九月中旬呢。”总之，太阳一出，就热；太阳一没，就冷。

下午，小叶带我们去他家——他三年奋斗的战绩之一。这是一座可以用汽车拉走的房子，和许多同样的房子立在一大片草坪上，有一个高高的木阳台——他自己修的，里面有五间房间：两间卧室，一间餐厅，一间洗澡间，一间会客室。二十四寸的电视机、录音机、地毯——他很幸运，买这房子时，房主刚刚新铺了地毯，这是一种粘贴在地上的地毯。他刚生了个女儿，周围的邻居都纷纷送礼，小叶说：“后来才知道，父亲应该请人家抽雪茄。”在这里生孩子基本上不需负担什么，一切都是免费领取：牛奶、奶糕，包括母亲的营养品等等。这里给婴儿吃的一种牛奶里掺有比重很多的黄豆粉，这样有营养又容易消化。那小毛头很壮实，脸蛋儿红红的，很好看。这是他家的第一个美国公民。据说，小叶这种低收入的人还可以得到一份什么补助，可他不愿去打听办理，他很客气：“像我这样，连税都不要我交，已经很受照顾了。”他不愿意受照顾，曾经主动去交税，结果退还给他，并且根据一个什么条例，退给他比他交的还多。在美国，就是不能失业——小叶说，只要有工作，都能过得去。他现在一边读博士学位，一边在学校里教课。不一会儿，他的儿子阿伟回来了，他才八岁，跳级跳到三年级。上了三年级，就可以骑自行车上学。因此，他是骑着一辆小小的两轮自行车回来的。在美国，自行车和行人是走在一起的。他一

到家，洗洗脸就坐下来看书，看电视，也没有家庭作业。他们学习得很轻松，小孩子在这里是很开心的。这孩子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成熟，不爱说话，看人的时候，眼睛很机警。他爸爸说，他不肯受人欺侮，老和人打架，挺有志气。有一次，和一个比他大的美国孩子打架，把人家的眼睛打出血来了。小叶向那孩子说：“你比他大。”又让阿伟对他说：“Sorry。”那孩子便伸出手与阿伟和解了。此事就这么过去了。不过，阿伟现在的志气已经过了头，他常常去挑衅，挑起战事。

9月20日 阴

上午宣布了每个作家在美国国内的旅费，请各人作旅行计划。旅游局也来人作了一番宣传。

读了几十篇台湾作家写的短篇小说，我发现绝大部分是写的知识阶层，而且是写知识分子的自我。要说细致，那是极细致，文字的功力也极厚。在技巧上、选择的角度上，初读时也具新鲜感。往往是从我们过去很少注意到的地方切入人的心灵。但是看多了以后，也就有些“套”感。太多的夫妻、情人、兄弟、姐妹、婆媳、母子，还有种种的“爱念”、“欲念”。也许这也可以称为“家务事，儿女情”。

“家务事，儿女情”，这句话是我熟悉的。六十年代初就有人冠我以这顶帽子，并把它和小题材划了等号，和“中间人物”划了等号。我内心是很想不通的。所以前几年写了两个短篇，一个叫《家务事》，一个叫《儿女情》，以表示这也是两颗极其晶莹的水珠，从它里面反映出来的世界，也许不比长江大桥小，不比十三陵水库浅。后来见到有人写文章，认为《红楼梦》亦是小题材，我就更加坚信不疑。社会上，人世间，一切大波巨澜，无不在这里起伏打漩。“家务事，儿女情”，这是一个通向外界的甬道，看了台湾有些作家的短篇后，更加感觉到这个甬道，确可以通向外界，同时也确可以通往内里。向里，向里再向里，于是只剩了赤条条的皮肉，颤巍巍的心灵。像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，一个没有齿的齿轮，摸不到时代的脉动，也看不到社会的心态。如果说，这是台湾作家辛苦寻来的一条蹊径，那么同在台湾发表的《夜行货车》《第一件差事》《城仔落车》《梦与狮子》等作品，却使天涯海角的炎黄子孙看了都会同感共鸣，明白今夕是何年。

无论从艺术上、责任感上，我都需要学习。听说上海复旦大学已开了一课，专门研究台湾作家的作品。我认为非常需要。

9月20日 雨

晚上，在Jefferson大楼，萧乾伯伯举行报告会，Jefferson大楼是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学生俱乐部，专为外国留学生服务，有很多服务项目，其中有一项，是为留学生找朋友——根据自己的要求。潘耀明的要求是——第一，女性；第二，年轻，第三，要会说英语——已经联系上了，约定二十六日晚上在这里见面。

萧乾伯伯报告的题目是“一个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生活”。他的英语说得十分漂亮，他说了自己一生的经历，然后请大家提问题。彼得第一个提问：“过去中国叫美国为走狗、帝国主义，建交之后却不这么说了。这种情况以后还会改变吗？”爱德文接着问：“中国出版有没有自由？”等等，问题与萧乾报告的本题毫无关系。最后，爱德文又一次站起来问：“中国的青年人对宪法、对宪法的修正有什么看法？”萧乾伯伯突然把这个问题推给了我，让我回答。我怔住了，多亏吴祖光伯伯为我解了围。

Esther对我说，要小心，今后还会遇到很多这种问题。我说我不喜欢牵涉政治的问题。她说，不可能避免，因为来的大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，对政治敏感而又很关切。“为什么，来的都是第三世界的国家？”我奇怪，“这似乎是‘国际写作计划’一贯的原则。”她说。忽然，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味，好像一下子有点高兴不起来了。

9月21日 阴

下午一个人搭学校巴士去市内，会合安忆去逛百货商场。

这是一个两层楼的商场。内有电影院、餐厅、咖啡馆，有当场现碾的鲜桔汁、服装、鞋子，直到鲜花，一应俱全。商场中央有盘旋而上的楼梯，也有电梯。两边随地都有长椅、烟缸，可供人休息。转了一圈，我有点累了，便坐下休息，安忆一个人在橱窗外面徘徊、观望。

一个男子在食品店门口捡起一张废纸和一个硬币，纸丢入废纸箱，钱放入口袋。

一个年轻极美的女子，披着长发，戴一顶男式礼帽，穿一件黑色长大衣，手里夹着一支雪茄，活泼泼地在路上走……

商场中央的花砖地正在修理，一个中年以上的工人，跪在那里把砖拼成扇形……

我们终于买了一双袜子，一包方糖，离开了商场，又走在其他的橱窗外面。天阴沉沉地，风里已有冬的气息。我们穿得单薄，有些冷，急于想回去了。可是当我们到邮局买了邮票出来，就发现已经迷了路。两个人匆匆走在人很少、汽车很多的街上，顿时有种身处异地的孤独感。在穿马路的时候，安忆拦住一个人，用她那几句英语问清了路，才找到回去的搭车站。

9月21日 晴、大风

早上原本没有安排活动，可十点多钟时爱德文来了，挨门送入一张通知，十一点钟去EPB旁听写作班上课。三楼教室里，一群年轻人围坐着，一个老教授正在念作品。过了一会儿，Esther来了，我很高兴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“刚才碰到爱德文，他说你在这里，我就来了。”她听了一会儿，在稿子背面写给我一句话：“你为什么来？”我回答她：“我没什么事。”她又写：“我们出去。”于是，我们便出去了。Esther说：“他在念作品，一边念一边说：‘这儿应该集中一些，那儿应该拉开一些’。咱们没看过作品，坐在那里没有一点意思。”我想，即使看过作品，也不会有什么意思。

我们上到四楼，去“写作计划”办公室玩。那里，Alex和一位女教师安娜正和许先生一起研究他的作品翻译。他的诗是用中文写的，在南朝鲜请人翻成了英语，翻得不成功，现正在润色。难怪人家译不出来，他的诗也太刁钻古怪，什么“我的误堕的纯真”“我囚禁白天又守护黑夜”。大家都不大明白，反复问他：“是你把白天关起来，还是白天把你关起来？”他自己也笑了，好像有些羞愧，说：“这是我二十年前写的诗，那时太年轻了。”

“工作辛苦啊！”爱德文大叫着进来了，从冰箱里拿出面包、白脱，摊了一茶几，开始吃午饭。于是我们也想到要吃饭了。大家一起到“Iowa House”楼下的学生餐厅吃自助餐。许先生一定要请客，就让他请了。这里的生菜滋味竟想不到的好，我就吃了一大盘生菜。安娜是希腊人，但上两代就已在美国生活。她长得很高大很美，而且神情温和，我想，她一定是个好老师。她说她看过我的《小院琐记》了，非常喜欢。她要让她的学生都读这篇小说，她是教修辞课的。Alex趁

机说，能不能让她的学生和我认识认识。可以呀——她说，很好，她很喜欢这样，但是她要安排一下。

吃完饭，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，让她搭学校巴士进城，我在图书馆这一站等她。她很紧张，我说："反正我就站在车站上，你一看见我就下车。"本来，我们决定，下午去逛农人市场，今天是星期三呀！在车站等了一小时，冷得直打战，今天冷得和冬天一样了，可我只在汗衫外面穿了一件外套。老远看见一辆巴士开来，妈妈趴在车门前张望。去逛了Old Capital，又去了邮局，等从邮局出来之后，我就完全地迷失了，左右上下地乱走了一阵，才回到市中心，然而妈妈对去农人市场已经完全没了兴致。而且天很冷，风很大。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打听去"五月花"公寓的巴士了。一个老伯伯正要过马路，我去向他问路，他热情地给我指点着，我已经明白了，他还反复说着。让行人过马路的白灯"Walk"换成了红灯"Don't Walk"，红灯又变了白灯，他还继续说，他很愿意说似的。等我们终于离去时，白灯成了红灯——Don't Walk，他一个人站在马路边上等着，汽车流水似地过去，人很多，正是放学的时候，一街的大学生，年轻得要命。他很老，有点孤单。

晚上看电影，是四个小短片，介绍四个现代诗人——庞德、耶茨、Cumminy、Roethke。电影拍得很有意境，我发现全世界的诗都是要唱着念的。电影结束后才九点半，Alex开车带我们去一家夜市很晚的商店买东西，那里有烈酒。我买了一只鸡一块肉，还有一个西红柿、几个香蕉。Esther警告我："这里的东西特别贵，是爱荷华城最最贵的。""贵就贵一点吧！"我说，我想到我们冰箱里已没有任何存货。过秤结账时，才知贵到什么程度，这么点东西，要十元钱，要知道，在Eagle，一大包鸡腿，才八十美分呀！潘耀明赶紧把他挑好的一只鸡放弃了。我不明白这里凭什么这么贵，难道就凭它夜市开得晚？真可气！

潘耀明和许先生打赌，潘耀明说明天是中秋，许先生则说今天是，回家看日历，谁输谁买酒。Esther劝潘耀明："你还是收回吧。今

天是中秋，我们台湾学生刚庆祝聚餐呢。”潘耀明很固执：“一定是明天，我在日历上作好记号的。”

9月22日 阴

约了叶向东去南朝鲜店买馄饨皮，明天华苓叫我们去吃晚饭。大家约定每人带一个菜去。我们还是老套子，包馄饨。顺便买了两包豆腐粉，以备随时可做豆腐吃。有罐头的雪里蕻像茶杯口那么大的一小罐，要六角多一罐。雪里蕻炒肉丝实在是一种美味，虽然它要比鸡贵得多。介绍给吴祖光，他立刻也买了两罐。

今天是中国的中秋佳节，可惜满天是云，没有见到月亮。

9月22日 阴

到底是许先生赢了，昨天是十五。潘耀明极其懊恼，他的日历上，莫名其妙地在二十二日这一天上打了一个红印，表示节日。我帮他和许先生吵："我们中国有些地方就是过十六不过十五，十六的月亮比十五圆。"窗外并没有什么月亮，秋风萧瑟，寒气逼人。

上午上英语课，七等生也参加了。老师总叫不好他的名字——七。我们说，你就叫他Mr.Seven好了。西班牙的卡罗读起英语来又急又快，舌头"得得得"地滚着，大家都忍不住地笑，他自己也笑。我今天新换了一件毛衣，大家都问我，这毛衣是不是在这里买的？我说不是，在中国买的。他们都说很漂亮。我这回可为中国服装争了光。他们都说我的衣服好看，当然，他们总是这么问："这在香港买的？""这在美国买的？"其实，我的这些衣服还都是旧的，在家随便穿的，并不是为出国而做的。为出国而做的一套西装，至今没有穿过，今后也不打算穿。在美国，穿得很随便，这是一个大好处。

中午，那位访问学者何人杰来电话，商议国庆的事情。如今，中国学生多了，有五十几个，所以成立了联谊会。今年就准备以学联的名义召开国庆招待会，问我们愿不愿与他们合办，他们决定自己烧菜，每人烧一个菜，两元钱的标准，既俭省也很亲切。

李章来信了，他是从连云港寄来的信，在路上整整走了十天。他说他们又在巡回演出，还是那样的生活，和十年前，我在那里的生活没有两样：那演出，那团体，那县城，那石子路，那夹着沙土的风……不由沮丧起来。怎么生活会一点没有变化，一点点变化也没有。

9月23日 晴

看见了！早晨起来，从窗口望见那雾霭升腾的爱荷华的上空，有淡淡的一个月亮。道道地地的美国月亮，不大，不过很圆，这当然是因为农历八月十五日的缘故。可能是在窗前吹了风，我忽然连连打起喷嚏来。人说打喷嚏必有人在念叨。难道人有一种感应力，能穿越地心？上海这时候正是晚上，他们已吃过了“飞行员标准”的晚饭（儿子来信说，他当家给爸爸吃的是“飞行员标准”的伙食）。他们在做什么呢？一定坐在电视机前面……

拉开半个地球的距离，来看自己过去的生活，似乎有些刻板，也有些刻苦，除了一卷在手，很少娱乐。日子几乎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。但是现在它却像涂了一层釉，变得那么鲜亮，亲切，发出一种诱人的熟悉的气息。

晚上去华苓家吃饭，原来是芝加哥大学的李欧梵、威士康辛大学的刘绍铭来了，还有两位台湾来的研究人员。前两位是来过上海的，曾来作协作过讲座。当时看他们一脸严重之色，未得好好交谈。他们也反映当时的场面太正式，台上台下难于交流。

晚上回来，见曼瑞在八楼走廊和各国作家开周末“派对”。邀我们也去，因为实在太累，安忆去吃了一块油煎锅巴就回来了。

美国非常注意周末。华苓就是在安格尔开刀住院期间，也没有把中国朋友的周末活动忘记过，总是安排得热热闹闹的。

9月23日 晴

下午一点三刻，蓝蓝开车接我一起去艺术馆。美国著名的踢踏舞蹈家金凯利到爱荷华来了。今天下午举行他和大学生艺术系同学的交谈。这是个小小的礼堂，阶梯式的座位，小小的舞台上放了两个沙发，一个茶几。在座的不仅是艺术系的学生，还有别的人，比如老人和孩子。有些学生胸前别着金凯利的头像纪念章。

他来了，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，拍手，微笑。他向大家挥手，然后剥了一块口香糖扔进嘴里说：“我已经说了二十小时的话了，我想我可以吃块口香糖了。”紧接着，大家便开始向他提问题，今天的提问不涉及他的私事，这是他事先要求的。问题提得五花八门、各种各样，想到什么提什么，一无顾忌。这是个没有顾忌的民族。

有人说：“明天的足球赛休息时，我们要表演舞蹈，那是您的步伐，您是否可以表演一下这步伐？”

金凯利表示为难。

“人家都说，一个舞蹈家在任何时候，站起来就能跳。”

“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认为。”他很遗憾。

“你身体这么好，是靠什么？”又有人问。

“我真诚地吃，真诚地睡。”

“你做什么运动锻炼？”

“打棒球，跑步，我从不用跳舞来当作锻炼的运动。”舞蹈对于他是神圣的，他极爱它。

“哇——”一个小孩子大声嚷了一下。

“哎——”他尖声回答他。

“我在旧金山买了一张您拍的电影的唱片，你能不能在上面签个名？”一个女孩子问。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“作为一个祖母，我是否能向你提一个问题？”一个老太太说。

“作为一个祖父，我一定尽力回答你的问题。”

一个小小的女孩子向他提问，声音很弱小，只听见金凯利慈爱地连连说：“是啊，是啊。”

“你认为对于舞蹈来说，什么是最重要的？”

“努力、努力，再努力。”

“你在不幸的时候，是什么使你重新站起来？”

“这种时候，”他说，“要相信自己的力量，要有自信。运气和机会很重要，我们要为这运气和机会作好准备。当它们来的时候，我们不致一无准备。我很幸运，上帝和大自然总是给我机会。”

“当今是电子时代，你认为金属对艺术有没有损害？”这是个先进国家的艺术家都在忧虑的问题。

“是啊，”他说，“现在太讲速度了，当然，如果在这速度之下，建立新的艺术美学观念，就更好了。”

“您现在正导演什么电影？”

“正拍一个舞蹈片，名字叫——《这是舞蹈》。已经完成一部分了。”

“您过去演的电影是不是会重新拿出来放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他说，“我不知道。不过，艺术表现的只是今天的生活，当今天成为过去，何必再拿出来呢？何必呢，不必了。我不知道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：“我觉得现在的艺术里，色情的、打斗的东西太多，对人们也许不会有太大的好处。”他回答这问题时，流露出那么一种令人感动的情绪：

豁达，又有点忧伤，一点点忧伤。对自己成为过去很豁达；对不是自己的现在，有点担忧，仅仅是一点点的担忧，没有别的。他已经七十多岁了。

晚上，在聂家聚会。从维斯康辛来了几位客人：一位是刘绍铭教授，一位是台湾的《中国时报》正在美国读书的副刊编辑高信疆先生，另一位是台湾近几年成名的在美留学的报道文学作家古先生。另外，从芝加哥大学来了一位李欧梵教授，这位先生我曾经见过他一面。那是在八〇年北京文学讲习所的时候，他由毕朔望陪来与我们讲美国文学，并且谈了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看法。当时，讲习所的作家们对他不感兴趣，觉得他对双方的文学的了解都肤浅，多亏中国和美国有偌大个太平洋隔阂着。而在这里，大家却都很赞扬他，说他带的中国文学班是全美国最有成绩的班级之一。从维斯康辛还来了一个美国学生，跟着刘绍铭先生修中文，名叫克瑞思。当他用中文对我说“你好”的时候，我简直吓了一跳，就好像看到一匹马开口说话了。他说了一口极好的中国话，他喜欢《红楼梦》，不知他是懂了还是没懂，但他说他喜欢。与他交谈了半个小时，只挑剔出他一个错句，我问他：“喜欢上海吗？”他说：“喜欢，但是，上海很美。”“但是”——他错用了这个转折复句的关联词语。然而，还是非常令人惊异。他的普通话绝对地要比潘耀明说得好。Esther一个劲儿地夸他，他只是谦逊地微笑，他连中国人的谦逊都学会了，只是那谦逊里总有些得意。

那位古先生也过来参加我们的谈话。他在维斯康辛读书，修学位。他告诉我们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个上海家庭，父母挺有钱，在上海

也算是有产阶级了。他家两个女儿都经历了插队落户，这二三年里先后来了美国。他似乎与其中的一个有了一段感情，可是，在一个舞会上，那女孩突然之间拂袖而去。他问我：“你们上海姑娘的感情究竟是怎么一种类型？”“有很多种啊！”我实在答不上来。Esther说：“我们这里放过一个大陆电影，叫《山路弯弯》。”“那不算是好电影。”我说。“可是我们台湾的男同学特别特别喜欢那个女的。我们从来没看见过这种爱情。这么专一，这么真诚，这么无私，又表现得那么含蓄。”“是啊，可是……”我说不出什么来，这是个太复杂的问题。社会在他们发展的同时失去了很多质朴的东西，古先生还沉浸在他的思想中：“唉，上海姑娘，上海千金！”他打算写一组《M城的故事》，专写移居在美国的人，第一篇就是这——《上海千金》。其实——我忽然想——这就是美国，很多很多移民的故事，合成一个美国的故事。

然后，大家唱歌，一起唱康定情歌——“跑马溜溜的山上……”越唱越快，“呀，有这么快的情歌吗？”有人置疑。“当今世界，爱情就是这样的节奏。”——很多人回答。

当我们回到“五月花”时，已是深夜一点多。走廊里坐着几位作家，放着音乐，在开舞会。今天又是周末。

9月24日 晴

请谭嘉开车送我们去图书馆。今天是星期六，假日，偌大一个图书馆，只有三五个人在看书翻报纸，大部分还是中国人。

三八年的《申报》没有找到，只有更早期的，只好失望而归。回来时，只见往我们相反方向汽车接长龙。原来今天下午有球赛，球赛休息时，有《雨中曲》里的主角舞蹈表演。

晚上在那音乐厅里看《雨中曲》，这可能还是美国五十年代的电影，在国内放映过。电影后有这位演员和观众见面。我没看过，所以也去看了。票价是七元五角一张，是“写作计划”请客。电影后未及见到这位演员，就匆匆赶回，因为一位台湾籍朋友约好要来和安忆交谈。

这位来自台湾的朋友很活跃，也很年轻，不过头已微秃，是位富于冒险精神的青年。他在康斯坦丁念文学硕士。他谈了来美学习的经历，十分有趣。

他来美国后，开始生活在华人圈子里，后来发现这对自己学习英语不利，便搬到一个美国学生的宿舍里去。他说：“这是一所嬉皮士住的宿舍。是否能住进去，要经过居住在那里的小组考核。”于是问了他许多问题，其中一个是对于同住的女生，会不会感到困惑？

答曰：“不会。”

结果住下以后，发现这里是男女同浴，当中只隔了一道幔子。游泳也是脱得赤条条地。她们身上光光的，会以十分自然的姿态跟他招呼。“Hi！”他绘声绘色地逼细了喉咙，举手作了个招呼姿势。

“那么，你习惯吗？”我不禁问了。

“开始不习惯，现在感到脱光了游泳，是一件极舒服的事。”

在那个宿舍里，伙食也是集体办的。他们把每种不等量的劳动分成点。烧饭是四点，洗碗是一点。每人每天需完成七点。他们工作十分认真。每月一次大扫除，把所有劳动项目写好，贴在墙上，各人自己去认一项，开始那一阵，他去认了一项打扫煤气灶的活，认为这一项最简单，把煤气灶上面擦擦干净就行。谁知道这集体的要求是很彻底的，活儿需要返工。要把煤气灶全部拆卸，凡是可拆的都拆开，擦干净以后，再重新装起，是一项最费时间的活儿。结果人家都弄完了，就他还未完工。

嬉皮士以反中产阶级为其主要精神。他们认为美国已被中产阶级垄断。他们当中，有的也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，但从不要家庭接济。按我们的话说，在经济上划清界线。他们一边读书，一边设法去打工赚钱。看他们一个个膀圆腰粗大男人，却在宿舍里孵豆芽。孵出豆芽以后，又小小心心，锱铢必较地秤，七十五美分一小包，自己推个车子出去卖。他们以吃素食为主，当然鸡蛋、芝士是不算荤的。有一次为了是否要接纳一个带一条小狗的女生进来住，大家讨论了一个晚上。提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要女生回答。最后总算一致通过。

他们也吸大麻，开会时大家围坐一圈，把卷成细细的一枝大麻，一人一口轮流吸。他们也很讲友谊。有一次，他情绪不好，一个人躺在床上发闷，一个同学便来安慰他，卷大麻给他吸，并告诉他，这不是毒品。他吸了差不多半支，没什么感觉，那同学吸了他剩下的半支，手发抖，可能已出现幻觉。

我熬不住问这位年轻的朋友，今后是否准备换个地方住。

“不，再没有比这个集体更好的了。”他回答说：“一般的穿衣、吃饭，我已经体验了三十多年了。”

这位三十多岁的年轻朋友，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小小的角落。这个角落，位置应该在那五颜六色的橱窗里面。

9月24日 多云、风

上午，谭嘉开车送我们去图书馆借书。回来的路上，看到行人都穿着黄黑两色的衣服，这是爱荷华城徽的颜色，也是爱荷华大学校徽的颜色。人和车都往一个方向开。原来，下午一点钟，要比赛足球，爱荷华大学和外校比。越近球场，汽车越多，汇成了一条长长的河流。向球场拐弯的地方，站了几个学生，拉起一条横幅，上面写了几个字，大意是请过往汽车在此处鸣喇叭，表示对球队的声援和支持。在平时，公路上任何地方都是不允许鸣喇叭的。

“好像全城的人都去看球赛。”我说。

“足球是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。”谭嘉回答我。

我想，什么时候，应该去看一场足球。

晚上，和妈妈去Hancher看金凯利主演的电影《雨中曲》。当银幕上出现金凯利的名字时，当金凯利第一次出现时，当他每一段舞蹈结束时，大家都情不自禁地鼓掌。那时候，他真是年轻、英俊，手脚灵便，充满活力。美国并不如同有些人所说的那么功利和薄情，并非只记着眼前而把过去都忘记。美国人会用很多感情去记忆一个人的，问题是这个人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存在别人的记忆里。

从Hancher回来，走近“五月花”时，正遇到古先生从聂家所在的那个小山坡上走下来，便请他上我们那儿坐坐。

他喝了很多可乐，谈了很多他们维斯康辛的生活，极有意思。他说：爱荷华是个保守的地方，而维斯康辛要开放得多，而且大得多，美丽得多。那城里有很多嬉皮，他就生活在一伙嬉皮中间。嬉皮的标

志是彩虹，因此在他们身上、帽子上、头巾上，或衣服上，常常能看到一道彩虹，并且留长发，长胡子——对了，我想起来，我曾看见过这么一个奇怪的人，前边是长长的胡子，后面是一条长而粗的辫子。当他想住进这幢房子的时候，他们先让他试住了几天，然后他们开会研究——他们每星期要开一次会，共同讨论要解决的问题，比如收一个新房客，换一块玻璃，他们没有头儿，一律平等。开会讨论过后，再把他叫进去，进行口试。四个人将他围坐着，向他提出种种问题。其中有一个是："男女之间没有约束的生活，你会感到困惑吗？"他极爽快地说："不。"他们对他很满意，留下了。据说有一个北京学生没有得到他们的首肯，给赶走了。然而他没想到男女之间会是这种情形——他早上去刷牙，看到公用的浴室里有个女孩子在洗澡，一丝不挂。他很窘，想退出去，却又想到自己的诺言。那女孩子则十分镇定，对他说："Hi，good morning！"不过后来他也慢慢习惯了，因为他们只是认为：裸体没什么可羞，人刚到世界上来的时候，就是这样的。实际上，他们很守规矩，从不乱来，界限分得很清。他们提倡自食其力，自己养活自己，可是不知为什么，他们选择了一项工作是——孵豆芽。孵好之后就拿到市场去卖。大大的个子，用一杆小小的秤，那情景是十分滑稽的。他们平均分配劳动，每人每周必须劳动七个小时，每月一次大扫除，每人负责一项工作，放着音乐，一边跳舞一边干。有人实在完不成定额，大家就会帮助他。他们使自己过着一种原始共产主义、部落式的群居生活。也许——我想——这个社会太重个人了，个人、自我，发展到了尽头，无路可走，则反过头来。力量太大，转折过急，便成了一种反弹，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。

9月25日 晴

中午正吃饭，忽听有人敲门。一开门，见七等生站在门口，神色紧张又有些不知所措。他一手拿了一个信封，一手拿了一只碗，一五一十地说：“星期五去买东西，没有去东西店，所以我没有买米。米没有了……”我赶紧说：“来吧来吧，我们有米。”他举起手里的小碗：“我只要两碗就够了。”“不用量了，随便拿点去吧。”我们都说。可他执意不肯，只好由他去量了。他量得很仔细，一定装满，而后用手在碗口上刮平。

晚饭前，小亮接他太太回来，顺路过来，为我们送来台湾李敖的文集。这位李敖是个鬼才，批评家，无所不批评，谁也逃不出他的掌心。他骂国民党，国民党把他关了十年，他在狱中十分逍遥自在，出来反倒年轻了，于是他说：“国民党帮我留住了十年的青春。”可是他也骂左派，什么人都骂，有时候也骂得颇有道理，比如，他骂三毛：“台湾有那么多受苦人，她却跑到沙漠去大发怜悯。”人们恨不得把他干掉，而国民党却开始保护他，怕他被人干掉。因为无论他被谁干掉，都会被怀疑是国民党干掉的。

吃过晚饭，七等生来邀我去“Iowa House”看电影，是一个西德电影，很棒。是美国某年评出的最佳外国片，得了奥斯卡奖。然而今天晚上“写作计划”有活动呀！那位南非女作家的一个剧在数学楼礼堂演出。可到了那里，则大失所望，台上坐了五个学生，每个人代替一个角色，只是把那剧本毫无表情地读着。我们东方人全没了兴味，决定退场慢慢走回去。

走出大楼，许先生对Esther说："你能不能带我去一个地方喝啤酒，我想请大家喝啤酒。"Esther说："可是，今天是星期天，是做礼拜、望弥撒的日子，酒店都不开啊！"他就只能请大家喝咖啡了。我和Esther不喝咖啡，吃冰淇淋，五十美分，得了好大好大的一球，几乎相当于平时的两倍。"为什么给这么多？"我问Esther，她说："快要关门了，所以给得多。"吃完后，又坐了一会儿，才慢慢向"五月花"走去。路过Esther的房子，她下了决心，请我们进去看看。她快步走在我们前边，冲进房间，把什么东西塞进抽屉。房间里很凌乱，地毯上乱扔着书、电吹风，可是挺舒服的。这里共有六个卧室，共用一个厨房，两个浴室。Esther对面屋子原先住着一个黑人，她生活很随便，经常带男生进来，最后有一个干脆住下了。于是，她们这儿就等于多了一个男生，而她们原本就是希望不要男生，全是女生的。而且，这个黑人，对东方人的态度很不好。后来，她们就合力把她赶了出去——去和房东说，要么她走，要么她们走。她走了，还没进来新房客。走出她的家，返"五月花"时，遇到了七等生。他兴奋得不得了，说那电影棒极了。他告诉我们，本来这是最后一场，但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明天下午四点半再放一场，于是，大家都激动起来，决定明天去买票看电影。

"五月花"公寓的灯光都亮了，出去玩的学生都回来了。今天是情绪最低落的一天，因为明天是星期一，要上课了。

9月26日 晴

每天打扫走廊、收垃圾的，有一两个人。而固定必来的是一个黑人女孩。她们的工作服是红棉布的，像京戏里的犯人。前两天忽然看见增加了一个中国女孩，是温州人。当时我们匆匆进了电梯，未及多谈。这几天很留意了一阵，想跟她聊聊，可是再也没见到她了。看样子，她的英语并不好，也不像是个学生。我想这红色工作服，也许要比"蓝领"更低一级吧！

下午去大学中心看电影。这个"中心"，和俱乐部差不多。楼下有自助餐厅，摆有桌椅的大厅，有各种卖食物、饮料的机器。学生下了课以后，可以在这里吃、喝、做功课，也可以休息。楼上是电视室、会议室、电影院。门票两元一张，比外面稍为便宜。在这里工作的服务员，全部是打工的学生。

今天看的电影，题名《锡鼓》，是西德片，得过美国的奥斯卡金像奖。陪我们去的李小姐也没看过，但她把听来的大致剧情先告诉我们。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，一个孩子看到世间很多怪事，也就不愿长大。于是果真他外形不长，但思想感情却依然日渐长大、成熟了。于是以孩子的形体，成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。背景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。

听了这介绍后，我抱着极大的兴趣，在影院里就座，看的过程中，李小姐挑要紧的给翻译一两句。看完以后，第一个反映是生理的，我想吐。真的是胃在翻腾，喉咙里滑腻腻地作呕。从理性上说，我不能不承认这位作家想像力之丰富，概括力之大。但从形象上得到的最强烈印象，是当孩子决心不愿长大，从楼上摔下来之后，他具有

了一种特异的功能，当他高声尖叫，以示抗议时，面对他的所有玻璃器皿，都会自动碎裂爆破。孩子看到的世界，除了希特勒的暴行之外，就是母亲的偷情。他果然拥有一只神圣的小鼓，小鼓的节奏，使法西斯的军乐变成了《蓝色的多瑙河》舞曲，军队和老百姓跳起舞来。但当他把神圣的鼓挂在教堂里的天使颈上时，却给人（不是神）轰了出来。世界依然是原来的模样。人们把腐烂的马头，抛入海里作为诱饵。再从海里拉起来时，烂了的马头的嘴里、耳朵里、眼睛里，钻满了像蛆似的鳗鱼。人们把鱼捉下来，切去头，煮来吃。于是鱼吃腐烂的马头，人吃鱼；吃鱼，生鱼，熟鱼，于是孩子的母亲发疯了。疯人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生鱼。……孩子，实际已经长大了的孩子，于是出现了孩子和未来的后母的床上镜头，——疯狂的世界，疯狂的人。

回来做了晚饭，却没胃口。文学艺术的目的绝不是让人发疯，以疯狂来对付疯狂，我想。

9月26日 晴

上午，去吴祖光伯伯那里借一把菜刀。吴祖光伯伯正在潘耀明房间里转来转去，寻觅着什么。他的房间里发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声音：“嘟、嘟、嘟”有点像打电报，又有点像警报。我们将所有的电器插头都拔了下来，那声音依然（后来才知是一个闹钟作怪）。

下午，看了那个西德电影《锡鼓》。

电影开始时，是一大片辽阔、荒凉的田野，刚刚收割过的土豆地。天色苍茫。一个女人生着一堆火，在烤土豆。这时，远处跑来一个人，一个被追捕的逃兵，他请求那女人帮助他躲起来，那女人便让他藏在自己的裙子里面。追兵来了，又走了。那女人只来得及惊呼了一声，一切就完成了。她撩起裙子，男人看着她，扣上了解开的裤扣。他们无言地对视着，无可奈何而又有点相濡以沫地温和地对视着。后来，他们有了一个孩子——人，就是这么偶然而荒诞不经地诞生了，并且还要诞生下去——这孩子长大了，结婚了，生了一个孩子，叫奥斯卡。那是在一次大战刚刚结束，人们艰难又荒诞地生活着，生活很混乱，奥斯卡三岁的时候，忽然有一天，他发誓不再长大了，他永远不要长大，于是他不长了，他永远是三岁。可是，时间仍然在流逝，二次大战爆发了，他的心仍然在长，在他孩子的躯壳里长成了一颗成年人的心。电影结束，仍然是那一片土豆田，奥斯卡的奶奶吃力地拾着土豆，那田野上多了一条弯弯曲曲、荒凉的铁路，一辆载满德国难民的火车刚刚远去。

9月27日 晴

国庆招待会的事情又有了变化：学联人多嘴杂，不同意与我们合办。当然，我们可以作为被邀请者参加，可是，“写作计划”的这么多作家怎么办呢？他们不管了。算了，干脆我们自己举办吧。聂华苓带着Alex来了，订出了方案——我们自己举办，就在八楼的走廊上，我们自己动手做春卷，美国人喜欢吃春卷，他们喜欢吃一切油炸的东西。通知上将时间安排在八点，意思是没有晚饭，请吃过晚饭再来吧。这一天，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帮忙，倒也热闹，并且这么一紧张，更加热闹了。

晚上，早早地吃过晚饭，和潘耀明一起去一个“电化教育室”听英语录音。我带着我的课本——是英语班上发的。课本编得挺有意思，极简单的英文，相当复杂的故事——一个有钱的姑娘和一个穷大学生相爱，姑娘遭到一伙坏蛋的绑架，一位神秘人物原来是侦探，坏蛋集团里有一个走投无路、逼上梁山的小伙子——可是没有找到这种课本的录音带。管理员让我留下电话，说一旦找着了录音带就立即打电话给我，因为每一种教材都应该有录音的。没法子，我就用潘耀明的课本和录音，他急着去Jeferson大楼与那位新朋友见面，匆匆地把我领到桌子前，把耳机子套在我头上，安顿好后就走了。八点多钟时，他回来了，说：“我请你喝东西。”我说：“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吃冰淇淋。我们现在去，他们一定会给很多很多。”他就跟着我走，而我却再也找不着那天许先生带我们去的地方了。我奇怪它怎么不见了。

“上次，你们是从哪儿回去？”他帮助我回忆。

“是从数学楼回来。那咖啡店里有一面墙故意暴露出粗糙的砖面。”是的，那砖面是有意袒露着的，有意造成一种陈年累月的印象，这个世界太崭新了。并且，在这里，砖是贵重的东西，因为它是直接用土制成的。

“可是，这种样子的店是太多了。那里除了冰淇淋，还有什么？”

“还有甜点心，巧克力。”

“大概是这里吧。”他转身向那边走，我就跟着他走。拐了一个弯，果然是那个咖啡馆，屋顶上垂下郁郁葱葱的藤蔓枝叶。我要了一杯芒果冰淇淋，我决心把这里所有的冰淇淋都吃遍。

“你见着那新朋友了？”我问。

“见着了。”

“什么样子？”

“女的，有四十多岁了。”

“这么大还上学啊！”

“呀，六十岁的学生都有呢！”在美国，上学容易得很，没有限制，谁想上就上，只要有钱。而且银行里专门有教育贷款，可以借，直到你有能力偿还的时候再还。

“唉，在国内上大学可不容易了。”

“可是，中国大学生毕业以后国家给分配工作呢！”

“对了，要是到这里来念书，拿了文凭再回去，那——”

9月28日 晴

天一放晴，立即转热。热得在屋里呆不住，便和安忆去公园看书。看到一些从大陆来美办刊物、拉班子、作演讲的“民主”、“自由”卫士们的发言，颇有些感慨。

中国的民主、自由，不是不可以讨论。我也不认为歌颂一定是爱国，批评一定是叛国。形而上学的危害，我们已有十年的教训。大家都怀着一种急切的心情，希望祖国早日脱掉落后的帽子，摆脱封建的残余，建成四个现代化。就是许多在国外的同胞，他们也跟着祖国的弱或强而沉沉浮浮，而竭尽自己之所能。我们急切，我们奋斗，对某些挫折、失误，我们也会懊丧、会埋怨，甚至会恨、会骂。因为我们和祖国同命运，共祸福。风风火火，跌爬滚翻，哪怕是在沉重的名称下奉献自己，我们都和我们无可选择的祖国在一起。

祖国遭受了挫折，走了弯路，付了代价，没想到竟然也可以作为某种人的资本。可惜的是一旦成为本钱，“卫士们”也便失去了他们立脚的大地，最终他们卖的是什么东西，就难说了。

记得斯大林的女儿，在苏联时不同意斯大林的种种作为，并与他划清了界线，不姓父亲的姓了。可是当她在印度逃进美国大使馆，当使馆官员决定是否收留她的关键时刻，她只能端出她久已不姓的父姓，抬出了斯大林的名字，因为她知道，这还是她身上最值钱的东西。

9月28日 晴

天又热起来了，热得在屋子里呆不住，和妈妈一起去公园看书，那儿很凉爽，也很安静。有两个大人带了几个孩子在野餐，不一会儿，就升起了一缕轻烟，火点着了。天上飘着一只大汽球，嗞嗞地放着气，正在降落。“假如它降到人家屋顶上去，怎么办呢？”妈妈很担心，我说：“那么他们就更加开心了。”

今天一整天似乎都在找小叶，为了采买国庆晚会的食品。打了几次电话，他总不在家。九点多钟时，总算找到了他，可是国庆之前，找不到一个对我们对他都合适的时间。怎么办？妈妈说是否请谭嘉帮忙，可谭嘉这两天很忙，家里来了两个客人，要招待他们安排他们的活动。并且有一次我听见谭嘉在对聂华苓说：“听Alex说，你不给我事做，因为我不愿收钱。聂老师，不要这样，我心里会很难过的，我很愿意做一些工作。”所以，我觉得去麻烦她不太好意思。一时上，觉得好像人们都不管我们，竟有些沮丧，可再一想，我们中国人，在这里是最最受照顾了。除了每星期一次的集体购物以外，总还要另外请人开车带我们购买东西。而我常常看见别国的作家自己抱着大包小包的东西。徒步走回“五月花”。我想，这样下去不行，还是要靠自己啊！想到这里，并且想到冰箱里的存货已经不多，便作出一个决定：明天早上一个人去找Eagle。这么小小的一个爱荷华，丢不了我的。洗过澡，研究了好久地图。一边研究一边吃冰淇淋，冰淇淋吃了两小碗，地图还是没看懂。可是明天是一定要去了，因为冰淇淋都吃完了。

9月29日 晴

亚洲小组讲演，发言的有印度、印尼、南朝鲜、菲律宾各位作家。菲律宾这位作家很年轻，是位诗人，他朗诵了自己的诗。虽然语言不通，但他朗诵时的那种激情，诗的音律、节奏，都很动人。印度的作家是一位教授，他介绍印度有十几种语言，文盲很多，文字不统一，给作家带来很大困难。南朝鲜的许世旭英语不怎么样，但他一定要求自己照英文讲稿来念，结果是谁也没听懂他说的什么，给我们做翻译的李小姐也无能为力。

9月29日 晴

一早起来，向妈妈宣布了去Eagle的计划，雄心勃勃，然而不一会儿，吴祖光伯伯来电话说，小叶又来电话，说待会儿开车来带我们去买东西。不觉有些扫兴，却又有些放心，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
这一回去Eagle，我坐在车上，认真地记住了去Eagle的路线，原来那是极简单的路线，一直走，走到那座玻璃落地的木板房子时，朝左拐个弯，再一直走，便到了。原来是那么近那么容易的路啊。我充满了信心，好像从此走遍天下也不怕了。

下午三点钟，召开亚洲作家报告会（不包括中国作家，我们将有一个单独的中国作家报告会）。这些作家，一个总的特点就是充满了积极的现实主义精神。这些国家都比较落后，政治不开明，社会矛盾很尖锐。会前，聂华苓特别宣布：不接受政治方面的提问，最近亚洲发生了一些大事：一是南朝鲜的民航机被打下，二是菲律宾的在野党领袖被暗杀，所以，不要提政治方面的问题。

许先生第一个发言，他是用英语发言的。是那么一种英语，中国人听不懂，外国人也听不懂。总之，他是谈朝鲜的现代诗歌，那历史大约七十年，受两方面的影响，一是中国黑龙江地区民情风俗和文化艺术的影响，二是西方文化的影响。

第二个发言的是彼得，他谈到他的家乡，那是在非洲的一个地方。由于殖民地的关系，本土文化被破坏，作家们常常有这么一种情绪：觉得自己本土太落后，嫌弃它，却又对它怀有一种犯罪感。他读了一首具有代表性的诗，说一个诗人很想回故乡，可当他回到家里，却发现自己对于家庭是一个陌生人，家庭对于自己也是陌生的。

第三个发言的是印度作家，他是一位大学教授，说着极漂亮的英语。他说，要谈印度的现代诗歌，那是在用十几种语言写作的。印度由于分裂，由于甘地的去世，人们不能不有一种绝望的情绪，这情绪当然也反映到艺术上了。正因为有了这许多危机，作家们开始面对现实，作品中充满了批判精神。

一位菲律宾诗人第四个发言。

最后一个发言的是年轻的印尼作家，他已经写了两个长篇，两个剧本，若干诗作了。他的英语不太好，是由瑞克代他念发言稿的。其中有一段这样的——“假如要写风花雪月，我可以奉陪，可是，在这时候，有多少多少人失业，有多少多少人犯罪……”陈映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。然后，他用印尼语朗诵了自己的诗，虽然听不懂，可是他的激情却十分感染人。

周海瑞来了一封信，他挺有气派的，把信寄到爱荷华大学校长那儿，请他转，而居然也转到了，连同那封寄给校长先生的信一起。信上说，他有个朋友，叫文伟，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念比较文学。他们学校的中东系主任原来对妈妈很熟悉，译过妈妈的《百合花》，去年中美作家会议上，还专题谈过妈妈的作品。他欢迎我们去圣路易斯，并能负担路费食宿。我问谭嘉，那儿好玩不好玩，她说那儿有个拱门，挺有意思的。那我们就去吧。

晚上，作家们又在走廊上举办舞会，欢送埃及作家阿里，他明天一早就要走了。大家早早地坐在走廊里等阿里。他去参加一个告别宴会了，到十点来钟才回来，舞会才得以开起来——酒搬出来了，音乐放起来了，舞跳起来了。他与每个人打了个招呼后，便进屋收拾东西。而大家则再也不去管他，只顾自己尽情地跳啊，闹啊，把他完全忘了。

9月30日 晴

今天是艾德温带领大家去访问农家。离爱荷华约一个半小时的汽车路程。

这农户家里只有老夫妻俩，住了一幢两层楼的房子，房前是一大片的草地，有几棵极大的老树。儿女都在大城市工作，家里有三百多亩土地，种的都是玉米和黄豆，现在正在收获。今年天旱，庄稼很受了影响。这里一切操作虽已机械化，但似乎也要靠天吃饭。男主人给我们介绍说，按今年的收成与投资的成本算下来，要亏损。他说："银行虽有低息贷款，但还是要付息的，不过低一些而已。"这一片土地是他岳父半送半卖给他的，和二三十年前比较起来，这里的土地价格在下降。

男主人体格结实，很少笑，十分认真地带我们参观，仔细讲解；他给人的印象，是个诚恳、可信赖的朋友。问他为什么光种玉米、黄豆，不种些经济作物。他抬头望望远处的土地，然后友善地看了我一眼说，他曾经想过，也写信问农民协会，协会回信说，这里的土壤只适于种玉米和黄豆。

这里的农民协会似乎在起一个相当大的作用。二十多年前，这里第一个发电厂也是由农民协会吸收了大家的投资办起来的。后来政府看到农民用电很多，于是办起了又一个发电厂。

两位主人开了车，陪我们去田里看看。大型的联合收割机正在一个年轻人的驾驶下收割黄豆。联合收割机很漂亮，驾驶室里有电视，有冷气，但是它只能收割两寸以上的豆子，下面的都撒在田里，主人说，每亩要损失十到十五美元。

这里的土地连成片，看不到有灌溉的渠道。农民家里的用水，取自一百米之下的地下水。这两位主人是“国际写作计划”的资助人之一，每年“写作计划”活动时，他们都招待各国作家去作客。女主人还记得丁玲、杨沫，说：“杨沫吃了很多甜玉米，吃过了就睡觉，还打鼾。我喜欢她。”

午饭吃得很好，都是自己生产、自己做的，很干净，不油腻，很合中国人的胃口，特别是甜玉米，真是十分可口。饭后大家都在他家门口草坪上坐着、躺着休息。这也是一种美国的生活方式。客人不进屋，吃饭自取，粗心的人，恐怕到最后也不知主人是谁。

下午参观另一家的养牛场和养猪场，牛栏猪栏里的气味跟中国的一样。

9月30日 晴

今天，参观一个农人的农场，农人的名字叫Catherine E Wilson，这个农场所在的地区叫Springvilleg，是不是可以译作春的乡村，假如可以，那就是一个很美的名字。上午在他房子的附近看了他的农具仓库、他的农业机械。他过得并不十分富裕，也就是说，他发不了财。但是那生活还是很有乐趣，他吃的东西，全是自己生产出来，自己制作的，那一定很好吃。女主人谈到前两年来过的杨沫和丁玲，她很喜欢杨沫，说："她吃得那么多，吃过了就睡，还打呼。她很友善，也随和，我喜欢她。"男主人把吴祖光伯伯认作了萧乾。看来，他们对每年去的中国作家都有深刻的印象。Alex每年都陪作家来。他说："每年来，热心参观的都是中国作家、东欧作家，还有几个非洲的。西欧作家从来不热心，总是坐着不动。"果然，那西欧的几位坐在树荫下已经大吃大喝起来。

农人和他的邻居们一起招待我们，午饭很丰富，都是新鲜的东西：牛肉、甜玉米、土豆片、黄豆、鸡蛋、西瓜、西红柿、甜点心。大家都吃了很多。我很喜欢吃。在我们桌上的一个老人，是Wilson先生的邻居，说是邻居，其实也相距了几十里路。他七十岁了，须发都白了，可脸色红润而结实。他太太穿了一身鲜红的衣服，是个教师。我们夸她年轻、漂亮，他说："她当然年轻，什么事情都是我来做，她生活得又舒服又轻松。"房子前草地上竖着一杆星条旗。"今天是什么日子？"我们问主人。

"什么日子也不是。"他回答。

"为什么要竖旗？"

“不为什么，爱国嘛！”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很满意。

吃过饭，就乘车到玉米地和黄豆地去看收割机收割。那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机器，驾驶室里有空调，有收音机，还有电话。我想起，这正是收割黄豆的日子。我插队的大刘庄，也是种一季黄豆，也是这时候收割。那是用镰刀一镰一镰地割，连割带砍，手上全扎满了刺。现在，这时候，他们还在割吗？我想应该是，分了地，地成了一小块一小块，用不了机器。下了车，在收割过的地里走走。爱德文让我爬进驾驶室跟着收割机跑几趟，印度作家和爱尔兰诗人也挤进来了。我们三个人挤成一团，把那驾驶员挤在角落里。那是个淡头发、一鼻子雀斑的小伙子，他极困难地操作着，可仍然很高兴，向我们介绍机器上的种种设备，好有意思。

下了收割机，我们上了汽车，去一个教堂。这教堂很朴素很干净，这是一个特别的教，好像叫Qwheker，是基督教里的一个分支，它的教义是和平、反战。不讲究形式，主张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地与上帝亲近和接触，用不着通过牧师。所以他们做礼拜是没有特定的人讲道的，谁受到了感应，谁就上去布道。

“谁能证明他是受了感应呢？”我问Esther。

“大概由他自己证明吧。”她回答我。

而且做礼拜也没有形式，大家坐在一起默想，也不念圣经——圣经是在家里念的。

这种教，在全国各地，甚至全世界各地都有，但在每个地区，都不可能有太多的人，因为那需要一种默契，要心齐，人多心杂嘛！在越南战争中，这个教给双方都送食物，并且规劝双方停战，而那显然不会有任何结果。

离开这教堂，去参观畜牧场。这些畜牧场的规模并不大，设备也不十分先进，这也许是因为这些教徒们还有一个信守的原则——发财致富的念头是罪恶的。走进畜牧场，我第一个念头就是——那气味，

全世界都是一样的。在汽车上就已经嗅到粪味儿和牲口味儿了。而小猪却十分干净可爱，肥肥壮壮，皮毛光滑。爱德文抓了一只猪要让我抱，他以为我会很喜欢，而我不由地倒退了一步。抱一只猪，这毕竟太过分了。为了安慰他，我就去抚摸了那猪。

妈妈问Alex，是不是能请几位写作班的青年作家谈谈，Alex一脸为难的表情，说，不那么容易，去年刘先生也有这种想法，最后也没成功，后来爱德文找了几对普通夫妇与他谈了美国的生活情况。妈妈说："我作为普通人，向他们求访，他们也不接受吗？"他说："他们美国人也许没有兴趣，他们认为没有必要。"他们好像对别人没有兴趣，每次"写作计划"开报告会，写作班的人从不来参加。可是，都说美国人很好奇，难道我们就引不起他们一点好奇心吗？Alex又说："我再向他们作一些介绍，把你们的情况多讲一些。"我们立刻阻止了他，这才没有必要呢。

直到五点半，才回到"五月花"。屋子里好闷热。

今天是周末，是来美后最宁静的一个周末。我给周海瑞打电话，十一点钟以后电话费几乎减半。我刚一问："周海瑞吗？"他马上说："是王安忆吧。"在这个世界上，恐怕只有我会称他周海瑞了。"你那儿是几点钟？"他问我。

"十一点零七分。"

"我们是九点零七分。"

相隔两小时，二千里路，声音非常清晰。

10月1日 晴

一起来就去借了潘耀明那把缺了大口的菜刀来切肉丝、切黄芽菜，包春卷，准备晚上的国庆“派对”。

酒和饮料讲好由华苓处拿来，我们准备点心。除了买了各种饼干之外，主要就是春卷，有豆沙和肉丝两种。上午炒好肉丝，下午帮忙包春卷的来了不少，有潘耀明、李小姐、七等生。七等生是冲着我那半瓶茅台来的。三下五除二，包过春卷之后，他果然把酒瓶占领；吝啬地给潘耀明只倒了一点点，然后就打开我们的冰箱，来了一个“自助餐”。把我们中午吃剩下的肉末豆腐拿出来，又拿面包，不亦乐乎地吃了起来。他说他从早上起来还没吃过东西。吃完剩余物资以后，又从我油锅边捞春卷吃。看趋势大有越吃越来劲的样子，我只好赶紧宣布一人只能吃两只，可是他已伸筷子挟起第三只了。

一边汆春卷一边跟他闲聊。他上次说过，这次出来，已把家里一些薄产留给了妻子。他跟我说了这些财产的来源。他是一个小学教员，过去生活很苦。在金价一万多元一两的时候，他设法买进了三十两，后来黄金涨到三万多元一两，就脱手卖出，赚了一笔钱。另外在一个小镇上有一所房子，房产涨价又卖出，再买一所房子。总之，他这点薄产是靠了做黄金买卖和房地产赚来的。

辛苦，辛苦，创作之外，要教书，要做买卖，这不是大陆作家所能想像的。

晚上的“派对”开得很热闹。除了“写作计划”的作家之外，还邀请了所有工作人员。吴作人先生和夫人来这里讲学，刚到也赶来参加了。八楼走廊里放了一张长条桌，桌上是各种饮料、点心和一桶冰

块。桌子那一头是一个音响喇叭箱。走廊里是音乐，房间里放映吴祖光带去的京剧录像。巴勒斯坦的女作家撒哈，她不住在“五月花”，今天她也来了，穿得极艳丽，舞也跳得极精彩。西德的女作家又有些醉了，大把地抓饼干朝嘴里填。看护她的，当然是东德的那位高大而漂亮的男作家，看样子比她年轻得多，可能也不善英语，所以总是默默地、腼腆地微笑。据说，他们曾经在东德同过学。看他照顾她的样子，很感人。这种同宗同族的感情，是无法隔离开来的，无论是在天涯海角。

南非的女作家克拉第斯·托马斯，不知为什么，也许是有感于我们的国庆。她不断地眼泪汪汪，又跳舞，又哭，又笑。加纳那一位非常和善、非常正派的男作家不断地安慰她。去年参加过“写作计划”的波兰剧作家，带了老婆孩子也来参加。他坐在走廊地上，神色疲惫。去年他出来以后，家里就被抄了，他无法回去，一直在外流浪。这次是安格尔给他设法，来此讲学一个月。一个月以后，还不知将去何处。

走廊上白天的余热无处可散，虽然已入夜十二点多了，仍然热得可以。大家在这狭窄地带跳舞，跳得汗流浃背，但还是兴高采烈。奇怪的是大家始终挤在条桌的这一头跳，走廊很长，就是不向两边发展开去。

跳到一点多时，土耳其和印度的两位作家忽然吵了起来，声势汹汹。只见土耳其人把印度那位教授猛推了一下，于是在条桌的那一头，另辟了一个“战场”。土耳其和印度两位各不相让，各有各的理由，美国和加纳两位在旁劝架。我作为主人之一，在旁干着急。那两位吵架的虽然在吵，但还不失文明礼貌，不断向我道歉。

中国人当中潘耀明的英语较好，他先弄清了吵的起因。原来是土耳其作家请吴作人先生写了一个“爱”字，写好后，他就拿在手里向人炫耀，印度作家以为是一张餐巾纸，便劈手拿来擦了一下脸，土耳其作家便大光其火，撞了他一下。在印度，一位教授是极其尊贵的，他哪里肯受这一下。脸色刷白地坐在地上宣布，一定要土耳其作家道

歉，否则，他第二天就离开爱荷华。中国人答应明天一定请吴作人先生补写一张，土耳其人认为自己没有错。

走廊里，一边是吵架、劝架，一边是跳舞，互不干扰，都很酣畅。直到两点多，中国人便收摊子，结束了国庆活动。半条走廊，几个小时的活动，便显出一个小小世界的模样。汆了一天春卷的我，已腿酸脚胀，管他怎样沸沸扬扬，我睡我的觉去了。

10月1日 晴

早上开始切肉丝，直到手上磨出两个泡来为止。下午两点，潘耀明便来帮忙包春卷，接着七等生也来了，再过一会儿，Esther也来了。

七等生包了几个春卷，然后打开桌上的茅台喝酒，喝着喝着找来一碗我们中午的剩菜，一边吃，一边喝，一边谈他的人生观，作了很多自我介绍："我是一个好酒好色之徒。"告诉我们他最近如何发了一点小财，贩卖黄金，又卖了一块地，潘耀明说："你给我第一个印象是很自负，在聂家，你一个劲儿地说你的书在台湾是如何有读者，有多少评论，国外又是如何地翻译介绍。"他回答潘耀明："那是因为我看到'写作计划'的作家介绍，对我的介绍很不准确。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进行一番补充。"妈妈问他："你认为文学的任务是什么？"妈妈总是提这一类严肃的问题。他笑了一下："文学，有什么了不起的任务？要说价值，创作的过程才是可贵的。"这观点倒是符合他作品中那种自我玩味的情调。潘耀明说："最近你写的那三个短篇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天机不可泄露吗？"他不回答，神秘莫测地笑笑。Esther说："中学生最喜欢七等生的东西了，因为，看不懂。"

桌上放着一本古先生送我的他的摄影集，他们翻着看，把他贬得一无是处。七等生问我："你知道我会照相吗？""当然会。"我说。"为什么这样认为？""因为你那么瞧不起古先生的摄影。""这不是瞧不起的问题！"——七等生和潘耀明异口同声地说。他们一直在争论不休——为了种种的人生问题、文学问题，这时候达到了统一。

"凡事都需要比较。你们想看看我的摄影技术吗？我从来没露过面。"七等生抖擞起来，从口袋里掏出钥匙，站起身在前边带路了。我

们跟在他后面，走进他的房间，他说：“打开第二个抽屉。”我们战战兢兢地打开，只见满满的一抽屉照相器材。我们面面相觑，然后Esther说：“我们的印象是，七等生很有钱。”他有些失望：“从使用的器材上应该看出技术水平。”我们也同样的失望。

Alex也来了，潘耀明说：“来帮忙，来帮忙。”他赶紧摇摇手：“不不，我马上就走。”实际上他并没马上走，而是坐了好大一会儿，好像包春卷会辱没他似的。他有些架子，把工作的等级暗暗地分得很清。他终于走了，说：“我六点钟到，把饮料和冰块带来。”

可是，八点了，有些客人都到了，他还没来，叫人家喝什么呀！真急人。小叶说：“这个人什么都好，就是忘性大。”“他可别把今天的晚会忘了啊！”Esther说。她一边在看今天的晚会通知单——Chinese Independence Day——“中国独立日！”她瞪大了眼睛，重重地打了我一下，“今天是十月一日啊！”“怎么，你不知道？”我给她吓了一跳。“我不知道。”她说，声音变了许多，好像有些顾虑的样子。我说：“Esther，你要觉得不方便，你就回去吧，我决不愿意使你为难。”“我倒没什么，只是，假如遇到台湾同学，总不大好——”“我明白，你走吧，不要紧的。”她迟疑了一下，然后又迟疑了一下，走了，我送她到电梯前，这么短短的几步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送她。我们站在电梯跟前，一齐看着电梯的指示灯——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

电梯上来了，门开了，里边是Alex，雄赳赳地推着一大车饮料。

晚会很热闹，大家都有点发疯。那位西德女作家一喝酒就醉，一醉就失态，汗淋淋，泪汪汪，披头散发，看到男的就拥抱，后来，她死死地缠住爱德文，贴在他身上。爱德文极力地摆脱，他的话我一句没听懂，可他所有的表情都表示着他的不耐烦，他的克制，他的敷衍。

接下来，那位土耳其诗人又惹事了。他老要和撒哈跳舞，并且老是要拥抱她，和她亲热。她火了，不和他跳，随手拉过潘耀明，说：“我有舞伴了。”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情：今晚上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

吴作人与他夫人也来了。土耳其人会泥塑，当场为吴作人塑了一个头像，吴作人为他写了一个字——爱。这是土耳其人唯一会写的一个中国字，他很向往中国，说土耳其和中国在很久很久以前是一家。他珍惜地捧着“爱”走过跳舞的人群准备回自己房间收好，印度作家正处在极度兴奋之中，一边跳，一边用滑稽的动作顺手拿过写着“爱”的宣纸，在脸上擦了一把。这还了得，土耳其人火了，骂了几声回到自己房里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气冲冲地走了出来，把印度作家叫到一边。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，总之，两人气汹汹地走了回来，印度人大声怒骂着。据说，土耳其人打了印度人一下。印度作家说：“如果他不向我道歉，我明天就走！我要给华苓打电话，我明天就走！”一时上吵得不可开交。

舞，仍然在跳，音乐，越来越热烈。玛利和彼得觉得我们的音响不够好，回去拿来他们自家的唱机，喇叭，唱片。

来了很多客人，安娜和她的丈夫——一个医生。她今天穿了一条红色的花裙子，美极了。还有一个“写作计划”办公室的工作人员，叫丽莎，她长得很像达·芬奇的《蒙娜丽莎》。土耳其人请她跳舞，她不愿，说：“我不习惯。”可过了一会儿，我看见她和别人在跳了，跳得很开心。来了一位艺术设计系主任胡先生，是台湾人，又来了一位波兰作家，他是去年参加“写作计划”的，后来波兰的戒严令下来了，他便没再回去，在这里请求政治避难了。刚出院的安格尔先生也来了，聂华苓、蓝蓝、安迪、谭嘉、吕嘉行……感谢一切使我们晚会热闹快乐的人，包括吵嘴打架的朋友。还感谢一切喜爱我们的春卷的人。

走廊里在跳舞，房间里在放吴祖光伯伯的《三打陶三春》的录像。坐了好些傻呼呼的外国人，不晓得他们懂不懂。他们对那女角的兰花指很有兴趣，那位年轻的印尼人一直在学，并且还教。一大排人，面对面地站着、操作着兰花指，把那柔和的动作规划为几道整齐的线条，看起来，好像是一套体操。

土耳其人在爱德文的说服下，向印度人道歉了，并且连连地说：“I love you！”而印度人不消气，还是要明天就走。

唱片里在喊：嗨！嗨！嗨！嗨！大家一起跟着喊：“嗨！嗨！嗨！嗨！”

10月2日 晴

中国人习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歇，不管昨晚睡得多晚，天亮便醒了。

这里天气真怪，只要出太阳，就要挥汗不止。按农历算，现在秋分早过，时近寒露，在上海恐怕早需穿毛衣了，这里却热得无法躺上床。可是公路对面的树，有三棵叶子已变成鹅黄色，有的竟已转为绯红。难道是安忆说的，自然是只依季节，不管气候的?

爱荷华大学艺术系一位南朝鲜女教授，请吴作人先生和夫人吃饭，中国作家叨光作陪。她的房子在城的另一边一个山弯里，是她自己设计的一所白色屋子，很别致。屋内面积最大的是一个大客厅，大客厅里主要的陈设，是沿着一面大玻璃墙边都是花草，上面挂下来的，下面爬上去的，阔叶的，细叶的。有一间很大的地下室，是她的工作间。她设计的艺术品，在美国、法国都很知名，就是在她的本国默无所闻。她已四十多岁，未婚，有一个美国男朋友。她请大家吃了大马哈鱼，半生的大虾，最后尝了她做的鸡尾水果。酒浸的各式水果，爱喝酒的人，一定喜欢。

10月2日 晴

中午，南朝鲜女画家朱今嬉女士请我们几位东方人吃饭，她主要是请吴作人，我们作陪。

而在十一点半时，潘耀明来电话说：“聂华苓来电话说她十二点差一刻来接我们。”

“那么就是十一点三刻啦？”我说。

“不，是十二点十分。”他说，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认为。

“不对，十二点差一刻是十一点三刻。”我说。

“怎么是十一点三刻呢？是十二点十分嘛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十二点缺一刻就是十二点十分嘛！”

我笑了起来。他挂上电话，过了一会儿，来敲门了，惭愧地说：“是我错了，下楼等吧！”他去了个电话给聂华苓，证实了十二点差一刻就是十一点三刻。

聂华苓和许先生各开了一辆车来了。许先生已于昨天一早搬出了“五月花”公寓。他本来打算去耶鲁大学作研究，可聂华苓硬把他留下来，要他在爱荷华作研究。他在爱荷华生活这一个月，终于发现了爱荷华的许多好处，其中有一条，治安好，女孩子夜里两点走在街上都没事——而他要把妻子女儿都接来的。他终于决定留下了。已租了房子，还买了一辆车，他就是开着这辆新车来接我们的。半年之后，他离开爱荷华时，还可以将这车再卖掉。

朱今嬉女士住的一栋小楼是她自己设计的，一栋雪白的小楼，里面的一切都是白色的。很简单，空间很大。有客厅，厨房，两个卧室，还有一个作为工作室的宽敞的地下室，她是搞手工艺术的，有些作品需要庞大的工程，用蜡制模型，再浇铸；或是用大幅的布、绢，等等。她一个人在这雪宫似的房子里生活，这几天，把房子让给吴作人夫妇，自己到她的男朋友——一个老医生家里住。他们同居，却不结婚，因为他们性格并不适合。结了也会离。她已经四十多岁，本还有结婚的打算，可总找不到合适的，她说："自从我见到安格尔以后，我对男人的标准就提高了。"唉，一个异国人，也难。

我们一起向聂华苓讲述了昨晚上的纠纷，聂华苓很潇洒："不要紧，这是常有的事。印度人不会走的。""可是，"潘耀明担心地说，"他说他从来没受到过这样的对待，他在国内是很有地位，很受人尊重的。"许先生说："这是有积怨的。那土耳其人是不好，我要在场，我也帮印度人吵，该揍他。"土耳其人是有些轻浮，可也不至于这么遭人怨吧，我们也搞不清他们之间的关系。聂华苓说："什么事都不会有的，这一批作家中，我只担心一个人，就是那个西德作家。昨天，她带着一种挑衅对安格尔说：'你们美国只有三百年历史，我们德国有二千年历史。'安格尔先生回答她：'中国有四千年的历史。'""那位东德作家可真是可爱，对她非常好，很照顾她，两个人形影不离。"大家都说。"他们太要好了。"许先生说，"那天晚上诗人念诗，东德作家来晚了，没座位了，他居然就坐在西德女作家的膝盖上，坐在膝盖上哪！"他非常愤怒。"究竟是谁坐在谁的膝盖上？"大家怕弄错了。"东德坐在西德膝盖上！"他强调着。

回到"五月花"，已是两点多钟，屋里热得像一个蒸笼。一个午觉醒来，睡衣全湿了。已经十月了，还这么热，这个爱荷华，怎么会是这么个气候？坐在书桌前看书，听到门外走廊上有个女孩子大声的哭，是谁呢？我们这儿没有这么小的女孩儿呀！冰岛作家的女儿也从不哭，也不说话，只是闷头爬上爬下地皮。打开门一看，一个黄头发的小女孩在哭，旁边是一个棕色头发衣衫不太整洁的女人。那女人看

见我开门，赶紧抱起女孩子向走廊深处跑去，似乎怕打扰我。那女孩子蹬着脚哭得更凶了。

10月3日 阴

下午叶向东带我逛旧货商店。从衣服到玩具、家具，一应俱全，可谓价廉物美。但美国人很少光顾。难得看见一两个人。有一家商店的后门口，丢着很多沙发、折叠床、自行车等等。据说这些东西都可以拾取，连进旧货店的资格都没有了。他翻看了一个空调箱，说是还可以修复，下次来把它搬运回去。听说有学生初来这里，经过一星期的收罗，便可拾全了所要的家具和动用之物，可见此说不谬。

10月3日 阴

今天发生了一桩悲惨的事：电梯坏了。楼梯间里又闷又热，爬上八层楼，实在很艰巨。

下午，小叶带我们去买东西，买完之后，小叶顺路到一家保险公司打交道。这家公司给他保汽车险，多收了他的保险费。他让我们坐在汽车上等，自己一个人进去，不一会儿，就出来了，很顺利。原来公司错把他当成非学生。学生的保险费要低一些。然后我们去Eagle买食品。不料一到Eagle，刚下车，一辆警车紧跟着停在我们边上，下来一个警察，拦住了我们。原来我们的车超速了，一共有三辆车超速，而我们跑在最前面。警察很有礼貌地说：“本来我应该罚你三十元钱，但是我没有在当场抓住你，这次就算了，请你下次不要开这么快。”在这里，开车的规矩很多。九月三十日那天晚上，中国学联开国庆招待会，会后看电影，电影完后有几个男生还有余兴，便去喝酒，回家时与另一辆车撞了。虽然是那一辆车的责任，可是一检查，发现中国学生嘴里有酒精，于是把他们的车也扣下了。因为严禁酒后开车。

买完东西回到“五月花”，负荷爬八层楼，苦不堪言，之后便再不敢贸然下楼了。

小叶有一本专门练习听音的课本，但是借给了别人，他要去要回来借给我用，打电话去追，一追追到了潘耀明，原来这本书到了潘耀明手里，地球真是个圆的。

10月4日 阴转晴

气候转凉，稍稍能坐得定了。

看台湾当局所没收的李敖《千秋评论》丛书。他是一个怪才，以骂见长。一个人办了一个刊物，刊物上就登他自己的文章，曾因思想过激，两次入狱。他在狱中写文要作家三毛关心真三毛。说他“最佩服的一个国民党，是一个死掉的国民党，他叫蔡元培”。出狱后揭露牢里的黑幕，准备第三次入狱，说：“坐牢的一个好处是：自己可以时常同自己在一起”，“不坐牢时，把自己介绍给别人，坐牢时把自己介绍给自己。”据说他家里有各个社会要人的档案、卡片。

晚上爱大艺术系美术教授李宏达和夫人请吴作人夫妇吃饭，我们叨光作陪。摆的是圆桌面，吃的是中国菜。夫妻俩轮流动手做，手艺不坏。在美国生活，一切都要靠自己，生活的好坏，决定于自己的能干程度。所有中产阶级几乎都如此。

饭后，看了李宏达的画，欣赏了他十四岁的儿子所创作的钢琴独奏曲。这曲子曾得全美初中级奖。

回到公寓已十二点多了。接木令耆来信，说她十二月初回美，我们如去波士顿，请到她家小住。

10月4日 晴

早上在楼下学习室里，等英语老师来上课。七等生告诉我：“昨天，听说爱荷华发生了一桩命案。”卡罗则指给我们看报纸上一行标题——一位将参加总统竞选的某先生来了爱荷华州。这两天没报纸，因为电梯坏了，送报的就不上来了。

下午去EPB听写作班的课。聂华苓已经帮我与写作班联系好了，并且早在一星期前，就请瑞克把今天要讨论的小说稿给了我。搭上校车，那位冰岛作家也搭车，他总是那么可亲地朝我挤挤眼，然后就与我结结巴巴地说几句话。看时间还早，就提前一站下，去Old Capital转转，一进去就是一股扑鼻的饼干香，然后是花香。我跑到服装店去看那件衣服，我念念不忘它，希望它能再跌一次价，再跌一点点，我就买——我心里想。可是它并没有跌，仍然四十九元美金。

转了一圈，出来时便有些迷茫，问了一位老人，他把我指向完全相反的方向，走走不对劲，又问了两个女生，才走上了正确方向。抬头一看，那EPB与Old Capital之间原来是条直线。——这正是我原先认为的，可却没有自信。这是个太陌生的世界，我常常容易失去自信。

到了EPB，在走廊上遇到印尼诗人，他走路动作，总有一股虎虎的生气，兴致勃勃的，使并不漂亮的他有了一种讨人喜欢的味道。他来了两个印尼朋友，一个老人，一个少女，他们三个人叽叽呱呱地说开了，那语言兴许是印尼语吧，有些吵人。于是Esther说：“我们下去找个教室去坐，太受不了了。”到了二楼，个个教室满满的，在上课。他们上课很有意思，像开会，分不出老师学生，围个圈坐着，随便得像在聊天，不过那确实是在上课。我们只能坐在楼梯上了。Esther把今

天要讨论的两篇小说简单地给我说了一下。一篇小说题目叫House Cleaning，写一个很老的老太太打扫房子，翻出许多旧日的东西，不舍得扔，勾起了她的种种回忆。另一篇小说叫Papa Bear，写一个人回到已离了婚的前妻那儿看望。我觉得写得都挺好的，并且这都是出自于写作班的年轻人手中。他们好像写得很像小说，没有那种我们的年轻人特别容易犯的错误——编故事。这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小说是从话本延续而来的？常常把小说写成了故事。我不知道。

时间还早，Esther就和我聊起来，她说今天“写作计划”办公室在议论，说这一期作家是有史以来最疯狂的一批。撒哈刚才在这儿大声呼吁：“再不能让那种事情发生了！”她指的是土耳其人硬要拥抱她的事。他们议论，西德女作家老是酗酒，而那东德的却特别安静。Esther说，这期作家中，她最喜欢的是那位墨西哥作家。说他非常聪明，常常有些出奇制胜的念头。这位作家在墨西哥是数一数二的，相当有地位。

过了一会儿，学生和老师都来了。老师是个上了年纪的女教师，名叫Doris Grumbach，也是一位小说作家。学生有十几个，他们好奇地看看我，朝我微笑，便再不管我了。只有坐在我前边的一个穿背带裤的女生，不时地看我，对我笑。他们先讨论那篇《打扫房子》，同学们纷纷发言：“可以感觉到作者对主角的同情心。”

“梦的气氛很成功。”

“最成功的是不需说的话不说。”

“使过去的生活贯穿全部，用动词过去式，很好。”

等等。

老师提出了一些不足：“太多的连接词，‘But’‘But’‘But’……一共有五处。太多的‘then’‘then’‘then’，很粘耳……”

听着他们的讨论，我有一种感觉，就是，他们把文学放进了研究院，这好像是一个极大的误会。我又想起国内那些形形色色的小说座

谈会，我们常常遗憾不能有正常的艺术讨论和艺术研究。究竟什么是小说里最重要、最值得谈的呢？不晓得。也许，那最值得谈的东西是最没法谈的。我也不晓得。

课堂休息了，我提议走，Esther也同意。在走廊上，那穿背带裤的女生向我们打招呼。原来她去过中国，并且去过上海，她说上海很美，真是个大极了大极了的港口，她说很喜欢她住的那个旅馆，对面有个俱乐部，里面有游泳池。“那是锦江饭店吧？”我说。“是啊！”她大声说，十分高兴。她那次是自费去旅游的，玩了十天，她说以后还想去。

出了大楼，正好遇到彼得开车出来，我便搭上了他的车，我的运气真好。他怕我寂寞，与我聊天，说了很多很复杂的话，我听不懂，心中的抱歉是无法说的。没办法，只能努力听着，居然也懂了一些，他要绕道去一下Eagle买面包和白脱。他说美国买汽车很便宜，来爱荷华之前，他们曾有过一辆更大的汽车，也不贵。假如没有汽车，很麻烦，乘巴士很困难。去过旧金山吗？那儿的汽车太多了。……到了Eagle，他问我要不要下去买一点东西，我说不了，就坐在汽车里好了。他就一个人走了，这时我忽然想起我应该对他说：“不要因为我在等着就着急。”这几个字我还能说。正后悔着，只听见汽车后面“砰”的一声响，他已经回来了，放好东西进了汽车，气喘喘的，他一定赶得很急，其实我一点儿事都没有，等上两个小时也没问题。彼得长得很好看，黑黑的皮肤，卷卷的头发，下巴很坚毅，我喜欢他的下巴。潘耀明说他好像有点架子，其实并不是架子，他就是这么严肃，与你聊闲天就在好像讨论问题，邀请你跳舞就好像叫你去办公。其实他很亲切的，他喜欢吹口琴，吹一支赞美诗。

晚上，那位设计系主任李先生请吴作人吃饭，也请我们作陪，我们挺有口福的。他家的房子和家具都是自己设计的，很别致。墙上挂着他的画。他的所有画都是黑白两色的，用油当水画，像水墨画。又比水墨浓郁。我问他，为什么只用一种黑色，他说：红颜色只表现了

红，绿颜色只表现绿；而黑和白却能表现无限。他的太太很秀气，却是电脑专业的教师。大儿子十四岁了，在念初中，能弹琴能作曲，他表演了自己创作的一个钢琴组曲《花园》，分四个段落：蓝蝴蝶，紫松鼠，橙乌龟，红蜻蜓，这构思兴许是得了圣——桑的《动物狂欢节》的启发。作品听了一遍没来得及好好品味，他妈妈向我们介绍：这作品中有一种中国艺术的情调。而他从来没去过中国，也没听过中国音乐，看来是血缘在起作用。这作品获得了爱荷华城和全美国的初中组音乐奖。

最后，吴祖光伯伯请吴作人再为土耳其人写一个“爱”字，以平息那场国际纠纷。

10月5日 阴转晴

真怪，天不热就冷了，穿上了毛衣。安忆中午和老师进行午餐会见。一个人在灯下粗粗想了一下，来美一个多月，有几件什么样的感觉：

一是，大大地显出我们坐功修养之深。从幼小开始，大人就以"猢狲屁股"为戒，来加以管制，大了以后，果然坐功就很见功底。美国人无论是吃饭、做客、集会、很少坐下，更没有主人陪同着穷聊，即使做客，也是主人忙主人的，客人自便。而中国人是习惯坐下，坐的时间通常又比较长，所以就十分讲究坐的位置。吃饭有上座，待客有宾主之分。名字变成铅印，那就更有学问，前后当然不同，一二三排列之外，"文革"时还创造了"还有"二字，"还有"后面的不同于"还有"前面的，那个区别、层次，真是细致到了家。

二是，大大地感觉到我们国内发言、讲话之长。一个报告，似乎讲不到两小时就不够水平。当然，主要是我们要讲的道理比较复杂。道理与道理之间的比例，都充满了学问。要讲缺点，就先要讲优点。优点讲不充分，就会变成一片黑；要讲光明，就要讲过去如何的不光明，作为陪衬。总之，任何一个问题，都要两分法，那么确实需要两小时、三小时了。

这两条实际上就是一条，我们实在不珍惜时间。不珍惜自己的，也不珍惜人家的。把时间看成用之不尽、取之不竭的东西。反正明天过完了还有明天。

三是，由于语言的隔阂，我不知道是美国人特别爱笑，还是美国人说话特别幽默好笑。一般的讲演、报告会，也会不时引起大笑。电

视里也如此，有些十分绅士派头的人，说着说着，忽然扭了起来，或者做一个和外表很不相称的滑稽动作。我大概是积习太深，总会感到惊讶、惋惜。不过再想想，什么事情都是由需要而产生的。这里也有一个供求关系。美国青年人需要笑，需要快乐、需要舒适，于是就产生各种可笑的语言与动作，产生随意性：随意的服装，包括毛边裤脚，露出一个肩膀的恤衫；随意的举动，甚至看电影时，女孩子会把双脚高高地搁在前座的椅背上。据说这种随意性的产生，是对于中产阶级的一切虚伪礼节的一种反动。

10月5日 晴

今天是真正的秋天，风有点凉，太阳却很暖，有点落叶，不落的叶子渐红了。十一点钟，我在楼下等车，准备去EPB。今天我们约好在一起吃午饭，就四个人：我，安娜，Esther和Alex。一边吃午饭，一边讨论星期五的课。安娜安排我和她的学生座谈，把这作为她的修辞课的一个内容。等车，等等不来，等等不来，这车虽说是一小时四班，可是常常半个多小时才来一班。倒把谭嘉、吕嘉行等来了，他们正好也要去EPB，于是我就搭他们的车去了。

安娜说要带我去一个非常美国式的餐馆，于是就带我们到了一条街。这条街上两边都是石桌石椅，专供学生们买了饭出来吃。正巧，遇到那位巴西女作家，便请她和我们一起吃饭。这个小餐馆很拥挤，排着长长的队。房子有些旧，安娜告诉我，这房子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了。我们排着队看菜单——菜单贴在墙上，墙下有个服务员为我们开票。我要了一份三明治和一杯中国绿茶，各付各的钱，免去了许多客气的时间。茶喝完了，Esther又帮我去添了开水。美国人也许很奇怪我们要添开水。他们以为茶和咖啡一样，喝完算数的，其实第二遍茶最好喝了。记得去年这个时候，我们在乐山茶馆里坐下，自有人来添开水。那小伙子把水壶举得高高的，那么一提，又那么一放，茶碗便满了，桌子上一点儿也没洒着。他很得意。当他提起水壶，我们本能地要躲一躲时，他便放下水壶说："不碍，烫不着你。"说完提起水壶，从头开始。

巴西女作家大约有四十多岁的模样，金黄色的头发烫得很讲究，她很安静，也很傲慢，不大参加集体活动，和大家比较生疏。听说她

刚离过婚，挺不幸的。我同情每一个离婚的女人，因为我从来不敢设想，我自己要离婚会怎么样。

她吃完饭就走了，我们便自己把桌子收拾了一下，掏出笔和纸，开始“开会”。我昨天晚上匆匆设计了几个问题，可安娜好像不太满意这些问题，当场便一个一个地向我回答了。比如，我问：“看起来他们生活得很开心，他们有没有什么烦恼？”安娜说：“他们并不那么事事如意，他们感觉到压力是很大的，又是在十七八九这种恼人的年龄，刚进入青春期，他们有很多苦闷。你看见他们跳舞、发疯、大笑大叫，有时则是一种发泄。”事先准备的问题都解决了，只好重新设想。我说：“我想问他们喜欢什么？除了晒太阳，跑步，喝酒，跳舞，还喜欢什么别的。”安娜笑了，说：“这是个好问题。”我说：“他们常常是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手拉手走着，或在树林里约会，能不能问，那是爱情吗？”安娜说：“这应该是第一个问题。”我又说：“女生想不想当电影明星？”她点头直笑，然后说：“这些问题很好，很有趣味，不会使他们感到枯燥。”接着，她把她设计的问题向我提出：我个人的经历，中国的大学生生活，关于我的小说《小院琐记》——孩子们都已经看过了。

从餐馆出来，已是两点多钟，Esther陪我等车，我们坐在马路上晒了一会儿太阳。她很疲劳，晚上睡得很少，要交报告，要上课，又要为我们十八日的中国作家报告会翻译材料。我问她：“学业结束后回去吗？”她说：“我想，也许还是回去好。在这里，给美国人做事，我觉得没什么意思。”

10月6日 晴

下午是听美国作家谈美国小说，可惜语言不通，只听翻译翻了一个大致意思。大意是谈到古希腊悲剧中的人物组合、结构，太符合理论化、逻辑化。作者如同造物主一般，制造全局及人物。小说作者不应如此，应纯粹反映经验。本质上应是幽默的，不要那么痛苦。现代人所写的悲剧，只有受罪，而没有了古远时候那种伟大壮烈的本质。他认为小说不要太强调结局，结局就应是平平常常道来，没必要去制造一个符合某种理论的又要贯穿全局的东西。

还有，文学的永恒意象：人类。

我是基本上同意这位先生所说的，不过我们用的词汇不一样。我认为脱离了生活，从主题出发，作者就会变造物主。

晚上在安忆房里看电视，敲门进来一个美国学生，是来推销一种带铃铛的小动物夹子的，这又是一种学生的副业。联想到在旧金山刚下飞机，和孩子们抢搬行李的情景。美国人似乎从小就在为生活接受各种训练了。应该说，这里有好的一面，从小就要培养一种独立精神。

10月6日 阴

半夜里被一阵吵闹声吵醒，走廊里有男人们响亮的说笑声，看看表，已是凌晨两点三刻，不晓得外面在搞什么鬼。早上去上课，过了好一会，东德的汉斯和西班牙的卡罗才匆匆忙忙地赶到，抱歉地笑着，像两个迟到了的小学生。原来他们昨晚上开舞会，一直到凌晨。怪不得，走廊上这么闹！这些人哪。

下午是一个美国小说家的报告会，一共有五位作家做报告，其中也有写作班的那位女老师——Grumbach。他们谈的主要的几点是：

一、悲剧。他们认为古希腊悲剧中的人物组合逻辑性太强，太理论化，作者如一位造物神般地制造全局及人物。而现代人所谓悲剧，只有受罪，而没了那种伟大壮烈的本质。现代悲剧科学化。

二、小说。不要太强调结局，结局本来就是平平道来，没必要一定制造一个理论的联系，贯穿全部。小说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，不必非要蕴涵说教、哲学性道理。小说——反映人生——这种认为过时了一些。旧的小说，总企图衔接人物和命运。近代小说有更多的课题在发展中。而近代小说，也有问题。事实上，真正的人并不像“荒谬英雄”——指“存在主义”“荒谬主义”文学作品中的人物——那样复杂、困扰。

今天的报告会，加强了那天写作课给我的印象。他们坐在一起，确确实实在谈文学，可是，似乎太“文学”了。文学里包含了多少社会的属性。文学不是那么纯的，它有很多不洁的成分，没法子，躲也躲不掉。

汉斯今天接到来信，得知他得了一个国家奖，他很高兴，一直在微笑。他像个大孩子，蓝色的眼睛非常纯。他很含蓄，很安静，我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总和西德那疯女人一起，他们不协调。

吃过晚饭，听到有人“砰砰”地敲门，开开门，一位青年背着一个大包，笑容满面地站在面前。他一边流利地说着什么，一边迅速地把一个一个东西夹在我的毛衣上。我愣愣地看着他，又看看那给他夹了满身的东西——一个个毛绒绒的小动物，五颜六色的。他笑容可掬地一个个夹着，一会儿，毛衣上下左右便琳琅满目了。他见我发愣，便问：“你会说英语吗？”“不会。”我摇头。“哦——”他仍然笑容满面地把小东西一个一个摘走了，一个也没给我留下。然后便走了，不见了，只有毛衣上到处是被那夹子拉出的毛。好一会儿，我也没明白过来。妈妈说：他是个推销员。这真是太奇怪了，这人像个学生，也许这也是打工的一个内容吧。我想起，昨天走过Old Capital，见橱窗里跪了两个女生，笑容满面地一人抱着一只狗熊，一个摇着一面小旗子，很快活，也很奇怪。这也是一种工作吧。

10月7日 晴

下午和大家一起去超级市场，采购一星期的食品。在这里搬东西的，都是打工的学生。结过账付了款的食品都装入大纸袋，放在推车上。每部推车都有号码，然后在发票后面写上推车的号码。买主拿了发票就可以离开，走去开了自己的汽车过来，只需坐在车里出示发票后的号码，搬货人就会把该号码的推车拉过来，把车上的东西，一包一包搬到买主的汽车上。虽然从上街沿的推车，到下街沿的汽车，不过两三步的距离，那些食物口袋，每一包也只不过十来斤重，但是这活儿是连续不断地搬、运，搬、运。买主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地开来，有时还排起了队。这劳动的强度，实在不比我们国内的搬运工轻。前几次来，看到干这活的都是男学生，今天有两个女学生也在干这活了。中国的女大学生，恐怕很少干过这么重的劳动。更可贵的一点是，他们并不以此为耻。

六点钟钟敬堂带我们去看大游行。这是一年一度的爱荷华大学的校友会，同时也是庆祝十个州的大学足球联赛在本州举行一场比赛。本州的足球运动员也回到州里来，因此也是欢迎他们回来。

游行很好看，别有一格。队伍没我们那样整齐划一，但看来已尽了力。前面是各式救火车，据说每年不同，今年是救火车展览。后面是各个时代的汽车，再后是摩托车队形表演、古典装束的乐队、马队。据说都是复员军人。看样子也都上了些年纪，都十分认真，十分庄重，努力看齐了走，很可爱。如果他们真是复员军人的话，我想这些帽子上插着羽毛、满脸严肃的人，应该是到过朝鲜，应该是知道中国的。想不到在这里，这样的场合下，见到了他们，祝他们幸福愉快地度过晚年。

看了一个多小时的游行，八点到音乐厅听爵士乐队演奏。乐队是从纽约来的，有些名气，票价是十三元一张。

从未听过爵士乐，听后第一个感觉，不是原先想像的那么不好，也不都是强节奏的兴奋剂。今晚节目由两个乐队演出，每个乐队基本由四人组成，除了爵士鼓和钢琴之外，其他两样乐器各有不同，各有特点。在演奏时，每一种乐器都有独奏表演的机会。这种音乐的流行，恐怕相当一部分得力于乐队的精悍、轻巧灵便。当然，音乐本身的轻松活泼，配合美国人民的胃口，是主要的。

10月7日 晴

一大早，被电话铃叫醒，是Esther。本来说好我打电话叫醒她，不料还是她先醒。今天早上要去赶安娜的修辞课，这堂课的内容就是我和学生们的座谈。赶紧起来，匆匆吃了点东西，下楼去等车。今天的天气真好，风和日丽。

安娜作了很多准备，带来了家制的蛋糕，烧了茶和咖啡。学生来了有十几个，个子都很高大，很成熟，可那神情却挺天真、幼稚，傻傻的。他们有些拘束，有些生分。我提出的问题常常得不到回答。问他们对现状有什么不满，都说很幸福，只有一个女孩子说："学费太贵了，应该像北欧有些国家那样，学费可以免去。为了交学费，我们要动脑筋找工作。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打字的工作，却只有三个月的任期。"当然，学校有个组织，专门为学生分配工作，但他们只考虑一定经济水平线以下的困难学生。我问，像我昨晚碰到的推销员的工作是不是容易得到，大家一起说："这种工作机会很多。"看来他们还是有些挑剔的。我说："你们懂得什么是爱情吗？"一个神情很严肃的男孩子说："对爱情，各人有各人的看法。"他们问我："中国有没有童工？""中国大学生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吗？"他们惊奇中国上大学要经过严格的考试，惊奇大学毕业国家统一分配工作。而他们毕业后还要自己找工作，很辛苦。不过，他们也还是愿意自己找工作，因为，万一国家分给你的工作是你不喜欢的呢？他们以为中国是一个集体意识很强而不见得有个人意识的国家，他们对中国是很隔膜的。我问："你们平时还喜欢干什么？除了跳舞、喝酒、晒太阳……"他们愣愣地想了一会儿说："就是这些，OK。"

一小时很快就过去了，刚刚有些活跃起来就要结束了。可是不可能再继续了。美国人坐板凳的耐心最大限度是两小时，少年儿童减半。我不能设想让他们到中国去开会，一开一上午。散课前，安娜布置每个人要给安忆写一封信。我很高兴在不久以后能收到这些信。

孩子们走了，我们又聊了一会儿。一直在旁边听的艾恩——瑞克的妻子，他们夫妇俩都在“写作计划”办公室工作——说：“这些孩子今天怎么了。他们平时喜欢干的事多了，看电视系列片，弹钢琴，踢足球。”安娜说：“他们和你还不熟。”是呀，他们和我不熟，唉，都怪我不会英语，否则每天可以和他们聊天。

我觉得这些学生远不如中国大学生成熟，可是，那成熟是用多少痛苦去换来的。安娜对她的学生非常宽容，她说：“他们很甜，很害羞，很听话，上课的时候，只要对他们‘嘘——’一声，他们便都安静下来了。”我说：“听人讲，美国学生学习不努力，只满足于得C，是吗？”安娜说：“他们很努力，他们得C是因为他们只能得C，他们是努力过了的。”她开车送我回“五月花”公寓。一路上，一直和我聊天，她有意把话说得简单，很慢，让我听懂，并且努力了解我的意思，不时地夸我，鼓励我，给我信心。她真是太善良了。“你很喜欢孩子吧？”我问。“是啊，非常非常。”她说。我想起那天参观农场时，她和一个四五岁的农家小女孩像朋友一样聊着天。那女孩儿告诉她：她很喜欢看一个电视系列片。安娜说：“是吗？我有个侄女儿也喜欢。”“你有孩子吗？”我问，“没有。”她说。她告诉我她的丈夫是个农家的孩子，现在他们俩都是一边工作一边读学位，很忙。她说：“我太喜欢学生了。”是啊，做她的学生一定很幸福。

下午五点多钟时，Alex打电话来，说：今天晚上，爱荷华市举行校友返校游行，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活动，他六点来接我们去看游行。“可是，晚上七点多就要去Hanche听音乐会，这不是太紧张了？”我说。“这不是很宽裕吗？”他说，“六点看游行，七点多听音乐。”我一

想，也是。六点到七点多之间，有一个多小时时间呢！一个小时是很长的时间呢！

六点钟，Alex来带我们去市中心，游行已经开始，Esther也已经在了，她说："呀，你们晚了，刚才的乐队可真棒，乐死人了。"现在的游行队伍是一辆辆救火车，呜呜地叫着，旋着五颜六色的灯光，很是热闹。"为什么这么多的救火车？"我问。"我也不太清楚。"Esther说，"好像是，每年都以一种车为标志，今年的标志是救火车。""为什么？"我很奇怪，"谁知道。"她说。又有各式各样的车子开过：老式汽车，三轮车，马车……一列退伍军人的队伍过来了，他们的脚步很庄严，有点迟缓，走着各种队形，穿着军服，非常威武。"他们都是自愿参加游行的吗？"我问。"当然。在美国，谁能强迫谁呢？""谁想参加都行？""行啊，你想参加现在马上可以进去。"她说。一列中学生走过，敲着军鼓，奏着军乐。"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？""什么日子也不是，因为足球队回来了，所以就搞一个校友返校日的活动。""为什么要在足球队回来的时候搞呢？""只有在足球队回来时，才有这气氛。"她回答我。"足球是美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。""哦——"我想到明天安格尔先生请我们看足球，真是不可不看的。一列阿拉伯人的队伍过来了，骑着高头大马，来回踱着，威风凛凛。还有中国人的队伍，穿着古代的戏装和旗袍，真是莫名其妙，有杂技，有小丑——跑来跑去逗弄着看游行的孩子。"今天这活动叫什么名字呢？"我又问。"叫Home coming，就是还乡。"

一辆车子过来，上面坐了一群小孩子，挥着小手齐声喊："Let’s go home""Let’s go home"……游行队伍看不到头，交通完全截止，奇奇怪怪的花样，层出不穷，到了七点钟，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，还有一场爵士音乐会呢。

今晚的音乐会，是两位全美著名的爵士音乐家的演出。一位是钢琴家Dave Brubeck；另一位是萨克管演奏家Garry Mulligan。音乐会给我的印象极好，我从来没想到爵士乐会有这样的境界，当然，它高不

到天上去，它仍然是大众的，是大众化的艺术。可是它确实有了一种较高的精神境界，而非过去我们所认为的仅仅引起动物性的本能。

前半场是萨克管领奏，一位钢琴，一位贝斯，一位爵士鼓；后半场是钢琴领奏，一只黑管，一只六弦琴或长号，一只爵士鼓。个人演奏技巧极高，我没想到长号能奏出这么灵活的四连音、装饰音。我觉得这音乐里有一种镂空的、透明的感觉，这里面有很多空间。我说不清这种感觉，总之，它不像古典交响乐那样满满的，全是色块，而它是线条，倒有些中国艺术的情调。也许我是太不懂了，居然将爵士与中国艺术联系起来，可我却是这么感觉到，这感觉使我有点动心。下半场比较强烈，把人们的情绪激了起来，全场掌声雷动，欢腾得不得了。那位西德女作家，站起来大声叫喊，她总是那么神经质，很可怕，我不喜欢她。

这里的周末总给我一点遗憾，好像——我感到——我这半辈子从来没有尽情地欢乐过，从来没有把我的欢乐尽情地发泄过，总是将它深藏着，和痛苦在一起，搅成了一团甜不甜、苦不苦的东西。这东西很重。

10月8日 阴

今天是爱荷华人的大节日，本州球队和别州比赛。下午一点半的球赛，上午十点多就要去了。安忆和吴祖光去了，是安格尔请客。我宁可在家看书，不想去赶这热闹。到下午四点许，只听得公路上“嘶嘶”声不断，汽车像流水似的流过，大概球赛已经结束。果然，过不多久安忆回来了。

晚上，爱大的一对墨西哥职员举行“派对”，庆祝安格尔的生日，请了“写作计划”全体作家。她家的客厅并不大，一下子涌进了三十多人，顿时连站都没处站了。香港编《七十年代》的李怡的千金，在这里念书，就寄居在这里。另外她还请了两位弄乐器的日本朋友，真是济济一堂。大家站了一个多小时，华苓陪了病后的安格尔来了。他们的汽车一到，屋里立即关了灯，那一对日本朋友在钢琴前就坐，女主人拿了一盘蛋糕守在客厅进口。等安格尔和华苓一进来，立即开灯、奏乐，大家一齐唱“生日愉快”，主人奉上蛋糕。安格尔看来很高兴，也很感动，坐在沙发上，听孩子们的演奏、唱歌以后，大家又一齐到室外。在门口的一棵大树上，拉了一根绳子到楼上的窗口，由一个人拉着。绳子当中挂着一只纸糊的，装有花生、糖果的，花篮似的大盒子，并备有棍子一根，让孩子和愿意参加的人，用棍子去敲那花纸盒。击破纸盒者，落下的花生、糖果就归谁。这游戏的优先权，当然是孩子。可是要敲到这纸盒不易，在窗口抓着一端绳索的人，有权拽动绳子，使纸盒忽上忽下，晃晃悠悠。孩子们有的击中了，但很不彻底，它只是十分吝啬地落下几颗糖果来，盒子依然完好。最后盒子外面的彩纸被打得破败不堪了，盒子却仍未大伤。这一下，大人们来了劲，也去试了试，最后是吹笛的日本青年拿了棍子，猛跳起来一击，

击中了，盒子打破了，他也跌倒在地。忙的还是孩子，满地去拾糖果，把个“功臣”忘在一边。

夜深了，室外分外的冷，但是大人孩子一个个兴高采烈，十分开心。当开始跳舞时，中国人不约而同地告辞出来，吕嘉行开车送我们回去。

同车的潘耀明这几天有点愁眉苦脸。港币急速贬值，现已到了九块多港币折合一块美金了。和他来时相比，几乎跌了一半。陈君这几天却又好像很高兴，他的短篇小说《山路》得台湾中国时报的大奖。奖金约合美金四千元，因此他的夫人有可能来这里。不过听说他也不无困惑。他被关了七年，是一个交保候传的人，一下子让他来美国，又得了奖，当然会有点“丈二和尚”之感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

华苓告诉我们，波兰那位剧作家刚收到他母亲的电报，说是家里被抄了，手稿、创作资料全抄走了。看来，这位剧作家无法回去了。那么，他在这里讲学一个月以后，带了老婆孩子又上哪里去呢?

小小一个“五月花”公寓的八楼，世界的风云却在这里起伏汹涌。

10月8日 多云

今天是两大节目。

一，足球。这是美国式的足球，其实，我们是称作橄榄球的。两队对峙，一队攻，一队守，队员抱着球冲过五十码，冲过球门；而对方则要阻拦他。阻拦的方式便是扑倒他。有个原则，就是对方队员绝对不能碰不持球的队员，一碰就是犯规。而对待手里抱着球的人，那态度就完全不同了，可以去压他，可以去拖他，可以用脚勾他，也可以抱住他。所以，一旦把球拿到手，所有的人就朝他冲上去，追他，把他扑倒在地。他们身上都穿着金属的盔甲，以免受伤，但尽管如此，受伤者还是很多。

Alex带我、吴祖光伯伯、陈映真三个人去看足球，是安格尔先生为我们买的票，四张票便是五十元美金。就是这么贵，票子还紧张得要命，不是容易买到的。Alex十一点半就把我们带出去，带到Iowa House的学生餐厅吃饭，因为，他说等在“五月花”吃过午饭再出门，交通就要拥挤，车子都开不动了。一边吃饭，Alex一边向我们介绍美国式足球的规则，打法。其实很简单，单纯是力量的对抗，我们很快就懂了。我们倒是有许多关于足球队员的疑问：

“这些球员成天跑来跑去地比赛，平时还要练球，还要不要读书了呢？”

“学校对他们很优待，因为他们为学校挣得荣誉了。”

“那么，他们能永远打球吗？”

“打得好的，可以参加国家比赛、国际比赛，还可以当教练。教练的薪水可高了，比校长还高。”

“要是打不出来呢？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教练的呀。”

“那——还是读书吧。他们的功课拉下了，虽然毕业了，可是连一年级的知识都没有。有人再从头学起。”

“挺可怜的。”

“可这会儿他们可得意了，好多女孩子追求他们。”

是啊，多少人在为他们激动——就是这会儿。走出Iowa House，街上已是浩浩荡荡的人群了，向一个方向走去——球场。人们穿着黄黑两色的衣服，有的还带着黄花——这是爱荷华大学的校花。“我们几个人身上没有一点黄颜色。”Alex说。我们都有些惭愧。“可我身上有黑色呀！”我说，我穿了一件黑色的尼龙衫。很多人扛着被子，毯子，挂着水壶。“为什么带这些东西？好像是去安营扎寨。”我觉得很好笑。“等会儿你就知道了，你要冷的。”Alex瞅瞅我的衣服，说。

我们的票子是分开的，我和陈映真坐在一起，Alex和吴祖光伯伯坐在一起。看台很高，风很大，今天的云很多，太阳一会儿出，一会儿没，不一会儿，我就全身都凉了。

好多好多的人，卖爆玉米花的在看台上走来走去，入口处有许多小摊，卖咖啡、卖球衣球帽、卖足球刊物……呀，这么多的人，我从来没想到，爱荷华城会有这么多的人。它不是只有六万人口吗？也许六万人全在这里集合了。

比赛还没开始，场上已经很热闹了。啦啦队不停地在球场边跳舞，做出种种动作，乐队奏着乐，士气大振。一只黄黑两色的“鹰”耀武扬威地在场上走来走去，不时地蹦一下，翻腾一下，这是爱荷华队的队徽。今天参加比赛的客队则是西北大学球队，他们的队徽是只花花绿绿的猫。这只猫很活跃，在场边跳来跳去，与爱荷华的啦啦队混得还不错。

爱荷华队上场了，全场欢声雷动，乐队大奏，掌声雷鸣。而待到西北队上场，全场却寂然无声。开始比赛了，乐队奏起乐来，观众们一起跟着乐队节奏吼，拍手：“Go hard，go hard！”

“把他们吓都要吓死了。”陈映真说。我们都十分怜悯客队。

比赛开始不久，爱荷华队便进了一球，每一球为六分，进球后还有一个机会争取一分，于是就有了七分，当记分屏幕上出现“七”字时，啦啦队的男生一齐伏在地上作俯卧撑，连做七下，表示庆贺。挣得十四分时，则做十四下俯卧撑，那只猫便坐在一个队员背上，表示心怀不满。做完俯卧撑，队员们翻身而起，把那猫抬起来，朝球门柱上撞，以示报复。

啦啦队一直不停地绕场表演，比场上队员还辛苦。观众们也没闲着，一只塑料吹气的大橄榄球在观众席上传着，传来传去，大家抢着抱住它，再打过去，过过瘾。偶尔掉到看台下，维持秩序的警察便拾起来，打上去，让它继续在观众席上传着，从东到南，从南到西，又从西到北。球场上空，有一架直升飞机飞来飞去助威。远处，太阳照在一幢玻璃的大楼上，那大楼反射出奇异的光彩，像是一座水晶宫。

鹰队当然英勇，势不可当，三十一号队员抱住球，冲过好几个队员的阻击，速度飞快，向球门冲刺，一群队员紧追他，终于拖住了他的脚，他摔倒了，但抱着球的上身已经冲出球门，得分！记分屏幕上出现了他的形象，是一个黑人。这时爱荷华队的比分已经遥遥领先。啦啦队的男生们没有力气作这么多下的俯卧撑，干脆，翻过身躺在地上，两个胳膊向上推完了比分。全场欢声雷动，每个人都在大叫大喊，吹着响亮的口哨。忽然，陈映真大声地喊道：——傻瓜！你们这些傻瓜！

直升飞机在天空中飞来，飞去。

风很冷，我全身完全麻木了。“是不是要回去？”他问我。休息时，在入口处与Alex、吴祖光伯伯碰头，大家商量，还是看完吧，挺

有意思，我也有些舍不得走。Alex说，去医务室借条毯子。大家阻止了他，这不会有什么结果，还是坚持吧！陈映真说："我去买两杯热咖啡，喝了就暖了。"咖啡到了手，已经温吞吞了。

球场上正在表演集体舞，乐队奏着军乐。

下半场进行得很顺利，势如破竹。比赛结果是六十一分比二十一分，爱荷华队把西北队打了个落花流水，场上场下欢天喜地。Alex说，今天晚上，整个城都要喝酒庆贺了。而我们却有点失望。因为结束后没有出什么事。据说，比赛结束时往往会打起来，或者把球门拆掉，或者……总之，常常要闹事。今天一点事也没发生，真有点扫兴。

"怎么样，冻坏了吧？"陈映真问我。

"没，没什么，"我的牙齿打着战，"有过这样的冷，再怎么冷我都不怕了。"

一到"五月花"，我吃了一点热东西，便把全身用被子裹起来，一动不动了。

二，生日晚会。今天是安格尔先生七十五岁生日，"写作计划"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墨西哥人美尼塔家为他做生日。请柬写了不要带礼物。安格尔先生最喜欢诗和音乐。可妈妈仍然想送安格尔先生一件生日礼物，我说："那就送一瓶酒好了，有了酒，诗和音乐就都有了。"

美尼塔今天穿了一件大红镶黑花边的长裙，很漂亮，黑头发朝上梳起，露出宽阔的额头。她的家很小，而且极不安全地摆了许多小小的玻璃装饰物，可是那么多人挤着，毫无顾忌。她有两个女孩子和两个调皮的男孩子，全是黑头发黑眼睛，最小的男孩只有四五岁，总是很沉着而和蔼地笑着，见了人就说："Hi！"大家决心给安格尔先生一个意外——黑着灯，捧着点着蜡烛的生日蛋糕，候在楼梯口，安格尔先生一进门，大家就唱："Happy birthday to you。"

门口一有汽车声，大家便关灯作好了准备，开门，却是别的客人，大家轰然而散，留下他莫名其妙地站在门口。在给安格尔先生一次意外之前，大家先得了两次意外。第三次，终于是他，他站在楼梯口，蛋糕上的烛光照着他慈祥的脸，他一动不动地站着，听着这支歌："Happy birthday to you"。大家都爱他。

然后，孩子们表演节目。安霞弹钢琴，许先生的两个女儿唱朝鲜歌，美尼塔的儿子拉小提琴——这是一把指板上刻着音阶的小提琴，像一把六弦琴，可他拉得很认真，身穿西装，系领带，这是一次极其严肃的演出。表演结束之后，全体孩子们都和安格尔先生合影，孩子们欢欢喜喜地围着老人。只有一个孩子很别扭，不愿照相。她母亲把她抱过去，她就大叫起来，怎么也弄不好了。我认出了，这就是那天在走廊里哭闹的女孩子。那女人则是她的母亲。她们是那位请求政治避难的波兰作家的妻子和女儿。

屋外吊着一只彩篮，里面装满了糖，努力把它打落下来，孩子们便纷纷上前抢糖。这是墨西哥的风俗。今年，安格尔先生过了一个墨西哥的生日。

安娜看到我，拉我去吃她做的蛋糕，一种西班牙式的蛋糕，可是蛋糕已经被吃得精光，只剩一只干干净净的盆子，那盆子干净得就像从来没有盛过东西。

那边在跳舞了。撒哈跳她的巴勒斯坦舞，火红的裙子转成一团火焰，她向卡罗挑逗着。老实的卡罗终于忍不住站起来，笨拙地跳了起来。

就在这欢乐的时候，爱荷华河边发生了一桩事。西德女作家把衣服脱个精光，跳下了冰冷的河水。人们把她拉起来，送回了"五月花"公寓，汉斯陪着她，照料她。她是怎么啦？我真是不明白。

10月9日 多云

昨晚三时才睡着，早上九点半安忆和大家又一起去密西西比河，我不想去了。

头痛，去对面树林散步一小时，头痛顿消。回来读陈映真的《山路》。

《山路》以倒叙的笔法，写了日本统治台湾时期，一个爱国主义工运工作者的爱人，一个具有高度自我牺牲的女子。由于她哥哥出卖了工运领袖，领袖被杀害，她爱人被逮捕。她为了赎罪，也为了爱，就冒充是这位被害领袖的未婚妻，来到他的家里，扶老携幼，自己去做苦工，养活老老小小。吃尽了千辛万苦，把牺牲者的小弟抚养长大，成家立业，挣到了一个小康的地位。这时被关押了三十多年的爱人，忽然假释出狱了，她猛省到自己这许多年来的努力结果。恰恰和爱人当年的奋斗走了相反的方向。她发现自己只是“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、饲养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”。在“惊醒的一刻，同时也感到自己已经油尽灯灭了”。

从这作品可以看出，作者具有一副多么冷静的头脑，多么深邃的眼光。透过那一切花花绿绿，他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。可惜的是“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”只是一句话，并没有在人物形象上发生什么作用。无论是她本人，或被她从小抚养长大的弟弟身上，都看不出“驯化”、“饲养”甚至“家畜般”的任何痕迹。

我以为《山路》虽好，却比不上他的《将军族》和《夜行货车》。

下午华苓来电话，邀我去她家玩。她现磨咖啡豆，煮了极好的咖啡请我，谈了她的长篇，她的经历，安格尔在旁不时送来一些小吃，谈到傍晚，她留我吃饭，于是又到厨房看她做饭。只见厨房里各种仪表都闪亮了起来，一会儿就听这里响，那里叫。二十分钟左右，她变出了五个菜，两个是为安格尔做的，还烧了饭，热了汤。安格尔看见餐桌上有鱼，直惋惜说：“有鱼，可惜安忆没来。”他正念叨时，安忆打来电话，他们已回来了。便叫来一起吃饭。

10月9日 多云

今天是第二次去密西西比河，不过，上次的路线是南下，这次则是北上。

车子上，大家都在议论一桩新闻：南朝鲜的全斗焕和几位部长在缅甸仰光瞻仰烈士墓，忽然一颗炸弹爆炸，全斗焕很幸运，就差了三分钟没炸死，而另外四个部长都死了。今年的南朝鲜是怎么了？流年不利。天下好像很不太平。

这是条有趣的路线，经过了胡佛总统的故乡。他的家可真小，一座小小的木头房子，要住八口人。他父亲是个铁匠，铁匠铺就是他们家的所有财产了。

路上还经过了一座漂亮的教堂。推开沉重的门，里面静悄悄的，没有人。高高的尖顶，玻璃窗上的颜色挡住了光线，暗沉沉的。一排排的长椅背上，放着一个个夹子，夹子里装着赞美诗，有乐谱的赞美诗。“能随便拿吗？”我问土耳其人，他严肃地朝我摇摇手，他这会儿非常严肃，在这里是不能随便的。

从教堂出来，坐了一段车，便到了爱荷华州的监狱。很森严，尽管有那么多的鲜花，开得十分娇艳。瑞克告诉我们，这是个重犯监狱。当我们拍了一些照片，上车要走的时候，跑过来一群男子汉，穿着球衣，他们朝我们招招手，跑进了大门。瑞克说，这是犯人的球队。“他们是囚犯？”我们再三地问，回答很肯定：“是的。”而他们的神情是太不像囚犯了，一个个挺得意的，这真是有点奇怪。

“你们的监狱是怎么样的？”我问陈映真。我对监狱感到好奇。

“有吃有穿，就是没有自由。”他说，“我刚进去时，心情坏极了。第一次笑是被你们一个大陆人逗笑的。那是个福建的渔民，船被风刮到了岛上，被抓了起来。他看我的书——”

“监狱里能看书吗？”我插嘴。

“很少的几本。他看不懂繁体字，你们不是简化了好多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他说：‘这国民党真混蛋，连字都那么难认。’我笑死了，哎呀，太有意思了，他还说，你们国民党的干部作风真不好！”

我也笑了。是有点滑稽。

中午，在一片绿地吃午饭：炸鸡腿，生菜，各人自备的饮料和爆玉米花。吃完饭，大家躺在河岸上晒太阳，聊天。菲律宾诗人告诉我们阿基诺事件的前前后后，又谈到马科斯夫人。陈映真对我说：“你不知道，外面的世界有多少大事在发生，你不知道。”

然后，上车，正式向密西西比河进发。一个小时后，才到了河岸，这是一个极陡峻的河岸，有点像成都的都江堰，不过都江堰要比这里更有气势，哦，那滔滔的长江——想起了，去年这个时候，我正在四川呢！乐山，峨嵋山，都江堰……中国的山河壮丽，多姿多彩，只是可耕面积不够多。而美国，几乎全是一望无际的平原，他们说，除了西部有一些沙漠，其他均是可耕地。有很多土地荒着，因为生产了太多的粮食，粮食就贱了。世界真是太不公平了。

离开这里，又穿过一个小小的镇，来到河岸上的一个小店，这里专卖钓鱼的用具和鲜鱼。老板娘带我们到底下一个设在河坡上的木棚子，里面有很大的水池子，水池子里游着鱼，她从水里捞起鱼，当场杀给我们看——用一根粗粗的棒槌朝鱼脑袋上砸，我赶紧跑了出去，不想看，我怕我会永远不敢吃鱼了，而我很喜欢吃鱼。外面是河坡，停了几艘船，木船、水泥船，几个渔人在岸边忙些什么。他们身上穿着防水的橡皮衣服，脚蹬高高的长筒靴。

离开这里时，已是黄昏了。车子飞快地开着，还是没赶上落日。太阳落在一大片一大片成熟的玉米田后边，一片苍茫的秋色。我喜欢这样的颜色，在美国一个多月来，似乎还没看到过这样清静而有点凄凉的颜色。美国的颜色鲜丽而热闹。

晚上，陈映真提议吃夜宵，十一点开始，把那两条活活砸死的鱼让潘耀明做了吃掉。聂华苓正来电话，听说了也很有兴致，跑了来。然而，这时候，倡议人陈映真却不见了。

“他会不会出去了？”大家猜想。

“刚才，就是刚才，我还听见他吹着口哨从我门口过去。”我说。

“是他吗？”

“一定是他，那口哨吹的是中国的小调。”

“他是在这里，来来去去的，在洗衣房洗衣服呢，把我的衣服也硬要去洗了。”潘耀明说。

“再给他房间里打电话。”聂华苓说。

于是，打电话，没有人接。我跑去敲他的门，把对门的爱尔兰诗人敲了出来，也没他的声息。潘耀明又下楼去找了一圈，没人。干脆就去敲同他合一单元的墨西哥作家的门。墨西哥作家从睡梦中被敲醒，睡眼惺忪地看着潘耀明。潘耀明从他的房间里穿到陈映真的房间，没有人，床上堆着刚烘干的衣服，屋子里很凌乱，好像刚刚发生过一场搏斗。潘耀明又走进洗澡间，澡缸里空空的。墨西哥人莫名其妙地跟着他。一无结果。我们开始猜测他会不会被绑架，又猜测他会不会发生暴病，联想到他过重的体重……一边猜测，一边把鱼吃了，收拾了碗筷，聂华苓起身要走，门悄悄地开了，陈映真进来了。原来他一直在对门那位阿根廷女作家屋里。

“可是，”聂华苓说，“刚才安忆听见你的口哨声的啊！”

“就是那时候，我吹着口哨，她的门开了，我就进去了。”他逗乐，“唉，这女人很不幸，她的母亲是个长期精神病患者。她说，那是她终身的监狱。”他感叹着，吃着我们为他留的鱼。

“为了留给你这鱼，我们都不敢吃，没吃好。”我说。

“抱歉，抱歉！她是犹太人，很压抑。她写小说是为了把那些说不清说不尽，也没法子说的东西倾诉出来。你不知道，”他停下筷子，对我说，“外面的世界，有多少苦难，你不知道。当然，你，我们都有自己面临的问题。”

聂华苓忽然想起了什么：“我给你们讲个故事，一个真实的故事，那东德作家和西德作家的故事。”

哦，他们俩就像是一个谜——

他们俩从小在东德的一个小镇上一起长大，一起上小学，又一起上中学，是一对朋友。后来不知什么原因，那女作家被东德驱逐出境，被迫迁到了西德。不曾想，他们在这儿遇到了，分别了二十年。她嫁了人，又离婚，又嫁人，她过得很不如意，她不喜欢西德，她从不认为西德是她的，她是西德的。这次要开报告会，她提出要属于东欧组，可她明明是西欧的。她的发言，一定会有批评东德的情绪，而东德作家刚刚得了一个国家奖，那将会很尴尬。并且，东欧的作家们都不欢迎她参加他们的报告会，他们认为她是西德的。办公室无法满足她的要求，她很不高兴，那天晚上，她脱了衣服跳下了爱荷华河。生活中的缺憾真是太多了——“你不知道！”陈映真又要说了。我确实不知道。地球这么大，而我这么小，我的那么一点点悲欢又算得上什么。

华苓说，南朝鲜飞机被打下的时候，那东德作家哭了。他为什么哭？是为他们的老大哥苏联的行为羞耻，是为那无辜的二百多名乘客哀痛？可他是不能负什么责任的。唉，汉斯。

10月10日 多云

许世旭的妻子女儿来了，找了一个公寓房子另住。房子共有一个相当大的客厅、两个卧房、一间浴室、一间厨房，还有一个朝向荒野的阳台。地处近郊，房租是四百元一月。他有了家，便请了所有的中国人去他家吃晚饭。他妻子很温柔，也很漂亮。本来是学音乐的，所以唱歌也唱得不错。两个女儿还小，大女儿不懂英语，一来就上了小学一年级。据说和同学相处无间，并已有同学常常找上门来。在孩子来说，似乎语言很不重要。

晚餐很有朝鲜风味，很好吃。饭后大家喝酒，照相。我将上海师院艺术系继仙老师画的一张《漓江晨》送给了他们。夫妻俩都十分喜欢，把画挂起，在画的下面拍照留念。华苓穿了他妻子的朝鲜服装大拍其照。最可怜的是潘耀明，他要一年里修到一张英语专业文凭，因此成日成夜地用功。学习压力又加上经济上的压力，常常是神色疲惫，还要参加一些“写作计划”的活动。饭后，他半躺在地上，就这么睡着了。一会给大家吵醒，就跳起来说：“豁出去了，明天不去上课了。”说着就灌了自己半杯酒，立即就高兴起来，疯起来，要求跟每个人都照相。

我猜，到了明天，他绝对还是拖了他那个犹如旅行袋似的书包，赶去上课的。

10月10日 晴

中午小叶来电话，要我搭学校巴士去市中心，他在那里等我，带我去听英语教学的录音。他要教我学会办手续，以后，我就可以独立地去听了。

汽车半途中，上来一个东方女学生，她看看我，我看看她，也许都在猜测对方是什么人，台湾人？香港人？大陆人？日本人？一起下了车，她和小叶用上海话打起了招呼，原来是老乡啊！她问我："你们是什么系的？"我很惭愧，我什么系都不是的，成天混在他们学生中间，来来去去的。"她是青年作家。"小叶说，我脸都红了，其实小叶没有一点嘲笑的意味，只是我自己发觉"作家"这个词儿的内容是多么空洞，不切实。"你是学什么的？"我赶紧问，想岔开话题。"我在学电机，""呀，真了不起，女的学电机。""学不下去了，读书苦死了，简直不想读了。"她说，半真半假的。看她年纪也不小了，脸色很憔悴，她一定很辛苦。

小叶帮我安排妥，就要走了，"我要去找我的老师，他给了我一个不合理的分数。"他把试卷递给我看，"分数低我随它去了，可是他在卷子上写，他看不懂我的解题方法。这个必须说清楚。好，你在这儿听吧，再见。"

晚上，到许先生新居去玩儿。这房子是谭嘉帮他找的，两个卧室一个客餐厅，阳台前是一片荒凉的田野，他就是为了这荒原决定租下的。家具是蓝蓝提供的，蓝蓝把她客厅里的一整套家具都借给了他。他太太，女儿都来了，女儿已经有了很多朋友，男朋友和女朋友，他们交往好像不用语言，没有语言，只有声音，像写一样，很容易就互

相懂得了，彼此都十分愉快。万事如意。他一晚上都眉开眼笑，神采飞扬。想到不久前他曾因为想家而哭，便十分地为他高兴了。许太太又清秀又贤惠。许先生说："来，给大家唱个歌。"她便站起身，深深地鞠一躬，轻轻地唱起来，唱得非常好，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她在日本留过学，是学提琴的，为了丈夫和孩子，放弃了自己的专业。而许先生却说："别的乐器练练都好，就是小提琴，好像练练不会有什么效果的。"大家齐声骂他可恶。他则得意地笑。

谭嘉和我聊天，她告诉我，她有个亲姑姑在上海，十几年前，她收到最后一封信，说她奶奶被"扫地出门"了，以后便杳无音讯。我问她想不想找。她说："当然想，可是没有一点儿线索，只知道她的名字叫谭涣。""还有什么？"她想了想："她的小名叫晕莲。""还有吗？""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了。"

今天晚上，个个都像发疯一样，又笑又叫。楼下的邻居再三地敲天花板，即许家的地板，以示抗议。当然是一点作用也没有的。谭嘉关照许先生："以后你们家要开Party，事先和邻居们打个招呼，这样比较好。""明天一早我就向他们道歉。"许先生说。"没关系，明天也许他们就忘了。"谭嘉说。

10月11日 雨

下午去大学，听美国诗人盖瑞·斯奈德的演讲。碰到许世旭，再三为那张《漓江晨》向我道谢，并要我向继仙问好。他也注意到潘耀明的情绪，昨晚我们回来后，他就打电话给潘耀明。潘耀明说他没有吐，只是胃里难过。潘耀明说这都没关系，主要是他感到寂寞。真是，他离开妻子女儿，要在这里独自奋斗两年，他是福建人，说一口香港音的普通话，学英语在发音上有很大困难。现在，我们大家在，他学习之余还有伴，等我们走了，他就更加难堪了。从经济上考虑，他准备等大家走了，另找一处房租便宜的宿舍去住。潘耀明从小极苦，没机会进过正规的学府，在报社从校对做起，靠自学写了几本书，在香港、新加坡颇有影响，现在是三联书店编辑部主任。目前都很注重学历，特别是在香港这样的地方，所以他咬牙要取得一个正式的文凭。这也是一种竞争，不无残酷的竞争。

晚上，华苓请盖瑞·斯奈德吃饭，同时也请了一些“写作计划”的作家作陪。

盖瑞·斯奈德即将参加明年在北京召开的中美作家见面会。他是美国公认垮掉派诗人中成绩最大的一个。在当代诗坛的中国热中，他是关键性的人物。他对中国的唐诗宋词极其热爱，并承认自己已受其影响。去年二月他在加州接受记者访问，谈到关于他模仿中国古典诗歌时说：“这种模仿表现在两个方面，其一，我在写诗时尽量使用最简单的，像汉字一样单音节的英语词，使诗行呈现一种坚韧紧凑的表面结构；其二，我模仿在读中国诗时所能感觉到的那种强烈的节奏。”

对东方文化之热爱，几乎是所有垮掉派诗人的共同特点。原因虽各有不同，但有一个共同点，这就是他们“从中国古代诗人那里，学到在诗歌伙伴之间一种特殊的亲密友谊，一种兄弟情谊”。

我想，这大概是中国古代诗人中，常有互相唱和、送别、对酒之作留传的缘故吧!

盖瑞·斯奈德现在已从唐诗转向攻读宋代大师的作品，如苏轼、陆游、梅尧臣。他认为，“宋代诗人更像当代诗人，他们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几乎和我们一样”。他认为，“宋代诗人所生活的时代是高度优雅的、高度文明的。当时中国人口众多，哲学思想复杂高深，而且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发达的货币经济，可是它也正朝着崩溃前进。宋代的高度文明，是一个面临部分毁灭的文明。这不仅指北方游牧民族即将来到的打击。北宋时，华北的森林就差不多已砍伐殆尽。从那以后，华北就更多地依靠漕运，从华南补足粮食、木炭，甚至墨。可以说，从宋朝开始，中国就面临生态危机。而这一切正是西方现在面临的问题。我们正生活在毁灭的前夜，不仅是核毁灭，而更是生态毁灭，我们正处于悬崖边上。”

垮掉的一派，并不是我原来从字面上所想象的那样，是颓废、苦闷、吸毒、完了的意思。他们在这物质文明高度发展、泛滥的时候，头脑相当冷静，这就难得。他们主张人生和自然的和谐。这位诗人对宋代经济和文化的研究和熟悉的程度，使我这个中国作家感到惭愧。他说得正确与否，不敢评论。

他曾经写过一首诗，是献给陆游的（可能是误译，从内容上看，可能是献给毛主席的）题名为《王八威利小卡车》，其中有这样一段：（编者按：此诗应译为《整修五八年威利式皮卡》经核确定献给陆游）

“在蒙着灰尘的零落的树丛中

我躺在卡车下

这车子早被人看作老掉牙

我赞美它做得结实

我想这样一部卡车

毛主席肯定会喜欢

……”

他说：“为什么毛主席会喜欢它？因为它牢固、实用，不是花哨的玩意儿，这就是科学技术。现在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卡车了。

“我们的用具不再实用，生产的目的是赚钱。这种生意总以污染世界为代价，而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。毛主席不会喜欢它，任何一个老木匠、老伐木工人，都不会喜欢它。”

他现在的生活方式，也如他的主张；住在一个荒僻的地方，自己种菜、做木工，有时还砍柴去卖（美国很多人家，冬天喜欢用壁炉）。邀请他来这里讲演，他也拒绝去比较高级的“爱荷华旅社”，而愿意住在“五月花”八楼。衣着简朴，待人亲切、自然。他，就是我们常说的“垮掉的一代”的代表人物。

10月11日 晴转阴有雨

下午决心睡个午觉，睡下时一屋子都是正午的阳光，醒来时屋里却暗了，窗外，一片阴霾，细雨打在玻璃窗上，沙沙地响。下雨了。

五点钟时，乘车去艺术馆，听一位美国诗人的报告。

Esther看见我，一把抓住，呀，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见面了。她塞给我一个小包，打开一看，是一块绿色的玉，我立即把它坠在项链上了："谢谢你，我喜欢的。""唉，"她叹了一口气，"我怕我会一下子见不到你们。""不会，我们还要呆一个月呢。""才一个月啊！"她说。

礼堂里几乎坐满了，这是我在爱荷华大学看到的人数最多的一次报告会。诗人是极有名望、极有吸引力的。他的名字叫Gary Snyder，是一位反学院、反传统的诗人。他看不起大学，爱荷华大学曾请过他，被他拒绝了。他住在农庄，过着乡村农人式的生活。他的主张是回归自然——

在远古民俗中间，可追溯全人类共有的母题（主题），在远古口述文学中，可发现一系列神话，这神话属于这星球的生命。西方的思想渊源，可追溯到奥林匹克山的文化。

报告会上发了一份材料——《Gary Snyder谈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》，这是一位华人学者去年在圣地牙哥加州大学对诗人进行的访问记。他谈到宋代的诗人，认为宋代诗人更像"当代诗人"。他说："宋代诗人所生活的时代是高度优雅的，高度文明化的。人口众多，哲学思想复杂高深，而且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发达的货币经济，可是它也正朝着崩溃前进。而这正是西方现在面临的问题：我们正生活在毁灭的前夜，不仅是核毁灭，更重要的是生态毁灭，我们正处于悬崖边上。"问

者插话：“许多宋诗充满理念的阐释，那正是理学在知识界取得压倒优势的年代。”他回答：“过分执迷于理念的诗必然不是好诗。但是仔细地看看宋代大诗人对哲学的处理方式，是很有趣的。”他举了苏东坡的《百步洪》为例，说明那不是西方诗中叫人讨厌的那种理念，而是“禅”——一种诗意的，经验性的彻悟。

这诗人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，蓄着胡子，确有点古风。他在爱荷华城呆三天，他愿意住到“五月花”公寓来，和作家们在一起。晚上，特意为他举办了一个舞会，自然还是在走廊上。一开始，因为有客人，大家很老实，乖乖地坐在地上，可没一会儿，就活跃起来，开始跳舞了。音乐响彻了走廊。玛利来请我们去，我们都没去。妈妈要睡觉，吴祖光伯伯在写话剧——他的第一幕要结束了——但愿他别受那音乐的影响，否则，他也许会在无意中来一个爵士式的收尾。潘耀明在做功课，他的功课永远做不完。而我，虽然喜欢跳舞，可这样没完没了地跳，我也觉得没什么意思，我还有很多事，明天打算一早去听录音，今天就要早睡。美国人太喜欢跳舞了，他们善于在运动中休息。而中国人，有一些闲情。那一份悠然，那一份怡然，我想美国人是体会不了的。

Esther来电话了，“呀，你们那儿好像很吵。”她说。“是啊，走廊里又在开Party。”“你那儿在放什么音乐，很好听。”“我们俩开电话Party吧。”于是我们就海阔天空地聊起来，她说：“我真怕你们会一下子都不见了。”“不会，我们还要去芝加哥呢！”“就是呀！办公室里说往年都是这样，作家们去了芝加哥，就不再回爱荷华了。”“我们还要回来的，你和我们一起去吧。”“我也想去，可是，还有课呢！”“让那些课见鬼去吧。”“真是的，读什么古英语，像天书一样，要读死人的。”“你去过芝加哥吗？”“去过，那儿的博物馆很棒，要看整整一天。街上有一种老式的马车，我请马车夫和我合了一张影。”“为什么不坐上去绕一圈。”“那很贵，这不是交通工具，只是供观光客游览的。”“呀，太好玩了。”“芝加哥的夜总会很多，还有，芝加哥的建筑非常漂亮，听说过芝加哥大火吗？大火把芝加哥全烧了，后来重新建

筑，所以，芝加哥很新。”“是吗！还有什么？”“芝加哥还有一个湖，唉，那湖有一种凄凉的神情，秋天去，你会伤心死的。”“呀，恨不得马上就去。可是我们在那儿只呆三天呀！”“三天是太短了。”“这三天里还要在芝加哥大学开报告会，唉，时间没安排好，其实，我们在爱荷华呆得太长了。”“你这话要把我气死了——”她说。

10月12日 阴

今天无话可记。下午去谈了十八日中国小组发言的程序。

访问养老院的事，谭嘉没联系上，未能成行，很感失望。不过这也是能够想像得到的。瑞士鲁加诺的莫尔放德镇上，那个养老院算得高级了，但又如何？把老人的暮年生活，圈成一个行将就木的世界，让他们和他们繁衍的后代隔开，和他们延续的青春隔开，和他们参与建立的事业隔开，不能不说这是残酷的。美国有一句流行的话：美国是儿童的天堂，中年人的战场，老年人的坟场。老年人的儿辈，又何尝轻松。他们也要繁衍他们的后代，也要延续他们自己的青春，为了这自然赋予他们的圣职，需要投入他们全部或绝大部份的精力与时间；为了他们可以享受到优裕的生活，他们把剩余的有限精力，如同投资一样，投放在妻子儿女身上还是父母身上？他们当然选择了前者，因为前者也正是他自己生活的一部分。而后者对他们说来，只是一种支出，并无收入。加上现代科学的发展，人的生活如同落在自动流水线上的零件，依序飞转不息；于是需要照料的老年人来到了这个与青春、与世界隔绝的围墙里，或者说是坟墓的前厅——养老院。“战场”上的中年人，他们一手把老人送进养老院，一手就对得不到抚爱的儿女，采取物质补偿办法。于是孩子们偎依在奶奶怀里，听从前的故事、月亮里的故事的那种种的熏陶没有了；有的是有增无减的物质欲望。如此循环下去，不也是一种可怖的现象吗？说到底，却是人人都在辛劳地建筑自己的“围墙”……

10月12日 多云

一早起来，与潘耀明一起去市中心，他去上课，我去听录音，我比他早一站下车，下了车便自信地径直朝一幢大楼走去。忽听潘耀明在后面大声疾呼地叫我，回头一看，他不知怎么也下了车，“你为什么下车？你下错了！”我告诉他。他对我大叫：“你走错了，在这里。”“不是在这里。”我相信我的记忆，他只是摇头，把我领了过去，领进另一幢大楼，果然是这里。回头看看，他正向下一站跑步前进，车已经开走了。他要迟到了，我很抱歉。

今天好像是机器的罢工日，什么都不干了？中午，到EPB吃午饭，那下面有自动售货机。在橱窗外选了一份火腿三文治，丢进硬币，却毫无动静，那扇门怎么也拉不开。潘耀明打它一下，它不开，又打一下。我说：“你打它有什么用，它又不是一个人。”“可它不应该坏的。”“可它现在就是坏了。”没办法，我就只能吃潘耀明饭盒的东西，把他本来就不多的一点东西吃了一大半。他说他给那售货机气得已经不饿了。傍晚，从录音室出来，又去Old Capital的取钱机取现款，我们还是习惯用现款，尤其是妈妈。我倒有点喜欢用支票，因为不是眼看着钱数出去，好像没有花钱而得到了东西，心理上似乎有种安慰。可是那取钱机坏了，取钱卡怎么也塞不进去，它拒不接受，只好退出。“你是不是再打它两下？”我问潘耀明，他不响。

今天一天是来美国最简单的一天，而明天就又要复杂起来。明天去John Deere，这是个大企业，是资助国际写作计划最多的企业。

10月13日 多云

“乔底儿”农业机械公司招待了我们一天。这公司也是“国际写作计划”的最大资助者。

参观了公司。有一所如同艺术博物馆似的大厅，陈列着“乔底儿”各个时期的产品。办公室、走廊、休息室、食堂，不仅一尘不染，而且都装饰着各种流派的画，及其他艺术品。使人最感兴趣的，是它建在最高层的室内公园。这里没有太阳，但有树有草、有假山、石阶、桥，遍地是绿叶，连石头缝里都爬满了这种叶子。这是一种阔叶白茎的绿色植物，每一片叶子都彼此相像；很绿，布满了白色的茎，像是假的，但都是真的；很绿，很干净，却很病态。一顶不算小的石桥，配以黑玻璃的通体桥栏、黑玻璃的围墙，到处闪闪发光，到处可以看见自己的影子，使人恍如进了一个幻境。对，是幻境。幻在这一切都很美，幻在这一切都似假还真，是真却又似假。像一个蜡做的美人，或者是一个美人已将临终。一个需要无尘的电子计算机办公室，就安置在这里。这里还有一个高级餐厅，每张餐桌中间，都有一个花瓶似的电灯，瓶内是个小灯泡，瓶的底座上是一圈花。这是一种稻草色的细花，枯萎的颜色，但它却又并不枯萎；它就是这种样子的鲜花。人活在这里，谈情说爱，似真非真，似假非假，仔细想想，不免恐怖。

下午去了离公司七十里的工厂。在冶炼车间里，第一眼看见的便是黑人。他们已把翻砂这一繁重的劳动机械化了。木模（据说是用木头和塑料混合）车间没有去，不知是否也不用人工了。

下午，公司招待我们坐游艇泛游密西西比河。甲板上风大，也有点冷，大家就都挤在艇上的客厅里。艇上还备有饮料和小吃。大家喝

酒唱歌，似乎忘了密西西比河的存在。闲来无事，随手翻阅船上的签名簿，原来中国各地农业人员来过这里，可能和“乔底儿”有过买卖。不过从签名册上看，许多签名中，只有一人在名字下冠了“局长”的职称。不知是出于什么需要，也可能是一种习惯。在国内是住旅馆也需要填上级别、职称的。不过在这里，“局长”不知能否酌定买或不买，这就不知道了。

大家真正欣赏到水，倒不是在密西西比河上，而是在晚餐的餐桌边。

晚上，公司里的高级职员都来陪我们共进晚餐。餐厅里灭了灯，点起了餐桌上的蜡烛。一霎时，大玻璃窗上，人影幢幢，烛光摇摇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宾主正在敬酒时，忽然在那幢幢的人影当中，出现了两只天鹅，伸着美丽的长脖子，悠悠地在人影中游动。

啊！客人纷纷离了座，拥向窗前。原来，窗外就是我们已经参观过的那个大水池，不，应该说，水池的水平面就在窗口，离窗沿约莫两三寸，所以天鹅就寻着灯光而来，沿着玻璃游来游去侧着头，参观着里面的人们如何吃喝。

这个厂创建于一八三七年，已有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。最早的老板是位打铁的铁匠，制造的农具，跟中国的扶犁一样，前面是用牲口拉的。现在它制造的农机，轮胎就有一人多高。其发展的速度跟美国这个国家一样快，或者是说美国的发展，跟这个公司一样快，也许更准确一些。据说，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农机公司。

10月13日 阴有雨雪

John Deere在密西西比河那岸的ILL州的一个城市——Moline，汽车开过密西西比河上的大桥，便是了。这是一个专门生产农业机器和林木机器的公司，和全世界各地的国家做生意，我们黑龙江农场也来签订过合同，买过机器。这个企业在全美国都有分公司、分厂，有六万多工人。最早的创业人就叫John Deere，是个铁匠，出生于一八〇四年，一八二五年开始创办他的事业，那时，只有一个铁匠铺，生产犁具，车具，这些东西都陈列在底层大厅里。这是一个小小的博物馆，展览着John Deere每一个时期的生产情况和产品。

上午，我们参观公司的办公大楼，这大楼漂亮极了，不知该怎么形容。这大楼的外部形状像一座正在修建中的搭着脚手架的建筑，全是用玻璃和钢材建造的，这钢材是一种特殊的从英国运来的钢材，它不需要油漆，外面会生锈，里面却不会生锈。最令人吃惊的是四楼职员休息室。那里有一个花园，有树木，有花草，小桥流水，而围墙、桥栏，都是玻璃的镜子，把这花草树木、小桥流水折射出三重九叠，真是天上人间。

“我有些发虚。”Esther对我说。

“我也恍恍惚惚的。”我说。

我们走进休息厅，富丽堂皇，像个宫殿。

“太奢侈了，何必呢！”我说，我发现在这里，说话的声音也虚飘起来，好像从很远地方传来似的。

“公司给职员提供最好的条件，职员则要向公司提供最好的效率。这就是美国。”她说。

中午在职工食堂吃午饭，公司的副职（副主任、副经理等等）陪我们午餐。这里很普通的一餐，却很实惠：一碟生菜，一盘牛肉饭，一道甜点心。我全部吃下去了，而且觉得很好吃。陪我们吃饭的一位先生问我：“你知道OK这个字是从哪儿来的吗？”“不知道。”于是他开始解释：很早很早的时候，有个汽车制造公司有个规矩，凡是合格的汽车，车身上就打个印——OK！慢慢的，这个“OK”就流遍于民间，为大家所采用了。

吃过饭，大家便到花园去玩，这是一个真正的花园。花园里有个湖，湖里有许多红鲤鱼，鲜蹦活跳的。这个企业为了证明自己对艺术的热爱，花了很多钱购买各国的艺术品，有专门的陈列厅。走廊上，餐厅里也摆设悬挂着种种艺术品：画、织品、雕塑，五色缤纷。我们晚上吃饭的高级餐厅里，还挂了一幅台湾画家刘国松的画。

在花园里，爱德文送给我一根白色的羽毛，说是天鹅毛，我不太相信，可还是谢了他。他总是很照顾我，设法让我玩得高兴。

下午，我们先去参观工厂，那参观的方式很奇妙。我们走过一条黑暗的楼梯，上了一个小瞭望台似的房间，一排玻璃窗，正对着大车间，可以看见车间里的一切。窗下有一排屏幕，逐一地亮起灯，显出画面并响起录音，向你介绍炼铁制作的每一程序。当行车在我们面前开来开去时，我们这小小的参观走廊便剧烈的震动起来。“怎么回事？”我问。“这是爵士。”加纳的黑人作家笑着对我说，露出雪白的牙齿。他是一个很可爱的黑人，态度很温和又很沉着。他是我所见到的第二个可爱的黑人，第一个则是美国电影《猜一猜谁来参加晚宴》里的那个黑人。可这“爵士”太激烈了，震得人都站不稳。看了这么多时候，什么也没看明白，只体会到大工业的伟大和威慑力量，令人胆寒。

出了工厂，天开始下小雨，汽车穿过Moline城，往密西西比河去了。

汽车上，撒哈和卡罗坐在一起，撒哈转头对单独坐着的华苓说："他只会说几个英文单词，等他那几个字说完了，我就坐到你身边去。"于是她便问卡罗："你结过婚没有？"卡罗认真地回答："没有。""你喜欢美国吗？""我喜欢美国人，不喜欢美国政府。"卡罗仍然很认真地回答……可是万万没想到，他那有限的英语却足够他说出了自己的一段复杂的经历：他曾无数次地坐过牢，最近的一次判了四年徒刑，可十个月便放了出来，他现在的处境还不错，可以自由发表东西。他是个老共产党员，可只到去年为止，他不再是了。

密西西比河到了，天很阴，风，凉飕飕的，冷得很。上了船——这是一艘小小的船。河的两岸是树丛，那树丛是一种凄凉的青黄色，很美。可是毕竟不如长江有气势，那一派大江东去浪滔滔的气派所有的那一种悲怆，更令人肃然起敬。密西西比河要委婉一些，但也是质朴的。有人告诉我们："密西西比河是一条男性的河。因为密西西比在印地安语言中，是'河之父'的意思。"墨西哥作家说："可它却很像女人，变化很多。"

看够了河，大家便挤在船舱里唱歌跳舞。我发现外国人从来不可能老老实实地坐着，他们坐不住。卡罗唱《卡门》，南斯拉夫年轻作家跳乡村舞，我们则唱："张老三，我问你，你的家乡在哪里？我的家，在陕西，过河还有三百里。在家里，做什么？种田还是做生意？在家里，种田地，种的高粱和小米——""什么是高粱？"外国人问Alex。Alex说："高粱is高粱！"呀，英语里没有高粱，美国没有高粱，这是我们的庄稼，那是能够在贫瘠的土地上高产的一种粱稼。它成熟的时候，火红火红，红了一大片。

大家发疯的时候，撒哈一直坐在角落里，默不作声，她的心情好像不太好，她在想什么？想她那离了婚的丈夫？想她那在苏联留学的

女儿？唉，撒哈，过去的就过去了吧。可是，也许还有什么没有过去而正在发生着的，我不知道。

晚饭是在一个面朝花园的厅里吃的。这是东楼。本来的规划是：东西南北楼的窗户都朝着中间的花园，意味着这所有的一切，都来自土地，可后来经费紧张，西楼的建造便不可能像东楼这么奢华了。这几年，美国的经济一直不景气，里根上台后，采取了一些措施，比如税收方面的改变，使经济稍好转了一些，可危机仍然存在。

晚餐是正职们陪同我们的，大家站在饭厅前寒暄着，我和Esther想找个角落里清静一时，却见撒哈一个人坐在那里出神，“别打扰她。”Esther轻轻地说，把我拉走了。

雪白的桌布上，放着亮晶晶的银餐具，烛台，烛台上点着蜡烛。“这么多刀叉，该怎么用啊！”我说。土耳其人把摆得整整齐齐的刀叉刷地一下子收拢起来，说：“美国人都是疯子。”晚餐高于午餐一个层次，而我却消受不了了。我发现我只能吃农人的饭，最叫我喜欢是那两次乡村里的午饭了。

第一道是开胃的果冻，那是一种异样的酸，和着cheese，这味道令人气愤极了。我“哇”的一声叫起来，Esther同情地看着我。“怎么办？”我问她，她轻轻地说：“你作出吃的样子好了。”这是一个不幸的预兆，往后便更加难吃了。只有一个冰淇淋，被我完全彻底迅速地消灭了。

土耳其人忽然叫了一声，蓦回首，身后的落地窗上，在映着我们的形象、摇曳的烛光、亮闪闪的银餐具后面，有一群白天鹅，它们安详地伏在水上，像一个仙境。

爱德文送给我的，真是天鹅毛呢！

酒足饭饱了，大家挨个儿起来，说一番话，作个自我介绍，再说几句感想，表达一些谢意。每个人的开场白都是：“我叫什么名字，我来自什么国家。”撒哈起来说话了：“我叫撒哈，我是巴勒斯坦人，可

是我并不是来自巴勒斯坦，我没有祖国了……”她的祖国被以色列人占领着。大家都沉默着。我回过头寻找了一下，我想起，我们这儿有一个以色列的作家，可是他没来，他很少很少参加集体活动。他是一个残疾人，因为翻车，着火，他的脸，脖子全烧坏了，看看真令人害怕。他的手也烧坏了，蜷缩着。他很可怜，总是一个人。

土耳其人站起来说：“John Deere对我们这样的款待。这需要多少钱哪！为了这个，我感谢John Deere。”我想起我会看过一部土耳其电影《穿黑袍的新娘》，那一片沙漠上，人们肩背着绳子，走出半里路，才能从深井里提出一桶水……

华苓女士开始拉歌了，气氛活跃了起来，她总是怕大家不快活，她希望每个人都快活，像她那样，深受种种磨难而终于快活起来了。土耳其人唱歌了，爱尔兰人唱歌了，菲律宾人唱歌了，烛光摇曳着，白天鹅静静地伏在水上，银餐具闪烁着……呵，John Deere！

灾难突然降临，拉我唱歌了！土耳其人拉我，爱德文叫着：“王！王！”大家一起拍手。Esther轻声对我说：“你只好唱了。”没办法，我只得唱，唱东北小调《送情郎》：“小妹妹送情郎，送到了大门外，泪珠儿牵行流下来……”我不知道这一刻是怎么过来的。只是过后，Esther对我说：“我觉得你随时都有可能倒下来昏过去。总算挺过来了。”她又说：“你教我唱这个歌吧！”“好的。”我答应，这会儿恢复了元气。

回爱荷华城的路上，下起了薄雪，这是最早的雪。然而这雪太薄了，落到地上便化了。陈映真开心得要命，他没见过下雪。在台湾，要爬到很高的山上，才能看到积雪。

大家唱着歌，彼得吹口琴。冰岛夫妇的那个南美洲女孩蒙着眼睛满车子地捉爱德文。我便翻看John Deere赠送的画册。这是他们公司收藏的艺术品的画册，很厚很漂亮的一大本。

“这公司为什么花这么多钱收藏这些艺术品呢？这和他们的业务并没有关系。”我问。

“有钱的人最怕别人说他没有文化。你不知道。”我旁边的人回答我。

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的事情很多很多。我不知道卡罗退出了共产党，我不知道撒哈没有祖国，我不知道西德的女人不喜欢西德，我不知道汉斯哭过……人们生活得不如意。汽车在夜间行驶，彼得在吹那一支赞美诗。

10月14日 阴，有时有雨

东欧小组各位作家发言，翻译给我的已经极其简单，我再加以选择，更加简要的记之。

匈牙利，是一位以医生为主要职业的女作家：匈牙利从地理位置、民族、历史、文化，皆不属东欧。美国为什么要把它和东欧放在一个组里?

波兰，就是那位拖儿带女的剧作家：他已流亡在外一年。现在在波兰，哪一个作家帮政府说话，第二天就会有读者把他的书扔在他家门口。

南斯拉夫，是一位研究苏联文学的女作家：她用大仲马一句话作为引子，念了一段她的小说。

东德：他认为文学是写人的，而人的根本是纯洁的儿童。从儿童的眼光来看世界、看大人是最真实的。所以他专门写十三四岁的儿童日记体小说，把人们最秘密的一切，都记在自己的日记里。他的主张极符合其人。他自己就以一个十分淳厚的大孩子的态度，真诚地照顾着他那一个常在醉乡的同窗。前几天听说他的作品在国内获奖。

……

会后听人说，陈映真听了发言十分失望。他觉得东欧作家的创作，越来越走向个人，和西方也差不多。

晚上放映《城南旧事》，编导和演员都赢得好评。虽然放映上出了很多毛病，人像都变了窄窄的一条，但还是赚了不少眼泪。

10月14日 阴

下午一点半，去Mabie剧院看冰岛作家的短剧录像。一共只去了四个人：我，卡罗，芬兰的女作家，南非或阿根廷的女作家——南非女作家和阿根廷女作家，我总也分不清，她们太像了，一般高，一般胖，一样的短短的鬈发，一样的鼓鼓的脸颊。

这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剧场，是艺术馆的一部分。先有两个本地的剧作家和学生们对话。这是两位学生所熟悉的作家，学生们的情绪很热烈。那第二位，非常清楚这一点，得意得简直忘形，一会儿坐下，一会儿站起，一会儿来回踱步，然后又坐下架起腿，搔首弄姿，叫人都有点难受了。他讲了许多话，我听不懂，可我认定那一定是废话，否则有用的话就太不值钱了，因为他说的委实太多，我越来越不耐烦了。他终于说完了，开始放映冰岛作家的剧作录像，这回是一组四个的小短剧，全是发生在家庭里的事情，不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，只是在极其平和的家庭里的日常生活。而危机和悲剧在平静的生活里缓缓地穿行。

看过录像，我和卡罗一起去“太阳廊”参加东欧作家的报告会，每次报告会都是在“太阳廊”举行的，那是Iowa House的一个角落。我们沿着爱荷华河走，太阳暖洋洋的，昨天的雪踪影全无了。我仅有的几个单词，和他仅有的几个单词，正好擦肩而过，无法交流，没法子聊天，我们就一起唱歌，唱《卡门》。就这么到了地方。

东欧作家很多，坐了一长排，匈牙利女作家，南斯拉夫女作家，保加利亚美男子，东德的汉斯，罗马尼亚两位作家，一位一九七九年参加“写作计划”的东德作家也来了，他这次访问美国，特地回爱荷华

来，还带了他新近得了多种奖的一部电影《独唱者Sunny》，还有一位请求政治避难的波兰作家——他高高大大的个子，黄色的头发，穿一件破旧的衬衫，脸色有些憔悴。他请求了政治避难，可生活一无着落，华苓和安格尔先生为他想了办法，说爱荷华大学请他来讲学，可是，这只有一个月啊！然后，他去哪里？谁也不知道。

晚上，放中国电影《城南旧事》，可去的人不多，一点也不踊跃，他们都叫那次《西安事变》弄倒了胃口。而今天的放映也实在糟，把好好的宽银幕收得窄窄的，人都成了竹竿儿，细溜溜的一条儿。蓝蓝去和放映员讲，也没用，说是机器不对头。不过就是这样，效果也很好。有一些美国人哭了，我也想哭。我们有一个多么叫人心疼的祖国。潘耀明说：“中国还是不错的。”我说：“错又怎么样？错也是好的，不错也是好的。”就是这么一个北京，就是这么一个中国，要就全部要，不要，就全没了。

10月15日 小雨

中午，去看了另一位东德作家自编自导的电影《圣芮独奏》。内容大致是描写一个叫圣芮的女孩，在一个爵士乐队任独唱演员，她孤独、失意、幻灭。她不爱的人，倒一心一意地爱她。她爱的人，又对她不忠。她喜欢唱，而乐队又辞退了她。她觉得一切都不如意，但又不愿勉强自己，或者说，不愿向这世界、向现实妥协。于是只剩一条路，她自杀了，但又被救活。最后她在白雪盖满大地的时候，又重新开始到一个非常年轻的乐队去报考独唱。这电影在法国电影节得了奖，女演员得了最佳女演员奖。银幕上所能看到的，是酒吧、爵士乐队、提兜女郎式的生活。只不过住的房子破败一些，酒吧拥挤肮脏一些而已。

晚上，蓝蓝在家请吃饭，这个电影的编导也来了。听到陈映真向这位东德作家提了两个问题。

一、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东德的影片，看了后，觉得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，怎么完全和西方一样。

二、电影内容也许是东德生活里都有的东西，但是看不到作家是如何来解释这一切的。

东德的剧作家坐在地毯上，作了长长的一篇发言。幸亏吕嘉行在旁给我做了详细的翻译。大意是：1，东德的文化传统，生活习惯，本来就和西方十分接近；2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，需要很长的时间，也许是一生；3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梦，而梦和现实、和理想之间的距离是很长的；4，制度不同，但每个人所做的具体工作，还是同样的；5，东德国内对影片也有争论，肯定意见居多。

他似乎没回答陈的问题。关于人所做的具体工作相同说，美国的卓别林在二十年代就态度鲜明地作过解释。大工业中的人的异化，重复，重复，再重复，人也变成机械化了。电影上有过这种可笑可哭的形象。

10月16日 晴

聂华苓带队去爱荷华州府狄莫恩，先去一个保险公司参观。这公司也是“写作计划”的资助人。所谓参观公司，实际是参观这个公司所收藏的艺术品。就像“乔底儿”一样，这里每个办公室里，除了有各种电子计算器之外，都装饰有各种绘画，绝大部份是现代画，也有一种摄影写实画和部份雕塑，所以等于是参观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美术展览馆。现代化的办公室，配以现代化的画，看来还很协调。有人说现代派的画，特别富于装饰性，此说不谬。

保险公司的总经理陪同参观、吃饭，饭菜十分丰盛。在他说来，花钱事小，花费了他大半天的时间，这在美国比什么都宝贵。他所经营的业务，又和作家毫无关系。从这一点看，又很不商业化。只是他有所爱好，喜欢如此而已。

下午去了附近一个农业博物馆。门票每人四元。这里保存了美国十八、十九世纪的农舍、土窖、村店、打铁铺、药房、杂货布匹店、剧场。各种店铺还都有营业，出售当时的食用东西。打铁铺里真有两个用布缠着头的小伙子在打铁，低矮的农舍里还有些男女青年，穿着当时的衣裙，桌上放着当时的餐具木碗瓦罐。场里不时有运草的马车。参观者还可以坐着马拉的大车，从一个时期的农舍到另一个时期的农舍。有定时开动的拖拉机，可以载你到更远古时候的林间小道；路上有雷电击折断的大树，有成群牛羊，直到当初印地安人住的寮窝、火堆。

展览馆外面，停着一排排的小汽车，而男男女女、大大小小，却高高地坐在大车上，由两匹屁股溜圆滚壮的马拉着，在泥地上慢慢踱

步，这情景是极有趣的。

美国人在现代的、高速度的生活节奏里，偷闲来这里慢吞吞一番，怀怀古，看看各个历史时期的农村实景，再掏几个美分，尝一尝从前人吮的糖果，无论从生理上、心理上看，都十分需要，十分好。联想到我国开展旅游事业，景物呢，靠祖国的大好河山，问题是住的方面总是不约而同地都想给外国人住大宾馆；结果是南南北北，大大小小，弄得都是一个面孔，失去了地方风格，吃力而又不讨好。比如像云南石林，来者不过住一两夜，实在不需那麻雀虽小而五脏齐全的宾馆。如果修一些少数民族住的那种竹楼，又别致，又简便，收费低廉一些，既有情调又很实惠，旅游者一定欢迎，特别是来自西方的朋友。

晚上，保险公司的总经理带我们去一所英国式的古老别墅里吃饭。这所房的主人是英国人，在美国做化妆品生意，发了大财，就在这建了一幢英国式的房子，从设计到一切建筑材料，都从英国运来。房子极考究，墙上、屋顶，各种花纹雕刻，精致之极，也是奢侈之极。更主要的，还是他收藏了各国的大量古董，印度的、中国的、大幅的油画、波斯壁毯更是到处可见。从世界上第一部《圣经》的几页，到中国皇帝的龙椅，都收藏尽致，当这个房主去世后，儿子因为付不起遗产税，不得不将这房子以及房子里所有的古董、艺术品，都捐给了州政府。今天在这里请我们吃饭的主人，就是这位房主的儿子。看上去他已有六十多岁，很清瘦，保养得极好。他是在这房子里长大的，客厅里有一架大钢琴，也是他小时候弹过的。他就坐在钢琴前随意地弹着“过去我并不好，但也并不老”。他说一种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的感情，无法排遣。

晚餐除了生菜、一道汤之外，主菜吃的是美国最讲究的嫩牛排。这是一块约有半寸厚、两个巴掌大的牛肉（据说，这只有牛的里脊肉才能做），刀切下去，就冒出淡淡的血水，的确很嫩，可也感受不到它的鲜美。主人在餐桌前略坐了坐，便又去钢琴前坐下，和另一位绅

士合唱了他们小时候唱过的歌。在上甜食的时候，就动员出席的作家表演节目，吴祖光清唱了京剧，嗓子竟然十分甜亮。当动员西班牙作家唱歌时，他不肯唱。这一位面目慈祥、身材不很高大的作家，是会唱歌的，而且唱得很好。据说他原是西班牙共产党员，坐过牢，现在已退党。他不无反感地拒绝唱歌，后经主人的再三邀请，他突然站起，带头唱起《国际歌》来，并挥手指挥在座的人一起唱，于是在这所精美的大厅里，响彻了《国际歌》声。

回到“五月花”已是午夜十二时。

10月16日 晴

今天在Des Moines，这是爱荷华州的州府。是一家保险公司接待我们。这是一家很大的保险公司。吃过午饭，几位穿扮整洁的女招待员分头陪我们去参观办公室。办公室就像是博物馆，陈列着许许多多的艺术品，各种流派的作品，令人目眩。老板很和蔼，大家在他的办公室里照了许多相，轮流坐在他的办公桌前过瘾。他的办公室里放着最早的第一架打字机。

两点半离开保险公司，去参观一个博物馆。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博物馆，它介绍Des Moines的农业历史。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农庄里，有一辆马车，还有一部拖拉机拉着几节车皮，把客人们送到“印第安时期”、“十六世纪”、“十七世纪”、“十八世纪”去进行参观。有铁匠铺，里面炉火熊熊，有两个铁匠在打铁，一个掌小锤，一个抡大锤，叮当叮当。带我们参观的人再三向我们强调：“这是真的。”这当然是真的，有什么奇怪呢？一锤一锤地打着铸件。十年前，我的丈夫就是这样打着铁。而在他们的生活里，这个时代已经十分遥远，像个童话似的，怪不得需要再三说明：“真的，真的！”有古老的乡村剧院，贴着海报，正上演着莎士比亚的戏剧。有旧式的乡村小杂货店，卖镰刀，卖水桶，卖种种小玩意儿。一个老头向我们表演：吹一只生了锈的口琴，一只竖笛，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乡村小乐器。潘耀明买了一小包糖，那糖不甜，有股怪味。我很怀疑：“会不会是马料？”他气得再不给我们吃了，一个人慢慢地吃，够他吃好一阵的。农人的房子，拉车的黄牛，印第安人停尸的架子……这历史并不长。都说美国的土地肥沃，种什么收什么。它只被开发了两百年，土力很足呢。而我们，已经种了四千年了。哦，我们的土地！

晚饭是在一座英国房子里吃的，这是一座真正英国式的房子。房子的主人是个英国人，在英国时遇到一个阔佬，答应给他一座英国房子建在美国。主人的子孙把它捐给了国家。假如他们继承了这所房子，他们就需要兑付许多关于接受遗产的税，而且还须保管它，这两项费用都是他们很难负担的。并且，现代美国家庭越来越小，大房子越来越不需要，这是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。今天晚上，捐献这房子的先生也来了，饭后，为大家弹了一支曲子，这是他从小弹的钢琴，是他从小在这房子里唱熟的一支曲子。

这里面有许多珍贵的收藏，各国的，也有中国的，一尊宋代的观音，还有一架皇帝的龙椅，真是奇怪，中国的东西怎么在这里收藏着呢？房子很大，阴森森的，高高的屋顶给人压力的感觉，长长的走廊，静悄悄的……我一个人走着，上楼、下楼、拐弯。墙很厚，是石头的墙，凉凉的，把阳光隔在外面了，暗暗的。我有些害怕起来，赶紧往回跑，推开一扇门，哦，阳光明媚得刺眼，碧绿的草地，站着一些人，喧闹着，在搬一些饮料：啤酒，可乐，全装在一屉屉的木格子里。我不由松了一口气。

波兰的流亡作家和他的妻女们也来了。他的女儿总是闹，左不好，右不好，吃也不肯好好地吃，她妈妈只能把她拉出去。当我们走出餐厅时，她在沙发上睡着了。汉斯走到她身边，怜爱地端详着她削瘦苍白的小脸。她妈妈问他："你有孩子吗？""有三个。"他说。蓝眼睛纯净得像个孩子。他是很爱孩子的，那天报告会上，他的发言就是谈童心，谈到儿童纯净的眼睛有时比成人更清楚地看到世界。他的作品，常常是写一个孩子，孩子在看大人的生活。眼前，这个黄头发的波兰女孩，她看到的大人的生活，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？她为什么那么紧张，那么神经质。有时候我想对她好一点，试图去抚摸她一下，她却恐怖地大叫起来，把我吓了一跳。

一个月，很快就要过去了，他们到哪里去呢？我为他们担心。波兰人看到我去看他，就对我微笑，他问我："会说英语吗？"我摇摇

头。他叹了一口气，然后抓住我的头发摇了摇。

上车了，不知什么道理，突然之间，罗马尼亚作家，印尼作家，一伙人大唱起《国际歌》来。刚刚吃了资产阶级的饭，接受了资产阶级的礼物。就这么，唱着《国际歌》离开了那座阴森豪华的石头房子，上了汽车……

10月17日 晴

下午，在聂华苓家里看吴祖光伯伯的话剧录像《闯江湖》，我已经看过三遍了，今天是为了陪Esther看。后来，谭嘉和吕嘉行也去了。华苓不在，安格尔先生一个人在楼上睡觉，我们自己上去打开冰箱，拿了可乐，然后下来看电视，我则看安霞的图画书。她有一本厚厚的书，上面画着两只可爱的猫，书上有一只，还吊了个小钥匙，我用钥匙去开锁，Esther叫了起来："这是人家安霞的日记，你怎么可以翻。"我吓了一跳："这不是一本书吗？""是日记，你看，有锁呢！""哦，"我赶紧放了下来。私人的东西在这里是要全力保护的。

一边看电视，一边聊起天来，吕嘉行说到台湾：台湾的官场，台湾的禁锢。有一件好笑的事：有一次进口了一个外国电影，讲一个强盗，抢了钱财，最后，他乘着船远去大海上了。政府觉得，偷了钱财的人怎么能够逍遥法外呢？这会给人什么印象。于是便把结尾剪了去，加上另一个电影的结尾——一只船"轰"的爆炸了。强盗有了应有的下场，而那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只船，并且不再是在海上，而是在河湾里，两岸有密密的树丛。我们都笑，Esther则说："那是你们在台湾时的情况了，现在大不一样了，真的。"

谭嘉说："刚从台湾来美国时，美国的教育真使我兴奋得不得了，台湾那一套完全是填鸭式的，而美国，则是教给你怎么去思考。我的小女儿曾经问我：地球的转动哪儿是开始，哪儿是结束？天哪，这是多少大哲学家在研究的课题，我怎么回答得了！在我小时候，是怎么也不会有这种问题的。所以，我们在美国这么呆下去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孩子们的教育。

“刚来美国时，就是要挣学费读书，总觉得一旦有了学费，就是最幸福的时刻了。读完了书，又想着结婚，建立家庭。好像一有了家，一切都好了。可当这一切都有了以后。我们忽然想：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？可是我们又不能轻率地离开这里了。孩子们在这里出生，他们完全认为自己是美国人，他们喜欢他们生长的地方。前几天下雪，他们高兴得又叫又跳，而我们闷闷的，我们对雪不习惯。

“台湾的冬天，老是下小雨，滴滴嗒嗒的。”

大家默不作声，看着电视。一个女孩子在唱大鼓。

“台湾没有这么好的演员。”他们说。

“她姓张。”我告诉他们。

10月18日 阴

下午是中国小组发言，共六人，依年龄次序进行：吴祖光，我，陈映真，七等生，潘耀明，王安忆。只有陈映真是自己用英语发言，其他五人都是别人代念翻成英文的稿子。潘耀明的英语水平是可以自己念的，可是他的发音还不过关，怕影响效果，所以也请了人代念了。听众有三四十人。有大陆来的学者、留学生，感到温暖。会议气氛友好，无挑衅者、出难题者。会议结束后，此地的一家中国餐馆庆祝安格尔的生日，请客吃饭，华苓把中国人都约了去，共进晚餐。

来此的主要节目，就此完成，比想象中顺利圆满。

10月18日 阴

今天是中国作家报告会。进行得很顺利，很轻松，却也有些冷清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爱德文才向我提了个问题——看过哪一些书、哪一些作家对我起过影响。我回答我没有自觉地去接受哪一位作家的影响。然后彼得向我们母女提问——我们作品的不相同处。我阐明了我的一些观点——我愿意给人们一些希望。然后彼得又向潘耀明提问，请他谈谈香港文学与大陆、台湾的不同之处。最后，有人还向七等生提了一个问题，会议便结束了。据聂华苓和Alex说，不少人反映，这是历来中国作家报告会中最好的一次，不知是真是假。我只觉得很冷清，好像人们对我们不了解，也不渴望了解，淡淡的，到的人也不多，倒有很多大陆的学生，一位西北大学姓沈的学生，今年夏天刚从大陆来，他说想和我聊聊；有一位北京来的女同学，姓毛，来读比较文学；另有一位北京清华学生物的，他不懂文学，只是来看看中国人。巧得很，他也住在“五月花”公寓，是底层地下室。

报告会结束后，我们中国作家和所有为中国报告会服务的朋友一起在聂华苓家小聚。彼得和我们一起讨论马克思，谈得好起劲。华苓说他是非常“马克思”的，并且，曾经是非常教条的。“是吗，彼得？”华苓问他，他笑了，有点难为情，这笑容使他严峻的脸庞突然柔和起来。他告诉我们，在第三世界里，中国的问题解决得比较好，比如失业的问题。我说，在我们这种高度就业的表面下，也隐藏着别的一些问题！他说：“我去过印度，去过别的地方，我知道，中国的情况比那些国家好。你不知道。”

又是“你不知道”。

10月19日 阴，有时有雨

有人提议，明天每人做两个菜，请华苓夫妇和谭嘉夫妇。我十分赞同，和安忆商量之后，以我们现有的烹调水平，决定做一个西式中做的茄汁猪排，炒一个清清爽爽的刀豆。因为大队人马即将去芝加哥访问，所以冰箱里已无存货，决定午饭后和安忆自己走去“伊格尔”买菜。但是安忆一定不要我去，说她很快去买了就回来，好像有点嫌我累赘，我也就算了。不过也有点担心，“伊格尔”是把牛排和猪排放在同一排冰柜上的，怕她弄错，便嘱了一句：“不要买了牛排回来。”

“嗯！”她不屑一闻地走了。

我午睡还未睡着，她已回来，把东西放在冰箱里，便回她的房里去了。我想想不放心，再问的话，就显得噜嗦了，便起来到厨房开了冰箱一看，的确不是牛排，但实在也不像猪排，揭了标签上的英文字去查字典，原来是一纸盘的火鸡。薄薄的几片，价是四元美金。贵倒在其次，这火鸡从来没有做过，叫我明天怎么下手？

10月19日 小雨

下午自个儿去Eagle买东西。天下着细得感觉不出的小雨，地上湿漉漉的，一地金灿灿的落叶，一树金灿灿的秋叶遮住了天。树叶儿都变红了，有的是金红色，有的是金黄色，还有的是淡黄色。淡黄色的树叶落在绿茸茸的草地上。空气中的水分使这金红、淡黄、绿，都晶莹起来。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么绚丽灿烂的秋色。而在这灿烂中又有一些凄凉，心情不由也有些黯然。那是一种甜丝丝的黯然。街上没有人，一栋栋小房子紧锁着门。只看见一栋小房子下站着一个老太太，一个人站着，等我走过去，露出一个笑容，说："Hi！"

世界很静寂，难得有一辆车"嗖"地过去，像一阵风，转瞬即逝。天和地，全被金灿灿的秋叶掩遮住了，我一个人走在这金色中，恍恍惚惚，像是一个金色的梦。Eagle在哪儿呢？我第一次步行去Eagle，好像没有这么长，会不会错了？可是我不想去问路，也没有人可问，就这么走下去，就是走错了也没什么。重要的是，这样走着很好。可是，忽然，Eagle在对面马路边出现了，它的出现，几乎叫我感动得想哭。

Eagle里荡漾着轻曼的音乐，不多的几位顾客推着小车在货架前走来走去，里面很暖和。心里踏实了许多，好像回到了原来的世界。买了排骨、西红柿、四季豆，然后又买了一瓶可乐——我觉得自己相当辛苦而且不容易，这是慰问自己的。走出Eagle，又迷茫了一会儿，可我真正下决心不问路了。终于找到了一个来时注意过的标志——候车亭。找到了来路，继而决定了去路。

仍然是那湿漉漉、金灿灿的天和地。不过好像喧腾了一点，三个小伙子围着一辆汽车不知在干什么；一座房子打开了门，一个老头踩着凳子，往门框上“砰砰”地砸着什么；一扇窗里传出大声的说话声：爱荷华什么什么的……走到“五月花”斜对面的草地上，忽然蹿出一条黑狗，朝我扑过来，吓得我手里的可乐也泼了出来，洒了一身。它围着我，朝我蹦着跳着，我几乎要惊叫起来。我克制着自己不要奔跑。在我插队时，得到一个经验，你越跑，它越追。可它绝对不碰我，只是紧紧跟着我，是在向我撒欢——我这么想。可是我究竟有什么值得它这么爱戴的呢？我从来不认识它。我疑惑不解，装出镇定的样子，偷偷看它——它走在我身边，一会儿左，一会儿右，一会儿前，一会儿后。过马路了，我走了几步，看到一辆汽车疾驶而来，便停了脚步，那汽车也放慢了速度，其实他是在给那狗让路的。而狗看我不走，它也不走，停在我的身边。就这么一步不离地跟着我上了台阶，跟我进公寓，却被等车的学生拦住了。有规定，“五月花”公寓里不能进狗。我进了电梯，回头看看，它正在玻璃门外徘徊。我放下心来，觉得终于脱离了危险，然而心里却有一点怅惘，它就自个儿在外面了，它究竟为什么要认定了我，这么高高兴兴地跟着，我连抚摸都没给它一下，心中是十分的抱歉。而这时，我才想起，有人告诉我，这里的狗是绝对不会咬人的，我其实用不着害怕的。

晚上，到蓝蓝家去玩，去的还有华苓、陈映真和吕嘉行夫妇。在她那里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——罗宋汤和面包。那汤很好。蓝蓝说，这汤，她一年只做一次。

吃过饭，电视里正放里根举行的记者招待会。记者们提了很多问题：黎巴嫩的驻军问题，美国经济情况，美苏关于原子弹的谈判，马丁·路德·金的纪念日问题——马丁·路德·金死了之后，有人提出将他的诞辰设一个全国性的纪念日，只有一个国会议员反对，他提出马丁路德是共产主义分子。假如，这一条成立，那么，关于纪念日提案就要推翻了。美国是个允许自由思想的国家，独独禁止共产思想。记者们很严肃的问题，而里根却很幽默，以他的幽默来应付记者们严肃的问

题。实际上——吕嘉行说——里根有很多事情都不了解，没法回答，在打马虎眼。蓝蓝说："里根开记者招待会，应该接上无数根电线，接受部长们的提示。"他很潇洒，很放手，显得轻松。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轻松的一个总统了，因为他什么事也不管。他明年还要参加竞选，明年四月将去中国，这是他竞选的一个内容，他很可能连任。因为他上任之后，美国经济好转了。其实——吕嘉行说——这是经济发展本身的一个起伏，低到一定程度自然会上升，经济生产自身有个自我调节呢！现在全归功于里根了，尽管大家都骂他。他竞选时，明明向大家许诺，要减税，可一上台却增税，当然这也是促进经济的一个措施。大家都挺喜欢卡特的，说卡特忠诚老实。而给大家留下最美好印象的，则是肯尼迪了，他是那么年轻，那么有活力，简直是美国的象征，又是那么早早地死了，死得也很有色彩，还暗杀。大家最最不喜欢的，则是尼克松。听他们议论总统，就好像在议论单位里的同事一样。

聊，聊，聊，又聊到了美国的工厂。谭嘉为了挣学费，什么都干过，也做过女工。她曾在堪萨斯一家美国最大的卡片公司做女工。她就是坐在那里，往卡片上贴一只蝴蝶，或者撒金粉，或者只是折一道，大工业的发展，使分工很细，操作则很简单，只需要一个动作。这动作有严格的计划，是用电脑计算出来最高效率的动作，左手怎么样，右手又怎么样，这是使速度达到最大限度的一个动作路线。每小时要做一千张卡片，就是说每小时要做一千个这种动作，女工们面对面坐着，这是一个看不到头的车间，坐着看不到头的几排女工。"有时候，"她说，"我做了一小时，抬起头一看，就想吐。有一次，一个女工突然站起来，发狂地大叫。我只做了四个月，可是我觉得我也要发疯了，我要杀人了。那时候，最大的乐趣就是听到下个星期要做另外一种卡片，不是贴蝴蝶，而是撒金粉了。可是到了下星期，做到第二小时又烦了，因为已经做了一千张……""大工业中，人的价值就是这么消失了，人成了机器的一部分。"陈映真说。谭嘉继续说："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女孩子，很瘦，只有八十磅的体重，她抬不动卡片箱子，

我实在看不过去，就绕过工作台，帮她抬。带工的人看到了，立刻跑了过来说：‘你知道吗？这样就影响了两个人的效率。’我说：‘我保证把这几张补做上。’‘不行。’他斩钉截铁地说。‘那么怎么办？就看着她在这里死掉？’‘我会找她谈话的。’谈话有什么用？她还是搬不动。”“她还是只有八十磅！”吕嘉行插嘴，“这是一架严密的大机器，人是机器上的零件。”可是我忽然想到刚才在搪塞记者们的里根，这么个吊儿郎当的总统，是如何领导这架大机器的呢？好像，机器有自己的运转轨道，总统呢，那就无所谓了，由他去吧。

“这个记者是个很有名望的记者，”他们在议论电视上出现的一个正说话的先生。

“爱荷华这地方挺有意思，跑来跑去尽是小孩子。”“大学城嘛！”

“你去芝加哥，你会发现，呀，芝加哥的人怎么这么难看。”

“爱荷华的居民是最美好的年龄，……”

“芝加哥的人，脸色都很疲惫。”

“街上能看到人躺在地上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病了，或者是醉了……”

10月20日 阴，时有小雨

在潘耀明的指导下，安忆自己来对付了那盘火鸡，切成丝，和芹菜炒了一盘菜，安格尔倒十分欣赏。

明天大家乘汽车赴芝加哥，要坐五六小时汽车，今天早早休息。

10月20日 阴

今天，我们中国人想请所有为我们操心忙碌的人来吃饭。

一早起来就忙着洗衣服，洗头发，切菜，洗菜，转眼就十一点半了，又忙着烧菜。我们搞了一个四季豆炒火鸡——这完全是个误会。我本想买猪排，看到一盆切得很薄很整齐的肉，便买了下来，没想到，是火鸡。我奇怪，火鸡的英文怎么是“土耳其”。潘耀明说：“人家都叫土耳其诗人‘火鸡’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他们不喜欢他，在走廊那头，以印度人为首，结起了一帮反对他的集团。”“唉，他怎么搞得那么糟！”潘耀明在做烤鸡，他还做了鱼和粉丝。陈映真做的是猪蹄、红烧肉、麻油鸡——他在里面放了大量的杜松子酒，那汤喝起来像药一样的苦。七等生的豆腐泡菜，很丰盛，宾主都很满意。连蓝蓝都吃了很多，她平时是不大吃午饭的，因为要保持体形，渐渐也就习惯了。明天要去芝加哥，大家再三关照我们：钱包要小心，芝加哥不像爱荷华那么单纯；要多穿衣服，那儿比这里冷，而且风大，芝加哥是个有名的风城，气候坏极了。Alex说，要带一些好的衣服，那里有些餐厅，必须穿讲究的衣服才合适。而华苓则推翻了他的意见，说：“就这样就行。”

玩得很愉快，只遗憾Esther和小叶没来。小叶是因为有事不能来，Esther则是没通知到！昨天晚上，我和吴祖光伯伯轮番地打电话，打到好晚，都没有人接，不知道她跑到哪里去了。

收拾过碗筷，我就一个人在屋子里忙开了。明天要去芝加哥了，我很兴奋。爱荷华太平静了，感受不到美国的脉搏。那该是怎样的一种搏动，怎样的一种节奏呢？

晚上，还有好多剩菜，就把小叶和Esther找来了。“你昨晚上到哪儿去了呀？我以为你被暗杀了呢！”我说。“没有，我在图书馆呢！表停了，一点多钟才到家。”她说。“真用功啊！”“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一边吃饭，小叶一边谈起他儿子阿伟。阿伟在学校里，是唯一的中国孩子，有时难免要受一些欺侮。他也很倔强，不肯受一点委屈。因此常常要发生打架的事情。小叶去和校长谈，校长说：“我为在我学校里发生这种事情而感到遗憾。以后再碰到这种事，你来告诉我，我一定处理。”所以，小叶要求儿子在这种情况下一定克制住不要还手，和他配合。而孩子很小，常常感情用事，冷静不下来。小叶就要他练习克制，并以自己戒烟来为儿子做榜样。他对阿伟说：“我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能够保护你的，就是你的爸爸。别人不会的。美国人不会的，别看他们对你总是微笑，说：‘Hi！’可他们对你并不关心。”“呀，你为什么要对这么小的孩子说这个呢！这是太沉重的道理。”我说。“没有办法，我要他争气。”他说。我们都不作声了，在这里，要扎下根来，是几代人的事，父亲很吃力，儿子也不轻松。

吃过晚饭，我和潘耀明一起送Esther回家，我们顺着爱荷华河走。两岸的灯光映在河上，好像星星落在了水里。把她送到了地方，我和潘耀明就去Old Capital取照片，一提起照片，我的心就一紧——从照相机里取胶卷时，我干了一桩蠢事，没把胶片卷上就打开了暗盒。虽然我马上就关上了，可是后果仍然不敢想像。到了柜台上，同时取好几包，潘耀明把最小的一包递给了我，他认定我的胶卷已经曝光曝完了。打开一看，果然只有小小的、暗暗的十几张了。就到了这般悲惨的境地吗？我马上要哭了，要知道这一卷里有我最喜欢的几处地方：密西西比河，John Deere，农庄……难道全没了吗？“这算不了什么，生活嘛！”潘耀明不知道怎么办好，就这么安慰我，“我经历得多了……”唉，他的概念太大了，这是两个不对等的事物，无法比较，我又要想笑。最后，总算闹清楚了，这包小的是吴祖光伯伯的，他是用小霜给他的那个小照相机照的，是一种玩具照相机，阿伟、安霞，都有一个。我那一卷，只毁了一张半，天哪！

我们都松了一口气，到二楼去喝东西吧。玻璃窗上映出高高悬挂的兰草藤蔓和人影。灯、草、人影映着玻璃窗外的街灯，楼房、街道、深蓝的天空，像是两张照片叠在了一起，交相辉映。

回到“五月花”公寓，正遇两个罗马尼亚人唱着歌回来，他们喝得个半醉，十分兴奋。他们邀我们去南斯拉夫女作家房间里玩，我们便去了，那位酷似蒙娜丽莎的丽莎也在，她把我拉到地图前，告诉我，她的家在纽约，在加州上大学，然后来爱荷华做事。南斯拉夫女作家高高大大的，淡黄的头发剪得短短的，总是穿一件宽大的罩衣，抽一支烟，十分洒脱。她看见潘耀明打太极拳，请教他，因为她的腰腿有病。潘耀明不教她，只给了她一盒伤筋止痛膏，也许他根本不相信她能进入太极的境界。卡罗唱着歌进来了，他英语不行，不能和人谈话，就唱歌，唱很复杂的交响曲，还和那位年长的罗马尼亚人分声部唱。南斯拉夫女作家画了一张图给我们看，这是——她的背脊——有两个脊椎并在一起了，因此影响了腿。年长的罗马尼亚人说他是一个鬼，南斯拉夫女作家就画了一个鬼，写上南斯拉夫文的“鬼”，卡罗写上西班牙文的“鬼”，罗马尼亚人则嫌画得不够好，自己又画了一张更复杂的鬼，接着便含情脉脉地对着南斯拉夫女人凝视。她也含情脉脉地把脖子伸给他，他用手抚摸了一下。她说：“你的手太粗了。”那位年轻的罗马尼亚人则对我念一首很怪的诗，说这是中国诗，可我一点听不懂，很抱歉。他委屈地说：“安格尔先生懂，”又接着念，一边念一边向我逼进，非要我听懂不可。搞了半天，总算明白了，他是在念李白的诗：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哦，可怜的李白！那位罗马尼亚年长者脱下鞋对着我，原来这是一双在上海买的松紧鞋。大家闹得好开心。我抬起头，忽然看见厨房的墙上挂着两个中国脸谱，这是我们送给那西德女人的生日礼物。哦，想起来了，那一边是她的房间，房间里没有人，她到哪里去了？好久没有见着她了。我有些挂念她。我想起她生日的那天，见我们去，好高兴，抱住我，亲亲热热地吻我。她把我们的礼物挂在墙上，一个钟馗一个关云长。

10月21日 雨

傍晚，在细雨霏霏中，与芝加哥见面了。这里是满天的灯光、满城的灯光。一百三十层高的大厦亮着灯，看上去像是透明的。这一幢一幢透明的高楼，组成了以建筑著名的芝加哥。密西根河黑沉沉的，看不见，汽车在它的大桥上奔来驰去，来回了两三次，寻找着李欧梵先生的住处。待我们找到以后，就又立即奔赴餐馆。他在唐人街“四五六”中餐馆订了七时的座位，我们已经到达了。

餐馆并不太大，生意兴隆，还有人等座位的。不过不像国内那样，等在客人后面“看吃”，而是坐在账台旁边。菜一般，相当于上海的三流水平。

饭后，大家回到李欧梵家里。钟敬堂带了吴祖光、王安忆去和其他作家会合，去听音乐，我宁可在“家”谈谈。李欧梵回到家，就开了酒柜申明说：“我是喜欢布尔乔亚生活的。”但我看来，他这个家，包括一厅、一卧房、一书房，也并不见好到哪里去。也许由于他至今未结婚，没有女主人的缘故。

谈到台湾文学，陈映真捧着一杯茶（他好像不喝酒）说开了。他认为台湾文学存在断裂，而且是双层的断裂。一，和五四时期文化隔裂，面向西方，并与自身社会结构、经济脱钩，学了西方的皮毛；二，在汲取群众语言上，台语与国语距离极大。

结合前一阶段看了一些台湾作家作品，我以为他的看法很准确；同时也了解到，为什么有些作家在作品里用进了许多台语。他还认为作家能得到读者来信，是一种幸福。我不禁暗暗叫了一声“惭愧！”

当我在困难时期，如在十年动乱中，每每受到读者一点一滴的鼓励和关心时，我都是当作一股力量来支撑自己的。但当环境顺利时，我又往往把它看成是一种负担。陈映真说的对，这是一种幸福，我大概是有一点身在福中不知福了。

李欧梵在芝加哥大学任教，现在正在写一本鲁迅研究论文集。他留了小胡子，拿着高脚玻璃杯，一副“洋”公子的模样。深谈以后，觉得他为人爽直，也并不完全如他自己宣称的那样，是个布尔乔亚。

他初来美国学习，在这芝加哥大学。那时语言还不过关，租了一个房子，但没有面包，连喝一杯啤酒的钱也没有。周围都是陌生的面孔，那时有一种自我失落的感觉。不知道为了什么，自己忽然被抛落到了这里。想回去，又无颜见江东父老，想过自杀……他回首往事，感慨万千。

10月21日 阴有雨

天下雨，真不巧。

说是十点整出发，可是等这等那近十一点了还没出发。最后，终于都到齐了，七等生却不见了。“他上哪儿去了呀？”大家纷纷问着。“好像是，Alex带他去银行取钱了。”我说。“不，已经回来了，上楼去了。好像是要等一个长途电话。”潘耀明说。天下着毛毛雨，大家分坐在三辆车上，我们四个：我，妈妈，吴祖光伯伯，潘耀明合坐一辆Alex开的小车。我们中国作家全部由李欧梵先生接待，他给我们安排住处，陪我们玩，Alex就为我们开车，带路。爱德文站在雨里送我们。他不去芝加哥，他祝我玩得快乐。“呀，这么晚了，还不开车！”我急了，爱德文说：“有必要为他一个人让大家等着吗？”是没必要，可是毕竟不能把他一个人扔下不管啊！又等了一会儿，Alex带着他总算来了。七等生上了后一辆车，Alex进了我们的车。“他在干什么呀，Alex？”我们一起问。“谁知道。他在房间里摸摸弄弄的，我不说他了。”

终于开车了。

天，灰蒙蒙的。

“什么时候才能到芝加哥？”我问Alex。

“本来，下午三点可以到了，四小时路，再加上吃午饭。可这么一拖，加上下雨路滑，要五点钟才能到呢，很难说。”Alex回答我。

雨，越下越大。瑞克开的一辆车赶上了我们，与我们平齐了。他的太太艾恩抱着他们四岁的儿子坐在他旁边，看到雨水从玻璃窗上滑

下来，很开心，伸出舌头去舔那雨水。

一小时以后，在加油站前停车了，车要加油，人也要下车休息。加油站旁有一些小店，这是一种专门为汽车旅行者服务的商店。大家下车进去上洗手间，买饮料，喝点东西，买点零食。天很冷，出了汽车，不禁有点打战。门口的自动售货机出售有热茶、热汤、热咖啡、热朱古力，我喝了一杯朱古力，身上才暖和过来。磨蹭了一会儿，又上车开路。

汽车在公路上行驶，两边是看不到边的田野，没有什么变化，一会儿就看乏了，想打瞌睡。可是妈妈说：“谁也不许睡觉，否则Alex就太辛苦了。”Alex开车，这么长途的开车，很容易打瞌睡，那是很危险的。“吴祖光伯伯讲个笑话吧！”我说。“可是，很难一下子想起什么笑话。”他很为难，也有些困了。窗外的景色很单调，一望无际的平原，看不到什么人，没有人也就不会有什么故事发生了。我想起我们的公路上常常能看到新娘子坐着大车上婆家啦；背着草筐的小孩子对着汽车砸土坷垃啦；一辆拖拉机翻车撞到一匹马啦；一个人蹲在地边边拉屎啦……

“让我看看你的书吧！”我决定和潘耀明捣蛋。他一上车就在看书——这是他们的功课。老师要他们把这本书看完后写个内容概要。

“这是我的功课。”他说。为了去芝加哥，他要旷两天的课，所以对功课更加重视了。

“让我看看怕什么？你这么用功会昏倒的。”

他把书给了我，却又从书包里抽出另一本书来。我就只能也看书。想不到，这书很容易懂，是一个爱情绑架的故事，看了几页又停车了。“下车吃午饭。”Alex说。

这餐馆不大，比较拥挤，我们几个中国人占了一个小桌子，桌上堆着脏盘子，客人刚走，丢了几个硬币作小费。一个黑人女招待来了，收走了脏盘子和小费。

“这些黑人挺可怜的。”陈映真说。这餐馆里的招待全是黑人，穿着大红的衣服。“等会儿，咱们多给一点儿小费。”

“好的。”我说。

我们大家商量着每人出十元钱，全集中起来由潘耀明保管，一起开销旅途上的费用。潘耀明把这些公款放在另一个包里，和私款分开。他干什么事都很认真。我们决定吃肉排，一人一份。妈妈说：“一份很多，我和你合一份吧。”“可是我觉得我能吃一份。”我说。我很饿。可是没想到，那一份是这样的多，浇了浓浓的汁，咸得要命。我只啃了两条排骨就饱了，可想起自己的宣言，我仍然不屈地啃着，一直到恶心反胃而后已。“算了吧！”妈妈说。每个人都剩了不少，就集中在一个纸袋里，说带给李欧梵，放在他冰箱里给他做早点。他是一个单身汉，一定欢迎这种现成的食物。

该走了，要留小费了，陈映真要留百分之二十，潘耀明则说，只须百分之十。

“给她们百分之二十吧，挺可怜的，这些黑人。”

“这种自助式的餐馆用不着付这么多，你看，那些外国作家一分都不给。”果然，那些外国作家站起来就走了。

“这不对，不管怎么，她们来服务过了。”

“用不着给百分之二十，我知道。”

“多给一点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并不是常来这里的，难得的事情。”

他们争得不可开交，我们便劝解，折中一下，给百分之十五。

下雨。上车。公路。田野。过关卡，付钱。又停车——这里有一个“麦当劳”，上洗手间，喝茶。“麦当劳”里有几架滑梯、木马，瑞克的儿子和冰岛夫妇的女儿便玩了起来。大人看了，手痒痒的，也纷纷爬上滑梯滑了几趟。一玩就没个完了。天色很暗，雨，越下越大了。

Alex急了："这么拖，什么时候才能到芝加哥呀！""假如这是一支军队，早就溃散了。"我说。终于集合起来，重新上路了。

已是傍晚，天色，灰蒙蒙的，雨小了，却很密，好像是湿的茸毛，弥漫在暮色里。

公路上的汽车越来越多，流水似的迎面而来，一幢幢高楼，迎面而来，从头顶上过去。芝加哥！水泥色的大楼在雨雾和暮色里，发出一种严峻银光。它们矗立着，有些孤独，有些肃穆，有些庄严，像巨人。灯亮了，那最高的亮处，是世界最高楼——Sears Tower。

汽车像流水似的过去了。

芝加哥！

"这才是美国呢！"我说。芝加哥的大楼从我头顶上过去，带着一种压顶之势。

外国作家们，都在一家大旅馆下榻。下车站了站，风大得吓人，站都站不住，不愧为风城。我们的汽车在雨中绕了无数个弯，才终于找到李欧梵家。他的公寓对着湖，隔了一个很大的停车场。他站在楼下已经等了我们好久："上唐人街。我已经定了位子，请你们吃饭。"他说。

雨蒙蒙的，看不清唐人街的模样。这家餐馆叫"四五六"，很奇怪的名字。餐馆里满满的，座无虚席。桌子和桌子排得很紧，侧着身子都很难挤过去。在爱荷华，我从来还没看到过饭店里有这样的盛况。都说"燕京"的生意好，可是从来没见它坐满过。在那里，总是只有三五个客人在吃饭，静静的，有点花香，有点音乐，这里，很喧哗，油味儿很重。招待是中国人，却不会说普通话，有的说广东话，有的说英语，有的说英语又说广东话，独独不说普通话。这里的中国人很矮小，好像不像中国人，又不像外国人。"我要去洗手间。"我对妈妈说。我挤出来，找到了洗手间，在一个角落里，木板隔成的狭狭的一

间，只能进一个人。很脏。走出去，门口已经有人等着了，是几个美国小孩儿，吵吵嚷嚷地打闹着。

吃过饭，开车到李欧梵家去。一进门，李欧梵就挑了一张唱片放上了唱机："这就是我的生活，喝酒，听音乐，小资产阶级式的。"妈妈、陈映真、七等生留在他家聊天。我、吴祖光伯伯、潘耀明，由Alex带领，去一个夜总会听Blues，即蓝调。蓝调是黑人的音乐。这是"写作计划"安排的节目，瑞克是芝加哥人，他知道来芝加哥，应该看什么。

这夜总会是在城北边的黑人区里。"把车窗摇上，一定不要开窗。"Alex说。汽车开过大街，街上很热闹，人来人往，巴士的候车棚下，有个人垂着头半躺在长椅上，一动不动。他是病了还是醉了呢？我看着他想知道。Alex却转过头对我说："不要太看人家。"

汽车越往前走越冷清，楼房渐渐破旧起来，最后只剩寥寥几个人了，是黑人，一个胖胖的女黑人撑着一把伞匆匆地走着，几个年轻人对着我们的车叫着什么，一个小伙子忽然头朝下，脚朝上，翻了一个侧身翻。可是，那夜总会在哪里呢？Alex茫然起来。我觉得这里不太像有什么夜总会的样子，这么冷清，这么寂寥，怎么说呢？没有气氛。

Alex开着车在冷冷清清的路上转着，转了一个圈又一个圈，终于走上了瑞克说的那条街，"你们帮我看门牌号。"他吩咐。"好的。"他缓缓地开着车，悄无声息地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滑行，雨，蒙蒙地下着，街灯很暗，沿街的门都紧闭着，我不明白，这里怎么会有夜总会。

"到了，就是这里。"车停了。哦，这个门上挂了一幅旗子，门口停了几辆车。一个穿大衣戴帽子的黑人笑容可掬地走了过来，招呼我们停车。"你们是从哪儿来的？"他很热情。"他们两位是中国大陆，这位先生是香港。""哦，香港的功夫片很棒。"他当下耍了两下拳脚，踢起一脚积水。

推开门，揭开门帘，一个硕大无比的黑人挡住我们，问我们要钱，每人五元美金。他是那么胖，胖得不可思议，像一座小山，我很怕他，小心地从他肚子底下绕了过去。一进去，是一个长长的酒柜，柜台前的高脚转椅上坐了几个人在喝酒，有黑人，也有白人。柜台里的招待是个白女人，脸色白得发青，很古怪的样子，像是很疲惫。里面是一排排的木桌子、木椅子。瑞克早和他们联系，为我们留好了座位。

乐队有三五个人，爵士鼓，电子琴，吉他，铜管。他们开始演奏，并且唱了起来。他们唱得很好听，很热烈。渐渐的，大家的情绪都上来了，身后的黑人和白人们大声朝他们嚷，和着他们一起唱。他们开始唱一支很亲切的歌，老是在问："你快乐吗？"然后把话筒递给观众，观众便回答一声："很快乐。"他又问："你快乐吗？"大家一起回答："很快乐。"这真是一支快乐的歌，大家一起跟着他唱，是很简单的旋律，一学就会，实在学不会的就拍手，敲桌子。"你快乐吗？""很快乐。"身后一个黑女人站起来，扭着身子，大声唱着。

灯光，暗暗的，窗外，在下着雨，歌声充满了这暗暗的小屋子，"你快乐吗？""很快乐！"大家一起回答。

午夜时分，才离开这里，在下雨，风很大。汽车茫然地行驶着，迷路了。一幢幢大楼隐没在夜色里，是睡了还是醒着？它们很沉默。有一幢白色的楼，醒目地凸现在黑色的大楼中间。"那是什么？"我问。"那是全美国最大的口香糖公司。"Sears Tower消失在朦胧的雨夜里，只留下模模糊糊的一些光影，好像雨雾把那灯光溶化了。

汽车沿着湖寻找我们的宿处，湖心卷起几尺高的浪，风贴着湖面卷过来。"这湖好大啊！"我说。看不到它的边，只有苍茫的夜。

"它一直通到加拿大！"Alex说。

10月22日 雨

八时许起来，见李欧梵摘了眼镜，穿着睡衣，已在给我们炒鸡蛋、煮咖啡了。“洋”公子一下子变成了“老李”模样。

上午李欧梵请了另一位年轻的先生，带我们参观了离此不远的科学宫。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，只能走马看花。

这里有各种能源的开发过程、电脑的发展过程。这里的一切，都可以让你按一按、扳一扳、动一动。即使是挂在墙上的各种图表，下面也装个电话，只需你拿起电话，里面就有解说。所以展出的虽有高深科学理论的东西，但是搞得十分生动活泼，深入浅出，吸引了许多孩子。于是孩子们从小就掌握了许多科学方面的基本常识。

电脑从开始到今天的发展过程，其中的道理看不懂，但总的发展格式是：简单——繁复——简单。竟然和一部作品从酝酿到产生的过程差不多。奇！

参观能源开发过程，是坐在电动椅子上转入一个犹如矿井似的黑洞里。椅旁有电话，电话里有音乐、有讲解。前面是各类图像、模型，加上灯光的变化，使人感到在地层下面、海洋下面，有各种能量巨大、美丽无比的好东西。

下午在芝大的座谈气氛很好，到的人不少。以中国人为主，也有学中文的美国人。我谈了自己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经历。提问时有人提出，《剪辑错了的故事》里，老寿最后是否找到了老甘，他们的前途如何？

答曰：找到了。老甘给了老寿收音机、电视机。老寿还可以把多余的农产品，拿到集市贸易去卖，赚许多钱，他富裕起来了；同时，他机灵、精明了；善计算，会聚财，他聪明起来了；也是同时，老寿也失去了他身上的某些东西，一些捏不住、看不见的东西——诗人们称之为淳朴、泥土的气息。

世上的事物就是这样，就像在狄莫恩参观的那所农村博物馆；美国人在积极努力，把过去那种原始、落后、贫困，连同它的古朴、恬静，一起消灭，建立起一个高速运转的生活，然后又跑来纪念它、怀念它；道理是一样的。

当陈映真谈了台湾文学中语言的断层问题，有人问七等生，他写作中如何解决语言问题？他的回答是："我没有语言。只有等我要说话，要写作时才有语言。"

据李欧梵说，座谈是成功的，比往年的气氛和谐，提问多但不存恶意。

晚上，李欧梵家里开"派对"，来了许多学生，放了吴祖光带来的录像，很热闹。许多学生想来找安忆谈谈，但她珍惜这难得的机会，又跟着大队去听音乐，看美国人的生活去了。我坚持到十点，也就悄悄回屋睡觉，觉得头昏得很。

10月22日 雨

七等生住一位陈先生家。

陈映真住一位钱先生家。

我和妈妈住李欧梵的卧室。

吴祖光伯伯住李欧梵的书房。

上午去参观科学博物馆，这是一种很大的博物馆，有各种展览：电话工业、煤矿工业、钢铁、宇航、电脑、食品——这里很有趣，假如在一架电脑机器里投上一些硬币，就可以测算出你的营养是多了还是少了。你告诉电脑几个数字：你的身高，体重，你每日三餐的食物通常是什么……机器里就出来一张纸，告诉你应该多吃还是减食。Alex上去做了一下试验，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——营养过剩。

中午，到陈映真寄宿的钱教授家吃午饭。钱教授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，他的太太是个美国人，会说一些中国话，她亲手给我们做午饭。她做饭，坚决不要别人插手，也许是要保证有一个完整的“我”，像任何一桩艺术创作一样。果然，她做的饭十分好吃，很简单，可是吃得很过瘾。他们家的房子也很漂亮。在一个僻静的街角，难得有一两个人走过，马路边停了一些漂亮的汽车。石砌的阳台很宽大，行道树遮了半扇门。“这房子和爱荷华很不一样，”我说。“对，这些房子有时间的感觉。”陈映真说。

爱荷华像个洋娃娃的世界。

下午，在芝加哥大学讲学。来听的几乎全是中国人，只有两个美国人，也是很懂中文的。所以我们就自己讲，不用翻译。各人讲自己

“如何走上文学道路”。陈映真讲得很逗，他说他最早开始写的小说，“照例是一个孤独的男生爱上了一个女生，那女生照例是苍白的，照例是穿着一件黑衣服，他们照例是在海边谈话，照例是谈艺术，谈学问……”好像每个人都有这个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年龄，回想起来又亲切又好笑。我想到，如今有一些已经长大的大人，还在那里“说愁”，不免有些恶心起来。

晚上，我们在学生餐厅买了饭，和学生们在一起吃。芝加哥大学的学生非常热情，围着我们聊个没完。有位台湾学生邀我出去，他陪我逛逛校园，可是没有时间啊，只能谢绝了。一些学理工的学生和我谈了很多，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，谈到美国，有个同学说：“爱荷华才是真正的美国，它代表美国最优秀的东西，它把美国的优点提纯了。”“问题就是，美国不是个很纯的国家。”有人反驳他，争个不休。有个学电脑的小男孩，才十九岁，是中国科技大学送来的公费生，刚来一个月。“想家吗？”我问他。“我有半个月是在家里的。”他说。“怎么说？”“就是说，晚上睡觉十个小时全在家里，做梦呢。”“他还是baby呢！”一个说北京话的女同学说，她是北大毕业生，是李欧梵刚收的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，姓吴。李欧梵非常夸奖她，说她学问很好，水平非常高。她是陈建功的同学，中间有了一个彼此都认识的人，就好像架起了一座桥，互相接近了许多。“陈建功可好了。”我说，“他写的也好。”“陈建功特有人缘。”一个男生插嘴，又是一个北大的学生。“他的人缘不是自己有意做出来的，他就是天生为人诚恳。”小吴说。“陈建功是谁呀？”旁边的人都问，听我们谈得那么热烈。“是一个青年作家。”我们告诉他们。“王安忆，你可以和这位先生聊聊，他的经历很可以写小说的。”一个学化学的女生对我说。她指的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先生，三十五六岁的年纪，很瘦，很苍白，头发很少，披在额上。他和蔼而天真的笑着，不说话。我看看他，觉得他有些奇怪。“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我问。“我叫林孝信。”他说。

吃过饭，我们一起去李欧梵家聊天。雨下大了，夜很晚。我和小吴坐李欧梵的车，他把我们俩在公寓门口放下，然后把钥匙交给小

吴，自己则到前边停车场停车。这里停车很方便，“我就是为这停车场买下这房子的。”——他说。我们自己先进了公寓，马上有两个门卫来问我们找谁。我们告诉了他们。进电梯，进门，都很复杂，要按种种电钮，总之是防备森严。

来了好多学生，把偌大个客餐厅挤得满满的。大家纵横交叉地闲聊着。

九点半时，Alex带着我们一起去一个旅馆——Holiday Inn。他与瑞克、艾恩说好，在这里碰头。

这是一个干净、明亮、华丽的旅馆，进进出出的客人都穿得整整齐齐，西装、领带，态度很严肃，有些高傲，擦肩而过，就好像没看到你似的，这里从来没有人对你说：“Hi。”像爱荷华那样。这里的人和人之间很陌生。

可是这里并没有瑞克、艾恩他们的人影，于是我们就等，等了一个多小时，才到了汉斯、丽莎等几位，而他们是与瑞克分开的另一伙。他们说，其他的人都跟土耳其人去吃土耳其饭了。可是说好九点半碰头，他们怎么还不来？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决定不等他们了。跑到旅馆的酒吧，那里面坐着一些打着领带穿西装的人，很严肃很优雅地在听音乐，门口收费很贵，大家都没了兴趣——不过瘾，决定去另一个地方，一个中下层阶级的住宅区的夜总会。

到了一条房屋低矮破旧的街，停了车，走进一个房子。里面黑洞洞的，没有开灯，只有酒柜里点着几个暗暗的红灯或绿灯。黑压压的，却站满了人，挤挤地站在那里。我们向里挤去，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必须挤进去，好像总觉得前面要发生什么了，必须挤过去看看。往前走，还是人，还是挤，满满一屋子都是人，都站着，喝着酒，抽着烟，沿墙有一排高凳，坐着一些人，有一对对的男女，旁若无人地亲热着，也有单个儿的。我脚底下忽然感觉着软软的，而又硬硬的。低头一看，只见地上靠着柱子坐了一个人，我赶紧向他道歉，他不响，好像没看见我，好像我刚才那一脚并不是踩在他身上，旁边的人友好

地朝我笑笑。挤来挤去，始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安身，喇叭里的电子爵士乐震得耳膜嗡嗡响。最后，终于在墙角找了个安身之处，靠着墙站好了。这是一面临街的大窗户，街上灯很暗，人很少，房屋很旧。

安定下来，便感到了头晕，屋里没有一点亮光，却有这么响的声音，那么多的人。“为什么不开灯？”我大声地问，可是没有人回答我，连我自己都听不见这声音。我头昏，而且恶心，我怕我会吐了，便挤过去找Alex：“我要回去了，我要吐了。”Alex说：“坚持一下吧，乐队还没来，看一会儿乐队再走吧。”既然还有乐队，总要坚持一下，否则也对不起在门口交付的那四块美金。大门已经关上了，因为再不能让人进来了，已经客满。过了好漫长的一会儿，前边忽然亮起一片昏暗的灯光，响起了音乐。远远看过去，几个样子很古怪的黑人在弹唱。领唱者头上编了很多辫子，一脸油汗，表情又疯狂又疲惫，做出种种强烈的动作——我觉得我应该照几张相，便鼓起勇气挤了过去。而到了跟前又胆怯起来，我怕不能照相而惹恼了他们。不知为什么，我觉得他们是不好惹的，惹翻了会很糟糕。便又去打听，回答是可以照相，于是就开始照，可是忽然有个男人笑嘻嘻地问我要照相机。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总有些胆战心惊。这里的一切都叫我有些担心，好像随时都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因此赶紧关上照相机退了出去，到了门口，和大伙儿在一起。Alex告诉我，这乐队是Jamaica的黑人，那地方的黑人音乐是很有特点的。而我只感到脑子里轰然乱作一团，这音乐太刺激神经，我只好把耳朵蒙住。可是忽然，靠墙站着的一个黑人大声地对着我喊什么，我害怕极了，丽莎就过去问他干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丽莎回来了，告诉我，他只是想对我说一声“Hello！”于是，我就把手放下来，不好意思蒙耳朵了。这里毕竟是没有恶意的。

雨，住了，风也息了。天空很清澈。Alex又找不到归路了，围着湖茫然地开着。

高大的建筑物静静的，威严地沉默着，灰色的表面在夜色里是黑沉沉的，只有那家最大的口香糖公司是白色的，在夜色里闪烁着骄傲的白色。

10月23日 阴，时有小雨

既然来到芝加哥，没有不去拜访世界最高大楼的道理。上楼需门票两元，售门票的人倒无商业观点，或者说是很有商业的信誉，竭力劝我们不必上去，说：“今天上面什么也看不见。”但我们只有今天一天了，坚持要上去。他只好摇着头，把票卖给我们。

上去的电梯很大，速度很快，有点像飞机起飞，耳膜小有不适。不一会，就已到达一百零三楼。这里不是最高层，只是专供游人观看全市景色的地方。四面都是镶着玻璃的空旷走廊，隔几步就有自动投币的望远镜。窗外果然是白茫茫一片，是云是雾，望远镜也帮不上忙。我们只得在里面走了一圈，在中间小卖部里买了些纪念品，就下来了。值得安慰的是，我们并不是唯一的登高者。

看了一个中产阶级的百货公司，据说，年收入在十万以上的人才到这里来买东西。在美国，什么阶层就到什么地方买东西，绝对不会走错。从公司出来，大家都想去开一个洋荤，吃一次法国菜。李欧梵就带我们走进一家公司模样的大楼，底层一张桌子后面坐了一位女子。李欧梵上前大概对她说明来意后，她立即站起身，笑容满面，十分礼貌地向我们一行中几位穿了牛仔裤的朋友看了一眼，便说了一声“抱歉”！服装不整，恕不接待！大家碰在一个软软的网上。

随便找了一个餐馆，吃了一客意大利面条，就去艺术博物馆。门票是四元一张。进门两边的廊下，就是中国古代的山水画。原来这里展出的是各国的艺术珍品。主要是画，而美国的只占一个厅。有法国、英国的名画，许多画是很熟悉的，有一些从未见过。印象较深的一张是毕加索早期的画；黑白两色，画面上是一位盲人坐在地上，抱

着一只琴弹着。这是画，当然听不见他在弹什么。但从他蜷起的腿到斜坐的姿势，一直到弯曲的手臂，这整个的线条犹如一阕悲伤的旋律。美国的展厅，看到有两种不同倾向的画：一种是印象派的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张全黑的画；一种是十分精细的，已在狄莫恩保险公司看到过的摄影写实，比真的还逼真，画上一张桌子，上面放着几个分币，那是真像可以一把掳在手里的。

最令人意外的，在美国展厅里，我们看到了一幅毛主席的油画，有三四人高，就像国内到处挂过的标准像，画得是否特别好，也不敢说。我们轮流在像下拍照留念。

美国这个厅是在底层，有些展品无法理解，有些又一目了然；很快看完以后，我们发现展厅的后院里，蜡黄的叶，铺天盖地，静静的树，伫立在细雨之蒙蒙中。还有些不知名的小树，红得娇艳非常。我们冒雨在那里照了像，但不知效果如何。

五点半离开艺术博物馆，由钟敬堂开车，带我们去非马先生家里吃饭。汽车沿着五十五大街开，经过黑人区，这是不用人介绍的，从街道，从灯光，从两旁的房子，从停在路边的汽车，从垃圾场，从广告牌，从站在街角上的孩子们的肤色，在在向我们作说明，作介绍。潘耀明按照人们的嘱咐，赶紧把车窗摇上，好像我们都是腰缠万贯，窗口会突然伸进一个冷冰冰的枪筒来。车子停停，看看地图，再开开，一直开到无路可走了，前面是黑糊糊的一片死水，才不得不掉头。

我们迷路了。我倒暗暗有点高兴。出门在外，一切都顺利，太平静，可写的东西也就不多了。但是遇强盗抢，遇劫持飞机之类，又太冒险。这迷路不太险，又有点波折，正好。

从地图上看，我们的错误是在把五十五大街，当作五十五号公路了。照道理说，从五十五大街是可以转到五十五号公路上去的，可是钟敬堂不认路，他非得回头，又经黑人区，沿密西根河，回到李欧梵

的住处，再走上五十五号公路，找到非马先生家里，已是七点四十五分，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。

非马先生是一位搞理工的学者，业余爱好写诗。他夫人亲自动手，做了一桌十分丰盛的菜，请几位中国作家吃饭。饭后，钟敬堂深怕中国作家脱离了集体活动，又辛辛苦苦地带领吴祖光几个人去和“写作计划”的作家会合，我即和七等生跟着李欧梵回到住处，看他表演了用电脑打字机写稿，改稿，可以当即印出，也可以储存在一个盒装的磁带里，每一盒可储五六十页。

闲谈中，知道许芥昱先生一九八二年一月于旧金山对面山坡上的住宅里，在洪水山崩中遇难。他生前编译了一厚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》。我的《百合花》是他自己译出，收在这本集子里。他最后翻译的是冯骥才的《雕花烟斗》。他曾在七三年访问中国时，在济南被“四人帮”驱逐出境。八一年，他在家热情接待了中国作家戈宝权、萧军等人。

我没见过许芥昱，但对这个名字，我是记得的。那还是我在干校的时候，有一次由工宣队转交给我一张名片。说是有一个人要看你，没有见到，转交你一张名片。我一看，上面是“许芥昱”三个字。我说：“我不认识他。”这是真的，我不认识，可是在我说这话的时候，我已深深地记住了这个名字。当时我已多年未曾执笔，还有朋友自远方来，想到了我，心里是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于是许芥昱先生同这种滋味一起留住了我的心里。

想不到今天在这里，知道了他猝然去世的详情。我捧着他编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》，像是捧着一颗爱国的赤心，默默地作了一次迟到的追悼。

10月23日 阴有雨

早上，Alex和艾恩通上了电话。原来，昨天晚上，瑞克他们把车停在不该停的地方，结果车被警车拖走了。他们也不晓得该上哪儿去找，一直到十二点才有了线索，付了罚款把车领了出来。他们那儿人多口杂主意多，很乱。土耳其人搅得大家都不愉快，谁都不愿与他同房间，连老实的汉斯都不愿意，只能说服印尼小伙子和他同屋。昨天，他又不知捣什么蛋，把冰岛作家惹火了，他以出走为抗议。——艾恩马上就要哭了。

上午，李欧梵带着我们去逛那世界最高楼——Sears Tower。天不好，雾蒙蒙的，大楼的三分之一以上被掩在雾里了。游客寥寥无几，没几个人在排队买票。排在我们前面的一对夫妇被卖票的劝说回去了：“今天有雾，楼上什么也看不清，什么也看不见。”他又照样地劝说我们，而我们很坚决，一定要上去。他看着我们，莫名其妙地摇摇头。他不知道，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机会了，明天，我们就要离开芝加哥了。

买了票，进了电梯，电梯上升得很快，立刻感到耳膜被压紧，说话像隔了一层玻璃，和飞机上升时一样。上了一百零三层。窗外果然是白茫茫的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。往望远镜里丢进一个二十五分的硬币，望远镜的镜头打开了，仍然是白茫茫的一片，而且更加白茫茫了。

下了楼，去逛街。这是芝加哥最豪华的街。这里的百货商店，是年薪十万阶层购物的地方。在芝加哥每一阶层都有自己合适的商店。里面的衣服很漂亮，却贵得吓人。李欧梵对我说：“你先慢慢看，看到

哪一件衣服使你站下来再也走不开了，咱们就去把七等生绑架来，让他付钱。”

逛完商店，就去吃午饭。李欧梵说：“我带你们去一栋大楼吃法国菜，这大楼比Sears Tower稍低一些，也许不受雾的影响，能鸟瞰芝加哥。”可是电梯口那女侍者说上面仍然看不见什么，只有雾。那么不鸟瞰了，光吃饭吧。可她又说我们不能上去吃饭，因为衣衫不整，我和Alex穿牛仔裤，很抱歉。我们只好灰溜溜地退了出来，在一家一般的快餐店里吃了简单的午饭。

吃过饭，便去艺术馆，不曾想，在马路上便碰到了瑞克他们的车。大家见面，分外高兴。这么大的一个芝加哥，能有一些面孔不完全陌生，就觉得很亲切，很安慰。有好几个作家想和我们中国人在一起活动，他们吵吵嚷嚷的，玩的地方还没我们多，虽然我们要讲学，要访朋问友，要迷路，还要时时在联络上花费时间。他们羡慕我们。据瑞克他们说，这次集体来芝加哥，凡是社会主义国家来的作家表现得都比较稳重老实，比如保加利亚诗人，匈牙利女作家，民主德国的汉斯……

五点钟，在艺术馆大厅里碰头，我们分两辆车去非马先生家吃饭。非先生是个搞工程技术的工程师，喜欢文学，翻译并写了很多诗，已经出过一个小小的诗集了。李欧梵的车先走了，Alex去停车场开车，我们在艺术馆门口等他。艺术馆的大门关上了，雨，又开始下了。蒙蒙秋雨中，芝加哥的大楼阴沉沉地立着，那真是很严峻的。汽车像河流，在艺术馆的台阶下面流过去，独独不见Alex的车，于是引起了种种猜测：会不会Alex的车也让警车拖走了？会不会出了车祸？会不会他又迷路找不回来了——正猜疑着，他的车到了。上了车，开始向非马家出发。可是，非马的家在哪里呢？他倒是画了一张图，图上画得有红有绿，十分好看，却不大顶事，怎么都找不到正确的路。一个小时以后，我们回到了李欧梵家门口，停了一会儿，重新研究了地图，又再次出发。穿过了很多很多街道，街灯亮了。芝加哥的马路

是那么宽阔，那么多而高的建筑各自矗立着，分开着，却又协调着。汽车穿出市区，上了公路。

“假如这回再不对，咱们就回爱荷华吧。”Alex说。

“怎么上了公路呢！这不是出城了？”我很疑惑。

“有钱的人都不住在城里呢。”谁回答我。

公路上的汽车很多，无声地流向前方。公路两边是黑色的田野，巨大的、绿色的路牌从头顶上越过去。

一个小时之后，终于到了非马家。

他的客厅很豪华，有一个精致的酒柜，柜里放着各种酒和饮料，柜外有两个高脚转椅。录音机正播放着一支中国北方的民间乐曲，那土里土气的装饰音很亲切，很暖和。

“这是和我们上午去逛的商店同一阶层的吧？年薪十万。”我问李欧梵。

“不，不，这是年薪五六万的阶层。”他说。

非马先生的太太又漂亮，又年轻，又能干，烧了一手好菜。每上一道菜，李欧梵和林孝信两位单身汉就要碰一次杯，表示同病相怜和努力找个好老婆的决心。

今天晚上去的夜总会，是在黑人区。这是芝加哥的城北，要是在城南——Alex说，黑人和白人不可能坐在一个酒吧里喝酒听音乐。

这是一支老年黑人的乐队，年纪都在六十岁以上，都是二三十年代在这城市里生活的老芝加哥。他们的歌唱得很庄重，很真挚。我很喜欢那几个黑人了，尤其是鼓手和那个弹吉他的歌手。鼓手有个单独表演，他迅疾地击着鼓，鼓点像暴风骤雨，一直响了二十分钟。那不变化的迅疾和力量，越来越具有严肃的意味了。他用他的全身心在击鼓，他有那么多的力量、爆发力和耐力。我想到了第一艘从非洲来的奴隶船，想到第一批来到美洲的黑人……没有人鼓掌，没有人叫好。

这不是技巧的表演，是心的表演。静穆。鼓声如暴雨疾风。那歌手开始歌唱了，他从容不迫地唱着，声音很浑厚，是那么的真心实意，有七分痛苦决不唱成十分，有三分欢乐决不唱成五分，有多少就唱多少。他微微地笑着，告诉你：没什么，这没什么，我经历的多了，……我想哭。接着又拉上来一个硕大无比的黑女人，她是来这里喝酒的，是这里的朋友，这里的所有人都像朋友一样；都住在附近，彼此都相熟。这里不像夜总会，而像一次朋友的亲切的聚会。她唱歌了，声音又粗又哑，形象也可怕。可她唱得那么真情，没有一点虚情假意，用全部真实的情意喊着，喊出她全部真实的情感。潘耀明直打瞌睡，不断地催我们："已经一点啦！"我们与他协商："再听一个曲子。"一个歌完了，我们还不动，他又说："已经一点一刻啦！""再听一个。"我们恳求他。最后，终于离开了这里。潘耀明一上车就睡着了，我和Alex兴奋不已，他告诉我："假如你交上了一个黑人朋友，他永远不会离开你，他永远会帮助你。""我相信，"我说，"为什么要叫黑人的音乐叫Blues呢？""蓝色是黑人的象征吧。以前，蓝调也叫Soul，就是灵魂歌曲。"哦，灵魂歌曲。"可是，为什么我昨天在那个夜总会里想吐呢？"我问。"你不习惯，第一次嗅那气味，你不习惯。"他说。"什么气味？""大麻的气味。"天哪！怎么还有大麻！"昨天那地方有人在抽大麻。我们到的时候那乐队正在外面抽大麻，否则他们不能有这许多精力。这是年轻一代的黑人。"哦！

风停了，雨住了，天空又晴朗起来，黑色的湖水缓缓地沉重地波动着，那边是加拿大。

10月24日 阴

今天要回爱荷华了。芝加哥也雨止风歇，不过天色仍是阴霾霾的。不知怎的，心里有些兴奋，有一种要回“家”的慰藉。

上午去看了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，主要是中文藏书部分。国内所有的杂志，在这里都看到了，真有点久别重逢的感觉。中午一时，才告别了李欧梵先生，由钟敬堂开车带我们返爱荷华。因为大家都还未吃中饭，所以车子就开到唐人街，在中国餐馆吃了炒面、炒米粉干、酸辣汤，又跟了潘耀明去给吕嘉行买感冒药和“五粮液”。

这里，也是不需要介绍的，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一条中国人的街。倒不是街中心点缀的飞檐牌楼，也不是满街走的福建、广东人。这里路面狭小、破败、脏。昨日下过雨，小弄堂里满地泥水。店铺里也很杂乱，仿佛都在盘货，或是即将倒闭的模样。货架上没有东西，满地上又都是东西。问老板有没有“五粮液”，他不知从什么角落里挖出一瓶茅台来，令人不得不怀疑是假的。结果两样东西都没买到，我们又回到那个废墟似的停车场，上车走了。

黑人区，唐人街，之所以成为一个区域，这里不知有过多少辛酸、挣扎。眼泪已没有了，只剩下一张张精明、厉害、势利的脸和眼睛。这又使我想起了那张笑容满面、礼貌周到、软软的网。

要打破这张网，不易。也许少数经过饥饿、发疯，从自我毁灭，从神经崩溃的边缘上咬牙奋斗过来的人，可能进入这个网里去。但也不过是进入而已。进入里面的人，自以为有了根，可以跟美国认同了。可惜，认同是双方的，你跟他认同，还有一个他跟不跟你认同的

问题。唐人街上的老板娘恐怕也很想“认同”，不过她们倒有点自知之明，知道一厢情愿的话不好说。

晚六时回到爱荷华，华苓即来电慰问，并约明天去她家后院照相。

真感觉是回到了“家”，煮了一点面吃，便洗澡睡觉，结束了这三天昏天黑地的芝加哥之行。

10月24日 阴

今天离开芝加哥。

Alex和艾恩约好，十二点钟碰头一起走。

还有一个上午，我们就去参观了芝加哥大学的校园和图书馆。芝加哥大学是哥特式的建筑，有种压力的感觉，走进走出的学生也显得成熟一些。与爱荷华是很不一样的。这是一所私立大学。校园里落满了金色的落叶。这金色似乎也比爱荷华的黯淡一些，而金的成色更重一些。有一个教堂，虽然没有人去。“看见它，总要想起些什么”——七等生这么说，他有很细致而又独到的感觉。

一直等艾恩的电话，可她的电话老是不来。等了一个小时，我们决定自己走了。先到唐人街吃午饭。

唐人街搭着花花绿绿的门楼，上面写着“天下为公”。店门的装饰，橱窗的摆设，都是花花绿绿，有点凌乱，有点俗气，街道很脏，铺面很挤。这是中国城，却是一个已过去好久的旧中国的城，我们不认识它。我们在“四五六”隔壁一家饭馆里吃炒面和酸辣汤。这里的饭馆很多，肩挨肩，脚碰脚。招呼我们的是一个广东女人，不会说普通话，矮矮的，像广东福建人，却又胖胖的，像美国人。炒面和酸辣汤倒是挺不错，只是那酸辣汤不大对，似乎没我烧的好吃。

一家店的橱窗里放着几排照片，是评选出的“中国小姐”，一个比一个丑。我们评论了一下，究竟谁比较像样，也没评出个结果。街对面，不知从哪个门里传出一把胡琴声，在拉一个中国调子，非常耳熟，却怎么也想不起这是个什么调子。天阴沉沉的，空气里有一些看

不见的水气在飘，衣服和头发都湿漉漉的，大红大绿的门楼在阴霾中更加显得俗不可耐。

上了车，车开了，开出了芝加哥，开上了公路。

终于离开芝加哥了，心里不免有点怅惘。回想这二三天里，充满了迷路、寻找和联络，充满了风和雨。我们总是坐在车上，而车在茫然地开着，或者是等待着，而要等的人总不来。哦，芝加哥！

“安忆唱一条歌吧。”七等生说。台湾人把一支歌总说成一条歌。“不，我要睡觉。”我说。我实在困坏了，这三个晚上，我总共睡了只有几个小时？我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忽然，车子猛烈地晃荡了一下，把我震醒了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车子往一边斜过去又猛地斜过来，过来得太急，整个儿地打横了，一直横到公路边的草坡上，总算停住了，一车子的人都说不出话来。Alex开车出了神，车子往斜里开去，七等生惊叫了一声，把他吓了一跳，于是就出现了刚才惊险的一幕。总算还好，没有出任何事情。为了压惊，也为了让Alex休息一下，我们把车开到一个休息站，下了车，坐了一会儿，吃了一点东西。然后继续前进。

七点钟的时分，到爱荷华了。远远看见“五月花”公寓的灯光，心中十分舒服，暖融融的，像是回到了家。我们在爱荷华毕竟已经住惯了，而人是多么乐意生活在习惯中——我发现自己也是，也是很想回爱荷华，很愿意在习惯的生活里。也许我永远也改不掉自己的习惯了，也许我注定要在自己习惯的生活中不甚愉快地生活下去。觉出这一点，心中不知是悲是喜。

10月25日 晴

让我好好看看你，爱荷华。

啊！叶儿黄了，嫩黄、鹅黄、苍黄，一片片的黄；叶儿红了，粉红、鲜红、紫红，一丛丛的红。爱荷华河里倒映着这一片片，一丛丛。人在这里，可以飘起来，飘得不知身在何处，也可以沉下去，沉到我窗前那张小书桌边，沉到陕西路71路车站，仍背着那个塑料大包，里面装着新到的杂志，书，信，沉到很远很远的过去。无论是飘还是沉，我仍然是我，攀攀的老外婆，但是还带了老花眼镜，在创作道路上摸索着自己新的风格。

伸开双手，拥抱整个世界，像吴霜那样。不过说到底，一个屁股只占着一个座位，在这，在那，不过坐坐而已。不是吗？只是时间长短不同，总不过坐坐而已。

在华苓家后面的山坡上、树林里、散步、拍照。华苓深知爱荷华的秋色是一瞬即逝的，所以她十分着急，怕我们赶不上了。

中午华苓请我和安忆（吴祖光已从芝加哥去他女儿处了）到“发电厂”餐馆吃饭。这个餐馆是买了一个发电厂改建的。老板别出心裁，餐厅上面还留着各种管道，配以和管道相称的装饰。窗外是水力发电用的水闸，很别致，也很漂亮，餐馆名字就叫做“发电厂”。美国人的思想，很不拘于一格，所以花样也多。

10月25日 晴

天很好，好得要命。

叶子全红了，红得像晚霞一样，而太阳却明媚地照耀着。

华苓请我和妈妈去玩，在他们家后边的树林子里散步、照相。“我真怕这叶子在你们回来之前就落了。”她说。

她开车带我们去一个河边的餐馆吃饭。这是一个从来没到过的河岸，河水很清，河岸很宁静。这餐馆就叫“爱荷华河水利公司”，它原来真的是一个水利发电公司，后来废了，就被一个老板买下来改做餐馆。而那些庞大的水管子却仍然留着，又装饰了一些于此协调的齿轮机械，形成一种特别的现代风格。窗户临着爱荷华河，风景宜人。阳光照耀着河，河水闪闪发光。一些金黄头发、穿着短裙的女学生走来走去招待客人，一个比一个漂亮，都那么可爱，看上去令人愉快。

下午，自个儿去Eagle买东西。阳光明媚极了，一座白色的小房子敞着门，一个女人在用剪草机剪房前的草坪。太阳洒在身上，暖洋洋的，今天很美好。买了很重的一包东西，背了回来。一路上只听到背包里鸡蛋清脆的磕碰声。无法顾及它们了。可是，回到“五月花”一看，鸡蛋们安然无恙。很幸运。

晚上，谭嘉、吕嘉行邀我们去市中心看电影。他们新买了一辆车，红色的，很漂亮。车开到电影院不远，正巧有辆车从电影院门口开走，空出一个位置，我们便乘空而入停了车。电影院里人很少，很安静。可他们说，这还算是个上座的电影呢！是一个系列性的侦探电影，今天看的是第九集，写一个〇〇七的侦探，智勇过人，所向无敌，上天入地，打得个落花流水，乱成这样子，还忙中偷闲，谈了段

朦朦胧胧的恋爱，最后，轰轰烈烈地收了场。这系列片，最早是在二十年前，有个作家写了一本小说，十分畅销，就是写这个〇〇七。改编成电影之后，轰动已极。然后就一集一集地续了下去。其中有那么两三集是相当相当的棒！后来，这位作家死了，可他的事业后继有人，〇〇七依然在战斗。

10月26日 晴

接到家信，同时接到梅朵来要稿的信，此公的手可谓长矣！

晚上在华苓家看闭路电视，播放纽约百老汇一百周年的歌剧演唱会。有四十位世界著名歌手的演唱。唱的都是古典歌剧中的片断。“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”，我只是看看热闹，华苓也坦率承认自己不能欣赏。于是聊起天来。原来她家就有《金池塘》的录像，早听说此片表演甚好，约定下次去看。

10月26日 晴

晚上，在聂华苓家看电视，电视转播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一百周年的庆祝会。世界各地最好的歌唱家来表演，真正是群星璀璨。

10月27日 晴

中午，华苓把“写作计划”的女作家召集一起，筹备在十一月八日开一个女作家的讲演会，要大家确定一下讲的题目。坐拢来人倒不少，有芬兰、巴勒斯坦、匈牙利、西德、南非、阿根廷、波兰那位剧作家的夫人、冰岛作家的夫人、我和安忆，加上华苓共十一人。我准备谈谈近几年中国女作家出现得特多的原因，当然只作些简略的介绍，不可能是专论。匈牙利和西德两位女作家，认为在他们那里不存在女作家的特别问题，所有的问题跟男作家一样，巴勒斯坦的撒哈不同意，认为他们那里，妇女还要姓丈夫的姓，不能说不存在问题了。正题谈完后，华苓征求大家对那天的会还有什么要求。这一下谈得可热闹了，要求那一天大家都要穿最漂亮的衣服，每人还要戴一朵花，而且还要请一些漂亮的男性来听。在“写作计划”的作家群里，有人指明要陈映真去听，因为他最漂亮。没想到一次妇女集会，竟然选出了一个美男子。一谈到衣服，就又想到那天会不会很冷，能不能穿夏天的薄衣服，气氛十分的活跃起来。华苓用中文对我说：“女人到底是女人。”

下午是听北欧作家的讲演，有芬兰、冰岛、爱尔兰、土耳其几位作家。

冰岛的剧作家，在会上放映了他剧本演出录像的片断。其中爱尔兰那一位好像经常感冒鼻塞的作家，作了一个具有十分现代风格的发言。

他面前有好几张很零乱的纸，他说他发言准备了四个开头。照一张纸念几句，说这是老一套，那个又不合适。说几句代沟问题，又说

世上的代沟无法解决。拿起另一张纸，换一个题目念几句，什么作家的苦恼、英帝国的压力。又换一张纸，说几句国内也有禁书，还有军法问题。总之，他念几句这张纸上的，又说几句那张纸上的话，内容是完全不相干的，好像是他对发言毫无准备的样子。说到最后，他讲演的题目是：“爱尔兰，美国，I.W.P拒绝。”虚无主义者对任何事物都排斥，拒绝一切已成型的文学、术语、传统。

他的发言，很合美国学生的口味。会后，看见有好几个学生围着他，向他热烈地表示着什么。

10月27日 晴

上午，一个人到河边去散步，走一条从没走过的路。树叶的黄色似已有些憔悴，阳光依然明媚。

下午两点钟在“写作计划”办公室开全体女作家会议。这是个预备会，是为十一月八日召开的女作家报告会作准备的。首先讨论各人报告的题目，决定把报告会的题目定为“美和革命”，接下来，就讨论要翻译。西德女人说：“爱德文可以为我翻译。”“可是他是男的呀！”大家置疑。“我们一个男的也不要。”“那么听众呢？”有人问。“听众要漂亮的男人，我们要挑选一下。”“台湾的陈映真。”Jamaica的黑人女作家首先说，“保加利亚诗人也漂亮，可不过是漂亮罢了，陈映真是一种内在的美。”“那一天，我们穿什么衣服呢？”“要穿最最漂亮的衣服。”“可以穿夏天的衣服吗？”“撒哈，你穿什么？”撒哈回答说：“我什么也不穿！”“我们还要花。”西德女作家提出，“要玫瑰。”“还要酒，可乐，吃的东西……”讨论得很热闹。海尔走进来，找什么东西，见那声势，又退了出来，很害怕的样子。卡罗想进来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走开了，这里的人都不好惹。漂亮的英语老师来了，一见我就问：“你怎么没来上课？”呀，我把这全忘了。从芝加哥回来之后，好像一切都有种临近尾声的感觉，心有些散了。她告诉我，今天只有一个人去上课，是七等生。她还告诉我，今天是她的生日。我心里想着，下次上课时要送她一件礼物。

开完预备会，又去艺术馆开西欧作家报告会。台上坐着所有的西欧作家：芬兰的、爱尔兰的、西班牙的、冰岛的，还有土耳其——不晓得土耳其怎么算到了西欧，他应该是中东吧。难道就因为他和芬兰的是朋友？不明白。

这报告会可说是最不成功的一次，艺术馆的礼堂太大，更显得听众零落。会议又拖得太长，我肚子都饿了。有些无聊。Esther递给我一张字条：“你剪头发吗？一起去好吗？”我回她一张：“多少钱？”“光剪，五元左右。”她写。“不去。”我写。

爱尔兰诗人在台上吃起苹果来了，一口一口咬着。我叹了一口气，Esther说：“他为什么在这时候吃呢？”他开始发言，他好像总是在伤风，瓮声瓮气的。他吃着苹果，漫不经心，时断时续，开开玩笑，好像很幽默，然而台下的人都饿着肚子坐着。



在爱荷华John Deere公司的雕塑前合影，右起台湾作家七等生、韩国作家许世旭、台湾作家陈映真、大陆作家吴祖光、茹志鹃、王安忆，左二是聂华苓



“写作计划”专门为女作家举办报告会时的合影

晚上，潘耀明请我去市中心喝啤酒，一路上看到许多化了装的学生，去哪儿开化装舞会呢？“可是，今天不是周末呀，是星期四。”我说。“也许是为万圣节开舞会吧，万圣节快到了。”他说。走过河边那幢叫“PHI”的大房子，里面传出震耳的爵士，又在开舞会。这是个学生宿舍，门前停满了汽车。每个窗口里都传出热腾腾的气氛，爱荷华真年轻。

10月28日 晴

又是周末了，蓝蓝带我们去看了一个外地来的现代芭蕾舞团的表演。第一次看现代舞，好像这种舞随意性较大，也似乎无须像芭蕾舞那么严格的训练。芭蕾是脚尖朝下，而它是充分利用演员的肢体，手脚朝上，在空间形成一种形态，表达一种情绪。其中有个太阳舞，从灯光、动作、音乐（音乐里还配有黑人音乐里用的鼓），十分富有东方色彩，感情热烈奔放，令人目不暇给。演出结束后，蓝蓝请大家去吃意大利煎饼。她对此舞团评价甚高。

10月28日 晴

下午一点半，小叶夫妇抱着小毛头接我们去东西店买东西。这小毛头的身体结实极了，脸色非常红润，比哥哥阿伟棒。也许因为父母亲的体质都增强了。母亲从一开始怀孕起，便可免费得到每月三十多美金的营养品。东西店里的好多东西都涨价了，爱荷华城独此一家东方店，生意当然是好的，小叶也有心开个店，他自信能打垮东西店，他已看出东西店经营上有很多毛病。

买完东西，他仍将我送到市中心，我自己下车去Old Capital。昨天和Esther约好，今天我们搭伴去“鬼的书房”买书，说好在饼干店前碰头。“鬼的书房”是一家旧书店，据说里面有旧的总谱，很便宜，想给李章买一些。

Old Capital对面的数学楼——就是我常去听录音的地方，门口马路上、草坪上站满了人，一辆救火车停在那里，璀璨地旋转着五彩灯光。人们欢欢喜喜地挤在一起站着，又着火了。我发现，他们是越着火越开心，怕就怕一无灾祸，风平浪静。

在约定的地点——饼干店前的长椅上，没有看到Esther，就到服装店里转了一下，那件人造毛里的滑雪式外套仍然是四十九元，已剩不多几件了。从服装店出来，便看到Esther了，她是去看救火了。我们又站在马路上看了一会儿救火。其实并看不到救火，只是看看救火车和人们欢乐的情景。然后便去冰淇淋店买了一个冰淇淋，向那“鬼的书房”出发了。

“昨天，我和我男朋友通电话了。”她告诉我。“他很想你吧？”“他说，我们家问他，我到底在美国搞什么鬼！”“怎么，你上学的情况，

你家里不知道？”她笑笑不说话，只顾吃冰淇淋。

这里不是城里了，路两边是一座座精致的小房子。我们走在落叶上，落叶停在草坪上。

这是一座美丽的小房子，门口的草坪上扔着几架儿童的玩具小车。进了屋，屋子里满架的书，有几个人坐在椅子上和地毯上看书，沙发上睡着一个一头白色鬈发的小孩子，像一只雪白的小绵羊。一个瘦高个淡黄头发的男人微笑着向我们迎来，也许是这家书屋的主人吧。“要咖啡还是茶？”他问我们。“茶吧。”我们说。他便端来了两杯热茶，我们向他说明我们要看乐谱，他便让我们下楼，到地下室去找。

下面全是一架一架的书，书架中间，坐着一个年轻女人，她穿着一身拖曳在地的黑袍子，一头很长很长的金发束在脑后，脸色苍白，安详地低头看书。我轻声对Esther说：“我好像觉得现在不是二十世纪了。”“嗯。”Esther点点头。“这里真是有些像鬼屋，有种阴森森的气氛。”我又说。“可是我在美国从来不怕鬼。从来不担心会出现鬼。”她说。“为什么？”我不明白，可是奇怪得很，我好像隐约地也有这种感觉。“美国是没有鬼的。”她很肯定地说。“是不是因为这是个阳气很足的国家？”我认真地和她讨论。“不知道。”说不清楚，反正，我们都认为美国不是一个神秘的国家。

“我在美国，不怕鬼，只怕人，尤其是黑人。”

“可是，我在芝加哥听Blues，我好喜欢那些黑人，还有黑人们唱的歌。”我兴奋地告诉她，“我到美国来，从来没受到过什么感动。我常常被震惊，常常是大吃一惊，兴奋不已，可是没有被感动过。只有在那个晚上，在黑人区的夜总会里，在Blues的音乐里，我简直要哭了。”“真的吗？”她细细地回想起来，然后说，“我好像也没受过什么感动。”我向她描绘了我们在芝加哥时去的夜总会：“那里有人吸大麻呢！”她说：“曾经有人劝我吸大麻，我问他们，吸了之后会怎么样？他们说：‘你就会一直笑。’我考虑了五分钟，最后决定不吸了。”

晚上，蓝蓝带我们去看芭蕾：我，妈妈，七等生，潘耀明，安霞，李小培——李小培是香港《七十年代》主编李怡的女儿，来这里上学，住在美尼塔家里，为她照看两个小男孩，膳宿费就全免了。这个团体是North Caroline的一个舞团，名列美国第五。一共表演四个节目，除了第一个是古典芭蕾以外，其余都是现代舞和现代化了的芭蕾。Hancher没有坐满，几乎空了一半。蓝蓝告诉我：在美国，舞蹈面临着一个危机：观众越来越少，它好像是太奢侈了。

“你昨天怎么没来上英语课呢？”七等生问我。“我忘了。”“我下楼来，看见那老师一个人坐着，就去上课了。”“可你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来上课了。”

“他主要是看见只有女老师一个人。”潘耀明说。

他笑笑，并不反驳，他喜欢和女性在一起，他说：“两个男的在一起太硬了，一男一女，柔和一些，比较舒服。”

演出结束后，蓝蓝请我们吃Pizza。这是爱荷华城里最好的Pizza店，很大。有电子游戏，有电视，电视上，那个全美著名的记者又在讲话，风度翩翩的。安霞向妈妈要了一元钱，去玩电子游戏了。潘耀明去洗手间回来，对蓝蓝说：“安霞交上了一个男朋友。”“不会吧，她是很害羞的。”“真的，他们聊得很高兴呢！”“我去看看。”蓝蓝立即站起身去了，过了一会儿才回来，说：“不是的，安霞的那架机器坏了，那男孩子帮她找人修理呢。”蓝蓝好像这才放下心来。

这餐馆我从来没来过。很奇怪，小小的爱荷华城有这么多的餐馆，而且都藏匿了起来，常常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一个餐馆。

快到万圣节了，电视里出现了大量的各色的鬼，飘然起舞。

10月29日 晴

后天是美国的鬼节，电视里已出现了许多鬼面具。

下午在华苓家里看《金池塘》，她不善摆弄机件，录像带放进去却不显像。她立即给卖电视机的店里打电话，对方十分耐心地在电话里告诉她，应该如何拨弄。按照执行后，仍然不显图像，又打电话给商店，店里答应立即来看。果然不到五分钟，一辆小汽车开上山来了。可是在这同时，电视机突然图像大明。那店员不但没有牢骚，而且仍然耐心地操作一遍。一边操作，一边教。商业的信誉，服务的到家，到这种地步，也只有佩服了。

《金池塘》的摄影极好，主旨也很清楚，接着又看了英国著名小说改编的电影。语言不通，只能看个大概。两个片子好像都涉及了一个问题：死。探索着人从有到无的奥秘，而研究人应该如何活着的，好像不多。

死，是每个人必然的归宿。可是在它还未来到之前，人就惶惶然，在它威胁下过日子，这就乏味得很了。

10月29日 多云

早上，和潘耀明出去照相。天很好。河边的大树下落满了金黄的秋叶，潘耀明要为我照一张爱荷华的秋色。两个跑步者跑过来，对我喊：“笑一笑！”

下午，在华苓家看电视录相，一个是《金池塘》，一个是英国本世纪初的著名作家劳伦斯的小说改编的电影《热恋中的女人》（Women in Love），这是个很能代表劳伦斯哲学的电影，他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，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有根据的，都来自人的本性，凡真正来自人的本性的行为都应该尊重并保护，都是美的。他憎恶现代的工业文明，认为那无疑是要异化人性。他把人描写成了自然之子，然而人实在又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，于是，便有了一连串的悲剧。

万圣节不远了，到处开化装舞会。看完电视回“五月花”，见门口公路上停了好多辆汽车，“五月花”也在开舞会。一个警察在汽车之间巡回，记下车号，并插上一张罚款单，因为这里是不能够停车的。“其实今天可以算了。”我们都这么说。

晚上，在走廊里，“写作计划”的工作人员为我们开舞会，每人做一个菜，安娜的火鸡，Alex的炒饭，等等。走廊的地上放了一堆化装用的衣服，作家们都蹲在地上挑选着。安娜打扮成一个跳芭蕾舞的女郎，穿着短裙，Alex打扮成牛仔。土耳其人戴上一个大红鼻子，爱尔兰人装了一头垂肩的金发，墨西哥人来晚了，化装衣服只剩了几件扔在地上，他拿起一个女人的胸罩，在胸前比了比，摇摇头放下去，然

后拾了一件黑披风披在身上，又拾了一把佩剑——“佐罗！”——大家叫。

吴祖光伯伯从芝加哥回来了，他是从芝加哥去印第安那看女儿，又从芝加哥回爱荷华的。他说，芝加哥的天晴了，出了大太阳，一街都是“鬼”。啊，太阳下的鬼！不知道有太阳的芝加哥是什么样子的。那一切灰色的水泥色的大楼被明媚的阳光照亮了又是什么样的。芝加哥也有这么明媚的阳光吗？

芝加哥，好像肩负着很重的负荷，在它宽大有力的肩膀下，爱荷华像花一样娇美地盛开着。

10月30日 阴，有时有雨

跟吴祖光去华苓家，研究离开爱荷华的日程。I.W.P是下月十四日开告别宴会，本打算十八日离开，讨论中都想去一次夏威夷，便延至二十日离开爱荷华，一月二日回国。

下午又去她家看录像《不同的桌子》。这好像是从话剧改编为电影的两个短片。同一个场景——一个旅社里的餐厅，两个不同的故事，有的人物贯串，有的又不同。两个短片都是写极度自我矛盾的两个人物。演员很好，整个戏都是各自坐在自己的餐桌前用餐、看报、互相招呼、谈天气、谈时事，但人与人间是疏远的。前一个故事说一对离了婚的夫妇，在这里邂逅了，两个人还是有感情的，经过了妒忌、矛盾，两个人终于坐到一张桌前来了。后一个故事，是写一个被母亲管教得极严的老处女，爱上了同住一个旅馆的男子。但这男子犯了猥亵罪，登了在本地报上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同旅馆的人看了，纷纷议论，有的坚决要驱逐他，有的则不同意。那个男的也爱老处女，但迫于体面，不得不作出离开的决定。最后老处女在一种又厌恶又爱惜的矛盾心情下，第一次违抗母亲的命令（母亲见到男的进来就餐，就要女儿退出餐厅），对母亲说了“不”字。而那男的也在卑视与同情都有的眼光下，终于勇敢地订了第二天的早餐，留下不走了。演员好，场景少，结构也好，内容也没有什么不健康之处。

晚饭后，I.W.P全体作家，和安格尔、华苓夫妇俩去附近一个小城——塞德莱比茨。安格尔就在那里出生的。我们去的地方，是这小城里一所有百年历史的大宅。据说是这个州里最大一所宅园。百年来，它已换过三个主人，后来就卖给政府，平时进来参观，门票是二元一张。

这所住宅的园子相当大，汽车开进一个大铁栅门，又弯弯曲曲在草坪、树木之间开了很长一段路，才到达宅子的大门。这里的艺术品不多，主要是参观卧室、浴室、客厅、书房、餐厅、坪台等等地方。房子、家具，都相当豪华，从当年说来，可能就更是数一数二的了。今天到的来宾不少。这房子最后一届主人的小女儿也来了。安格尔和她是小学同学，他回忆说："小时候看见她穿一件塑料透明雨衣，觉得漂亮异常。"大家在餐厅里喝点酒，尝一点小甜食，便在大厅的楼梯上表演，作家们用各国不同的语言唱歌、朗诵。虽然唱得不怎么样，可是另有风味。

回来的时候，汽车绕到安格尔出生的那幢房子前走了一圈，又恰恰是安格尔刚过生日，大家纷纷向他祝贺。

回来已近十二点，潘耀明就上次多下的汤，下面请大家吃宵夜。正吃着，敲门进来了几个美国男学生，扛了一筐夹着生菜的面包来兜售，看见我们已在吃面条，四五个男孩子又摊手又耸肩，又是说又是笑，嘻嘻哈哈，十分可爱。他们想到做这一个买卖，也够细致的了。最后是吴祖光花了两元，买了他们三个面包。

10月30日 阴有雨

上午直睡到九点多钟才起来，潘耀明笑话我，我说：九点多钟并不晚，是正常的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忽然打电话来，说：“你还可以再补睡一小时，你今天起早了。”“为什么？”我奇怪。“今天进入冬令季节，全美国的时间都要拨回一小时。”于是，现在的十点二十分便成了九点二十分了。美国人真是奇怪，把个时间弄得乱七八糟。而我们，冬季推迟一小时上班，夏季则提前一小时。时间是永远不变的，是一种宇宙的固定的秩序。而美国人，什么秩序也不要。

下午，又在华苓家看电视录相，是个较老的电影，名字是《不同的桌子》（Separate Table），是两个发生在同一个旅店里的没有关系的故事，很像是一个舞台剧，可能就是从话剧改过来的。第一个故事讲一对离婚的夫妇在这家旅店里相遇了，后来又重归于好，达到了谅解。他们坐在一张桌子上，互相握着手，门开了，两人立即缩回了手——“好久没看到这样的反应了。”Esther说。第二个故事很好，一个老处女与一个犯猥亵少女罪的男人相爱了（这一对演员仍是上一对演员，绝然不同，表演很好），他们实际上是很像的，都是怕人，怕异性，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，前者是躲避，后者则是想证明自己不怕。

看完电视，Esther跟我回来吃饭，陈映真也来吃，饭就有点不够。潘耀明就多煮了一些面条来接济我们。刚煮好，吴祖光伯伯带着Alex来了，他们是在机场接吴祖光伯伯的一个学生。是个女学生，特地从堪萨斯赶来看他的。吃饭的人又多了两个，可Alex说：“少吃一点，晚上去Ceder Rapids有很多东西吃，大家都留点肚子。”

Ceder Rapids——就是我们从旧金山飞来时停了几十分钟而我们没下飞机的那地方。萧乾伯伯的儿子萧桐在这里的大学读书，安格尔先生在这里出生。

我们去一所一百年历史的房子里参观，这是一个没有后代的富人捐给政府的房子，现在就供人游览参观，算成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。这是一座大房子，当年一定是奢华极了的。现在给我留下印象的只是：洗澡间特别的大，可以开舞会。看过房子后大家便乱哄哄地坐在一堆喝酒吃东西——并没有多少东西可吃，只有甜酒和一点巧克力糖，一点切成小块的水果。令我们失望，肚子有点饿。我们一些中国人便上楼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，正是一个长圆的桌子。许先生也来了，他们一家刚从华盛顿飞回来，下了飞机就直接叫出租汽车来了。大家问他："在白宫同里根谈得怎么样啊？""还好，我们在一起吃了饭。"他微微笑着。"黎巴嫩的撤军问题，你问了他吗？""他说是保卫黎巴嫩呢！""叫他撤军吧！"他有苦难言地摇摇头，看来谈话并不成功。正说笑着，楼下传来了华苓的声音，要开始表演节目了。今天的表演都是有准备的。

他们还要我唱歌，而且，一定要《送情郎》。我不唱，Esther说："我和你一起唱吧。"可是唱什么呢？我们想着。"你会唱《绣荷包》吗？"她问。"会啊！"然后便唱，结果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《绣荷包》。没办法，只好找爱德文说情，让他把我的节目免了。"什么时候，你教我唱《送情郎》啊？"她说。"好的。"撒哈从大学里请来一个巴勒斯坦的学生，为她弹吉他。她唱得很有感情，沙哑的嗓音有几分含蓄。陈映真弹着吉他唱了一个台湾小调。许先生一家表演了朝鲜歌。安格尔先生讲述了他小时候在这城市里的生活，他有一个女同学，有一件透明的衣服，当她穿上这套衣服时，他觉得她性感极了。最后压轴的表演是全体中国人的大合唱，就唱《城南旧事》里的那支"毕业歌"，这是一支难得的大陆、台湾、香港，老少男女都知道的歌。表演前，安格尔先生和华苓作了大量的演讲，我们则直直地站在前面，好像马上就要有一个惊人的节目开始。可是很快草草收尾了，

只有吴祖光伯伯一个人的声音，其他人只能哼，因为记不住词。结束后，一个老太太跑到我们面前，夸我们唱得好，说了一套赞美的话。我们面面相觑，然后陈映真说：“为什么还要来讽刺我们？”

然后，汽车又拉着我们在城里绕了一圈，从安格尔先生出生的那房子前开过。天下着雨，黑沉沉的，只看见灯光在闪烁。

10月31日 阴

燉了一锅鸡蛋红烧脚圈，准备犒劳一下潘耀明。我们这里人来人往，都是他默默地上灶做菜。难得说几句闽南国语，又立即遭到伶牙俐齿者的无情挖苦，于是他呐呐地更加说不周全了，实在厚道得可爱。他极能吃苦，又极肯用功。每天一大早，就拖了一只像旅行袋似的大书包，带两片面包去学校，一直到晚上才回来。一回来就放下书包急急做菜，而且做得一手好菜。吴祖光和他住一套房子，常说自己福气好。

他又是一位头脑十分冷静的作家。在芝加哥大学、中国同学会上有人向他提问，关于对武侠小说作何评价的问题。他只是客观地介绍了香港对这问题的争论。再问他自己对这争论的看法，他十分技巧地把争论双方的论点，扼要介绍了一下。很冷静也很有分寸。他写的《中国作家风貌》，亦很有水平，而且对那么多作家的作品，都有那么多的了解，真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。不过更可贵的，是他虽然长在香港那样一个商品化的社会里，却仍然保持着一种“精神”，一颗“赤子之心”，实属难得。

我是早想慰劳慰劳他了，想让他回来吃一顿现成饭，所以早早就煮好了菜。没想到下午忽然闯来了一个胖墩墩的伶俐鬼，大概是肚子里形势吃紧，逼得他不得不来找锅子，想煮点吃的了。他一掀锅盖，见一锅燉烂了的脚圈，立即大大地“哇呀”了一声，也顾不得拿碗了，抓起筷子就挟起一张蹄髈皮往嘴里送，一边唏嘘着：“好吃！好吃！”及至吃完一只脚圈，一只鸡蛋，才透过一口气来，腾出工夫说话。

傍晚，吴祖光有一位远道的学生来看他，潘耀明六点多回来，看看大家凑起来的菜不够，放下书包又动手做菜。他这顿现成饭到底没有吃成。遗憾！

今天是鬼节，机灵鬼赶了巧，可怜鬼吃了亏，一点不错，各显了本色。

10月31日 阴有雨

一早送来通知，英语班停课了，因为有些作家已经开始旅行了。呀，不上课了，那么，还有没有机会遇到那女老师呢？我本想送她一件生日礼物的，而且要对她说一声：“你不老。”因为她告诉我她过生日时说了一句：“我很老了。”我没反应过来，等反应过来她已经走了。

今天是正式的万圣节，鬼节。下午五点钟时分，谭嘉打电话来，问我有没有兴趣帮她去发糖。鬼节是这样的——天黑了的时候，孩子们便穿上鬼的衣服，化好装，戴上面具，然后到各家去要糖，嘴里喊着“trick or treat”，即“你是要我整你还是请我客”，假如没有糖给他们，他们便捣蛋，在门上涂油漆。当然，每家都准备了很多的糖。据说去年的万圣节，有些无聊的人恶作剧，把送给孩子的糖里包了针，结果大人们都不让孩子出去讨糖，很紧张，很是扫了孩子们的兴。这万圣节，他们很早就在盼望并作准备——装什么鬼，买什么样的面具。

“你要来的话，就和我一起站在门口，有人敲门，你就开门给他们糖。你会看到各色各样的鬼。大概一小时内可以看到几十个鬼。”

“这么高的频率呀！”我叫了起来。可是很可惜，我不能去，因为晚上我们打算在一起聚餐。我们烧了红烧猪蹄，陈映真烧牛肉，吴祖光伯伯烧饭，他带着他远道来的学生一起参加。七点钟过后，他俩去Hancher看戏，是一个轻歌剧，一个名剧，本来我也要去看的，可是Alex说票要自己买，十九美金一张票。这太贵了，我毅然决定不看了，虽然有些可惜，可现在不是奢侈的时候，还有长长的一段旅途，

这旅途上需要多少钱，心中没有一点数。我只知道，钱是越多越好。这个世界，钱是钥匙。好比“五月花”的洗衣机，你把两个二十五分的硬币推进去，它便发动。不需要任何别的推动，没有别的开关只有这么一个装置——推进两个硬币，必须是二十五分的。这是一个金属的世界。

阿根廷女作家挨着个儿敲门，请大家去她房里喝酒，她们国家的在野党获胜当选，她很高兴。

饭后，潘耀明请我和他一起去散步。他说，印尼小伙子告诉他，在公园那边，一直走，有个咖啡馆。那里怎么会有咖啡馆呢？我印象中，那里只有住房，树，草坪，草坪上的落叶。我半信半疑地跟他走了。走上公园旁的桥，忽然看见桥下边的树丛里走着一个长长的、细细的人影。定睛一看，像是七等生，试着喊一声：“七等生！”那人站住了，果然是他。他一个人在散步呢。

秋天的落叶铺了一地，厚厚的，一脚踩不着地。“有一次，我和我丈夫想拍一张落叶的照片，可是那落叶很薄，我们就将它扫在一起，扫了很久，扫到了一起，可那落叶已经粉碎了。”我告诉他。“这里的土地很肥呢！”“可是我认为这里的地理位置和我插队那地方是一样的，水土气候也一样，我不服这种水土，身上起了好多疙瘩，和我插队时一样。”“中国的地种了四千年，这里，有两百年吧！”他说。

“咖啡馆呢？”我问。

“是呀，怎么回事，没有嘛！”

“我可是渴了。”

“去向人家要点水喝吧。”

“美国人不喜欢人家走近他们家呢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他自顾自走上人家门前的草坪。屋里亮着灯，敲敲门，又敲敲窗，没有反应。屋里没有人。从窗里望进去，里面是一个

漂亮的客厅，铺着厚厚的红色的地毯。摆设很奢华。“这家人家很有钱。”潘耀明说。门上贴了一张鬼图。“他们大约是去参加舞会了。”我们猜测，今天是万圣节啊。

只能往回走，天下雨了，还打雷，雨越来越大，像是春天的雷雨。赶紧跑到人家的屋檐下躲雨。“人家会生气吗？”我担心。“不会，说不定还请我们进去坐坐呢。”可是这家人家里也没有人，开着灯，客厅同样的漂亮，还有一个廊，放着几把扶手椅，一把孩子坐的马头的圈椅。“这家有一个孩子。”我们判断。“唉，”我叹了一口气，“我同学结婚，只有九个平方。”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香港的住房也很挤。美国是得天独厚的。从来没在本土打过仗！”“为什么呢？世界就这么不公平！”“没什么，没什么，还有更糟的呢！”

雨停了。可刚踏进“五月花”，又下了，下得比刚才更大更急，而且一直不停了。

十二点时，“五月花”里忽然回荡着一种十分奇怪的声音，我到处张望，寻找，也找不出个究竟。这是鬼叫，可是他们是在哪里叫呢?一时上，鬼声四起。美国的鬼很喧腾，气壮如牛。

11月1日 阴，时有小雨

华苓请中国朋友吃火锅。饭后，大家围坐一起，听台湾民歌《大路歌》，回顾往事。原来华苓和我同龄，比我略大几个月。她九岁丧父，与母相依为命，而我九岁时正在杭州，姑母要将我送入尼姑庵。四九年我们打过长江时，她从南京逃出。她撤出南京后，正是我随军区进驻南京。我在南京结婚，她已逃到台湾。她的弟弟在台湾空军试航遇难时，正好安忆出生。她在台湾带了两个女儿，独力担负家庭重担时，也正是我一个人带了两个女儿，在上海支撑一个家庭。这一对照，竟然也是一幅中国近代画卷。现在我们竟从不同的路上，来到了一起，坐到了一起，谈到了一起。

半个世纪来，风云变幻。我从孤儿院里，以一个作家的身份，走到了美国，就是最大胆的梦，也不敢这样做的。

十二点多才告辞出来。下山的路上，落叶满坡，冷风侵骨。公路上汽车稀疏了，“五月花”公寓楼下，仍然灯光通明。这里似乎没有夜晚，或者说，夜晚已退缩到清晨三四点，浓缩成小小一点。

11月1日 阴

华苓请大家吃火锅。

安格尔先生今天感觉又不太好。这次手术很大，有点伤元气了。他的伤口很疼，吃不下东西。幸而安霞在这里，使他很高兴。安霞哄他吃了一点点东西，又哄他睡着了。他们祖孙感情很好，安格尔先生动手术那天，安霞在学校里上课，忽然哭了起来。老师问她为什么，她说我很担心。她虽然长得完全是个外国小女孩，可是情感却是中国式的。华苓为安格尔先生带来了一个极安乐的晚年，一个中国式的充满亲情的晚年。安霞的自我感觉是半个中国人，她原来有些自卑，而近几年中国的儿童画得了国际奖，中国的女排得了冠军，今年她又去了中国，她很喜欢中国。前几日，在Ceder Rapids举行的体操比赛，中国得了三十几枚金牌，这些都渐渐使她骄傲起来。问她最希望谁胜，她说："第一是中国，第二是英国"——她的爸爸是英国人，"第三是美国。"

她不会说中国话，可是能听懂几个字，比如"漂亮"和"肚子"。当我们说她漂亮的时候，她害羞了。当吴祖光伯伯说，"你的肚子要练下去一点"——因为她的肚子有点大，很可爱地挺着，她也害羞了。

11月2日 阴，偶有小雨

约定今晚请吴祖光的朋友也是他的学生，还有华苓，一起来吃晚饭。安忆忙了一下午，潘耀明回来又立即上灶，总算弄了五个菜一个汤。可惜华苓感冒了没能来，少了她总觉不大热闹。

吃饭时，说起法国餐厅。吴祖光说北京也有一家法国餐厅，是我们与外资合开的。因为他为餐厅张罗过乐队，所以餐厅请了他和凤霞。他来美国了，就由他大儿子陪了妈妈去。凤霞是坐轮椅的，可是进入餐厅的一段路要由人背着。一到了门口，儿子的衣服不合规格，他身上还穿着他爸爸从法国买给他的夹克衫，但不行，进餐厅必须穿西装打领带。临时就由餐厅里的工作人员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套西装，并帮他打上领带。可是这套西装实在太大，他儿子穿上以后，里面还可以装进一个人去。但没办法，他儿子只好穿了这么一套西装，背了妈妈进去。这一进去，顿时引起了整个餐厅客人的注意。穿这么一套西装，已经够逗的了，加之又背了一个人，他儿子是大汗淋漓，坐在那里不敢稍动。百元一餐的大餐，就这样受着，实在罪过。

晚上，和安忆陪了吴祖光，送他的学生回旅馆。吴祖光和他的学生已几十年未见面，现在居然不远千里寻来，实在难得。不过我想这也要有经济作后盾，否则，也只有望洋兴叹。哪怕你叹出血来，人家还以为你生了痨病。所以基度山伯爵在痛痛快快实现他那报恩复仇计划时，非得要有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不可。这部小说倒是写出了一个“有钱能使鬼推磨”的社会。

11月2日 多云

中午，圣路易斯的文伟来电话了，他接到了我们决定去讲学的信，想知道我们更详细的情况。于是我将我们的行程计划告诉了他，他很满意我们将圣路易斯安排在从东岸到西岸的必经之途中，这样可以省去旅费——今年美国大学的教育经费减缩得很厉害，能省则省了。美国很奇怪，家庭很富裕，个人很富裕，可是“官费”却很紧。一个出版社或杂志社请几位作家开笔会，报销车费，宿费，游山玩水，在这里是想也别想的。他又问我们一般讲学采取什么形式，我告诉他，一种“爱荷华式”的，一种“芝加哥式”的。他说恐怕要采取“芝加哥式”的了，因为他们学校来参加会的可能也都是中国人和懂中文的美国人。然后，他又和我聊了起来，“你是第几届的？”我问。“我要比你高呢，六六届的。”他得意地说，“你可以说上海话。”于是我们便说上海话。“来美国两年了，看到国内来的人，总归很高兴，想碰碰头。”他说。

晚上，我们和吴祖光伯伯去散步，沿着爱荷华河。今天天很暖，有一两个大学生坐在河边长椅上，很多人跑步，迎面跑来，说一声“Hi”，跑了过去。他们从不停下脚步，不晓得要跑到什么程度才停止，也许一直要跑到实在跑不动为止。这好像是美国人生的象征。有人告诉我：在美国，你有一个梦想，再付之努力，总能达到。可是，非常累。前边始终有个希望在吸引你往前跑，一直到你跑不动为止。

11月3日 多云

晚上，吴祖光伯伯请我们吃饭，在羊城小馆，有我，妈妈，潘耀明，谭嘉，吕嘉行，Alex，Esther，连他的学生，一共九位。是聂华苓帮助定的菜。华苓和羊城小馆的老板是好朋友。他们互相很照应。

吃饭时，潘耀明请求谭嘉为他写个作业——明天他们课上有个内容，要每个人介绍一个本国菜的做法，要讲得使每个人都懂。他很为难，便来求谭嘉帮他写个大概提纲——如何烧糖醋鱼。谭嘉说："你何苦写这么复杂的菜呢？就写'怎么做炒饭'好了。"正在他们俩策划着怎么列菜谱时，吴祖光伯伯用他的玩具照相机给他们照了一张相，说要给潘耀明的老师寄去，这是作弊的见证。

Alex来得晚了，因为他要送一些作家去华苓家开party，是下午在戏剧、诗歌讨论会上发言的作家。据说，下午的讨论会上，印度作家表现得不好，喝了一点酒，有点醉，很失态，在会场大讲下流话，被爱德文拉了出去。而土耳其作家表现很好，乖乖的。Alex说今年作家的特点是——斗智。往年则是大打出手。每年都会发生一些故事。有一年，有位中东国家的女作家还被抓到监狱里去了。因为偷东西——偷一件毫不值钱的小东西，身上却穿得十分华贵。原因是：她正在写一个小说，写到一个贼，为了揣摩和体验这种心情，她便实验了一下，结果进了监狱，监狱打电话给"写作计划"，才把她保出来。另一年，有个作家是个疯子，疯得很厉害，最后爱德文把他送到芝加哥，让他回国了。……安格尔先生说："假如我有权利，我每年全部都请中国人，因为中国人最讲礼貌了。"

吃完饭后，吴祖光伯伯忽然宣布：“今天的客请不成了。”大家很吃惊，桌上杯盘狼藉，吃得很干净。他继续说：“因为华苓已经付过账了。”真是岂有此理。吕嘉行大声说：“要不要来杯饭后酒？反正聂老师出钱！”

从羊城小馆回到“五月花”，口很渴，便和潘耀明下楼去学习室里的自动售货机买可乐，这里的可乐比超级市场里的贵一毛钱，他买了一个苹果，然后就找了张桌子坐下聊天。他说：“以前看於梨华写留学生的作品，总觉得不真实，哪有这么苦啊！现在知道，这都是真的。”“你就算很好了。港币能换美金。大陆那些自费生才真苦呢！”“那寂寞是一样的。这儿的学生，每人都有房间，可仍然泡在图书馆里，一泡泡到半夜。要知道，图书馆里虽然也安静，可到底有人，而一回到自己房里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涌了上来。那天晚上，我们班上那个最年轻最漂亮的委内瑞拉女孩子打电话给我，诉说她很孤独，想家，学习又感到困难，说着说着就哭了。”

“她要你陪陪她？”

“不，也不是。她只是要找个人说说，只要有人听她说就行了。时常会有这种情绪上的低潮，学校里也已经掌握了这一点，过一段时期就发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，你将会遇到某种某种问题。并且列出帮助你克服这些问题的办法。”一提到学校的教育情况，他又兴奋起来：“我们上课很愉快的，坐成一圈，随你干什么都行，随你提什么问题都可以……”

我们又到对面的娱乐室去玩，康乐球盘和乒乓桌都被占了，两个虎彪彪的小伙子在打乒乓球，技术之差令人不相信。中国任何一个小学生都可以将他们击败。门口又到了一辆巴士，一群学生涌进公寓，挤进电梯。

11月4日 晴

华东水利学院有一代表团来，学校请他们吃饭，请我们作陪。团长刘晓群原来是新四军四师的，可谓是未见过面的老战友了。

饭后，他们去听音乐会，我们去看了玛利莲·梦露的《车站》，她表演了一个饱经风霜，然而还保持纯真的一个穷歌女。的确，她很美，但无嘉宝那样的气质。

这个盛年夭折的女明星，在美国人心目中还留着意犹未尽的浓厚兴趣。也许倒要归功于她的早夭。一旦等到淋漓尽致之后，到来的必然是兴味索然。那时，虽活着，人们也会遗忘，就像一代红星费雯利那样。事物的辩证法就是如此。虽然有点残酷，却是真理。

11月4日 晴

今天去数学楼听录音。一早起来，天气好极了，一地灿烂的秋叶。怎么会有这么厚的秋叶？那空气是甜清甜清的。到处是年轻的大学生，匆匆地来来，又去去。要了本故事课本听，一抬头，是窗户。窗户外是碧蓝的天，乳白色的屋顶。我想起曾有一个人对我说过：“美国的大学太美了，美得不真实了，像童话。”而它明明又是现实，就在眼前，在你的脚下，却给你不切实的感觉。那蓝的天，乳白的顶，顶上飘着一面星条旗，旗在风里舒卷着，那星条在阳光下闪烁。我忽然明白，所以会有这种不切实的感觉，那就是——这不是我们的国家，不是我们的大学，不是我出生的地方。我们与它永远接近不了，它永远使我们感到不切实，感到虚渺，它是人家的。我喜欢它，可也许我对它永远也不会感到亲切。没有办法。

下午四点，去Eagle买东西。不买不行，冰箱里都空了；可是去买吧，时间很紧张，五点钟吕嘉行就要来接我们去参加一个party，是华东水利学院的一个代表团来爱荷华大学，国际学生中心为他们召开的一个party。于是就需要司机海尔先送我们回“五月花”。不得已，一定要与海尔说明这个意思。我把他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他很紧张。我须要在没有人旁听的情况下才能说英语，我也很紧张，等我终于说出了我的意思，而他又终于明白了的时候，他松了一口气，我也松了一口气；他出了一身汗，我也出了一身汗。他终于首先把我们单独送了回去，赶上了party。

party在Jeferson大楼举行。华东水利学院代表团去年也来过一个，是吕嘉行为我们做翻译的。爱荷华大学的水利系比较好，在全美国也排得上号。谭嘉指给我看一个大胡子的美国人，这是大学的中文系主

任。奇怪，这位中文系主任我从来没见过，照理说，中文系主任应该对中国人有些兴趣。

吃过晚饭，去看玛丽莲·梦露主演的电影《车站》。这位玛丽莲·梦露是一个美国著名的性感明星，她的性感是一派天真，自然得好似风要吹，水要流。有很多人喜欢她，尤其是男人。她的第一个丈夫是剧作家阿瑟·米勒，后来离婚了，又嫁给了肯尼迪的第三个弟弟，她三十六岁那年，突然死了，传说是暗杀，因为她知道的秘密太多了，那都是她不应该知道的秘密。看完电影后，陈映真说：“这是每个男人的梦。”

11月5日 晴

水利学院的代表团拜访安格尔和聂华苓，我们被邀作陪。

下午看了录像《沙友那拉》，故事类似《蝴蝶夫人》，背景是一九五一年，正是我们抗美援朝期间。美国把日本作为美军休假地，一个空军在那里爱上了一个日本姑娘。最后那个姑娘忘了仇恨，跟着这个军官回美国。侧面看到了日本人民对美军的那种民族憎恨，虽然只有一个场面。

11月5日 晴

上午与潘耀明去东西店买春卷皮子，准备晚上到美尼塔家参加party。今天的party是，每个人都要带一个菜。美尼塔希望我们带春卷。看来，国庆节那天，我们对春卷有深刻的印象。由于潘耀明要走一条从来没走过的路——他说他不愿意老是走同样的一条路——结果，迷路了，怎么也找不到东西店了，真是急人。问外国人，外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“东西店”。后来，潘耀明想了一个办法，上那个中国餐馆“翠苑”去问路。他是这样问的——先进去问那老板，一个瘦瘦小小却很整洁的广东人：“还没开始营业吗？”“要十二点，请坐。”“这会儿已经十一点了。有些什么菜啊？”“请看菜单。”老板极殷勤地递过了一份菜单。“好，我们先带回去看看。”潘耀明郑重其事地拿起一张菜单，认真仔细地看着，然后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；“哦，请问一下，这里有个‘东西’店，是在哪里？”“就在前边，一直走。”老板说。“哦，谢谢。”他又继续看菜单，然后说：“再见。”走了。

果然，前边就是东西店，因为是从另一条路上来，一时迷失了，其实就是这条街，不过是另一端罢了。买了春卷皮和豆沙，潘耀明说：“上次去芝加哥，路上吃午饭，还有十元钱的公款在我这里，我们一起吃次火锅吧。”“很好。”我赞成。于是又买了鱼圆、虾圆等吃火锅的材料。走出东西店时，已是正午，太阳明晃晃地照着一天一地的秋叶。

回到“五月花”公寓，发现门下有一个大信封，拆开一看，是一大叠写给我的信，有安娜的一封短信：亲爱的安忆，这是我的学生们写给你的信……

这些信是太可爱了。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：

亲爱的安忆：

感谢你到我们班级来。我的名字叫Mreg Keafha，来自一个很闭塞的中产阶级家庭。到大学来学习是为了增加自己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可能。我希望你们知道在美国，年轻人对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是很关心的。而你告诉我们在中国，大学毕业生有一份得到保证的工作。在美国，大学对你的工作不做任何保证，握握手说一声祝你幸运，交给你文凭，就完了。你告诉我们中国大学生怎样一早就去图书馆在那里整天学习，中国学生对学习有强烈的动机，因为学好了，就有这份得到保证的工作。我就没有这种保证，所以总是觉得从我的学业里得不到好处，那又何必继续留在大学里呢？高中文凭不能使你得到工作，大学文凭也不能保证有工作。

课余时间对美国大学生至关重要。我在课余做一些身体锻炼运动，跑步，打篮球，使我从大学功课的压力中轻松一下。

安忆，希望你在美国访问对你有帮助，我希望你告诉你的朋友的是："爱荷华城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，这里的人们努力工作，津津乐道于友谊之情，向往着美好的时光。"

一个努力的大学生

Mreg Keafha

有一封信是这样：

亲爱的安忆：

谢谢你花时间和我们班谈话。我们都知道了不少东西。以前我不会知道有这样的事：当你一旦进入了大学，你就肯定毕业后有一份工作。听到说大学里控制学生恋爱，对我说来也是有趣的，吃惊的。

有三年多了，我一直和一个叫劳拉的女孩子一起参加社交活动。我们彼此很相爱，这种关系有助于我们在大学里干得更好些。因为我们相互取长补短。她数学很好，我则擅长其他学科，我俩帮助对方克服短处。

诚然，我父母有足够的钱可以供我念完四年大学，但他们不给钱。我现在自己供自己上学。这是我爸爸的主意。他认为：要是我能体会到供自己上大学有多难，我就不会只为了出钱的人而念书了。现在我也看到了这是个好主意。我看到了接受良好教育所要付出的代价，我对时间能够精打细算，因为我是个自己付钱的人。

可能你知道了，我和许多和我同年龄的年轻人都相当有独立性。我有很强的责任性。任何时刻，我都得自己照看自己。我有很大的自由可以在任何时候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。但是，我的责任性使我把时间用得有意义。而对有些人说来，这确是个大问题。

你希望怎样同你的朋友们介绍我呢？可以讲讲爱情。爱情的作用是很大的，它帮助我度过艰难时刻。有人跟你结成对，共同努力，你就能干得最好。你不再是一个人对付世界，这种有所依靠的感觉是很棒的。当你知道，无论你干得多么糟糕，总有一个人和你站在一起，你会多么高兴啊！

Scott R.Bruner

有一封信是这样：

亲爱的安忆：

上星期五早晨我起来以后一直迷迷糊糊的，因为前一天夜里我看书看到很晚才睡。可是当我上修辞课，坐下来等你和我们见面时，我顿时来了精神。

你只身一个和我们十八个人谈话，所以我们对你的了解可能比你对我们的了解深入一点。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Barry，

是大学新生。打从我记事起就和家人一起住在农庄里。我有两个兄弟，一个姐妹，爸爸和妈妈。

我至今不知道自己读了书以后要干什么工作。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学生在毕业前都要改变专业五六次。我想，还是让我先试一试，可选择的专业太多了，很难找到正好适合我干的专业。这学期我选的课程是：天文学、戏剧和公共关系。

我刚说过，我曾在农庄居住。咱们的农庄有三百六十公顷地，离最近的邻居一英里。房子很大，四周有针叶林，还有许多许多草，需要修整。听起来，好像我住的地方挺荒僻，其实不然，我们离爱荷华和Cedar Rapids城都只有四五十英里。所以买东西、看电影或听交响乐都相当方便。

我爱音乐，我几乎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听音乐。

我所爱的音乐都是很新潮的，试验性的。

等你回到中国，请代表我和我们学校对那里所有人问声好，告诉他们在美国，我这样年轻的人确实是很友好的。我对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好奇心，它能帮助我理解自己的生活方式。这就像一种颇有价值的财富，感谢你使它增加了一层。

一个上修辞课的美国人

Barry Kimm

有一封信是这样的：

亲爱的安忆：

感谢你和我们交谈。我以前从来没有与作家见过面，更别说是外国作家。我认为能和你这样令人注目的作家交换意见是很有趣的，尤其因为我已经读了你的短篇小说。

我叫Quiliano N.Anderson，就是坐在房间左角上那个黑头发的家伙。我十九岁，是菲律宾人。我在美国已经生活四年多了，逐渐

学会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。我有三方面，自己觉得可以作为美国年轻人的特点的：爱吃汉堡包，爱花钱买些不必要的东西，爱独立作主。我喜欢独立，因为我不喜欢别人来告诉我干什么。当我最后摆脱父母时，十分高兴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彻底地自由自在过。妈妈总要教训我。要是我买一样东西，并不就意味着这是需要用的。我从来不满足于已有的东西。比如说，我最近花了二十美元买了一个床靠垫，我并不真的需要它。我认为多数美国青年是友好的，有幽默感的，无私的。他们喜爱足球。以上也是我希望你对朋友们讲起美国青年时，希望你讲的事情。

很荣幸能见到你。

Quiliano N.Anderson

……

11月6日 雨

学校里有录像带出租。华苓租来了另一部玛利莲·梦露主演的片子，叫《七年之痒》，是一部喜剧片。这位女演员，除了漂亮以外，在表演艺术上，是不能和美国三四十年代的演员比拟的。但要说她是个“脱”星，从我们看到的这两部片子看来，倒有些冤枉。说老实话，不看《七年之痒》，对这演员的印象还好些。

傍晚，在市里开了一个中国同学会，到了二十五人。情况不如芝加哥大学。多数来自大陆，少数是台湾和香港来的学生。见到了三个来自上海的学生，他们有亲戚在美国，自费来美学习的。两个女孩子见了我，絮絮地有说不尽的话。她们初来时，语言不通，在国内学的外语，到这里听不懂。经济上的压力，学习上的压力，上课听不懂，回来还需从头看。一星期打工几十小时，每天总要到两三点钟才能睡觉。青黄不接时，如向亲戚伸手，还要看脸色，眼泪只能朝肚里流。而且在我们那个社会制度里出来的人，只知道埋头用功，反正读好了以后，工作有保障的，因而不懂当前的趋势，也就是商业上的供求关系。这位姑娘是学机械的，而目前在美国，任何专业都离不开电脑，机械更是如此。所以她今年拿到了硕士以后，还要再选读电脑。而台湾和香港的学生，就比较了解形势，选读的都是热门科目。

11月6日 雨

中午，和潘耀明打乒乓，以三战两胜赢了他。他口口声声说他是让我的，可事实上决不可能，他打得十分努力。游艺室里面还有一个游泳池，正在修理。希望它在我们走之前能够开放。可小叶对我说，最好不要到公共游泳池去游泳，因为现在美国流传一种传染病，是由同性恋者而发生的传染病，得了病后，全无抵抗力，十分危险。

下午，蓝蓝带我和小培去Hancher听音乐会。来演奏的是纽约的一对兄弟，钢琴家。我们又聊起波兰剧作家的孩子。小培说："那孩子已经完全不正常了，她总是那么紧张。""就是啊，想对她好，可她总是戒备你，总那么别扭，常常要尖叫。"我也说。蓝蓝告诉我们："这孩子从小是跟奶奶长大的，现在离开奶奶，又到了完全陌生的美国，又是在纽约生活了一长段时间，生活动荡不安，父母心情不好，对她影响很大。"是的，她爸爸对她很粗暴，连亲昵都很粗暴，用脚去踢她，她真可怜，小小的年纪就流亡在国外。

音乐会结束，蓝蓝就带我们直接去国际学生中心，今天我们召开一个中国招待会，放映吴祖光伯伯剧作的录相，然后再座谈座谈。到的人很少，冷冷清清的。大都是大陆的，而大陆的中间又是上海学生为多。有个台湾学生谈得很好，她说："我是学英国文学的，又是在美国，时间长了，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背景就会渐渐淡漠。而有了'国际写作'计划，有了这么些每年都来的中国作家，有了和他们接触，这对我很好，这一切都提醒我，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。无论是对我的学业还是人生，都是很好的。"她告诉Esther，今天收到家里的信，她弟弟去马祖当兵了。台湾是义务兵役制，每个男人都要当几年兵。"呀，你多多给他写信吧。"Esther说。

招待会结束时，华苓说：“还剩下很多饼干和cheese，大家都带一点回去吧。”他们先忸怩了一会儿，然后不知由谁带的头，纷纷站起身，把东西分着包起来带走了。

然后，我们上吕嘉行家玩。他们的家总是那么舒适，井井有条。吴祖光伯伯说：“谭嘉是以治国之才治家。”大家都去看他们新买的汽车，其实也并不是崭新的，已经九岁了。他们没有分期付款，一口气付完了。“还是中国人的习惯，不愿意负债。”吕嘉行说。美国人的习惯是不存钱，只负债。存钱等于浪费，那利息永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。而且——我想——在这里，得钱很容易，花钱也很容易，拼命地挣钱，然后，拼命地花。“你们原来的车呢？”大家忽然想起那已经退役的汽车。“坏了，暖气也没了，冬天开车冷得要命。”谭嘉说，“送去修，人家不给修，说他保证这车子在一个月之内全部崩溃。”

“这车是太旧了，走在美国的路上不大协调，美国的车都是小小的，新新的，漂漂亮亮的。”有人说。

“那年去加拿大旅行，这车开到加拿大，就像回了家一样。加拿大的车都是大的，载重的，不怎么新的。”吕嘉行说。

11月7日 晴

在谭嘉帮助下，和吴祖光一起，跟南非的女作家克拉第斯·托马斯交谈了两个小时。

出于我的意外，这一位约有五十岁左右的剧作家兼诗人，这次来美之前，竟然从未离开过她住的村子，连大城市也未到过。在南非，是四分之一的白人（多数是英国和荷兰人），统治着四分之三的黑人。她父辈是过去荷兰人的奴隶，移民至南非和当地黑人结婚所生的后裔。所以她的肤色不黑，但仍是有色人种。这四分之三的有色人种，是没有选举权的。他们也不能居住在大城市里。即使在大城市里做苦力的，他们的家也只能安在乡村。而且把有色人种驱逐出大城市的活动，每年都在进行。

南非人民都住在乡村，每个村边都围以铁丝网。外出时必须随身携带身份证，证明你是否有色人种。严禁与白人通婚，如发生这种事情，黑人得坐牢六个月，白人则不必，但双方都必须离开本土。凡是有色人写的剧本，都不能在城市里上演，除非你提出请求。她不愿请求，所以她写的剧，都只是在本村或其他村里演出。她写的诗也如此，只是朗诵给本乡本土的老百姓听，而后逐渐流传，以致在国外报上刊登。她没有因为写作而得到过一分钱，但她依然努力不懈。她要把这种非人的歧视、不平等的待遇，诉诸于世界。她说着说着就眼泪汪汪。她自认为自己没有一技之长，只能做一些这样的事。她得奖的剧本《我们不孤独》，写的是一个黑人混血儿，羡慕城市生活，就贿赂了有关人员，取得了白人身份。取得了这身份，就得和故乡以及所有亲人断绝一切关系。他母亲在村里，并不因为失去了儿子而觉孤独。最后母亲病危，儿子闻讯赶来，而村里的兄弟姐妹都拒绝了他。

她的剧本都是揭露这种生活。而她的诗，则是一种呼号。如她在《鬼魅般的眼神》里写道：

“美丽的大地，
润浴着，
美丽的山峦和海洋，
但这些都没有我的份儿。
来！让我们携手同行，
舍名胜而逐贫民窟。
看吧！
就在你的面前，
是人间的地狱，
白色的樊笼，
千万只野兽在狂奔。
仔细瞧瞧他们的眼神，
如鬼魅般的眼神，
而如此这般的铁丝网，
便围困在他们四周。”

毫无疑问，她是南非妇女中的优秀分子，使命感特别强。为了她，要谢谢华苓了。

晚上潘耀明请了他的三位同学来吃饭。他们是来自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。北京儿艺的长号手吴强，他来美国的时间几乎跟我们差不多，是一个头发乱蓬蓬、憔悴、瘦削的青年。吃不准他有多大了，可能是三十，也可能是三十五，眼睛好像有点毛病，老是睁不开的样子。他

和潘耀明在一起读英语，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送报，到八点钟又去另一个地方打工一两小时，到他上课时，就已经筋疲力竭，只想打盹。对老师的提问，只有茫然以对。而他辛辛苦苦去打工，就是为了付学费，以及维持生活。他却在付出代价最多的课堂里打瞌睡，又在生活费用中占绝大部分支出的房子里只能呆上五六个小时。吃呢，他总是买一大条面包，夹带进课堂（不允许的），中午就光啃面包。哀哉！与大作家吴强同名的长号手！而那一位瘦瘦的上海姑娘，我们刚来这里时，曾在萧乾同志住的爱荷华旅馆里见过。她还在那里打工。潘耀明说她中午只吃一个苹果，就当顿饭了。美国现在正流行节食减肥，简直成为一个运动了。可是这几位同胞，看来节食节得太过火，减肥减得个个脸色发黄，憔悴不堪。

我很高兴今天自己又煮了一大锅脚圈，可以待客了。果然他们吃得很高兴。在美国，猪脚圈并不名贵，只是需要时间煮就是了。

吴强带来了他过去表演的长号独奏录音带，吹得真是不错。他又不知从哪里翻出两张报名照来，也是他出来前在北京拍的。我看了照片，真正感到惊讶了。原来他是那么年轻，也算得上漂亮的一个小伙子，还很有点艺术家的派头。现在，这漂亮好像不大能和他这么一个人发生联系了，这也许是头发和衣服的缘故。那派头呢，作兴是他拍照时临时搭起来的，也可以把它除掉。最令人吃惊的是，照片上的吴强，明明有一对大而深的酒窝，竟然也不见了，而且连痕迹也没留下一点点。

11月7日 阴

这几天的报纸上，头版头条都是美国出兵轰炸格林纳达岛的新闻。美国说是为了护侨，因为那里有美国的医学院，可是他们究竟遇到什么危险了呢？令人惊讶的是，美国举行民意测验，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是赞成这一行为的。难道他们忘了越南战争了吗？我想，美国如此喜欢战争，也许因为是从来没在本土打过仗。想到这一点，真希望有人在美国上空扔一颗炸弹试试。

晚上，潘耀明班上的三个大陆学生来玩，一个是杭州来学工的；一个是上海来学电脑的，曾经有一次，我们去爱荷华House看萧乾伯伯，她正在走廊上打工；另一个是北京来的，姓吴，来学音乐：长号演奏。他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，在山西下放两年后，抽到一个地区文工团，然后，七七年时，又考入中国儿艺。两个月前来美，先到堪萨斯，那里有他的朋友，在学大提琴，就是当年在《小铃铛》里扮演那个女孩子的小演员，现在也已经很大了。她开车把他送到了爱荷华。在这里，他要进修专业课，又要修英语，还要打工。他找了两个活计，一个是在爱荷华House打工，收拾房间，一个小时四元二角美金，一个星期至多只能得二十小时的工钱，但可以把多打的时间存起来。另外就是派报，这个收入不多，一个月只九十多元，而每天都要早起。他是极其辛苦的，脸色苍白而憔悴。他们说他总是睡不够，上课迷迷盹盹的，总是听不懂老师的话，总是找不到讲义，一找讲义，就把书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在桌上，那是什么都有的：面包，派剩的报纸，打工的袋子……老师问他话，他总是很茫然，老师便让中国学生翻给他听，他依然不作回答，老师又叫人向他解释，人们便说："他完全理解，只不过是不懂英文而已。"常常是，问他东，他答西。而我们

发现，问他中国话，他也会这样。比如妈妈问他："一天睡几个小时。"他回答："有时不到一个小时。"大家都吓了一跳，原来他说的是一天练长号的时间，这才放下心来。他感到让我们看见他目前这种样子十分遗憾，便拿出他在北京照的照片给我们看，那是很帅的照片，"可以当明星"——潘耀明总结。他放着他演奏的录音，他的长号吹得很柔和。"你结婚了吗？"我问他。他点点头。"想家吗？""想死了，我简直想回去，真比插队落户还苦，真的。""一开始总这样，熬过去就好了。"我安慰他。"就是。我就是想得个文凭。"他们三个全都不小的年龄了，气色不好，有些憔悴。"在美国读书，就是学费太贵了，"他们说，"可是，至今还没听说过有谁被钱困住的。"就是这么个国家，时时感到钱的压力，可却不会被钱困住，总有办法可想。当然，那压力是极大的。

吃过晚饭，大家一起去华苓家看录相，一个叫《转折点》，写两代芭蕾舞演员；另一个是金凯利主演的音乐剧——《一个美国人在巴黎》。看完两个电影，已是十二点，潘耀明已经在地毯上睡了一觉。他的同学径直去图书馆，今晚就在那里过夜了，那里有沙发，有暖气，地毯上也能睡。

李章来了一封信，他们现在的处境很困难。地区和市合并，他们地区文工团就要和市歌舞团合并，一个阶段结束了，另一个阶段还没开始。结束了很久很久还不得开始，他只能等待在结束上，他只能等。唉，这转折点。

11月8日 阴

今天是十一月八号，是I.W.P的女作家报告讨论会。据说今年女作家邀请得比往年多，主席台放成一个大大的马蹄形，大家还是坐得挤挤的。每个人面前，还真有一小束可以别在胸前的鲜花，而且陈映真也真来了。

大家谈了以后，巴勒斯坦的撒哈和西德的女作家争论了起来。撒哈是一位妇女解放运动的激进者，人长得不错，舞跳得更好，打扮得很鲜艳。有人曾在一次“派对”中，对她有些不礼貌的举动，她立即当面开销，要对方尊重自己，也尊重别人，而且拒绝和对方跳舞。她能言善辩，很像个政论家。她在这里读博士学位，是个能干角色。

妇女问题，离开整个民族的解放、国家的独立，是很难谈的。我和安忆介绍了我国近几年来女作家出现得特别多的情况。

为什么？这是可以成为一个研究专题的，我只谈了几个最简单，也是最起码的因素：

一、要有饭吃，还要吃得从容。吃饭问题太紧张了，也许写不出，也许只能去写些立即能换钱的东西，比如广告之类。

二、要识字，要有点文化。如果光能写出几个字来，还不能成为作家。她还需要思考得比一般人更深刻一些。

三、她还需要有走出厨房和家庭的时间，有接触社会的条件。

声明一点，中国女作家多，并不是中国对女性作家特别宽容的结果。中国的男作家的作品是很出色的，女作家要不和男作家写得一样好，那么，是不会得到人民的承认的。

11月8日 晴

早晨，在一分钟，不，一秒钟之内作了决定——去图书馆。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，只是想到爱荷华的生活中去：和匆匆走路的人们一起匆匆地走路，和静静地看书的人们一起静静地看书，和草草吃一顿快餐的人们一起草草地吃一顿……我喜欢这种气氛。

中午，和潘耀明一起去“写作计划”办公室楼下买一杯茶。然后，我们想再在自动售货机里买一个水果。钱丢进去，门打不开，它又坏了。潘耀明打它，用脚踢它……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一个人在和一架机器打架，这情景有一种残酷的意味，我有点恐惧起来。我走过去，站在他和机器中间：“不要打了，你和它是没有道理可讲的。”它是冰冷的，铁硬的，它不会还手，不会还嘴，不会骂你，也不会安慰你。“可是它不应该坏。”他又说。“可是它就是坏了。”我还这么说。他绷着脸，火透了。唉，和一架机器生气怎么能行呢！

我们到河边去吃饭，太阳很好，河坡草地上躺了许多学生，一边吃饭一边晒太阳。那边石头上坐了一个丰满漂亮的黑头发女孩子。“那是我的同学，委内瑞拉来的。”潘耀明说。“哦，就是那天打电话给你，哭的那一位？”“是的。”“我们过去和她一起吃吧！”我说。“不了，他们外国人有时候喜欢一个人，不喜欢别人去打扰他们。”

下午，回“五月花”，巴士上遇到了Esther。她正从图书馆出来，回家吃东西，再去图书馆。“你要死的。”我说。“没办法，这一段的功课积了下来，到二十号要交二十个报告。”“呀，这都怪我老缠着你玩。”我很内疚。“怎么怪你，是我自己要和你玩。”她说。她的精神倒挺好，这种紧张是正常的。

晚上八点，在Jeferson大楼开女作家报告会——“Revolutionary and Beautiful”（革命和美）。那位波兰剧作家的妻子也作了发言，她原来也是波兰的一位较著名的新闻记者，她讲得很有趣。芬兰的女作家说：妇女固然要解放独立，然而现在有一些妇女，过于排斥男性。不能设想，一个舞会上，全是女的，那很可怕。撒哈的发言总是很激烈，特别强调妇女解放运动，认为没有妇女的解放，便没了人类的解放。我觉得她偏激了。要知道，正和有些人批评她的那样，巴勒斯坦还面临着更重大的男女共同的问题——以色列占着他们的祖国。很多人和她辩论，她很凶，以一挡十。不过那凶悍的样子十分可爱。蓝蓝说她是从自身经验中发出的对男人的敌意。散了会后，我们没有跳舞，提前回去了，乘许先生的车。车上，大家都说，应该让撒哈到许先生家住一个星期，那么结果会是怎么样呢？大家想像到——许先生在家煮饭，吸尘，洗衣服，客人来了，一个人悄悄地坐在一边，许太太说：“老许，唱一个歌！”他便乖乖地站起来唱一个歌……

11月9日 阴

看了美国拍摄的《日瓦戈医生》。有一些地方夸大，有一些地方拍得相当真实。影片是从贵族这一面来反映苏联十月革命前后的那一段历史。

人道这东西，对一方人道，对另一方就不能那么人道。贵族诉说他们失去的痛苦，更多的穷人却有翻身的欢乐。作家的眼光注视哪个方面呢？从这方面来说，它还不如《飘》。《飘》的作者对行将覆灭的贵族，尚有比较客观的认识。

分寸感，是文学艺术的生命线。真切之处，十分触心，夸大的地方，哪怕只夸大了半分，便觉可笑。甚至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真实的，夸大了零点一，那也就会露出宣传品的本相，便可令人投以不信任票。

看别国的东西，我们有这种感觉，不知别人看我们的东西有什么感觉？我们电影艺术里的分寸都很准确吗？

为什么不准确呢？仅仅是生活不熟悉吗？

11月9日 雨

晚上在聂华苓家看录相：《日瓦戈医生》。然后吃宵夜——火锅。

华苓告诉我们一件好笑的事情。那位年轻的罗马尼亚人和西班牙的卡罗住一单元。有一次，罗马尼亚人要离开爱荷华一段时间，便和办公室的丽莎说："你搬到我屋里住吧。"丽莎才来爱荷华不久，没有房子，住在走廊里。于是，她便搬着自己的东西上这儿来住了。而这么一来，隔壁的卡罗就十分紧张，他没有结过婚，看到女人紧张得不得了，于是厨房也不敢进，厕所也不敢进。他实在受不了了，终于对玛利说了。玛利对丽莎说："你马上搬出'五月花'！现在就搬，我帮你搬。"丽莎也十分地紧张起来，赶紧打电话给华苓道歉，她是实在没有想到这和卡罗有什么关系？她并没住在他的屋里，又没和他同床。她是个美国女孩子，很随便，实在没想到这对卡罗会有这么强烈的影响。

丽莎挺有意思的。她老叫我"王、王！"我说："这么叫，就像在唤一条狗。"因为他们往往叫成"汪！"她赶紧安慰我："没关系。我在西班牙学习时（她是学法文和西班牙文的），房东家有一条狗，就叫丽莎。"

11月10日 晴

请谭嘉翻译，和加纳、匈牙利的作家交谈了半天。

加纳总人口一千四百万，南北八百里，东西四百里，于一九五七年宣布了独立，至今仍是酋长制。在中央行政下，有五十个部落，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土地、语言，甚至风俗习惯，文字是统一的——英文。他们的文学有两种，一是口头文学，如祭神时唱的、朗诵的。内容都是讲他们过去的历史，从埃及到尼日利亚，怎样战斗，怎样演变。有齐唱，有一人领唱大家和，有朗诵。这种方式一是有娱乐作用；二是不忘记自己的历史；三是如何改善今后。因为他们那里有大量金矿，欧洲各国都想去瓜分，争夺剧烈，直到二百年前英国占领后，划了一条线，就叫“黄金海岸”。就这样，那里至今还有一小块土地是属于德国的。现在宣布独立了，很多制度还是沿用英国的。

他们一方面有中央政权，但是下面所有的土地仍属于各个部落。各部落的领袖是酋长。多数酋长是世袭的（现在也有少数进行选举了）。所以酋长的儿子一开始就能受到各方面的教育和训练，使他能够担任酋长。

这位加纳作家的父亲，曾被推为酋长，他父亲是位教徒，不想干，就让给其弟，其弟也不做，就让给他的堂房表叔做了。这位作家既能用文字写作，——他们的文字，才三十年的历史——又熟悉五个部落的语言，熟悉圣经及拜神的仪式，又有大量的口头文学。他用文字写诗和剧本，有的作品已编进教科书。他是文协的主席，主持出版工作，他的部落地处首都。

因为时间不多了，和匈牙利女作家谈得比较简单。她是一位内科大夫，是写儿童文学的。

11月10日 阴

今天中午，我们和加纳作家、匈牙利女作家谈话。这是吴祖光伯伯建议的，他想和每个国家的作家谈谈，这几天天天早上在谈，请谭嘉作翻译。我本来并没有什么兴趣，可是这位加纳的黑人作家，我对他印象很好，他沉着，友善，不卑不亢，风度优雅，而且，他来自非洲。

加纳的情况令我们十分惊讶。他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安乐和平的图画。他说加纳本是英属殖民地，自独立以后，还是把英国那套政府机构形式、教育形式保留了下来。但是在他们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更起作用的仍是古老的酋长制。酋长是世袭，他也是酋长的后代。我不明白，在城市，在有了工业的地方，难道还是以酋长为领导吗？他说也是。我不相信。要么就是他们的工业还不发达，而他们那些城市实际上仍然存在着许多乡村的因素。我问他，他们国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？他说：有，就是经济不发达，所以现在国家很注意和对他们经济上有帮助的国家搞好关系。问他，加纳的文学有什么特点，他说有两种文学，一种是口头的，一种是写下来的。那些口头文学是十分珍贵的，他很喜欢，时常去搜集。有一次，到了一个地方，那儿的酋长是他的同学、好朋友。他要见他，也必须按照规矩请求拜见，然后有一套见酋长的仪式，那是很严格的。我们说：你们国家情况真叫人羡慕。他说：是啊，来到这里后，听到别的国家的情况，真正是大吃一惊。他怎么也搞不明白，事情怎么会搞得这么糟。我们又问，为什么同一个非洲，南非和加纳的情况会有这么大的差别，要知道，在南非，是百分之二十五的白人统治百分之七十五的黑人。他说是因为南非太好了，气候宜人，物产丰富，第一批掠夺者是荷兰人，去了之

后，就霸住不肯走了，后来又去了英国人，他们在那里扎下了根，自以为自己就是真正的南非人了。非洲本来有了同盟，要解放南非，可是后来这同盟衰落了。我们说：你们一定要解放南非，他说："是的，可是战争是很可怕的。""然而，没有别的选择了。"我们围着他问了两个小时，终于欲罢不能地停了下来，转向那位匈牙利女作家。她不太关心社会问题，她的职业是内科医生，她喜欢写作儿童诗，写一些儿童诗，或是将成人的诗改写成儿童的，让孩子们能及早地领会诗的美感。这很符合她的职业精神——博爱。而我满脑子的还在想加纳，我不相信这是完美的境界，他们的田园式的生活究竟能维持多久，我很怀疑。他不是说，他们经济困难吗？那么，假如他们要发展工业，工业化的社会化的劳动，一定会冲击他们这种生存形式。再假如，他们不发展工业，而周围的国家都在发展，他们的国家也许会面临再度沦为殖民地的威胁。我不明白，不明白。我这时真想去一次非洲。然而这显然是个梦想——一个黑色的梦。

和他们结束了谈话，走出门，正好遇到陈映真，他理了发精神抖擞，准备迎接太太的到来。他的小说《出路》得了奖，奖金十六万台币。就用这钱接他太太来美国玩一玩。"呀，好帅！"我说。"唉，我紧张死了。美国理发怎么是这样的，背对着镜子。我的心一直在跳，不晓得他们在我头上捣什么鬼。"他直摇头。

吃过午饭，我搭巴士去市中心，今天和潘耀明说好，他带我去见那位从Jeferson大楼联系上的学生。在爱荷华House。这位学生已经四十多岁了，女儿也已上大学。她在大学里选了一门课：政治。她对中国的社会结构问题很有兴趣。我们谈了一些关于中国和美国家庭情况，又谈了一些关于男作家和女作家的区别，便分手了。"她显得很老。"我说。"美国女人的黄金时代是二十岁，一过二十五岁，便每况愈下，老得很快。""其实，她的化妆化得太厉害了，反而显得老。有一次，我看见一个女孩子，特别年轻，后来一研究，原来她没有化妆。""香港女孩子很会化妆。""呀，算了吧！你们的女孩子谁没见

过。那大明星朱虹，一张脸化妆得像个面具。”“谁让你们老要看朱虹的电影，我们有很多年轻的明星呢！”

“我请你吃晚饭吧。”我说。“这怎么好意思。”他说。“这次来爱荷华，你对我的帮助很大，你带我走熟了爱荷华。我要谢谢你。”“去哪儿呢？”“还是你带路吧。要去一家好的，不要自助餐，要服务的。”我决定奢侈一下。到这么个奢侈的国度，我还没奢侈过一回呢！

于是，找了一个餐馆。一开门，闹哄哄的，是个酒吧，我要退出来，他拦住了我：“你进去，走进去。”穿过闹腾腾的区，忽然安静了下来，灯光暗暗的，很柔和，一个侍者立即上前来，问我们几个人。“两个。”我们告诉他。他脚步轻快地在前领路，带我们到一张桌子边，麻利地点上蜡烛，把餐巾给我们铺在腿上……烛光摇曳着，有一点点音乐，人很少。一人要了一个菜，一人要了一杯酒。账单开来了，吓了一跳，十三元多。等于人民币二十七元呢。可是很多人和我说过，花美金时切忌换算，这样会饿死的。于是，我又镇定下来，准备付三元小费。我想，这个地方，小费应该多给。

出了餐馆，走过Old Capital，进去转了转，照例去看那件衣服——毛线面子，人造毛里子，带风帽的外套——可是它们没有了，一件都没了。呀，我简直想哭，这时候，我才发现我是多么喜欢它，希望得到它。可是没有办法了，怪我自己。走出来，往“五月花”走去，每路过一个服装店，我都要进去看看。哈，终于看到了它。只两件了，挂在衣架上，而且，居然又跌了一次价——四十八元。虽然只跌了一元，可我仍然觉得这两个月没有白等。赶紧买下了它。我不能想象，这衣服属于了别人而不属于我，我心里早就将它认同了。

11月11日 多云

今天跟那位很有个性的撒哈女士交谈。

她激烈地主张妇女解放是不无原因的。阿拉伯国家重男轻女，财产只传儿子。一个男子可以娶四个老婆，丈夫一句话，叫妻子滚，妻子不能携带任何东西，只能光身一人，离开丈夫家里。这一切都是法律规定的。而女方要求离婚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婚姻一般都由父母作主。

她有姊妹八个，只有一个弟弟，父母把弟弟溺爱坏了。她从小就爱跳舞、唱歌，生性活泼，她父母就把她早早地嫁了出去。开始，她反抗、绝食，后来和男的一见面，见那男的长得跟电影明星一样，而且骗她说将要来美国。她想来美国后，也许会好办些，于是就结婚了。结婚后才发现丈夫是个赌徒，输得光光地去向她父亲借钱，她父母方知上当。那时她一心就想在经济上独立，就偷偷在外学打字，学好后，找到了一份秘书工作，就提出和丈夫离婚。一般说，女方要求离婚是难以实现的，除非男方同意。但因为她的父亲是电力厂的老板，又经营汽车生意，很有钱，所以等于是用钱把她从丈夫那里买回来的。她已有两个女儿，一个在苏联学习，一个在东德学习。她自己则在美国研究妇女文学。父亲对她写作的内容，一概不知，只知道女儿写书了，很骄傲。现在她在巴勒斯坦已没有家，住在约旦，出来也是拿的约旦护照。

她对妇女解放要求迫切，主张激烈。了解了她的国家的情况与妇女的地位，就感到并不奇怪了。

她也很同意妇女的解放一定不能脱离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解放。

看了录像片《日落大道》。这可能还是美国五六十年代的作品吧！写一个女明星的晚年。这是一部有生命力的电影。

11月11日 晴

上午去图书馆，中午去“写作计划”办公室吃午饭。办公室里很忙碌，作家们都将陆续去旅行了，去订行程机票。波兰作家夫妇也在，他们的女儿在办公室里跑来跑去，她活泼多了。“苏珊娜！”有人叫她，给她一块饼干，她胆怯地伸出手接了。“苏珊娜！”我叫她，朝她招手。她没过来也没大叫，只是站在那里，睁着眼睛看我，那眼睛是淡蓝色的，然后一笑跑开了，和冰岛作家的南美孩子追逐起来。她在这里已经开始熟悉并习惯了，可是，他们要走了，明天一早走，去纽约。

下午打算去听录音，可是忽然困倦起来，便去图书馆的休息室睡午觉。那里有很多沙发，沙发朝着落地的玻璃墙，街上人来车往，阳光明丽。这里的一切房间进去都不需要任何证明，很随便，而秩序井然，不用张贴“闲人免入”的牌子。这里没有闲人。我想，这会儿最大的闲人就是我吧？从一张沙发上起来一个人，是学长号的小吴：“王安忆，你睡这沙发吧。”他的沙发长一些，可以躺下，这沙发上下周围，满是报纸——他没派完的报纸。



保罗·安格尔和聂华苓家的露台，作家在那里无数次地聚会。
左起聂华苓、茹志鹃、王安忆

晚上，又看录相，是两个三四十年代的老电影，一个叫To Kill Mocking Bird（《百舌鸟之死》）。Mocking bird是一种鸟，只唱歌，对人、对庄稼没有一点害处。这是一个象征。电影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，看美国三十年代南部的种族歧视。吕嘉行说，就是最近，南部德州还发生过类似的一个案件。法庭拼命阻挠一个能证明被告无罪的妇女出庭作证，被告在案发时间正和那女人谈话，谈了四十分钟。那被告是个黑人。另一个电影叫《日落大道》。日落大道是洛杉矶好莱坞电影演员曾经住过的一条大道。写一个过时的女明星，好凄凉。这电影是针对好莱坞的明星生活的。是不是，好莱坞给了人太大太显赫的光荣，而这光荣又不可能伴随她一生。当这光荣不得不离去时，怎么耐得寂寞。华苓宣布，明天下午看《飞越杜鹃窝》。看完录相，大家都来看我的新衣服，吕嘉行说："我能看看是哪一国产的吗？""行。"我低下头让他看后面的商标。"是南朝鲜的。"他说。"为什么不是美国产的？"我问。"就是这么奇怪，你在美国买东西，很少能买到美国产的东西。""为什么？"他耸耸肩，回答不出。

回到“五月花”，去向波兰人告别，怎么说呢！祝他们一路顺风，一切一切顺风。

11月12日 多云

华苓家里来了一位姓林的客人。他出生在北京，住在香港，在美国一个大学里讲学两年。他讲的课很特别，是佛教中的密宗。他不是一般的阴阳先生，但亦看风水；不是一般的算命先生，但也能看相。听他说了他的理论。

他从天地、阴阳谈起。说一个“道”字的笔画，乃“一阴一阳，二者合而为一，按照自然法则，运行不已”即是“道”字。如此看来，这阴阳说只属于中国。他说天为阳，地为阴，但天也可分阴阳，如日月。地是阴，但亦有阴阳之分，如山、河，前为阳后为阴。山上有人，有建筑物，于是人又分阴阳，屋子有阳宅、阴宅。如此阴阳之分，以至无穷。他送我一首诗：海棠旁插一枝梅，富贵穷酸共一堆，莫笑梅花不富贵，春来独占百花魁。

不知这首诗赠过多少人，姑且记之，作为一种见识。

晚上叶君健同志来，在华苓家相聚，也是相别。一方面是惜别，一方面则是喜归，这也是有阴有阳。下雪了，这是爱荷华第二次降雪。

11月12日 晴转阴有雪

上午，去华苓家。她家来了一位大师，林先生。这是个神秘的人物，他一看到你，便会知道你的过去甚至将来，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病，有没有过什么故事。总之是，料事如神，不可不服。在他到来的前几天，我们已经谈论了很多了。曾有一次，他去谭嘉家，对着在座的另一位客人说："你父亲死了这么长时间，为什么还不下葬？"这是真的，那客人大吃一惊，而谭嘉也大吃一惊，因为这件事，连谭嘉都不知道。而这客人和林大师绝对是初次见面。他还对谭嘉说："你有一个和你很亲的人是唱戏的。"呀，果然，谭嘉的父亲是票友。我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我都不想见他了。可还是按捺不住好奇心，去了。

林大师是台湾人，在北京长到十六岁，所以说了一口道地流利的北京话，像个"京片子"。随他一起来的有一位戴小姐，特地来美国听他讲课，不料她机场邂逅相遇，然后便结伴而行。那戴小姐对他十分恭敬，尊为先生。

他先给我们解释他研究的哲学——这是佛教的一个分支。然后给我们"算命"——恕我用了"算命"这一俗词，可我实在想不出别的词儿，虽然他的"算命"和"算命先生"的算命是很不一样的。他的方式的核心是"气"。人体，也可以说是由"气"带动活动的。他说我心中有怨，全郁结在胸中，总在想法子冲出去，所以我老是撅着嘴。他为我提供两点解法：一是"容吐术"，二是在床前，起床第一眼能看到的地方放一面镜子。他提供一个解术，便递给他一个红包。早上我们作了准备，一个人包一个红包。现在，看来显然不够，幸好，谭嘉带来许多，聂华苓也准备了许多，能及时供应。而他只留红包不留钱，钱还是归还，但那红包是一定要给的。谈到妈妈时又将我们作了比较，他

说我和妈妈各有一份艰辛，结局是一样的，然而这艰辛不同，妈妈是苦的艰辛，我是乐的艰辛。他再三对我说："你妈妈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"是啊，妈妈吃过很多苦。我问："我会像妈妈那么苦吗？""不不不，你很不苦。"我这才放心下来。他又告诉我，妈妈身上有痼疾，是郁结所至，要他的学生戴小姐教给我一套大日如来，让我再教妈妈做。我要给她一个红包，她让我把红包里的钱换成小钱，因为她的道还不够，没有资格退钱，她要把钱留下。正说着，来了一位美国年轻诗人，是过去写作班的研究生，来看安格尔先生和华苓的。他也来凑热闹，让林大师为他看相——我又说了一个俗词，该死！后来，华苓说，他给那美国人看得并不准。我觉得美国人是很难用中国的传统哲学去剖析的，什么阴阳五行说等等，对他们都不适宜的。比如，中国人很讲时辰，而美国的时间没个准，东部和西部不一样，冬天和夏天不一样。他的飞机下午四点就起飞。他走了后，我感觉到，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，每个人都有一点秘密，不愿被人发觉的。

然后，大家就下楼去看录相：《飞越杜鹃窝》。这是一部象征性的电影，写一个疯人院，进去了一个正常人，一个犯人。他太捣蛋，监狱觉得有必要让他去检查，是否有点神经不正常。他走进疯人院，他感觉到疯人们都还正常，不正常的是医院、医院的管理，他把病人们带出疯人院，或者把正常人、姑娘们带进疯人院……可是他最后被电疗治疗成了一个废人，他的好朋友，一个印第安人，把他扼死了，然后他一个人实践了他们俩的心愿——飞越疯人院。看完后，心里沉甸甸的，很不舒服。

叶君健也来了，他是去开国际笔会回来，路过这里，想在爱荷华休息几天然后回国。

晚上，陈映真把他的太太接来了。他太太十分年轻，说话挺爽朗。陈映真满面春风的样子，十分得意。大家纷纷向他太太告状：他如何地上门要饭吃，吃完饭还要喝一罐可乐；他如何地欺负潘耀明，惹他发急……不过，他还规矩，和女人有关系的事，还没听说。

吕嘉行出了一个节目，台湾的“歌仔戏”，那是非常有气势的。他出声便是一声吼，把大家都吓了一跳，以泰山压顶之势而赢得掌声。那是简约高亢的曲调。不知为什么，台湾，如今在我脑子里，是由委婉凄凉的《望春风》和质朴慷慨的歌仔戏组成的。还有，还有他们把妻子叫作“牵手”。

11月13日 阴

和土耳其作家交谈。他一面谈，一面给我和吴祖光塑了一个像。他听了中国作家的待遇，可以拿工资搞创作，十分羡慕，站起来高呼："我也要做一个中国作家！"但他又不承认是羡慕。他说，这是作家应该得到的合理待遇。只不过我们得到了，他还没得到。他认为作家总会碰到麻烦事，因为作家本身就包含了风险。他是写儿童诗和小说的。他认为儿童的世界里没有国界。儿童最天真，最纯洁，但他们也最没有发言权，最受控制。

叶君健同志来，一起吃了便饭。

夜读《人民日报》，有艾青、丁玲等作家举行记者招待会，这在国内是少有的。又提出整顿刊物，这倒是有过经验的。不过这一次整顿的结果会怎样，就很难预计了。

头绪纷杂，心里很不平静。睡在床上，耐着性子听下面公路上，汽车"丝丝"地连成了串。

11月13日 阴

下午，和Alex去安娜家，安娜要和Alex一起为爱荷华大学的文学刊物写一个我的采访记。并且，她早就说过，她要请我上她家玩。她家住在离市中心较远的地方，一座白色的小木房子，是他们自己买下的。小房子旁边有个汽车房，她将车开到门前，一按一个电盒子，那车房的门便自动升起。就好像阿里巴巴的山洞，喊一声“芝麻，开门”，门前有一个花坛，她说可以种很多东西，她总是种一些蔬菜。进了门，她把我们的外衣挂好，就不再管我们，也不请我们坐。我们就站在厨房里看她忙着做午饭。她家住了一个客人，前几年参加“写作计划”的荷兰作家，明天他也将参加我们的farewell party（告别舞会）。安娜忙着，然后分给了那先生一份午餐：一片面包，一根香肠。他笑嘻嘻地运用着刀叉，像模像样地吃着，一转眼工夫就吃完了。“完了？”我问Alex。“大概是完了。”他回答我。我们一直在看他吃。他也笑嘻嘻地看我们。安娜在微波炉里为我们烧了两杯茶，然后把我们从厨房领进客厅，坐了下来。客厅很大，家具不多，一张椭圆形的餐桌，餐桌上有一只小筐，放着几穗红玉米，“这是印第安人种的玉米。”她送给我一穗。“几把椅，橱，茶几——这是我丈夫做的，我们一起设计的样子。”她说。她先生乔治从外面搬来木柴，将壁炉生起火来，屋子里很温暖。Alex告诉我：这是真正的壁炉，像聂老师家里的壁炉，其实底下有煤气，先开煤气，等火燃起来了，再灭掉煤气。而这个，没有煤气，完全是真的。他们采访完后，我们又围着壁炉聊了会天。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火光暖暖地照亮了一圈。安娜是希腊人，还保留了一些传统的东西，不像一般美国女孩子那样的、那样的不再像女孩子。我说，丽莎和我说，爱荷华是个闭塞的地方。安娜立即不

同意了："丽莎刚从纽约来了不久，她的看法并不准确。爱荷华的生活很丰富。"我又问她关于美国的嬉皮，她说那已经过去，现在的这种反传统的行为叫"New wave"即新浪潮。她找了一本最最典型的美国青年杂志给我看，上面有很多这种新潮青年的照片，总之就是男的装扮成女的，而女的则装扮成男的。她又问我，我的家有多大，我比划给她看：小小的两间，和她的客厅一半一样大。她很惊讶有这么小的房子，而我告诉她，我已经很满足，我比我的同辈人要幸运得多，我甚至对他们感到抱歉。六点钟时，我们告辞了，我给她带来一件小小的礼物，是叔叔送我的一串绿珠子项链。她非常非常喜欢，马上把它套在脖子上。她告诉我，她对金属的东西过敏，不能戴金属的饰物，所以这串项链对于她非常合适。她又让她先生看。乔治长了一双会笑的眼睛，又纯朴又温和，他们很匹配。我原先觉得安娜和爱德文很匹配，可以成一对儿。

回到"五月花"，上了八楼。小吴也来了，和潘耀明、吴祖光伯伯几个，一个个容光焕发。仔细一追究，原来是理过发了。他们几个互相理发呢！小吴小时候，是学校学雷锋小组的，专攻理发。在走廊里遇到阿根廷女作家，她指着我身上的新外套说，这是她们国家产的。"不。"我说，"是南朝鲜产的，"她坚持说这衣服的图案、式样全是南美风味的。呀，南美的样式，南朝鲜的生产，美国出售，难道这就是美国的经济？

晚上，还在聂华苓家看录相《毕业生》。写一个二十一岁的大学毕业生，写那恼人的青春，他不晓得自己要什么。最后，他知道了，他要一个女孩子，于是他浑身都抖擞了起来。我很喜欢那个插曲。他们说，曾经有个时期，这个插曲风靡全国，家喻户晓，都唱疯了。那男演员演过很多电影：《克雷默夫妇》《午夜牛郎》，是个挺棒的演员。

然后我们又看了一个美国记者采访台湾的电影，他们努力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上看台湾，台湾的生活，台湾人眼里的大陆——他们拍

摄的《苦恋》，他们描写庐山会议的电视系列片《秋蝉》，他们拍摄的《假如我是真的》——那男主角戴着八角帽，一件干部服从底扣到领口，连风纪扣都别着。我笑了起来："这一点不像知识青年，一点儿不像。"他们说："你们拍的《彩云归》也不像，一点儿不像。"也许是的，互相都不像，都陌生，而互相又都好奇——那记者说："台湾人对大陆感到好奇，这好奇证明台湾与大陆的联系，假如没了这好奇，那台湾和大陆也许就是真正割断了。"从这电视片里，我觉得，台湾好像很西化，又好像很国粹，有点畸形。国民党怕历史，因为他们怕追根溯源，怕人心思归。他们将"纵"的东西封锁了，却不怕"横"的开放，而文化是不能没有历史的，文化是不能缺少"纵"的联系的。当然，文化也同样重要地不能缺少"横"的联系。

11月14日 阴

I.W.P开告别宴会。无话可记。

聂华苓家的阳台上，风铃在冷风中叮当，地上积了一层厚厚的枯叶。爱荷华河收起了它的波光，知道冰封期将临。

11月14日 晴

今天晚上是告别晚会。

所有的作家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去了华苓家里，满满的。从明天起，作家们就要陆续分头踏上旅途了。

我们都寻找着自己喜欢的人合影，比如爱德文。“他不像是美国人。”Esther说。“为什么？”“美国人工作很有计划，很有效率，却不带任何感情。而他不。”是的，他不，爱德文不。比如汉斯，我们是同学呀！他像个大孩子一样，每当老师要他回答问题，他就咽一口唾沫，吐出一口气，再吸进一口气，然后，一个字一个字，艰难地吐了出来。比如海尔，我记得第一次和他见面，也是在这里，不过，是在那阳台上，他对我说：“我们小时候，总说，我们在美国叫一声哈罗，从中国就传来了回声：哈罗！”哈罗，海尔。比如玛利和彼得，玛利对我们像小妈妈一样，有一次，他们要带我去教堂，可是我很饿，要吃饭，就不去了。我真后悔，我应该去的。去了那里，我也许会和他们更贴近一些。我喜欢彼得爱吹的那支宗教歌曲。……我建议Esther和墨西哥作家合影一张，因为他们很要好。曾经有一次，墨西哥作家与她长谈了一次，将他的很多故事都告诉了她，比如结婚，离婚，有了一个情人。Esther无限感慨：“一个作家，要告诉别人怎么生活，而自己的灵魂却这样空虚和痛苦，这怎么可能呢？”当我提出建议，Esther却忸怩了一阵，我说：“是不是有了什么感情？”她狠狠地打了我一下，而过后则告诉我：“后来他对我太好了，我有点害怕起来。”不过，她仍然和他照了一张相，要知道，人与人能够相逢——在偌大个世界上，是不容易的。佛家说：修百年才能同舟。

等到胶卷照完之后，我们想走了。Esther请我和潘耀明到她那里去玩。我们三个人依然走河边那条路，去芝加哥前一天晚上，我们三个人也曾走过这里。“以后，什么时候才能走在一起呢？”我说，“我们是不是要大哭一场？”Esther说：“你别惹我，我要哭起来可没法收拾啊！”她说的有几分认真，我赶紧住口了，Esther说：“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，是我留学生活中最最愉快的日子。”“明年，‘写作计划’活动，你还来工作吗？聂老师很喜欢你呢！”我说。“可是，我想转学了。”“离开爱荷华城？你不喜欢这里？”我很奇怪。“不，谁能不喜欢爱荷华。春天，雪还没化尽，花，一下子开了，一下子开了，真是奇怪，一下子全开了。可是这里毕竟太平静了，有点闭塞。”她说的同丽莎一样，“我觉得我再继续学英文，没什么意思，古英文简直像天书。我本来学英文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学中文。”“为什么要到美国来学中文呢？”“在美国，是用西方文学观念来研究中国文学的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，会有很大的启发。”“你已经找好学校了吗？”“一个是芝加哥大学，一个是威斯康辛大学。芝加哥大学好是好，可学费太贵了。”“可是你知道吗？威斯康辛中文系太棒了，功课相对地来讲，压力就大了。”潘耀明提醒她。“这个，我不怕。潘耀明，我不怕这个。”她说。“那么你在这里学了一年的学分，不就浪费了吗？”我又提醒她。“可是再读下去，就更要浪费了呢！你们说，我转学好不好？”我沉默了一会说：“你的想法也许是对的。”其实，不用我们再说什么了，她是极有主见的。别看她的模样像个小小的孩子：长长的额头，戴了副过大的眼镜。这里有很多机会，她应该试一试。问题是选择，要选对、选好。

走到她的房子，她首先冲进房间，把一些什么东西塞进抽屉，我也和她一样迅速地冲到她床边，我看到她床上放了一件红格子的衣服，那红格子很好看，我喜欢红颜色：“这衣服很好看。”“赶快放下，那是睡衣。”她对我说。

墙上挂着她家人的照片，还有她的男朋友。“他能来美国吗？”我问。“很难讲。他们家很苦，他是个穷孩子。现在在香港找了个事，赚

了很多钱，他从来没赚过这么多的钱。所以，有点舍不得放弃这个职业。”潘耀明问她：“你看过於梨华的《傅家的儿女们》吗？”“看过。我知道。这种事我知道的太多了。我对他说定，等两年。两年之后，我们听任自然。”

她剥了一盘带点苦味的葡萄柚给我们吃，又冲了一小锅日本汤，给我们解解油腻。然后放录音，是《毕业生》的插曲。她向我解释那歌词，其中有一首是影片一开头，家里为他举行毕业庆祝晚会时的。歌词大意是：死寂充满着，人们为了抵制这死寂，不注意这死寂，就不停地聊，聊，而寂寥仍然像癌症一样散布开来……正听得有意思，潘耀明又催着要回去，他明天有测验，后天有大考。

11月15日 阴

已有作家陆续离去。走廊上一片忙碌。

上午和南斯拉夫尤格西女士交谈。她是研究苏联文学的。她说苏联作家分两派，一是写城市，写工业的；一是写农村的。后一派继承传统，把农村写得很好，而似乎祸害都来自城市。

中午请东欧、印度、土耳其作家吃自己做的中国菜，照例又辛苦了潘耀明。

晚上，有同胞告别。

11月15日 多云

这一页，是最珍贵的一页。

世界本应该是这样，是朋友，就在一起；是同胞，就在一起；是亲人，就在一起……可是暂时，不能够写。好的，我不写，可我全记在心里了。我想，总会有那么一天的，可以把世界应该有的面目全写出来。

11月16日 阴

送别了一些作家，八楼顿时显得冷清了起来。情绪最不好的要算潘耀明了，大家都走了，他一个人还要留在这里念书。

收到麻省省立大学郑清茂先生、纽约陈幼石女士来信，收到圣路易士华盛顿大学正式邀请信，洛杉矶蔡先生打来的电话，他们已在那里忙起来，准备接待我们。

11月16日 多云

今天上午，陈映真和他太太一起走了。

今天上午，土耳其人走了，芬兰女作家站在他身边，送他。他祝我好运气。

走廊上，好几个房间敞开着，里面很凌乱，在打包，捆行李。

到Old Capital，等潘耀明，今天他们大考，下午没课。他说要再带我把爱荷华城没跑过的地方跑一跑，另外，他要采访我——真是可怕，到了美国也没逃脱被采访的命运。他对中国当代作家很有兴趣，作了大量的采访、研究，建立了档案——在他家的客厅里，他说，等将来大陆的文史馆建好了，他要把这些资料全捐出去。他已经出版了上下两册《当代中国作家风貌》，还打算继续写下去。

我坐在糕饼铺前的长椅上，旁边有个老人在看报。他老是朝我看，我就朝他微笑，他也微笑，微笑了一会儿，他收起报纸，我看出，他好像想和我说话。果然，他说话了，问我从哪里来的？我告诉了他。可我招架不了太多的问题，只好告诉他我不会说英语，他的神情好遗憾啊！我从心底里感到抱歉。这里的老人很寂寞，没有人愿意理他们，并且有很多专门用来骂老人、表示讨厌老人的词汇。我很想安慰安慰他们，可我没法子。有时候，我常常想，美国，已经解决了很多重大问题，为什么连这么一个很小的问题也解决不了。我觉得安慰他们一下，暖暖他们，是不难做到的。

等到了潘耀明，他神情有些沮丧。今天的考试不顺利，太难了，是一种测验智力的考试，很多人考得不好。正和他说着这些，忽然看到了Esther，我们三个人就决定一起去吃午饭。去哪儿呢？去“翠苑”

吧，那里中午有一种“special”，就是特价饭，是二元八角一份。走进“翠苑”，宾客满座，有很多中国人，也有很多外国人。那特别餐是很难吃的，可是外国人很喜欢，那全是哄美国人的——油炒饭，上面浇一层粘粘的菜汁，再放上几个油炸馄饨。美国人喜欢吃油炸的东西。此地的“燕京”生意好得不得了，秘诀就在这里，再加上味精。英文里没有“鲜”这个词，他们便更觉得妙不可言，高兴得快飞起来了。正吃着，那位诗人小陈来了，他近来情绪似有些消沉，将诗兴收敛了许多。潘耀明问他：“最近从图书馆的窗口里，看到什么女孩子没有？”“没有没有，没有女孩子了。”他回答。他没有和我们坐在一起，而是走过去，同一个美国女孩子坐在一起吃了，好像又在谈诗。

吃完饭，走出“翠苑”。太阳很好，潘耀明打开照相机，说：“我来给你们拍几张沙龙照片。”“什么叫沙龙照片？”我不明白，问Esther。她说：“就是什么云啊，雾啊，花啊！”“这是艺术！你们不懂。”潘耀明很气愤。拍完“沙龙”，又去Old Capital，Esther陪我去买磁带，潘耀明在外面长椅上打瞌睡，他总是困得不可开交。Esther说：“我很喜欢Old Capital，好像有一种温暖的气氛。”是的，我也很喜欢，这里有很多人，很多闲人。美国太少闲人了，每个人都匆匆忙忙的。而这里的人在看衣服，在看商品，慢慢的、挑挑剔剔的……这里集中了美国人有限的一点余暇，这里有一种新的生活气息。磁带很多，我要买两个美国当代歌手的磁带，这是谭嘉向我介绍的：一个叫Niel Diamonol，他唱的歌，他的音乐，是歌颂工业文明、现代文明的，他使我很感兴趣。另一个叫Tohnny Cash，是一个乡村歌手，他唱的多半是乡村生活，人类历史。一看价格，吓了一跳，决定舍弃Johnny Cash，买了一盘Diamonol的。拿到柜台上去算账，不料这盘磁带要双倍的价钱。“呀，真贵。”我说，“不过，这是很好的歌手，我也喜欢。”她说。我们自己叽叽咕咕地议论着，那算账收款的小伙子不满意了，他说：“你们在说什么？是不是在议论我？”“没有，没有。”Esther向他解释。还有一个多月就是圣诞节了，商店里摆了很多圣诞礼品。

潘耀明已经睡着了，我们大喊大叫地把他叫醒，然后说：“跟我们走，我们已经把你卖了。”他糊里糊涂地穿好外套，跟我们走了。然后，Esther要去图书馆，我们便在路口分手了。

潘耀明并没有忘记采访的任务，开始要我谈创作体会。我拒绝谈，因为这一年里，这些同样的话，我已经翻来覆去说了有上百遍了，我烦了。可他十分诚恳而又急切，实在无奈，便只好说了一点。而我发现，来美这两个多月，我已经把这些经验体会忘得差不多了。我希望统统忘记，这才好呢。

11月17日 阴

许世旭在家欢送我们。

蓝蓝这个坦荡而纯真的姑娘，跟我倾诉了她的心路历程，感情表达得十分细婉动人。

11月17日 晴

上午，谭嘉带我们去银行结账取钱，把所有的钱，大部分换成旅行支票，小部分换成现款。我的支票用得很乱，自己没有记录。可是银行里全有记录，一清二楚，写出去的支票统统回到了银行，一笔不少。他说：“你的支票里有一个问题，有几张支票写错了。”然后他报了一串号码。我赶紧说：“是我扔掉了，因为写错了。”“好，那么就对了。”这个人很和蔼，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妻子孩子的照片，回头看看，周围几张桌上，也都放着家人的照片。谭嘉再三嘱咐我们，到了大城市，身边一定要少带现钱，一定要小心。我问：“究竟会遇到什么样的事？他们是来摸口袋，还是来抢？”“有摸的，也有抢的，还有来向你讨钱买酒喝的。”我感到很兴奋，我总是在期待着遇到一桩奇遇，爱荷华是太宁静了。

下午，Alex来帮助我们寄东西。我们将几箱书直接寄回国，几个箱子，里面装上不用的东西和夏天的衣服，寄到旧金山，这是我们在美国的最后一站。一切就绪，要搬运行李的时候，潘耀明回来了，来的正是时候，正需要劳动力。他今天回来的特别早，是为了采访妈妈，却叫我们抓了劳工。于是他跟车到了邮局。这几件行李都相当重，一个邮政人员已经有了些年纪，一件一件搬上磅秤，秤台又很高，十分吃力。我说：“我们能进去帮帮他吗？”“不能。”Alex说，不可以随便进柜台的。但愿不要寄丢了，假如行李丢了，最惨的是吴祖光伯伯，他所有的箱子都寄走了，手里只提一套西装。假如寄丢了，他就只能提着一套西装回北京了。

晚上，去许先生家，他为我们送行。分手时，他对我说：“你试着来封信吧，信上不要写别的，只是问平安。”“能收到吗？”“也许。”他

只能说也许。我发现，南朝鲜对于我也是重要的。真的，世界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隔离呢？

11月18日 阴有雨

下午在华苓家，各谈了经历，产生了今后写通讯的想法。

晚上在华苓楼上的书房里，潘耀明一本正经地对我进行了录音采访。

11月18日 阴有雨

上午，南非女作家和印度作家走了，他们哭了，哭得很伤心。唉，祝你们好运气。

下午，潘耀明从市中心来电话，说他要去看房子，有人为他介绍了两处。他决定尽早搬出“五月花”公寓。这么一下子，大家全走了，人去楼空，那寂寥是可以想见的。他开始找房子了，问我有没有兴趣一块儿去看看。我当然有兴趣，我对什么都有兴趣。当我们在学生中心前碰头时，他已经和那两处的房主通了电话，他对那里的情况不甚满意。一处是月租一百四十元，与两位台湾女学生共用一个厨房，一个洗澡间。那两个女孩子并不在乎。他则很在乎。另一处是月租一百八十元，他嫌太贵了。并且他希望和美国人住在一起，可以提高口语能力。艾恩劝他去爱荷华日报登个广告。于是，我们就一起去报社。广告科是一位老年女人，十分和蔼可亲，她帮助潘耀明把广告的字数压缩到不能再压缩的程度：一共才只十六个字，这十六个字说明了自己的身份——香港学生，又说明了要求——要一个美国家庭，要离市中心近一些。十六个字，登十天，收费十元零八分美金。我发现这报社编辑部的人都很年轻，像小娃娃一样。

晚上，蓝蓝带我去Hancher看演出，是他们学校舞蹈系的师生创作的一台现代舞。蓝蓝没有参加编导。她说：“有时想想，真没意思，一年里，辛辛苦苦，编一台舞，在Hancher演过这么一二场，就算完了，什么也没有了。唉，爱荷华太偏僻了。”“你想去哪里呢？”“我想去纽约，那是艺术中心。”蓝蓝轻轻地扶着方向盘，眼睛看着前方，她今天穿了一身优雅的蓝裙子，侧面看起来挺美。“安霞不来看？”“本来系里要她来献花，我没让，我不想让她喜欢舞蹈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舞蹈需要

感情，需要得太多了。我有个老师，在纽约，就是今年夏天我和他一起去中国的那位，他说，他整个人，已经被抽空了。”“哦。可是安霞真漂亮。”“她的感情太细腻，我很担心她。她六岁的时候，对我说过：爸爸总是不快活，总是不快活。有一天，她忽然哭起来，说：她想要一个人，不知道是谁。她想要一个爸爸，可是，不是这个爸爸。”“她说？”“是的，她说。我要保护她，可是很难，周围是那样的……怎么说呢？她们现在，学校里已经进行性教育了。她才九岁。”蓝蓝笑了一下，我不说话。

Hancher灯火很辉煌，四面八方开来汽车，停在Hancher前边的空地上。

这一台舞蹈，水平比较一般，尤其是一个表现动物的舞，我很不喜欢，我感到有些猥琐。蓝蓝告诉我，编舞是系里最年轻的女教师，很傲，是个同性恋者。但其中还有个舞是纽约职业剧团的老师来教的，显然很不同。“你看那个男孩子，黑头发的。”“嗯。”“他很有前途，我送他去纽约我老师的那个团训练了一段时期，大有进步。他马上要毕业了，已经和一个职业舞团联系好了。”他果然跳得很不一般，“他是个同性恋者。”蓝蓝轻轻地说。那男孩子很漂亮，我想，追求他的女孩子一定很多。

“这儿的学生水平不高。”蓝蓝说。“他们怎么进来的？要考吗？”“他们自己选修舞蹈系，交学费，就得了。”“哦，只要喜欢，都可以试一试？”“是的。这都是傻瓜，美国学艺术的都是傻瓜，聪明人学医，学法律，学电脑，好找工作，挣钱又多。”

“蓝蓝，我不明白，”我说，“我看《邓肯自传》，那现代舞给我的感觉是充满了人生的欢欣，生命的蓬勃，而如今，我在现代舞里看到了很多痛苦。”

“也许是，人类越来越痛苦了。”蓝蓝说。

外面在下雨，今天一天都很暖，暖得叫人吃惊。果然是，下雨了。

11月19日 阴

准备行装。将旅途中用不着的衣物，寄旧金山领事馆。把书寄回国内。忙忙碌碌，又不知自己忙了些什么。

11月19日 雨

早上起来，我用吸尘器把房间里里外外扫了一遍，又和妈妈一起拆洗煤气灶。这里的规矩是这样，离开之前，一定要收拾干净。假如不收拾，房主会找人来收拾，然后寄给你一张账单，请你付工钱。

中午时分，安娜来了，她是特意来送我的，送给我一盒爵士乐的磁带，我很喜欢。安娜说，她听Alex说，我在芝加哥时，很喜欢听Blues，很喜欢听音乐。她又说，每年这个时候，作家们旅行去了，一个个很高兴，而留下的人就很难过。

我一整天都很兴奋，明天要去华盛顿了！

跑进潘耀明的房间，他正在和谁打电话，我冲着话筒大叫一声“Hi！”他吓了一跳，赶紧捂住话筒，厉声说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他要和我再打一场乒乓，他一定要雪耻。于是就下到娱乐室，打了三盘，这回是我输了，可我真的觉得自己是让他的。他请客，请我玩电子游戏，我的反应永远赶不上屏幕上的变化。那小人总是被追得走投无路，最后当头一棒，倒在地下死去——结束了，必须再扔一个二十五分，再开始第二场战斗。

然后，我们就忙着准备晚上吃火锅的材料：剥虾，切鱼片，洗菜，泡粉丝……我们要请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吃火锅：华苓、蓝蓝、谭嘉、吕嘉行、Esther、Alex、小吴他们几个大陆学生……

Esther要到三楼一个美国同学那儿去送一封信，问我愿不愿意陪她去，自然是陪她去。下到三楼，走出电梯，这里的气氛与八楼全然不一样，走廊上贴了花花绿绿的各种海报、图片，门上画着各种图案，

很热闹。那同学住在走廊尽头。她们是四个女生住一单元，两个人共一个卧室一个书房。她住卧室，她的同屋住书房，因为这个同屋要抽烟，宁可单独住小小的书房。书房的墙上贴了许多男人的照片，都是些电影明星，流行歌手。Esther的那个朋友则贴了许多电影海报，唱片封套皮，一张从楼下偷来的布告，还贴了一大张列宁的相片——因为她去过苏联。她才大学二年级，十八九岁，模样已经很成熟，神态却仍是个孩子。Esther交给她一个信封，她和Esther推让着，最后只得留下了。这信封里是一点钱，原来是有一个星期六，Esther在这里度周末，教她烧中国菜，她居然付给Esther钱，Esther说："我简直气死了。"走出她们房间，迎面是一个男学生的房间，门上写着"I★school"这★表示"爱"——我爱学校。我回头问她："不是说男生住一层，女生住一层吗？"因为有一次，一群喝醉酒的男生上到八楼，来找女孩子。据说八楼原本是住女孩子的。她说："并没有的。只是，好像六楼住的全是男孩子。"我想起，第一天到"五月花"的晚上，这里的着火就源出于六楼。

进了电梯，这电梯莫名其妙地下到了一楼，门开了，进来一伙兴高采烈的学生，穿着黑黄两色象征爱荷华的衣服，大声叫喊着拥进来，把电梯塞得满满的，使得我们只能紧紧贴在墙上。他们又吵又闹，原来是下午比赛足球，爱荷华队以五十几比七胜了客队。这个队曾经打败过爱荷华队，以三十几比零的比分，在爱荷华队史上留下了最最羞辱的一页。今天总算是雪耻了。然而五十几比七的悬殊，究竟也算不上是精彩的比赛了，拿得太容易了。他们十分兴奋，大声笑着，我和Esther被挤得动也不能动。"我们怎么会到这里来了？"我问Esther，"不知道。"她说。到了四楼，他们全部涌出去，我们才喘出气来。一到八楼，便遇到爱德文，他是特地来道别的。他拥抱了我，说："这是西方礼节。"

吃完火锅，在一起照了几张相，便纷纷道别了。我不愿和Esther说话了，因为她眼睛红红的，兴许是要哭，又兴许已经哭过了。等他们走后才知道，她已经大哭了一场。呵，Esther。

晚上，玛利和彼得来向我们道别。

更晚一些，Esther来电话了。

“你好，Esther。”

“你好。唉，你们这一走，就好像是到了另外一个国家，不，还不如真是另外一个国家呢。”

“也许我们很难见面。可是，我希望明年秋天，有一个我喜欢的作家来爱荷华，而你又还没有走，就一定给他作翻译。我想你会喜欢他，他有一米九十高，有点像陈映真，会画画，喜欢音乐，小说写得很好，你一定会喜欢他。”

“可不要再喜欢了，分手时好伤心。”

“假如他要能来的话，这就更麻烦了，因为这是个男的！”

“呀！天哪！我一定要离开爱荷华了。”她叫道：“哎，我告诉你一件事。我刚刚知道，我们家还有一个关系在上海。”“谁？”“我爸爸过去的太太。”“呀——”“我爸爸一直在和她联系，通过我男朋友转，他不是在香港吗？”“这可以写一篇小说了。”“事情越来越复杂了。我刚听说时，我好乐啊！唉，想想看，我爸爸心里一定挺难过，他让我男朋友给她寄点钱做生日，我爸爸一定很想念她。干脆，让他们俩‘统一’吧！……”

“你给你奶奶的钱寄了吗？”

“我要去打听，据说爱荷华还不能寄。我奶奶八十岁大寿啊！想好好办几桌。你们那里能办寿宴吗？”

“能办，只要有钱，办吧！”

……

这是爱荷华最后一个晚上了，天不好，下着雨，奇怪地暖和着。树叶都落了，露出树枝，在夜幕上画下一张篱笆。

11月20日 阴

一早，华苓、蓝蓝、潘耀明送我上飞机场。华苓煮了咖啡，装在水瓶里，让我们在路上喝。

去华盛顿需在圣路易斯换飞机，在机场碰到一位曾到大连讲授过管理学的同胞，他对于祖国现在也学习经济管理，感到十分振奋。他认为日本是搞得最理想的一个国家。在工作时，他们讲科技实效，回到家里，则有人情伦理，讲文化讲修养。他认为美国有其前者而缺乏后者；中国呢，则有其后者而缺前者。他对中国现在打破大锅饭十分赞赏，认为“有些事，看起来是有些残酷的，你不合适就请下去，也不是不给出路，换一个工作不是也很好？实在不会做，扫地总会的。要看到这对整个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”。

他也上华盛顿，与我们同机。他津津有味地谈了一路，十分热情。

十点半到达华盛顿，有大使馆舒暲等诸位同志来机场接我们。

中国是个等级分明的国家，就是在使馆也有这个感觉。我们一进使馆，便和吴祖光进了两个不同的电梯。吴祖光同志住大楼，我和安忆住后面的小楼。住小楼的人不能去大楼，有事必须由传达室通知，由大楼的人下来谈，或是负责把你带上去。这对我们倒无所谓，却给吴祖光带来很大不便，因为我们先来华盛顿，主要为了他可以和女儿及未来的女婿，在一起过感恩节，在此期间，他女儿要来住一两天。他女儿当然也上不去那个大楼，这使吴祖光有点发愁。

傍晚，有《半边人》的编剧兼主演王正方和他夫人一起来接我们，到叶芸芸家里去玩。

叶芸芸是由朋友辗转介绍的。她出生在台湾，来美已经十年。她是学服装设计的，又做得一手好菜，曾经教过烹调。现在她放弃了这一切能赚钱的工作，靠丈夫的月薪生活，自己则找了二十个股东（自己是义务劳动），办了一个叫做《台湾与世界》的月刊，四分之三是赠送，只有四分之一是卖出的，所以每月要亏损上千元。

我问她，办这刊物的宗旨是什么?

她丈夫是搞理工的，一直默默地在厨房里忙进忙出，一听这话，连忙插话说："问得好，这问题问得好！"有一种不胜负荷的样子。

叶芸芸看上去有三十多岁，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一身学生打扮，家里也并不富有。她不管丈夫的揶揄，非常认真，也不无苦恼地说，她不同意台湾现在的政治，不同意"台独"的那些理论，也不同意大陆的某些做法，"我想探求另一种认识"。

她请我们吃了两头尖的海蟹，上海叫梭子蟹，是论斤称的，在美国恐怕要按只论价了。

在她家看了一部描写核战争的电视，看完以后觉得有些失望，不如日本描写同类题材的片子。日本人因为亲身受过，有更多的真情实感。而美国人从想象出发来描写这个，不过是用来吓唬吓唬人。

告辞出来已十点多一点，天下雨了，人很疲劳。使馆的规矩是十一点以前必须返回，叶芸芸家住郊区，王正方飞车把我们送回，正好十一点到达使馆。经过了盘问，让我们入内，到达华盛顿的第一天，总算就此结束。

11月20日 晴

今天离开爱荷华。

今天踏上旅行的路途。

今天去华盛顿。华盛顿是美国的首都。

飞机要在圣路易斯停机一小时，然后再上机。我们三个人都不懂英文，有点紧张。华苓和航空公司说明了我们的情况，他们立即打电话交代给飞机上的空中小姐，要求特别照应。正好，吕嘉行又在机场遇到他的一个美国朋友，和我们同路，就让他来带领我们。他非常负责，空中小姐也很负责，飞机刚一降落便来关照我们。其实不用担心，非常顺利。出了飞机，机舱的门直接通往大客车，大客车将我们带到下一班飞机的进入门口。一个美籍华人，主动走上前来和我们聊天，他是去华盛顿讲学的。今年他曾回国内讲学，讲工业管理。一路上，他和妈妈、吴祖光伯伯谈个不休。我没有精力，乘飞机始终是我的一桩苦事。不过，这次来美国还算好，只是降落时，耳朵疼得厉害，一时上，如同坠入云里雾里，听什么声音都像是从极远处传来，包括自己的声音。

到了机场，两位使馆同志来接，把我们安排到大使馆的小楼。这小楼是在使馆大楼的侧面。

到处是中文的布告和说明，人人都说中国话，还有热水瓶——这是来美国后第一次看到热水瓶。小楼正修理，房间的墙被敲破了，浴室里很脏乱，百叶窗落了下来，洗脸池和澡缸积了很厚的污垢，好像长久没有人来住了。令人惊奇的是，也有热水——暖水管里也有热水，这样的澡间，像是不会有热水了。很高兴，赶紧洗头发洗澡。

晚上，叶芸芸女士请我们吃饭，在座的还有一位余珍珠小姐，一对搞电影的夫妇王正方和孙小铃。王正方最近演了一部电影《半边人》，在香港很轰动，报纸上有大幅的广告，照片。可惜我们一点儿认不出来。

叶芸芸有点像日本人，短短的头发，很清秀。她现在正自己办刊物——《台湾和世界》。筹了二十几个股东，她事先就声明："股东们应该有这种觉悟，就是说，三年里要亏本。"股东们回答："可以。可是，假如第一年里，发行不到一千本，我们就要抽股。"现在才只半年，已超过一千份，这第一步是成功了。但是，相当困难。叶芸芸不做事，她先生——一位老实的基础生物学教授要养她和两个儿子，还要为她贴补《台湾和世界》的亏损。我们问叶芸芸："为什么要办这个刊物？"她先生立即说："这是个好问题！"大家都笑了，叶芸芸也笑，然后就从容不迫地回答起来：他们的宗旨是要重新认识台湾和中国的关系。在美国，发行这么一个内容严肃并且又是中文的刊物，那困难是可以想见的。每期要亏四千美金——她先生只是苦笑，他也只能够苦笑。大家都夸他，称他为"默默地耕耘"。

八点钟，要放一个电视片——The Day After，早就听说过这电视剧了，电视上早已作了大量的宣传。这是一个幻想的故事，假设有那么一天，苏美发生核战争，那可怕悲惨的结果。几乎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去看这电视片，这是美国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。可是叶芸芸却不许她的小儿子看，她怕电影上那种残酷恐惧的场面，对孩子心理有刺激。他却很想看，要知道，所有的人都在看电视，而他一个人在房间里，那是不公平的。后来，大儿子和弟弟悄悄地进行了一场谈判，然后把弟弟送上了楼。谈判成功的条件是，给他两元美金。

电视剧拍摄得并不特别成功，总之，没有宣传的那么好。可是大家还是极有兴趣。反对核战争，已经成了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了。小学里都向孩子们宣传，让孩子给里根总统写信：停止核试

验。这就像家里放了一堆炸药，不晓得哪一天就要爆炸，而家人不愿扔出去，还要不断增加。并且，是这么一个富裕舒适的家。

11月21日 晴

上午叶芸芸来，带我们坐地铁到Well。这是约有上海三四条马路长的一个广场。一头是华盛顿纪念碑，另一头是林肯纪念堂，这两个建筑物前面，都有一方面积在二三十亩地大的喷水池。沿广场周围有国会大厦、宇宙馆、自然博物馆、美术馆、国会图书馆等等，因此这里又是一个文化中心。当中一条极宽阔的马路，汽车禁止入内，只供游人散步，两旁都有路椅。

我们先参观国会大厦。大厦在前两个星期被人炸坏了一个角，现正在修理。正面楼的上半部蒙着塑料薄膜，远看像贴着一块大膏药。走上无数的台阶，进门处受了如进飞机场那样严格的安全检查。圆形的前厅，由一座座全身的雕像、大幅的壁画所组成，然后是大理石的楼梯、长廊、会议厅。参观的人相当多。

在宇宙馆楼上自助餐厅里，随便吃了些东西，便去楼下影院，看了四十分钟有关自然方面的电影。银幕极宽，立体感强，声音也是立体的。因而看的时候常常被那夸大了的自然现象，如瀑布、海浪、风云等等镜头和声音所震慑。

回来的时候，仍由叶芸芸带我们坐地铁。华盛顿的地铁秩序较好，也比较干净。据说纽约的地铁，单身女人是不敢坐的，特别是晚上。叶芸芸送我们到站，我们就自己找回使馆，其实路并不远。

回来休息片刻，就随吴祖光访问时钟雯教授。她住在水门公寓。这所大厦的一部分是高级公寓，一部分是旅馆，一部分是办公室。水门事件就发生在这里。从阳台上望出去，远处是河，下面是露天咖啡

座，环境是很好的。房子不是很大，只一厅一房，不过客厅相当大。房价可想而知是昂贵的。

张恨水的女儿张明明，带了两只菜也来看我们。她和丈夫开了一家印尼和中国风味的菜馆，刚刚开张不久。

时教授是教中国古典文学的，但她却收集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录像谈话。

11月21日 晴

上午，叶芸芸陪我们去华盛顿的中心广场玩。乘地下铁去。走过狮子桥——这桥在大使馆附近，因为桥两头立着石雕的狮子，使馆的人就这么叫了——在“动物园”站乘地铁。自动电梯往下，往下，往下，回头看看，很远很高的地方，有一方蓝天，天很蓝，电梯斜下、斜下、斜下，直下到很深很深的深处。

“很壮观吧？”叶芸芸问我。“很壮观。”穹顶是个巨大的弧度，自动检票机，自动售票机，一排排的，像一支颇有威风的军队。“要是机器坏了，可糟了，只能叫一个人站在出口，手捧一个纸筒，请大家自动丢钱，乱七八糟。”“会有这种事发生吗？”“经常有。”“听说纽约的地铁很糟。”我问。她微笑了一下：“很糟，很旧，可是很管用，很方便，你去了就知道。华盛顿的地铁很漂亮，可它只是为中产阶级服务的，你们来看。”她带我们到地铁线路图前，“这是市中心。现在，有钱人并不住市中心，喜欢住在市区外面，马里兰州和佛吉尼亚州，我就是住在佛吉尼亚州。华盛顿这个首都，是用了马里兰州和佛吉尼亚州的土地建成的。中产阶级都住在城外。”她的手指在市中心的外面划了一圈。“这是地铁，你看，它们从不同的地方，从外面伸向中心。住在市里的人，要从这儿到那儿，就用不上地铁了。”果然是这样，地铁从中心分头伸向外围，呈现出一个放射性的图案。

车来了。

这就是相当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一样的地方，首府中心。绿绿的草坪，草坪上停着鸽子；蓝天将池水映蓝了，水面上飞着水鸟。树叶还没落完，黄黄的，这儿比爱荷华暖和，也湿润。国会大厦在两个星期

前被一颗定时炸弹炸了，现正在整修，外部用塑料布盖了起来，也有盖不住的地方，搭着脚手架，工人们在工作。然后去宇航馆，先吃午饭。午饭在楼上，要排队上电梯，一个黑女人开电梯，点人数，这里的门卫，几乎都是黑人，据说这个城市，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是黑人，市长从来都是黑人。

“你是哪一年来美国的？”我们一边吃饭，一边和叶芸芸聊天。

“说起来话长。”她微笑了一下，“那一年，中国在美国建立大使馆，而台湾则撤出。我父亲很高兴，当然，他不能到外面去放鞭炮。晚上，他开了一瓶酒。但是，又有点担忧：台湾会怎么样呢？于是，就对我们孩子说：你们年轻人还是走吧。就这样，我们来了美国。”

“你打算在美国定居？”

她又微笑了一下：“我这一二年，思想上有个转变。过去，我并不想在这里定居，总想回去，回台湾或者——。两年前，我回了一次台湾，我很失望。我感到在台湾，那种奋斗、竞争的方式，都是我所不能胜任的。我完全不具备这种能力。”她又微笑了一下，“而且，我的孩子们也影响了我。老大有时会说‘我是在美国的中国人’，会说‘他们美国人’；而小儿子则完全以为他就是美国人，他认为这里是他的家。把他带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对他说：‘那不是你的家，这才是。’毕竟有些残酷。这孩子完全是美国孩子了，他不晓得什么是饿肚子，以为生活就应该这么好。”

“美国的生活是很好。”我说。我想起吕嘉行有一次告诉我，他去看《齐瓦哥医生》，影片上那些描写十月革命以后艰苦的生活场面，前排坐着的一群中学生，不相信是真的，以为是胡闹，是逗乐，笑得不得了，开心得不得了。唉，这个不知油盐柴米愁的民族，将来要受惩罚的。

“太浪费了，没有必要这样奢侈。欧洲国家也没有这样。这样浪费下去，前景是可怕的，因为地球就这么大，它能提供的资源是有限

的。并且，美国的生活也已经不如前二十年了。”

“你喜欢美国吗？”我问她。

“我想我是喜欢的，”她说，“假如我不来美国，我也许永远不会发现自己的潜力在哪里。在这里，每个人都可以试一试，很多次地试一试。”

吃过午饭，去看电影。影幕是弧形的，立体感非常强，这电影是介绍地球上的生活，下一场是介绍宇宙，可惜我们没有时间了。出来以后去参观一个太空舱，排很长的队，我正和叶芸芸谈话跟着队伍进去，还没注意什么，以为内容还在前面，不想已经出来了。只看到两边玻璃橱窗里有许多亮晶晶的零件和机器，还有一个人，想必就是宇航员了。

走出宇航馆，去华盛顿纪念碑，本想乘电梯到那塔尖上，可是队排得很长，绕塔一周，就算了。远远地看了林肯纪念堂——那是一座与毛主席纪念堂极相似的建筑，不高，很稳定，面对华盛顿纪念碑。

华盛顿很有气派，并且，我奇怪，这么科学发达、工业发达的美国，怎么会和大自然这么贴近。“狮子桥”下是一大片密密的树林，到处是绿绿的草坪，草坪上停着鸽子，水面上飞着水鸟。很多人在跑步，晒太阳。叶芸芸说：“这里的人大都是政府机关工作的，人们常常讽刺他们，每天的工作是：‘十一点吃饭，然后跑步，然后洗澡，两点上班，四点下班。’这里的官僚气很重。在旧金山，一个邮包半个月能收到，在华盛顿，则要两个月。”

巧得很，在地铁上，遇到了写作中心的墨西哥作家，见了面，大家都很兴奋。

晚上，一位时钟雯教授请我们吃饭，在座的，还有张明明，她和我约好，后天下午带我出去逛街。她是张恨水先生的女儿，在爱荷华大学，我曾看了她写的《我的爸爸张恨水》。

时钟雯常去中国，最近电视里播放的一个关于中国作家的电视片，就是她采访并制作的，电视片里介绍了茅盾，丁玲，艾青，巴金。她有两本纪念册，全是来美的中国作家或别的什么家的签名留影：谢芳，秦怡，刘心武，谌容，张洁等等。

她的房子是太漂亮了，站在阳台上望过去，灯光灿烂，像一条星河盘绕蜿蜒着。她的公寓叫水门公寓，和水门饭店在一起。这里发生过著名的水门事件。

11月22日 晴

九时“美国之音”的记者来使馆访问。

十时，由舒暲同志带我们参观国会图书馆。

下午参观美术馆，可惜由于时间关系，只看了一部分，最精彩的是罗丹的雕塑。晚上是龙先生（龙云的儿子）在他开的燕京餐馆请客。厨师是刚从云南来的大师傅，据说曾给毛主席做过菜。见到了吴霜的男朋友别尔，穿得笔挺，来见未来的岳丈大人。

走马看花的参观，也只好写流水账似的日记。

11月22日 晴

上午，美国之音的格森（是个中国人）来采访，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。我对美国的采访很喜欢，简单，干脆，问题有长有短，生动活泼。而我们的采访，常常是从根上问起，哪怕只写一个小小的东西，问题又总是千篇一律：“你是怎么走上创作道路的？”“你写作的主题是什么？”……

然后去参观国会图书馆，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，一共有三栋楼，藏书很多，并藏有别的各种宝贵资料，比如电影，比如最昂贵的大提琴。中午在图书馆的餐厅吃饭，是接待我们参观的中文部主任王冀先生请的客。他非常热衷于戏剧，早年还写过一个剧本，拿来那剧照给大家传看。

然后去参观国家艺术馆，艺术馆的建筑非常特别，是个中国人——贝聿铭设计的。分两个馆，东馆和西馆，东馆是现代艺术品，西馆则是古典的。从东馆到西馆隔了一个广场，广场中央是个喷水池，也可以从地下道走，喷水池下面正是个咖啡厅。看得非常之匆忙，大家都累了，早早地走出展览馆，叫了出租汽车，回大使馆了。

回去之后便睡觉，到七点左右时，下楼去集合。晚上有位龙先生请我们吃饭，他和我们谁也不认识，是受托了一位朋友，这位朋友叫唐中旋，是吴祖光伯伯的好朋友，所以我们也就一起被请进去了。

下楼来，吴祖光伯伯已经在楼下了，正和时钟雯教授谈话，谈了一会儿，时教授向我们一招手：“你们坐过来好不好。”然后说，“我到学校里去争取来了摄影机，明天下午三点钟，给你们录段相，你们谈点什么好吗？”我们面面相觑，一时说不出什么来。“我不知道该问你

们什么，你们看你们想谈什么？”她说。老实说，我什么也不想谈。她对我说：“我没看过你的作品，不知道问什么好？”我心想：那么就不要问好了。她何必要来录我们的相，也许是为了备考，以免日后我们成了大人物而不至于漏了我们。我说：“明天下午我和朋友有约会呢！”“那也好。”她说。她对我是不高兴了，而我很高兴。我讨厌采访，更讨厌这种没有平等的诚意的采访，我不希望我们的旅行里，充满了采访、应酬、吃饭、谈话。

在龙先生的餐馆里吃饭，那中国餐馆与爱荷华的中国餐馆大相径庭，气派豪华得多，菜也精致得多了。今天为我们做菜的是龙家的一个老厨师。他们龙家当年在云南是很有背景的，龙先生的父亲是位要人，由于他的起义，而使云南和平解放，恕我不精通中国近代史，说不出他的名字。这老厨师后来被介绍给毛主席，为毛主席做饭了。两个星期前来到美国，为餐馆厨师做指导。龙先生开了两个餐馆，只为了应酬方便，并不真为赚钱，他主要是做中国和美国的某某生意交流，他是第一次将中国电影介绍到美国来的，那电影是《林则徐》。饭后，龙师傅又出来和我们见面，他是极纯朴的一个老师傅，好久没见到这样的老师傅了。同桌吃饭的有小霜，小霜的男朋友——一个白白胖胖、高高大大的美国人，弹钢琴的，现在华盛顿歌剧院做事；一位龙先生的美国朋友，搞迪斯科广告音乐；另有一位美国人——他见到我们使馆的司机小马，立即上去与他握手，因为他们曾在一起吃过饭，他说了一连串热情的话，小马一句也不懂，却好像懂了的样子，用西安话回答他：“有空上我们那儿去玩儿啊！”我一下子笑出声来，好朴实的人情，好久没听过这话了，小马刚从国内来，却似乎比谁都了解情况，一路上。他老在介绍那位龙先生的身份：“老夫妻俩一起来美国，后来那老太太死了，留下两个儿子，一人开一个饭馆，一个叫北宫，一个叫南宫……”舒暲实在听不下去了，说：“你在说什么呀？”他则强调：“我一点儿也没错，是这样，夫妻俩来到美国，老太太死了……”舒暲只好笑。

回到使馆，舒暲带我去打电话，打给纽约的一位年轻画家——我从舒暲这儿得知他在纽约，我很崇拜他，比崇拜任何一位作家都要崇拜，那才是真有才学的画家，我曾经看过他的一篇创作谈，谈风格："它好比纯属私人的事情，每一个念头，每一层原委都是不容易说清楚的。"我对舒暲说："我想和他认识。"

电话接通了，不曾想，他也知道我，并没看过我的东西，只知道，王安忆很有名。真该死。我们立即在电话里聊起来，一聊就聊个没完，"好了好了，到纽约再谈吧。"我们说。

纽约，是下一个站。据说，当今世界艺术中心转移到了纽约，不再是巴黎。纽约聚集了一大批青年人，在那里作最后的拼搏。能在纽约崭露头角，就算是世界水平，假如败下阵来，也就无话可说，认输吧。

11月23日 阴

上午和安忆两个出来走走，看看市容。华盛顿一切建筑都不得超过国会大厦，因此这里没有高层建筑，整个城市倒十分敞爽。空气湿润，气候温暖，倒和上海的秋天仿佛。

走了几条街，在摊子上买了一块钱四只大香蕉。这里好像是一个使馆区，房子大，门口站着警卫。店铺有一些，但却很小，东西特别贵。

张明明开了车来，带我们去鱼市场。这是一个河码头，靠水面的一边，都是鲜鱼铺子。两元五角一打的小蚌，鱼的标价是五至七元不等。她又带我们去逛了唐人街，看了黑人区，在一个类似城隍庙似的夜市里尝了“热狗”。就是在面包里夹一条烤热了的小香肠，加上你所喜欢的佐料，这就是一顿简单的饭。

傍晚，汽车绕到十四街，这里是红灯区，类似旧上海的四马路。不过这里路面宽阔，两边的商店也很气派。今天是感恩节的前夕，下着小雨，路上很清静。夜市又太早，特色还未出来。因为我们晚上还要看歌剧，她只得在七点前送我们回使馆了。

张明明和她丈夫来美国已经四年了。她丈夫出生印尼，在大陆学的是环卫，研究污染问题的，过去不想出来，而且宁可夫妇分居两地，主要是想搞专业。他父母都在香港。“文革”后期，她和丈夫先到香港，后来美国。出来时思想上已作好准备，在外只能挣钱糊口，不可能再搞对口的专业了。现在租到了一个门面，开了一个印尼风味的饭馆，刚刚开张二十天，还不知能否赚钱。在唐人街逛时，她带我们进了一个王氏什么公司的大店里。这个店的老板娘是上海人，跟张明

明认识的。所以她特地进去买了一包茶叶，借此和老板娘说话，说明了自己餐馆的方向位置，请老板娘关照光顾。

真是辛苦经营，很不容易。

晚上是安格尔请客，为我们订的票，在肯尼迪中心。这是一所三个大剧场联成一个大厦。休息厅外面，是广场那么大的平台、喷水池。我们看的是轻歌剧，门票是四十美元一张，这里没有一个黑人。

11月23日 雨

下午，张明明来带我们去逛。“你们想去什么地方？”她问，“去黑人区，好吗？”“当然好。”她发动了车，把车开得飞快。

街上车很多，可是并没有到下班的时间哪。“明天是感恩节，都提早下班了，回家过节。感恩节是美国人很重视的，放两天假呢。”果然，街上装饰得很漂亮，树枝上缀满了灯。

街上的车少了，人也少了，冷清起来。建筑很单调，公寓很像大陆近几年大兴建造的新工房。这是黑人区。

“走吧，这么看也看不出什么名堂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我们去唐人街吧。那里我很熟，刚来美国，我就住唐人街。”明明今天打扮得很漂亮。她是个典型的北方姑娘，高高大大，很爽朗。她是学美术设计的，大学毕业后，分在成都工作，她丈夫却分在兰州，是搞气象物理的，搞什么人工化雨、人工化雾的研究，他很喜欢他的专业。他们分两地的生活一直过了八年，最后，明明终于调到了兰州。七六年六月，他们申请去了香港，她丈夫是出生在印尼的华侨，母亲在香港。七六年六月，那是最黑暗的时候，探亲签证三个月的期限过去了，他们商量是回去还是不回去，最后决定留下。不曾想，很快，“四人帮”就打倒了。她丈夫在一个贸易处找到一个专对中美做生意的翻译工作，后来这家公司要在美国设一个代办处，他们便一起到了美国，那是在四年前。但这单位工作的性质很受中美关系的左右，前时期，中美关系有摇摆，于是，他们也很不稳定，而对着失

业的威胁，有着风雨飘摇之感。二十天以前，他们开了个餐馆，决定放弃工作，自己打下个天地。

“在美国，也许没有政治的压力，可是经济的压力很重。开餐馆很辛苦，可究竟是自己的企业，心里好像踏实一些。”

“还顺利吗？”

“才二十天，还看不出。我们买了个现成的餐馆，那老板要去尝试更大的生意了。餐馆叫‘快活林’，是个中国餐馆。我们买下来之后，决定专做印尼菜和北京菜。美国的中国餐馆太多，美国人的嘴也吃刁了。而印尼菜，全华盛顿连我们才三家，那两家的印尼菜很不纯了。我请了两个人做招待，一个亲戚掌勺。我每个假日去帮忙。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，生意倒还不坏。”

“很辛苦。”

“这是血汗钱。”她说。

“今天耽误你半天时间，真不过意。”

“我喜欢的，”她朝我笑笑，“我喜欢家里来的人，我好想家。”

这是唐人街。街上的电话亭，戴着个绿色的中国式的小屋顶，很难看。唐人街上的商店总是那么不景气的样子，橱窗灰蒙蒙的，商品灰蒙蒙的。“呀！这两个模特儿在这里站了四年了。”明明笑了起来。果然，一家橱窗里歪歪地站着两个神情淡漠，蓬头垢面的模特儿。橱窗倒挺大，有好几个门面，上面写着“王氏公司”。

“他们生意不好吗？”我问。

“生意好得不得了，赚了好多钱。这里好多房子都是王老板的，他们有好几个店呢。”

我们在一家杂货店里看到了王老板娘，她的模样很富态，很精明，也很端正。她是十几年前从上海来的，会说上海话，会说广东话，也会说英文。发财之后，对唐人街的中国人也非常照顾。初来美

国的中国人，总是先在唐人街落脚，比如张明明。能打入美国社会的，就走了，打不进的则留下。明明一家也受了她很多的照顾，华侨的报纸上也曾介绍过她。

“明明，现在怎么样啊？”她手脚麻利地帮助一个黑人试穿一件衬衫。

“我找了两份事，还是搞设计。我们家买了家餐馆，老林在忙呢！”明明回答。

“餐馆在哪儿呀？明明，请帮我看看，这衬衫是多少钱一件。”

“十七美元。餐馆就是‘快活林’，买下了。”

“哦，有时间一定去拜访。”

“来啊！”

“一定，祝你们生意兴隆啊！”

天色暗了，我们上车。

“我们要走十四街了，这是红灯区。”

“红灯区？”

“也许这时候，妓女们已经出来拉客了。”

“她们有什么特征吗？”

“没有。可是一眼便能看出来。她们总是很风情的样子。”

我很兴奋，一直直瞪瞪地望着窗外。可是，并没有这样很风情的女人站在街上。并且，这条街很整洁，高楼大厦，房子很漂亮，街道很宽阔。“为什么这里是红灯区呢？”我问。

“我也说不清楚，也许因为这里旅馆多，外来的游客多吧，或者有什么传统。不知道。”

“警察管吗？”

“这里的规定很奇怪，一个住宅里住一个妓女不要紧，假如是两个以上就要管。”

“是因为两个以上就成‘院’了？”

“谁知道。”

十四街走完了，没有看到妓女，很遗憾。而一看表，才只四点半，还很早呢。干这种事总要吃过晚饭以后。今天是阴天。

到了乔治城。乔治城，这是华盛顿的老城，有三百年的历史了。这是个很有风味的城，知识分子喜欢住在这里：医生，律师，艺术家。这里有一些古风，有夜生活。我们走进一个集市，想吃点东西权充晚饭了。这里有一方一方的小铺子，卖各种小吃。在这里买一方地盘做点小生意，是一种很实惠的谋生方法。可惜，明天是感恩节，大多数的铺子都收摊回家了，只有寥寥几个。这里有一个，一个东方小男孩在做买卖，有热狗，还有春卷。他是个越南人，三年前来到美国，可能是难民——明明说——越南难民来了很多。又在一个杂货店逛逛。这里有很多可爱的杂货：茶杯垫子，刮白脱的刀子，木碗，木勺，草编品，绣品，五花八门。明明警告我：“你买的时候可一定要看看出产地，别把大陆的东西又买了回去。”于是，我就注意出产地。果然，有一种茶巾是我们产的。这里的东西来自世界各地：英国、朝鲜，还有中国台湾，很少有真正美国产的，真奇怪。

天黑了，街灯全亮了。灯沿着树枝闪烁，火树银花。很久以前，第一批移民登岸，新大陆为他们提供了衣食之源，他们感恩不尽，每年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，都要合家团圆，感谢上帝。

回大使馆了。明明开车。到了一个大圆圈，她总也不能准确地开入岔路。从圆圈上，伸出了八条岔路，开过了便不能回头，只能再转一圈，进错了，也不能回头，再从外围绕近圆圈，再绕……“每到这个地方，我就头晕。”她说。车速很慢，慢不下来，又错了。

“你回去过吗？”我问她。

“明年我想回去，我想家，我真没出息。”她又绕过了头，重新再绕。

“家里还有人吗？”

“还有弟弟，妹妹，好几个呢！我一个人独身在外，我好孤单。”

“回去看看吧。”

“中国人的家乡观念特别重。不像美国人，他们先天就是移民，在一个地方住不热就跑了。唉，我不行。我想北京。”她又进错了。

“能避开这个圆圈吗？走别的路。”

“不行，走别的路也有圆圈。”她顽强地绕着。

……

晚上，去肯尼迪中心看歌剧《美丽的海伦》，这是安格尔先生和华苓请我们看的，票价贵得吓人。这是肯尼迪被刺的那一年开始造的，其奢华，远远超过纽约的林肯中心。分两层，第一层有三个剧场，一个音乐厅，一个歌剧厅，一个歌舞剧厅。厅外是宽阔的露台，水从辉煌的池底喷起，射到空中，变成一束透明的雾，在深色的树丛前洒落下来。露台下是河，Potomac河。河那边是城市之光，华盛顿的夜。厅中央，是肯尼迪的头像，脸上的表情很痛苦，是被刺的那一瞬间？昨天是他被刺二十周年，报纸上有很多文章。美国人对他的印象是美好的。

华盛顿很开阔，没有特别高的楼。也许是因为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一切房子都不要高于国会大厦。这里有一些长长的巷道，望进去，深深的，一片树叶在石板地上滑过去，天晓得里面藏着什么故事。

看戏回来，我们三个人一起给潘耀明打电话，表示慰问。爱荷华在下大雪了，很大的风，很大的雪。啊，下雪的爱荷华，我想你。

11月24日 阴有雨

美国的感恩节笼罩在阴雨中，街上行人稀少，店铺也不开门，有些寂寥。

中午章大使和张颖同志请我们吃饭，同时请了时钟雯女士、龙先生等几位；也邀请了叶芸芸，但她因为家里有客，未能来。

龙先生是一位很乐和的人。他在美国办餐馆多年，根据他的经验，认为办好一个餐馆，菜的新鲜、味美还在其次，主要的还是餐馆工作人员心情愉快。他说："做不到愉快，起码做到不要不愉快。否则，在美国另找一个餐馆去做，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。"

他说的是一个要害，用国内的话来说，就是一个团结问题。在国内，团结不好，大家也无可奈何，只得貌合神离，捆绑在一起。而在美国，人是可以流动的。团结不好，也就可以变成孤家寡人一个，这就逼得你不能不注意，不能不搞好。这大概也叫形势逼人吧！所以他还在其他餐厅未给职工医药费时，就给职工做了医疗保险。

傍晚，王正方夫妇来，他正在写一个剧本，准备和国内合拍，其中有一个待业青年，想和安忆谈谈，便接我们去张明明的餐馆。

明天要去纽约了，在离开之前，去看看张明明经营的餐馆，这似乎给我们在华盛顿的节目，打了一个句号。而且中午龙先生讲的一套开餐馆经验，我也急于贩给张明明。但去看以后，我便不响了。龙先生的经验对他们并不适用。这一个餐馆门面不大，进门处只能安下单排的三四张火车座，后面稍宽，安了两排火车座各两张，再后面就是厨房。我们去时，没有一个顾客，倒是张明明带了儿子女儿，一家人在店里过节，还请了四个客人。实际上，这是一个夫妻店，雇有两个

佣工，也就谈不到什么团结不团结的问题。我们一去，他们一家人都忙了起来。我们吃了印尼的串肉和饭团。在吃饭聊天过程中，只来了两位拖儿带女的印尼顾客，他们吃得十分经济，除了满桌撒下一些饭粒以外，不见有菜。坐到十时许，便用张明明的车把我们送回来了。华盛顿笼罩在细雨蒙蒙中。

11月24日 雨

今天是感恩节，是美国的团圆节。我一个人走过狮子桥，那里有几个店还开门。人很少，天下着细雨，有些寂寥。据说市中心有欢庆游行，很热闹，不知道天这一下雨，那游行还有没有。店堂里空空荡荡，很少几个人在买东西，酒柜前却坐了满满一列人。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，不愿意回家团圆？还是没什么可团圆？回去的路上，雨下大了，迎面走过来一个男人，对我说着什么，我听不懂。他为什么不回家？

中午，大使请吃饭，在官邸。我们慢慢地步行去，湿漉漉的，金色的秋叶贴着湿漉漉的地和湿沥沥的天。在座的还有龙先生，这会儿我弄清楚了，他的令尊是龙云；时钟雯教授；还有国会图书馆的王冀先生。说起来很巧，王冀是龙先生最早的工友，他半工半读，一边读书，一边在龙先生的餐馆里打工。今天他们坐在一起，没有尊卑之分。在美国，是不用为自己曾有过的卑微而感到屈辱的，每个人都有一段艰苦奋斗史。有了可以瞻望的将来，那卑微也就不成其为卑微了。龙先生是华盛顿第一个提倡工友享受劳保福利待遇的，并且提高工友薪水，这是他生意兴隆的第一个原因。

晚上，王正方、孙小铃夫妇请我和妈妈吃饭，想在一起好好聊聊。王正方常去中国，和一些年轻作家混得很熟，比如古华。“咱们去‘快活林’。”他说。“是张明明他们的店？”“就是！”

“快活林”的店址很好，在闹市中心，门面很小，而却很深。于是，便成了狭狭的一条甬道。店堂已经很旧了。而他们买下来之后没来得及装修，立即开张，一天都没停。停一天也许会失去许多老主

顾，有很多主顾上这里来已经成了一种习惯，一旦破坏了习惯，就难恢复了，也许他们会找别家餐馆，餐馆多极了，遍地皆是。我们走进店堂，明明高兴得叫了起来。她的先生老林是个文质彬彬、眉清目秀的人，穿了一件灰色的羊毛衫，老觉得他像个文雅的顾客，而不是老板。他们赶紧招呼我们坐下。今天的顾客很少，今天是感恩节。“我们让伙计都回去休息了，我把全家都带到这儿来，让他们也熟悉熟悉业务。”全家指的是她的儿子和一个侄女儿。两个孩子很兴奋，在店堂里蹿来蹿去，开心得不得了。“我们就请了一些朋友来玩玩。”她为我们摆上餐巾杯盘，一边说。在我们桌子旁边，坐了一家子，是中国人，那先生一直在注意我们，他们已经吃好了。那边还坐着几个印尼人，林先生对我们说：“这是印尼大使馆的，我把他们都打发走了，就和你们聊！”

明明指挥着孩子们给我们上菜，一口气地上，上了许多我们并没点的菜。“乱上菜，”王正方说，“要赔本了。”印尼菜挺好玩，最有特色的是沙嗲，就是烤肉串，一个小小的火油炉。自己烤着吃，印尼菜好像香料过重了一些。明明轻声对我们说：“印尼大使馆的人说，这里的印尼菜很纯。”

林先生站在那两位印尼客人跟前，和他们聊着天。他站的姿势很优雅。孩子们在店堂后面打闹着，明明一个劲儿地给我们上菜。我说：“看起来，他们一定要破产的。”

“嘘——”他们一起喝住了我，小铃压低声音说：“可不能说这话，他们紧张得要死。”

两位印尼大使馆的人走了，又进来一个印尼家庭，两个大人带着三个孩子。

我们旁边那家人不吃了，那位先生把椅子拉过来和我们聊天。

客人们都走了，小孩子开饭了，明明和林先生拉了把椅子坐在我们桌边，可以休息了。林先生点起一支烟，架起腿，一只胳膊搭在椅

背上，优雅地吸了一口烟。这才像他呢！“唉，在这里，我感到最快活的是聊天，下了班，和朋友们坐在一起，喝喝酒，菜不要多，简简单单的一二样，一边聊天，聊，聊，聊到十二点……”旁边那先生提醒他：“这可不是做生意之道。”

小铃说：“今天晚上唐人街放电影《火烧圆明园》呢！去不去？”

“几点钟？”明明问，大家都问。

“十二点。”

“为什么这么晚？”我不明白。

“在这儿放中国电影，常常是十二点。因为中国人大都开饭馆，要到十二点才有空闲。”

“哦，是这样。”

雨下大了，明明和林先生把我们送到门口。上了车，雨水从车窗上泻下来，他们站在小小的店门前。雨水泻下来，将他们隔远了。

11月25日 雨

下午一时到达纽约。纽约也笼罩在细雨冷风中。

陈幼石和她丈夫王浩已在机场久候了。两位都是初次见面，但是两位的热情，立即溶解了一切生疏和距离。王浩先生曾来北大讲过学，是著名的数学家、哲学家、逻辑学家，老家是山东济南。他带着浓重的乡音，浑身上下无一丝学者的架子，忙忙地帮我们拿行李、带路，俨然是一位山东老乡，给人一种一见如故的亲切感。陈幼石一看便知是个热心人，而且是一根肠子通到底的。他们住在纽约近郊，房子相当大，我们三个都住在他们家里。

晚上陈幼石约了曾来国内见过面的郑培凯先生和另一位高教授来，为我们介绍纽约。他们两位真可算纽约通，给我们说了格林威治村的经历。那里原来是艺术家集中的住地，后来不知怎么为有钱人看中了，就慢慢往那里迁，把艺术家往外挤。

晚饭是极愉快的，陈幼石做菜的手艺极高。王浩先生诉苦说，陈幼石平时只给他吃夹面包，只有朋友来了，她才露一露身手，所以他极盼望有朋友们来。

11月25日 雪转晴

下了一夜的雪。

牌子上写，上午十点钟停暖气。这房子是买人家的一个废旅馆，价钱便宜，可是各种设备都破旧了，常常出问题，需要修理。

今天我们离开华盛顿，去纽约。

一早听说，华盛顿的一个油库着火了，怪不得听到救火车叫声了，一连串。

“王安忆！”传达室的小伙子和食堂小俞叫住我，“你会不会英文，这里有个电话，一个外国人叽里呱啦不知在说什么。”“你们听不懂吗？”“不懂。”他们说，“这好像也不是美国人，好像说的并不是英语。”我前后左右看看，没有别的人，便大着胆子说：“我来试试。”果然是叽里呱啦的外国人，也许是西班牙人，因为他的口音很像卡罗，滚珠似的。我努力听着，终于听明白他要找的是王春光——一个北京医学院的讲师，在弗吉尼亚大学搞研究，和我们同一天到华盛顿的，今天一早还来我们房间聊天，帮我捆箱子呢！他在这里已经一年多，很想家，想老婆孩子，“假如能带爱人就好了。”他说，“闷得很。我的英语又不足以表达复杂的心情。”

小俞他俩一个劲儿地问我：“那人不是美国人，是吗？他的英语很难懂是吗？”好像假如是美国人说英语，他们也都是懂的。

“你们在这里憋得慌吗？为什么不出去玩玩。乔治城，唐人街，黑人区，夜总会，去跑跑呀！”我动员他们。

“又不认识路。”他们互相看看，很为难的样子。

“多跑几次不就认识了。”

“你是作家？”小俞问。

“就算是吧。”

“在我前边的那个人也喜欢写，写了好多。他就坐在床跟前写，床跟前给他坐了个大坑。”

“瞎说！”

“不信你去看，他期满回国了，我就睡他的床。”他很认真。

“小俞，听说你已经登记了，是吗？”我问。

“嗯。”他忸怩起来，脸红了。

“想她吗？”我逗他。

“不想。”他笑了起来。

离开华盛顿的时候，雪住了，太阳也出来了。不过，天气陡然地冷了许多。舒暲送我们上飞机，再三嘱咐我们：到了纽约要小心提包，小心照相机！他们有个同志，就在看表的一瞬间，叫人拿走一个包。到了进口，他说：“可以去登记座位了。”我们三个人一扭头全走了，他伸手拉住我说：“以后碰到这种情况，只去一个人便行，一定要留下人来看行李。”还没到纽约，那紧张的气氛已经感受到了。这飞机只有一小时，算是空中巴士，可以先上飞机再买票。方便得很。

到纽约了。

我一眼认出了陈幼石，最近刚在一张什么报纸上看到她的照片，她在法庭上正打官司。但她本人显得年轻多了。她的先生王浩教授是个搞逻辑的教授，说着一口山东话，听起来很觉亲切。在这里听到的太多的是台湾普通话，软绵绵的，不那么自然。

纽约在下雪，很冷。

他们家在纽约市外边，从机场到她家，正从纽约市边擦过去。车开着，迎面是密密的楼房，一排一排过来，然后分开，向两边退去。

“好密的楼。”我说。

“这叫密啊！明天你到市中心去看看就知道了。”陈幼石回答我。后边，王浩教授在向吴伯伯和妈妈介绍纽约的城市及历史。陈幼石对我说：“别听他的，他的观点全是形而上学的。今天晚上，我找了两个朋友，他们会给你们好好讲纽约的。”

王浩教授不理她，依然说：

“安忆，不听他的，不听不听。他是搞哲学的，最最唯心，完全是胡说八道。”

我笑了起来，觉得她挺逗。到家了。他们的房子很大，三层楼，高高的台阶，楼下是客餐厅，另一边是一个小小的客厅，“过去是专门为女客设的。”这是一座古老的房子。中间一弯楼梯很气派。每个房间都有煤气灯，洗澡间也是老式的，很大。新式的美国浴室，都比较小，安排得当，而澡盆都有隔门。厨房也很大，煤气灶旁还有个大大的砖灶。“这房子真大。”我说。

“越大越便宜。”陈幼石说，她指挥儿子给我们搬行李。

“为什么天花板是绿的？”我们觉得很奇怪。

“我喜欢绿的呢！一开始，那漆匠不肯漆，说：从来没听说过，天花板油绿的。我硬逼着他油，他也只好油了。你们看，还挺不错呢。”她很得意地昂起头欣赏着天花板。然后，她跑到厨房去做午饭了，王浩教授这才得从容地说话。

“安忆，你们去年去爬四川峨嵋山了，是吗？”

“是呀，您怎么知道？”我很惊奇。

“我看了张抗抗写的一个散文，《峨嵋山启示录》还是什么的，提到了你，还有一个大冯，是谁？”

“大冯就是冯骥才！”我高兴地说，在这遥远而陌生的地方，有人和我说起这些熟悉的朋友，真感到愉快。

“你去年写了个《冷士》是吗？”他又问。

“呀！您怎么看这么多刊物！您不是搞逻辑的吗？”我奇怪极了，他是一个有名望的逻辑学和哲学教授，他的一本关于数理逻辑什么的书，影响可大了。

他笑笑：“我很喜欢看。”

“你回去过吗？”

“去年回过。还去家乡济南看了看。济南，好像没什么变。”他说。

“幼石的官司打得怎样了？”妈妈问。“就这么拖着，让她打吧，这符合她战斗的人生观。”他回答。

“吃饭了。”陈幼石招呼，“中午随便吃，晚上吃好的，我给你们烧燕窝吃。”

说随便也并不随便，有好多菜呢。王浩教授带领我们入座。

“来客人，他最高兴了。”陈幼石指指王浩先生，“挤在一起凑凑热闹，吃东西。平时没有客人，我不烧菜的，自己下面条去。”

果然，他挺高兴挺精神的。陈幼石给大家分菜，她的一儿一女端坐着。

“他们也高兴，有客人就有吃的了。平时他们没什么吃的也不抱怨，有的吃就穷吃。”

吃罢饭，她把我和妈妈领到给我们安排的卧室，说：“这是我二女儿的房间，她在大学里，回不来见你们了。这是个传奇人物，想当模特儿。”这是间小小的屋子，有点凌乱，柜子上横倒着一幅画，一个裸体女人，身上缠着条蛇。床边落着一条白纸，是一个女孩子的一排相

片，披着长发，手护着裸着的胸，眼神挺神秘，这恐怕就是她的二女儿了。

很累，我睡着了。醒来时，听见楼下客厅里有人大声说笑，是两个陌生的男人声音。是客人来了？赶紧下楼去，果然。一个年长些，一个年轻些。

年长的是高友工先生，在纽约附近的普林斯顿大学。年轻的是郑培凯先生，也在大学里教书，教历史，还写诗，最近刚出了一本诗集。陈幼石向我们介绍："他们对纽约很熟悉，你们有什么问题和要求，尽可能向他们提。"然后，陈幼石向他们提出了首先的要求：

"聂华苓来电话，特别叮嘱要带他们去世界贸易中心看纽约全景。"高友工立即反驳："不要不要，那没有意思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"郑培凯接上来说："我认为，要了解纽约人的生活，在这个时候，应该看shopping（购物）。刚过完感恩节，接下去圣诞就要到了，大家都在购买礼品，我们应该去百货大楼看买东西。"我说："我想看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比如我们在芝加哥，去了夜总会，黑人的。""对！"高友工先生说，"要看酒吧，必须去九个零，这个酒吧不可不看。在格林威治村。"

"格林威治村？"我记得我刚读完一本英文教科书，女主人公就住在格林威治村。

"这是个有名的地方。最早的时候，这里是个乡村似的居住区，许多艺术家都住在那里。后来，纽约扩展，很奇怪地将它跳了过去，仍然让它保留了浓郁的古风。于是它便有了一种另外的价值，很多中产阶级开始争相购买这里的房子，这里的房租便奇异地高涨起来。艺术家们已经完全支付不起，便被挤了出来，往东转移了。当然，也有些艺术家还住在那里，比如郑培凯。"

"真的吗？郑培凯，你住在那里？"

“我是借一个舞蹈家的房子，她去中国了。这幢公寓是政府特意保留着让艺术家居住，房租很低。”郑培凯说。

“那么怎么才能让政府承认你是艺术家呢？”

“总要有些成就吧，也许和你们作协收会员一样。”他开玩笑。又说：“格林威治村往东再往东，那就是极其可怕的地方，有黑社会，贩毒，案发很多。那里，晚上是万万不能去的。”

“那么我们很快地开着车兜一圈，好吗？”我恳求他们。

“我不敢。”

“唉。”

“最近，纽约监狱住的太满了，放了一千个犯人。”

“轻犯人？”

“相比较而言吧，也都是有命案的。”

“为什么不多盖些监狱，美国这么有钱？”

“好像是，美国不愿意有太多的监狱，还要有人管理，看守，费用很多啊！”

高友工先生说：“到纽约一定要看戏。”

“我明天就去给他们买戏票。”陈幼石说。

“纽约的戏院子很有意思，最好的票是包厢，要四十多块钱一张，其实只能看到半个舞台。最便宜的是顶楼，那根本看不到舞台，只要五元钱一张票。不过座位前都有一排灯，那是供你放总谱的，买这种座的往往都是艺术学院的大学生。坐在那上面，只是听，一只手拿着指挥棒读总谱。”他谈起剧院就神采飞扬，他是个戏迷——陈幼石说，纽约每个剧场每天上映什么剧目，他全知道。他说纽约正在上演一个华人剧作家的剧，这位华人剧作家是用英文写作，已得到美国社会的承认。

我忽然想起了那位波兰作家："这里有哪个剧院在上演一个波兰剧作家的剧本，是阿瑟·米勒给他找的剧院，是家不小的剧院。"

高友工和郑培凯面面相觑，然后摇摇头。

唉，偌大的纽约，要找一个人，不容易。我希望他成功，不至于只演一场就撤下来，尽管我知道，这是很多艺术家难以避免的命运。

11月26日 晴

在纽约的日程，是陈幼石和朋友们为我们预定的。今天是郑培凯和从波士顿回来过周末的徐祁莲女士带我们逛纽约。在纽约市是难以找到一个停车处的，郑培凯只能把车子开到比较热闹的大街，徐祁莲陪我们下车，在一个百货公司等他，他要把车子开回他家的停车场，然后再乘地铁来和我们会合，约需一小时。我们便在百货公司里逛，看热闹。有些柜台，除了有极周到的服务之外，柜台外还有推销员。化妆品柜台前有穿着十分漂亮的女郎，手里拿着推销品，不断地向来往顾客介绍、宣传。有的是拿一把伞，买她推销的产品，便可赠送阳伞一把。我看这些推销员实在辛苦，比站在柜台里面的营业员要辛苦得多。一小时后，我们在门口等到了郑培凯，由他带领我们逛四十二街。

纽约的四十二街，好像有点类似华盛顿的十四街。闪动霓虹灯的“成人商店”，门口都写着或雕立着一个标志，说明只要花二十五美分就可进内，看几秒钟黄色下流电影。郑培凯很年轻，已在大学讲授中国历史。他和他的爱人都没进去过，所以里面到底有些什么“宝货”，他们也不知道。在这里，这种“成人商店”一家连着一家，进去的人不多。马路边站着大声兜售毒品的贩子，往往都是黑人。他们冲着来往的行人，竟然大声叫着：“可卡因！可卡因！”实在令人惊奇。

“警察不抓他们吗？”

“他们身上并没有毒品。只有他们真正找到了买主，才把买主带到另一个人那里成交。所以警察抓这些叫的人没用，他可以说，是叫着玩的。”据徐祁莲说，这些贩毒者，还对一些黑人妇女说些下流话。

走了好几条街，看了新开张的百货商店，门口站有两个高大的“圣诞老人”，内部几乎都是玻璃结构。看了最大的珠宝店。路上有放着赞美诗的录音带，放着捐款箱，旁边站着一个人，不知是为自己，还是为教堂在捐款。

晚上，陈幼石为我们大显身手，请来了许多客人，有李政道夫妇、郑愁予夫妇、张文艺夫妇，还有夏志清夫妇。

非常高兴见到了李政道先生，而且是出乎意外的年轻，风度从容不迫，使人感到亲切。他很关心文学，亦很关心祖国各方面的政策。他说：“中国历史上，变动前进的频率，从没像现在这样快速，所以就免不了产生一些差错。”“重要的是前进，而不要经常把时间花在检讨过去的错误上。”

11月26日 多云

上午，郑培凯和他太太祁莲带我们上街。祁莲在波士顿工作，在大学里搞化学研究。“你们为什么不能在一个城市里生活呢？”我问。“工作不大好找，当然，是指合适的工作。”祁莲说。她的脸初看有些平，但笑起来有点动人，说话的声音很甜，很镇静。

车子开过一座桥，进纽约了。最高的是世界贸易中心——帝国大厦。

“其实，初来纽约的人是应该上去看看。”郑培凯说，“高友工说不必去，那完全是城里人笑话乡下人的观点。”

我这才明白，爱荷华是个乡下，我们是一群乡下人。面对着这么密的楼和人，爱荷华果真是乡下了。

“高友工是个很奇怪的先生。”郑培凯说。

“他特别喜欢看戏。”我说。

“他特别喜欢纽约。每到周末，没有课了，他便提个箱子搭车到纽约来了。”

汽车进了市里，市里很热闹，今天是星期六，休假。车子开到一个百货公司前。

“这样好吗？你们在这里逛，我去停车。”

“你去哪儿停车。”大家都很紧张，有些将要被抛弃的感觉。

“上我住的那地方。这儿附近别想停到车，然后我再乘地铁到这里来碰你们。”

“你多少时间能回来？”

“一个小时。”他让我们赶紧下车，把车开走了。人像流水似的，涌过来，涌过去，几个穿着圣母军军服的人在吹着铜管，吹的是圣诞歌，他们在募捐。乱哄哄的。我们站在马路边上，还没完全清醒过来，人流冲击着我们，我们不由自主地被卷进了百货公司。这是一个糕点柜——“假如我们走散了，就在这里集合啊，是糕点柜。”祁莲说。她也有些紧张，波士顿不是这样的，她说。还是不要走散的好，我们前呼后应，紧紧相跟。

化妆品部，各大公司的男女职员拿着自己的化妆品，站在柜台外面，向人们介绍着，并且，假如你愿意，他可以当场为你化妆。

衣服：男装，女装，冬装，夏装；

鞋子：男鞋，女鞋，靴子；

皮件：皮包，皮夹；

礼品：花篮；

首饰。

还有人，人挤着人，人推着人，人被挤着，人被推着，上楼，下楼。自动电梯，载着人，梯形的人队，没有头，也没有尾，上，上，上，或者下，下，下。

“头很昏。”我们说。祁莲也无精打采的。“到门口去等他吧。”于是，前呼后应，紧紧相跟着出了门，等在门口。门口有个全副武装的警卫，对着我们笑。我拿出照相机，想找个角度，照出纽约的楼，最高的楼，再照出纽约的人，最多的人。警卫提醒我：“镜头盖没拿下来。”“谢谢。”我对他说，他对我笑。祁莲对我说：“他很希望你给他照一张。”可是来不及了，郑培凯来了，要带我们走，去吃饭。

这是一个火车站的餐馆。黑洞洞的，桌子上点着煤气灯，侍者的态度很粗暴。祁莲直埋怨郑培凯：“为什么要到这里来？这是个最俗气

的地方，我从来没到过这种地方。”郑培凯解释说：“这是个非常美国的地方，你们看，他们好像很高雅，有鲜花，放着煤气灯，而实则上很粗俗，小市民在这里大声谈话。我觉得这很能代表美国。”食物来了，确实很粗糙，祁莲要的一碗豆糊似的东西，原封不动的到了郑培凯面前，妈妈的三文治也移到他盆子里一半。郑培凯不声不响闷头吃着，像是要弥补自己的过失。

吃过饭，又坐了一会儿，决定去四十二条街。“这是一条重要的街道。”郑培凯说。我们站起身出发了。

街上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。一个银行前，摆了一个长长的地摊，地摊上是手工艺品，用木头雕成的鹿、马、印第安人、骑马的印第安人、拿长矛的印第安人、面具、头像，挺好的，很多人挤着看，却不见有人买。挤出人群时，头上的发夹掉了一个，有点心疼，那是妈妈从日本给我买的，我一直很喜欢。

前边又围起了一圈人，跑过去，地上放了架录音机，两个黑人小男孩在跳舞，跳得非常好，有韵律，有味道，一顿足，一抖腕，都有一种动人的韵味，有人扔给他们钱。他们依然跳着，跳得很骄傲，因为跳得确实好。

有人在街边上卖画，各种画，大都是一种铅笔画，素描似的，画的是纽约，专卖给观光客。有人买。

地摊越来越多了，卖各种杂物。有个高大的男人在卖儿童小汽车，小小的电动的汽车。汽车在纸匣里开着，开到匣壁，翻个跟斗往回开，碰到匣壁，又翻个跟斗——在那男人的脚边。看起来，好像是几只甲虫在爬。

这是四十二条街了。大白的天，亮着霓虹灯。黄色的灯沿着招牌的边缘逐次闪动，像是一条花斑的蛇在滚动。橱窗上，醒目地写着：X，X，X！还有25。“什么意思？”我问祁莲。

“那是小电影，二十五美分看一会儿。”

“小电影？”

“黄色的。也许有点简单的故事，很快就上了床。可我不懂，二十五分能看点什么。如今，二十五美分能买什么东西呢？连杯咖啡都买不到。”祁莲很奇怪。

“Smoking Smoking！”有人连珠炮地对着我们叫。每走几步，就遇这么一个人，叫着：“Smoking Smoking！”

“这是贩毒的。”他们向我们解释。

一个头发卷紧紧贴着头皮的黑人对着妈妈叫：“Smoking……”

祁莲笑了：“他也不看看像不像，只管乱叫。”

他自己也笑了，是为了好玩，还冲着妈妈喊。我们不理他，他便跑过去缠两个黑人女孩子，女孩子不理他，他火了，说：“你们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对你们并没有兴趣。”

由于阳光而显得昏黄的霓虹灯在招牌边缘逐一滚过去，滚过去。路当中站着一个高大的瞎子，伸着手，在讨钱，他身后蹲着一条驯顺的大黑狗。

地摊。一个人爬在树上，忽然大叫：“警察来了，快收摊。”于是大乱。

地摊。人，车。

我们走完了四十二条街。走出来了。有人装扮着圣诞老人向大家募捐，铜管吹奏着圣诞歌。楼，又高了起来。两排高楼对峙着，露出狭狭的天。楼，是一层又一层的。人，在楼下走，密密的，缓缓的。

这是幢新开的大楼，两个穿着古代武士衣服的门卫在站岗，大厅里一架钢琴在弹奏，小提琴拉着柔和的旋律。自动电梯上升着，人梯源源不断地上升着，水从大理石壁上泻下来，映着灯光，灯光映着水花，水花和灯光映着透明的小提琴声。小提琴声穿透了混沌的人声。

这是一幢百货大楼，要上四楼，必须要有一把特殊的奇妙的钥匙，要拥有这把钥匙，必须在这店里购买很多很多钱的东西。这里的一个皮包要四百美金。这里同样的拥挤。

“我们回去吧！”

我们回去了。乘地铁。大量大量的人涌进地铁口，地铁口涌进大量大量的人。确实是陈旧的地铁，矮矮的顶，往深处看去，黑洞洞的，像矿道。车来了，车里车外画着乱七八糟的图，写着乱七八糟的字。“咦，这单数的车怎么停在双号的车道？”郑培凯去问别人，别人也不晓得，摇摇头。大家都很疑惑，不敢上，看着那车开走了。“这是很奇怪的事。”他说。

又来了车。上车。车摇动得很厉害，很响，“晃当晃当”，不能说话，一点也听不清。一对年轻人在车厢门口接吻。大家朝一致的方向来回摇晃。

天黑了。

吃过晚饭，给那位画家打电话。在华盛顿时，舒暲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。通了，约好，明天中午十二点，去林肯中心的水池子前边见面。“你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戴眼镜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戴。我身高一米七八，穿一件皮夹克，也许，还戴一条围巾。你呢？你戴眼镜吗？”

“也不。我有一米六九。”

“呀，你这么高！你怎么会这么高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也许因为我妈妈高，其实她仍比我矮许多，不过那时候她算是高的了。现在人好像越来越高了。”——我们讨论了一会儿人类的发展趋势。

“那我一定能认出你，在美国，个子高的中国人很少。”

“你在这儿还好吗？”

“怎么说呢？这里的情况很复杂，怎么说呢？”

是不好说，这是个稀奇古怪的地方。我们还要出去逛。这里有什么在吸引着我。

我们一起去市里。妈妈留下了，补进来王浩教授。

“先去格林威治村吧，上我那儿去停车，顺便把祁莲送到家。”

“你今天累坏了。”我说。祁莲闭闭眼睛，笑笑。车到了公寓楼下时，她忽然说：“我想跟你们一起去，可是我要换一套暖和点的衣服。”她忽然兴奋起来，一改今天一整天的疲惫不振。

于是我们全跟她上了楼，进了房间。门一开，就蹿出一只大猫。这是主人留下的。这是一大间房间，除了洗澡间，全不隔开，通通在一起，厨房在一边，客厅在一边，床，架起来靠近天花板，床下边是书房。很乱。满地堆着书、杂物，地板旧了，有点翘，走上去，似乎在咯吱咯吱响。这是我在美国看到的最不讲究的住宅，却有一种超然的气氛。“灯一暗，天花板上就亮起了星星，好像睡在荒原上一样。”郑培凯介绍着，“第一个晚上，可把我吓了一跳。”他又把我领到窗前，递给我一个望远镜：“你看，那边，越过海，就是自由女神像。”

“在哪里？我怎么看不见。”我搜寻着，一道闪光的海岸，再过去，是幽黑的海，再过去，星星点点，哦，看见了，有个人影，顶端在发光。“发光的是她的冠。”郑培凯告诉我。那幽黑的海中间，有一点灯光，是自由女神的冠。

祁莲换好了衣服，说：“再喝点咖啡吧。”“她来劲了，”郑培凯说，“她是极不喜欢白天去的那些地方的，那是小市民的生活，她不喜欢。”

“你还能在这里住多久呢？”我问。

“快了，那舞蹈家快回来了。”

“那你怎么办？”

“再找吧。”

“住我们家去吧，”王浩教授说，“幼石早说了。”

“我要放一部分书到你那里去。祁莲那里只允许我放一个书橱。”他好像是一个无家可归到处漂流的流浪汉。而哈佛大学却还有他一个办公室。

走出艺术家的公寓。晚上的风倒像是暖和了一些。一个汉子在卖艺，脖子上套了个口琴，手上弹着个六弦琴，脚还踩着一件什么打击乐，一边弹、一边唱，一个人倒也奏得个热火朝天，很有气氛。三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子，在地上放下个小碗，然后站在一起商量，你推我，我推你，谁也不好意思开始表演。商量了一会儿，终于下了决心，站了个队形，开始跳，跳了一下又停下来，把小碗换个地方，再站队，终于跳了起来，是芭蕾，很蹩脚的芭蕾。她们一定是初次登台，很难为情。三个小男孩走过来。夸张地对她们鼓掌喝彩，做出怪样子。她们不理会，依然跳着，却又停了下来……

“天还没冷的时候，我还看见过两个中国人在这里卖艺，是拉小提琴的，拉得真还不错。一看样子就知道是大陆来的。”郑培凯说。

一家门口停着小车，从上往下搬一捆捆的报纸。“是纽约星期日报，明天就要发行。”哦，明天是星期天。那报是很厚的一份，看一个星期也看不完。

“这是性商店，专门卖性器官模型还有种种这类东西。”橱窗里放着皮衣、皮裤、铁链子。

“这是同性恋的用具。很奇怪，同性恋喜欢穿皮的衣服、裤子，喜欢在腰里拴铁链子，耳朵上挂铁环。”郑培凯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想，也许是因为，”祁莲说，“同性恋者往往都是虐待狂和被虐待狂。”

这是同性恋区了，行人骤然地少了许多。一个奇形怪状的人从对面走来，我朝边上躲了躲。祁莲说：“你用不着害怕，他们不会对你感兴趣。”王浩教授说：“咱们这里，有危险的只有郑培凯一个人。”

这时果然走着一对男人，勾着肩膀，穿着皮夹克，其中一个耳垂上有一个铁环。

这儿是九个零酒吧了，招牌上醒目地画着三排零，每排三个，正好九个。“进去看看吧！”郑培凯提议，我便和他走了进去。推开沉重的门，里面黑黑的，沿墙坐着一排男人，酒柜前站着三个男人在拍拍打打说笑。里面的人脸色很阴沉地看着我们，他们身穿着深色的皮上衣。那么多男人在一起，使得气氛很重，压抑得很。我们退了出去。这是个同性恋酒吧。气也透不过来似的。

这里的行人很少。一座房子名叫“绿地”，门前圈起一小块水泥地，水泥地漆成绿色。自我安慰着。这里很少有树，有草坪，所以，中央公园周围的房子，贵得要命。

走出幽暗沉寂的街道，走到路灯底下一个餐馆门前，一对年轻男女紧紧拥抱着，响亮地接着吻，哦，这是多么美好的情景。

11月27日 阴

朋友们把我们像接力棒一样，今天由郑培凯交给了张文艺。

张文艺先生在联合国中文部做事，很瘦，很黑，留着长发。带我们进了联合国，在他们的餐厅里喝了茶。

纽约市已进入感恩节后、圣诞节前的购物季节，一片火树银花。他带我们坐了纽约的地铁。可能是时间关系，地铁里人还相当多，车辆上涂得乱七八糟，行驶也不正常。倒还没有碰到强盗。

夜宿张文艺先生家。

11月27日 晴

“你是王安忆？”他坐在水池子边上，瞪着眼睛看我，一点笑容也没有。他身后是林肯中心的歌剧院，还有喷水。

“是的，”我说。电话里已熟惯了的人，这会儿忽的又陌生起来。

“你会抽烟吗？”他递给我一支烟。

“不会。”我很惭愧。

“你要学会才好，就更像作家了。”他把烟送到自己嘴边，然后点火。仍然没有笑容。

“咱们去哪儿玩呢？”我问他。

“去大都会博物馆吧。”

“可是，昨天我们走过那里，马奈的画展是最后两天，排了很长很长的队，怕是来不及看。”

“我们可以不看马奈，那不用排队。”

“好的。”我同意。

“你能走路吗？”

“能。”

“我们走，穿过中央公园，就到了。”说完，他从水池沿上跳下来，迈开脚步就走，走得很快，我必须走两步，跑一步才能跟上他。我想请他走慢一点，可不好意思开口，他一点笑容也没有，而且，很生疏，远没有他的画那么亲近。

中央公园，太阳很好，阳光下，有一些人，坐着，站着，或则慢慢地走着。“我给你在这里照张像，难得来一次美国。”听他那口气，好像是陪一个乡下人逛大上海。

大都会博物馆。马奈的画展下面，排着一圈又一圈的人，这是最后一天了。他让我等着，自己去买票，然后回来给了我一个小铜片，教我别在毛衣的领子上。然后，我们去存外套和背包。那女人将我的包还给我，不给存。她说了一些话，我茫然地看看他：“为什么不给存？”他也同样茫然地看看我：“不给存算了。”我就背着我的包。

他带我看画，并且给我解说：这是什么主义，那又是什么主义，库尔贝——他讲到库尔贝，我听了便说：“你是不是有点受他的影响？”他回头看看我，忽然微笑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我太受他影响了，我很喜欢他。”

他把我带到一幅画跟前，说：“你看看这幅画，然后告诉我有什么感觉。”然后他走开几步，把我一个人留在这画面前。这是一幅奇怪的画，一片深成黑色的紫，边上有一道黄的浑浊的边。一片深紫色，看久了，便是黑色了。“我没有什么感觉。”我回头告诉他。“有很多人，在这幅画前哭出了声。”“为什么？”我很吃惊，又回头看看那片黑洞洞的紫色，我很遗憾自己这么麻木，竟然没有一点感动。“这片深色，会将人带入一个深渊，一个深不见底、无边无际的空间，这是一个深而远的境界，人，无倚无托，这会激起人的一种神秘的宗教情绪。”“哦，”我明白了，那确实是一个深渊，而我所以并不感动，也许是因为我的文化背景中没有一点宗教色彩。我自我安慰地想。

“Hi！”忽然，远远的有人向我招手，呀，是那罗马尼亚年轻人。世界真是又不小又不大。纽约真是又不小又不大。那年轻人和我说话，我请他翻译，他的表情很茫然，只翻译给我几句。我发觉他的英文也不行，虽然他已来了两年。

他带着我上上下下地跑着，熟悉得像在自己家里。

埃及的一整个墓穴。

苏州的一整个庭院。

英国贵族的一整个闺房。

一个年轻的中国画家带着一个年轻的中国观光客上下跑着。

这是大都会博物馆。

水池子，清澈的水里，沉了一大堆分币。他递给我一个分币："扔进去一个，许个愿，不要说出来，在心里想。"于是我在心里想着，扔下了分币，分币沉落了，沉在分币上面。这里已经积起了一堆心愿，各种各样的人，各种各样的心愿。

"你成家了吗？"他问我。

"成了。"

"有孩子了吗？"

"没有。"

"我的女儿已经五岁了。"他骄傲地说，"看着我女儿一点一点长大，唉，我就真觉得人类伟大，艺术伟大。你的男的是干什么的？"

他这么问我。一反这儿称呼太太先生的习惯——他把太太叫做"女的"而把先生则叫做"男的"。粗陋得可以。

"你现在画的画还是像过去那样？"我问他，我们坐在楼下大厅中间休息。

"基本上是这样。"

"我不明白，在这里，五花八门，有那么多潮流，难道它们对你没有一点冲击吗？是什么力量使你保持住你的那种所谓'现实主义'的风格？"

“有人说我冥顽不化，也许我是太保守了。可是，这个说起来，话就长了。”

“人家都说，纽约是艺术家最后的擂台。你有希望成功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他说的那么果断而肯定，倒使我吓了一跳。

“为什么这样没有信心？”

“不是信心的事。刚才我们看的新表现主义里，有几张画就是当今画家画的，他们有的才只有二十多岁。”

“画得好？”

“那没话说，好，他妈的X!”他骂人。

我看看他，他抽烟。

“我们这一代也许很难出大画家了。这不是一代人的事，也许我们只是为后人做铺路的石子。可是，认识到了这一点，我反而平静下来，反而更有信心了。”

大厅前用篱笆围筑起来，里面正在修一棵高达几层楼的圣诞树。到圣诞节那一天，圣诞树上的灯亮了，周围的小天使翅膀也闪亮了，蜡烛点起了，大家一起唱圣诞歌，那情景是十分动人而壮观的。

“我们应该吃东西了，我很饿。”我说。

“好的，走吧！”他又在前边大踏步地走了，走得风快，我则走两步跑一步。走进一个快餐馆，里面坐满了。走出来，玻璃橱窗上有一张克雷默夫妇对坐的剧照。他看了一会儿，终于看明白了：“哦，《克雷默夫妇》的这个场面是在这个餐馆里拍的。”还没来得及让我再看一眼克雷默们，他已经在前边走远了。

走进一个pizza店。吃pizza。他买了很多，多得吓人。

“你在这里还习惯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我也许是有什么毛病了。怎么别人到了美国这么高兴，开心得要命。我不行，我来了这里，哪儿都不去，在屋子里看书，看的都是中文书，老庄的散文，看了以后大哭。人家说，看这些书在中国也好看的呀，可是，我偏偏是来美国之后才看，并且这么大受感动。”

“你生活还可以吗？”

“我一来就和一个画廊签了三年的合同，收入挺好的。当然，给他们画的全是那个内容。”

那内容便是他在国内充分显露才华的那组画的内容。

“下一步，我打算画纽约人。”

“哦，纽约人。”

“我是一个在三层楼房上长大的孩子。父母感情也不合。他们早早地被打成了右派！哼，我讨厌《牧马人》，我见过的右派多了，哪有这么好的，二十年后又成了条好汉。他妈的X！”他又骂人，这回我听清楚了，他确实在“他妈的”这句谩骂后边无耻地加上了一个“X”。我脸红了。我们家老房子隔壁有条弄堂，那里的孩子都会骂这个字而被我们叫做“野蛮小鬼”，并且被禁止同他们在一起玩。

“我的经历，我的所有这三十年里的一切，都使我不可能打进外国人的生活中去，永远不能。”

我不响。吃pizza，难吃，是不是不吃了？

“我什么都经历过了，社会的，家庭的，还有我们这代青年共同有过的。这些东西，真他妈的见鬼，就是不让我打进外国人的生活。他们是他们，我们是我们。”

“我们这一代青年很不幸。”

“No，no，no！”他说，“我不喜欢用‘我们这一代’的说法。我们这一代的不幸有多少了不起？有多大？”

我发现他的英语不好，只有一个字说得好，说得准确、清楚、经常，一片茫然——No，no。

天已经晚了，马奈的画展前排着长龙阵般的队伍，里三圈，外三圈。我们走过四十二条街，去坐一号地铁，他送我回去。四十二条街的霓虹灯滚着。

走过灰狗巴士公司，一群工人们胸前挂着牌子，散着传单。这是罢工，已经坚持了两个月。灰狗是全美一家很大的巴士公司。职工抗议减他们薪水。这会儿，他们正在大骂已经复工的人。有人说，这罢工不能怪资方，美国工人的薪水太高了，再高下去，整个企业就难维持了。这几年，美国的经济很不景气。

走下地铁，上了车。摇晃得厉害，又响得厉害。只能在停站时说几句话，没说完又打断。到了下次停站，上次的话题便忘了。

“你的英文不好？这怎么能行？”

“行。我插队落户大山里都去过了，还怕他妈的纽约！”

“这总不方便。”

“这地铁很好，你看这张图，很清楚，上哪儿都行了。”

“可是，终究……”

车开了，咣当咣当。

“难道你在美国尽是不开心吗？”

“哪里？这里很好。站在这里，好像能看到世界，就是看自己的生活，也多了几个立场。”

“比如说——”

“比如……”

车开了，咣当咣当。对面是一对黑人男女，垂着眼睛，脸上没有一点表情。

“你男的对于你是怎么样的？”

“他好像是一面镜子，照出真实的我。我在他面前，一点作不得假。那些光荣和名声，在他面前，好像没了价值。”

“这倒像我爸爸对我的态度。”

“你爸爸？”

“我爸爸……”

车开了，车又停了。

“写小说很难吧。我写一篇创作谈修改了七遍。”

“画画才难呢！”

“我画画很快。”

“哦，画画是实实在在的，小说是说家。”

“No，no，no……”

车开了。

11月28日 阴

上午陈丹青来接安忆去看画廊。我和张文艺夫妇逛唐人街，这里的唐人街，似乎比芝加哥的整齐，生意也很兴隆，美国人来逛的不少。中午便请张文艺夫妇吃小笼包、炒年糕、萝卜丝饼，三个人没吃完，才十一元多，在美国这算是极便宜的午餐了。

傍晚，张文艺带我们登上了帝国大厦，补偿了在芝加哥未见到的景色。买票上去的人不少，都是美国人，可能是从小城市来的，抱着跟我们一样的心情。从衣着上看，他们穿得和纽约人一样漂亮，但表情不一样。在电梯上，他们跟我们一样屏息静气，还有人在电梯急速上升时，轻轻唤着“上帝”，他们跟我们交换着会心的微笑，脸上的线条极和善纯朴。我想，他们也许来自爱荷华那样宁静的地方吧！

鸟瞰纽约夜景，无非就是看电的魔力。那立体的光，是房子里的灯；那流动的，是汽车上的灯；那片片繁星似的，是高级旅社、商店，布置在街头、树上的小灯。在这里，那闪烁不停的霓虹灯，都不是安在高级、正派的店门口的。

11月28日 雨

天下雨。开车进纽约，去张文艺先生的家，他在联合国做事，住在纽约市中心。

他的房子很有意思，是从一家迁址的公司手里买下的，自己设计改装——底下是卧室：夫妇俩的，儿子的，客人的，洗澡间，洗衣房；楼上一大间统统打通，一半客厅，一半餐厅，很宽敞，很透气。窗底下是拥挤的街道，车像流，人也像流。楼梯口有一个矮矮的木栅栏，栅栏外蹲着一条哀伤的狗，是他儿子的狗，儿子上大学寄宿去了，留下了它。据说它从此再不愿进儿子的卧室，似乎是，一种被遗弃了的伤心和幽怨。这狗见到男客就叫得凶，只得把它拦在门外。它很肥，肥得不再像条狗。“这里活动的地方太少”——张太太说，“每天一早一晚，我只能带它去对面大楼下的空地溜溜。”那是小小的一块空地，只能溜溜，跑是跑不起来的。

今天，张文艺先生带我们逛纽约。他没有车，因为纽约市是简直没地方停车。我们是步行加地铁——地铁很管用，虽然很旧。

雨停了，可是天阴得厉害，天含着一包水，随时都会泻下来。走出他的公寓，对面转角上，一座大楼前有一小块空地，空地上有一座钢板墙，有一点微微的弧度，又稍稍有点倾斜，日晒雨淋，已经生起厚厚的黄锈。“这是一个艺术品。”——张文艺说。

“艺术品？”我们有点吃惊，重新看那钢板。

“这公司造好这大楼，便请了一个设计家来设计建造一个装饰品。于是他设计了这么个东西。有很多人不喜欢，说：这算什么呢？只有

孩子们，躲在它后面玩耍。那艺术家听了十分高兴：啊！有孩子们躲在它后面玩耍，太棒了！”

想一想，倒也有些道理。

去渔市场，这是新建的一个场所。靠着海湾，有个大商场，也是像华盛顿乔治城那个商场一样，很多商人摆着摊子，大都是食品，有中国食物，日本食物，朝鲜食物，也有三文治，汉堡包，热狗，冰淇淋……假如天暖和，顶楼还有露天餐厅，看海，看纽约。海边有一艘船。“北京号”，是第一艘开往中国的船。船靠在岸边，供人们参观。

商场门口，有一群孩子在唱圣诞歌，唱得很好听，孩子的形象也可爱，便给了他们一把分币，交给一个抱着募捐箱的小黑人手里。

然后去华尔街的股票市场。华尔街——Wall Street，最早的时候，这里却是一道墙，后来纽约扩建，把墙拆了。这是一条世界著名的金融街。一个旅行打扮的日本女孩子向我们问路：她也是要去股票市场。在我们前边匆匆地走了，手里拿了本旅行指南。似乎，股票市场也算是纽约一景了。

专门有条供参观的走廊，下面是股票市场，一地的碎纸，每一个柜台上方都是一圈电视屏幕展示变幻着数字，人，好多人，走动着。这已不是高潮，早上开盘和下午收盘是高潮。这会儿，开盘过了，收盘呢，我们怕是等不到了。我对股票一无知识，我只知道这是个心脏，企业的心脏。我忽然想到香港，港币大跌的时候，那股票市场该是一幅什么情景呢？

然后，我们到一个车站广场的小餐厅坐了坐。走得很紧，人多，街窄，楼高，头昏脑胀。这是一个式样较老派的车站大厅，穹顶是弧形的，放的音乐是圆舞曲——《蓝色的多瑙河》。张文艺告诉我们：这个穹顶像夜空，缀满了星星——到了晚上。这个设计家死了，是被他妻子的情人杀死的。一个古老的故事。

一个年轻的女招待为我们送来饮料。“在这里打工的人，多半是准备进艺术学院学艺术的年轻人。”不知是他的推测还是确实，那招待们倒都是又年轻又漂亮的孩子。“你们看好了，凡是小费给得多的人，都是打工出身的。”比如他自己——他在桌上留下了不少的小费。

我们再走，去联合国。天终于下雨了，下得很大。联合国，安理会会议厅，大会厅，休息厅，餐厅，办公室……在开会，关于巴勒斯坦问题，座位上有译意风，自己可调节挑选语言，一共有五种语言，其中有中文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翻得不顺利，结结巴巴，听不出什么名堂。厅底下，开着一个小型的展览会：日本广岛，投下原子弹以后，那钱币成了泥块。我想起，那晚上，电视片The Day After放过之后，第二天里根在电视上发言，说：我们更应该制造原子弹了。以核反核，以战反战，真是各有各的理。

雨下得很大，去地铁站。下班时候，行人脚步匆匆，伞挂住了伞，湿淋淋的雨衣，路灯在雨中发光，那光化开去，有了光晕，水淋淋的。一辆车飞快地开过，溅起了一大泼水，像是一层浪，拍湿了人行道上的行人。

终于下了地铁口，上了车。人们朝一个方向摇晃着身子。对面两个东方女孩子在叽叽咕咕说话。她们的头发修饰得非常讲究，身上的衣服也整齐漂亮，脚上是雨靴，而提包里露出一双小巧精致的鞋后跟。“这是典型的职业妇女。”张文艺在我耳边大声说，而我只勉强能听见。“她们一定是哪家大公司的职员，或是大百货店的店员，穿得很整齐。”“哦——”“我有个表妹也去一家公司里做事，她每天早上要花三个小时洗头，做头发，化妆。我简直吓死了。”“你们不需要吧？”我看看他，他穿着一件风衣，头戴巴拿马草帽，瘦长瘦长，很像巴尔扎克小说里的钢笔画插图人物。

“陈幼石的官司有希望吗？”我们问他。他和陈幼石是好朋友。大家都很关心这场官司，她无辜地被大学校长开除了。

“没有希望了。本来要开庭，她还有点希望，可是，那校长很坏，他使得法庭同意推迟开庭，一直推迟到陈幼石的聘期满了，那么，开庭就不再会有什么意义了。”

“她还能在别的大学找事吗？”

“很难。这么大的打官司，闹得满城风雨，恐怕没有一个学校敢接受她了。她的名声搞坏了，人家以为她是个太不安分的女人，居然，告校长。”他摇头。

“唉。”我们叹息。

“很可惜，她是个很好的老师，教书教得很好，对学生好，别看她凶，她就是对学生好。”

“唉。”我们只能叹息。

回到张文艺家，陈幼石正坐在高椅上喝酒，一边激愤地抨击国内有人为了要男孩而溺死女婴：“政府怎么不管！”“政府管的，这些人要严办的。”我们告诉她。“你们作家为什么不写文章指责，大声地喊啊！”她依然愤怒不已。

晚上，张文艺请了几位客人来陪我们晚餐，其中有一位大陆来的画家张鸿图，他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毕业的老大学生。他还没有和任何画廊签订合同，一边打工，一边读书，一边画画。他的头发白了许多。

晚上，我们住在张文艺家。我和妈妈睡他儿子的卧室。卧室后窗外，是一道窄而长的天井，往上看，是邻家的大楼，笔直笔直地从窗前拔起，看不到顶，看不到天。张太太牵着狗出去了，去遛狗。

11月29日 多云

早上起来，走出房间，那只胖黑狗就对着我狂吠起来。记得昨天它还对我很友好，让我抚摸它而不哼一声。这会儿怎么变了脸？也许是因为看见我住了它小主人的卧室。

他来带我去看自由女神像。他倚着墙站在公寓门口，手上拿着我的小说集。“为什么拿着这个？”我问他。

“在地铁上看呢！鼻子还真酸了好几次。”他笑笑说。

“这儿离市政厅很近呢！我刚知道。”我说，我知道他昨天在市政厅参加一个party。

“这儿离唐人街也近，从自由女神像回来，我们再逛唐人街。”

“好的。”于是我们向那岸边走去。

“今年七月四日，美国的国庆节。移民们举行大游行。”

“移民局组织的？”

“No，no，在这里，你要改变一个概念，就是说，没有一项活动是政府或任何公家组织的，都是自发。移民大游行，我们中国的队伍在最前面，这样安排也许是因为中国是个大国。可是，唉，我看了好难过，好生气。中国的队伍是唐人街上的居民组成的，穿着长袍，马褂，或是清朝的服装，精神涣散，唉！……”

“谁的队伍最好呢？”

“日本和朝鲜的。服装好，队伍严整，精神抖擞。还有新加坡的也很好。”

天，微微地出了一点太阳。阳光，淡淡地拂亮了街道。人，总是那么多，走路，总不能那么直取目标。一支队伍走过来，停下来，他们脖子上挂着牌子，一个人大声地宣讲着什么。“是罢工吗？”我问他。“大概。”他不能肯定。

忽然，行人们全朝马路对面跑过去，拥成一团。“干什么？出什么事了？”我问他。

“不知道，很奇怪。”他望着那边。

“会是吵架了？”在国内，有时会这样围着一伙人，那通常是吵架。

“不晓得。在这里两年，我还从来没看见过有人吵架。过去看看吧。”我们随着人群一起跑过了马路。人挤人，里三层，外三层，看不见什么，也听不见什么。只好问人，原来是一个大明星走过了这里，人头济济，不知哪颗头是明星的。只得走了。

“那天，美国的歌星黛安娜，来纽约公园演出，中途下起了大雨，可没有一个人走，情绪非常热烈。黛安娜说：‘明天也许也要下雨，可是我还在这里唱，大家来不来？’大家说：‘来！’每个人都湿透了。”

“她唱得好？”

“好！她不是唱，而是一头野兽在吼。”

“哦。”

到了岸边，对面那小岛，岛上立着自由女神。要摆渡过去，船是半小时一班。

装胶卷。忽然，出太阳了。水一下变蓝了，草坪变绿。影子投在干干净净的地上，好像是自己的魂回来了，顿时精神大振。

“呀，天好了！”我说。

“天好了！”他也说。

岸边有很多雕像，难民的像。

“这是移民赠送的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有时想想，多亏有个美国，世界的几次大难，有人能够劫后复生。可是……”

可是，我想到，不久前，美国轰炸了格林耐德岛。

“这雕塑有点概念化，有点像我们‘文化革命’中的雕塑。你在华盛顿看到越战纪念碑了吗？”

“没有啊！怎么他们没指给我看。”

“呀，那真是好，全美国征稿，由国会讨论通过。结果是一个中国女孩子投中了，才二十一岁。中国人真行啊！”

“那是什么样子的纪念碑？”我想知道。

“那是说不清的，必须看了才能领会。”

“呀，你讲讲看嘛！”我更想知道了，急死人。

“是这样子的，”他终于描绘了，用手比划着，“这么样的一块水泥平台，后边，有一点距离，是一面星条旗。水泥平台上刻着阵亡者的名字。”

“就这么？”

“就这么。”

我不响。

他也不响。

船来了，上船，船开了，慢慢离开了码头。回头看，哦，纽约。

“你有没有觉得，这很像上海，外滩。”我说。

“有一点。我也常常这么觉得，可是我不喜欢上海，不喜欢上海姑娘，上海姑娘太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了。我女的是南京人，她真是的，唉，真是可爱。她长得很难看，侧面看不到鼻子，正面看不到耳朵。可她就是个女人。我一看到她，就想：这个娘们，我一定要。你看到她也会喜欢的。”

既然他这么自信，我就不好说什么了。

“她是画国画的。一年不画，可是突然有一天，画了，画出一幅很好很好的画。这个娘们！”

“她一定是很聪敏。”

“就是太任性。你们女人都是这么任性吗？怎么会这么任性呢！”

我不响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。

自由女神在前边了，她是蔚蓝色的。

我们上岸，围着她走了一圈。她有一个角度，看上去十分妩媚，腰陷进去了一点儿，伸着胳膊，有点撒娇。

我们进去，上去。出来，站在她的底座下面，仰起头看她。一片云从她头上过去，她巨大的身驱像是向我们倒来。

我们重新进去，再上去，这是自由女神的身躯里边了。铁架子，窄小的铁梯子，急遽地转弯，每一层有一个座儿，可以坐下来歇脚。

“这是自由女神的腰了。”

“是腰。”

再上，胸口，脖子，终于到了头。

一排小窗户。这是她的冠。从冠里望出去，她的胳膊，举着火炬。那火炬在晃。

“在动呢！他妈的X！”

“不不，是我们自己心跳，跳得厉害，这么一口气地爬上来。”我说。

“哦。”他不响了，望着窗外，是海，海那边是纽约。窗户上是一排灯。那天，远远的，在郑培凯的窗口望见的光，便是来自他们了。

“你记得吗？我们小时候，总是画这么一幅画：自由女神手里举着一颗炸弹。”他说。

“记得的，”我说。

那边是纽约，挤挤的楼，最高的是帝国大厦。“这是世界最高楼。”他告诉我。

“不，芝加哥的Sears Tower比它更高，我不久刚去过。”我说。

“No，no，不可能，帝国大厦最高。”

“Sears Tower超过了它，你难道不知道？”我奇怪他的孤陋寡闻，这好像是每一个来美国的人都知道的。”

“怎么可能呢？”

“是的，没错。”我坚持。

他不响，可能在考虑这究竟可不可能。

“今年，从帝国大厦上跳下了它的第十二个自杀者。一个年轻人。”他说，“警察在后面大叫：不许跳，可他还是跳了。当场，警察昏倒在地。”

“呀。”

“那边，一对高楼，看见了吗？一对老夫妇分别在那高楼上跳下自杀。没有留下任何遗言，只是交待把他们的财产捐给福利机构。那是一对精神分析医生。”

“精神分析医生？他们不是常常治疗别人的苦恼的吗？”

“也许他们也给自己治过，没治好。”

“是的，医生常常治不好自己的病。”

“呀，他妈的，这自由女神真的在摇！”

果然，她在摇，摇得挺厉害。真的。

下去，出去，摆渡。

天又阴了。去吃汉堡包。

“你属蛇吗？”他问我。

“我属马。”

“那么你怎么和我是一届的呢？”我们都是六九届，最倒霉的一届。

“我小学上的五年制，于是比别人都早了一年。本来该是七〇届的，就可以不插队了。”

“我差点儿变成七〇届呢，因为我早产了一个月。”他一下子追溯到很远。我一算，果然，假如他推迟一个月，那就是九月以后生的，那么就得再等一年上学。“我生下时，不会哭，像只闷鸡。后来放进了一只抽屉。”——我想，恐怕是暖箱。“我妈妈怀着我八个月了，还在拖地板。我爸爸对妈妈不好。当然，我的教育全靠爸爸，我忘不了他。”

心里沉甸甸的，好像塞了很多东西。

“否则，我还应该高大强壮一些，像我弟弟，他又高又大，漂亮极了。”

“你也并不难看，”我安慰他。

他笑笑，不说话，吃汉堡包，然后指了一下挂在杯子边的茶叶包：“美国人吃茶，真笨！”

走出麦当劳，天已经暗了。风很凉。我们去唐人街。

“你经常想插队的生活吗？”他问我。

“经常想。”

“是呀！我经常经常想，想那生活，好开心。我们集体户里，有个男生，把老俵家闺女的肚子睡大了。人家找上门来打架，我们一起上。我专门出主意，给他们抱衣服，拿手表，后来我们装病，不吃饭。老俵最怕不吃饭了，不吃饭是最大的病，赶紧来哄我们。唉，老俵！”

唐人街，隔壁是小意大利城。据说，很久以前，中国人一走出唐人街，就会挨打。

“我还是要劝你，把英语学好。”我说。

“这是我的错。”他终于承认了，“我刚来时，非常情绪化。有一次，我们中央美院的一个老师在这里讲学，有个《中国时报》的记者提问说：‘中国是很封闭的，你怎么能知道这么多关于西方现代艺术的知识。’我当时气得浑身发抖，一下子站起来说：‘你究竟知道多少中国。’我握着前边的椅背，真想举起椅子朝他砸过去。过后平静下来，实在觉得他问得并不错。可是，唉，你不知道，我们在这里，吃一只鸡，也会有人问：‘你吃过没有？’”

唐人街，五颜六色的灯光，大红大绿的招牌。孔子大厦，中国人的公寓。我们站在孔子大厦下面，谁都不想说话，感到累。

“走吧。”过了一会，我说。

“好。”他迈开脚步，又停住，“我走得太快了，是吗？”

“有点快了。”我说。

“习惯了。在江西插队，我常常一小时走十几里山路。”他说。

我高兴我听到的是这样的解释，而不是很多人所说的：“因为美国的生活节奏很快。”啊，不，我们中国也有那样的生活，使人走路快而不是慢。

“要分手了？”

“要分手了。”

“他妈的真快！”他又骂人。

我什么也没说。我想劝他不要太苦闷，可是又想，假如他不苦闷了，也许就要失去一些什么。于是，便什么也不说了。

我们分手在唐人街。

晚上，陈幼石带我去看戏，《第四十二条街》，音乐剧（musical），具有浓厚的美国精神，一群年轻人，兴高采烈地跳着踢踏舞。看了真叫人高兴。这个剧团要排一个新剧，招聘女演员，一个昔日的名演员来应征，录取了。她独舞，动作僵直可笑，脚灯把她的身影打在天幕上，那拙劣僵硬放大了，更显得可笑。而为她伴舞的是一群少女，天真，活泼，可爱。后来演出了，老女演员被撞伤了，不能上台了，只能让一个年轻演员代替她。在年轻人上场以前，那女演员坐着轮椅来看她，对她说：“你穿我的服装，演我的戏，你成功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！可是你要记住，最后第二场有这样的动作，你要做好，这很重要。你要演好。”

明天要离开纽约了。

11月30日 晴

告别了极其亲切的王浩先生，陈幼石就送我们到耶鲁大学。我先到郑愁予教授的班里，跟他的学生见面、讲话。这个班里有中国学生，也有美国学生，我请他们代我解开一个谜，那就是我在爱荷华看到的那一位晒太阳的学生，他在想什么？

学生们很可爱，都认真地思索了。有的咬着唇笑而不答。有一位美国男学生回答了，他说："我想他一定在想将来，大学毕业以后，他将做什么。"

我说，这回答是一定对的。在大学生这个阶段的年龄上，他们还没有太多的过去可以回顾，他们想的一定是将来。

见面完毕就汇合到大课堂，由我们三个讲演，陈幼石翻译。晚上是耶鲁中文系请我们在中国餐馆吃饭。

是夜往郑愁予家。本来陈幼石要返回纽约的，硬把她留下了。

11月30日 晴

中午，陈幼石开车，去New Haven。耶鲁大学请我们去开座谈会。

“陈幼石，”我没大没小地直呼她陈幼石，“我说，你别打那场官司了，来中国教书吧。”我知道，她为这场官司请了两位律师，花了不少钱。我也知道，北大请她去教欧美文学。

“中国，我是一定要去的，我学欧美文学就是为了回中国教书。可是，官司也要打。官司打到现在，他没有赢，就是我不输。我非和他洋人干到底，他凭什么？我豁出去了，卖房子，卖汽车，也要打到底。”

“那你不来中国了？”

“我想回去，为了这，我已经作了一年的准备，找资料，看作品。可是，据说国内在批判西方现代派，我的……我这张嘴没遮没拦的，你知道吗？安忆。”

车很快，天气很好。一公路的阳光。纽约在身后了。这里是田野。

“你的律师好不好？”

“笨蛋。还得我教他，他说他从没见过我这样打官司的。可是，他也承认，我的战略见效。”她又得意起来。“我挺有信心的。我的学生都帮我。我去敲州长的门，敲州议员的门，要他们发言，我是纳税人，有权利得到他们的服务。”

“你，真行。”我说。

下午两点到New Haven，把车停在耶鲁对面，进一个书店吃午餐，这是个书和蛋糕的店，满架的书，飘着蛋糕的香味。“这儿的蛋糕很棒。我们每一种都尝一点。”她说。

坐的都是学生，一边看书一边吃蛋糕。这也是个大学城，有点像爱荷华。不过耶鲁是私立大学，学费高多了，校舍也老多了，是美国经济萧条时建造的，全是用石头，乔治式的建筑。

台湾诗人郑愁予先生请我们来的，也是他具体组织会议的。他的办公室里还有一张桌子，是准备给许先生的，而他留在爱荷华了。

下午报告会，陈幼石为我们作翻译。吴老讲他如何会想到写剧本，妈妈讲她怎么会写小说，而我讲——讲国内年轻一代的小说，我不会作概括性的提纲挈领式的介绍，我只能笨笨地给他们讲小说内容，一口气讲了好几个：陈建功的《轱辘把胡同九号》，叶之榛的《我们建国巷》，李杭育的《最后一个渔佬儿》，史铁生的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……我发现，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实在是太不了解了，他们只知道那些被批判的小说。他们不是用文学的态度对待我们的文学，而只是想通过我们的小说窥察到我国的政治情况。这很不平等。果然，又有人提问，要我们谈谈最近国内在批评的小说。我讨厌这种问题。难道我们不可能坐下来，平等地谈文学吗？中国不是没有文学啊！不过，会后，有个美国女孩子跑过来，用发音不准的中文问我：“《我们建国巷》里，那个人的电视机，后来怎么了？他搬家的时候没带走吗？”“哦，我没说清楚，他发火时把电视机砸坏了。”我说。“OK！”她微笑着点头，高高兴兴地去了。

晚上，在郑愁予先生家住。陈幼石该回去了，可大家都留她，她也很犹豫：“我不舍得离开你们。”虽然两天以后，我们就将在波士顿见面。“别回去了。”大家说。她说：“别的没什么，只是明天有课。”“你还听课？”“听课”她说。郑愁予告诉我：美国，凡是取得博士学位的人，可以免费进修课程。陈幼石是耶鲁毕业的博士。“不去了！”她

忽然决定，“我就睡在这沙发上。”她坐了下来：“明天，我还给你们开车，给你们翻译。”吴祖光伯伯说：“真不知该怎么报答你。”她说：“我们才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呢。你们在国内，经历那么些运动，吃了那么多苦。我们在外面享福。”

12月1日 晴

仍由陈幼石送我们去三一大学。中途在一位温医生家里停留吃午饭。

温先生是印尼华侨，解放以后，便回国念医学，五七年戴上了“右派”帽子，“文革”时又要他夫人跟他离婚。七五年出来到香港，然后来美国。刚来时睡地板，饿肚子。现在已开了几处诊所，挂号费每位四十五美元。但就是这样，一谈到祖国他就流泪，总觉自己仍是一个流浪汉。他夫人一边给我们端菜，一边也是眼泪汪汪的，说是明年想回国看看。

下午在三一大学讲演，仍由陈幼石作翻译。三一大学中文系教授，是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人，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，叫李文玺，原是郑愁予的学生，年纪很轻。他的夫人是该校舞蹈音乐系的系主任，长得十分娇小。晚上，由他夫妇请我们在意大利餐馆吃饭。生菜、面条，都是端来当面表演如何拌以大量的“芝士”。

夜宿李文玺家，他们好像结婚不久，家住在一个公园附近，环境幽静，房子也很大。据他说，这都是他妻子的，他自己没有钱。这是我们来美以后，第一次住到美国人家里来。入寝前，他和妻子来问我们明天早上几点吃早饭。小夫妻俩兢兢业业地想把主人当地道。

12月1日 晴

上午，参观耶鲁大学。在很早很早的时候，耶鲁大学是哈佛分出来的一个学派，南下到了New Haven，创立了耶鲁。耶鲁和哈佛的不同在于，耶鲁重创见，而佛哈重考证。东岸聚集了美国最早最好的大学，因为这里是第一批移民登岸的地方。东部人看不起西部人，说西岸没有文化，都是些淘金狂和垦荒者。而在东部最骄傲的又是波士顿，他们瞧不起纽约人，因为他们有最长的历史。然而，近些年，西部有些大学开始超过了东岸，比如史丹佛大学。

耶鲁有一个珍本图书馆，那建筑非常奇特，全是用一方一方大理石垒成，走进里面，才知道，那大理石是透亮的。这座建筑里没有一点木头，全是金属和石头。里面暗暗的，大理石透着幽幽的萤光。一堆堆泛黄的书排列在玻璃橱窗里，一个图书管理员就着一盏小灯在读书。

耶鲁有一个礼堂，舞台上排列着一个交响乐队的阵容，椅子，谱架，鼓……耶鲁的音乐系很棒。舞台上方，有一架巨大的管风琴，它使音响达到理想美妙的效果。

耶鲁有一个走廊，大理石的墙壁，两边是浮雕——一个母亲抱着孩子，一个战士……中间是密密麻麻的人名，这都是在历次战争中牺牲的耶鲁的学生。郑愁予先生告诉我：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，那设计者兴许是受了这个启发。

耶鲁有一个人像，是一位在独立战争中牺牲的学生，一个很年轻的学生，据说他死得非常勇敢，他的身后是他做学生时住的宿舍，墙上爬满了紫藤。

耶鲁的大一学生宿舍，学校规定大一年级的学生一定要住集体宿舍，那样，他们不至于太孤寂。大一年级，是青春期最恼人的年纪。

耶鲁的学生餐厅。

耶鲁的钟楼。

中午，我们离开耶鲁，开车去Hartford，那里的Trinity学院请我们去开座谈会。中途，在一位温医生家歇脚，午饭。他是从北京来的。凡是有中国人来，他一定要争取一次招待。

他们的家，在远离闹市的田野上，一大片草坪，一座豪华的房子。家里十分有钱。温医生以他的针灸而扬名这个地区，他已经开了几个诊所。今天，特为我们留在家里。他太太也是从北京一起来的，说了一口清脆的北京话，做了一大桌的菜。

温医生是印尼出生的归国华侨，来美国是在十一年前，正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间。反右的时候，他还在大学里，戴上了右派帽子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自然是挨斗挨批剃光了头。

“老温剃光头，不像和尚，像尼姑。”温太太说。大家都笑了，回头看看温医生，果然，他生就一张婆婆嘴，慈眉善眼，像菩萨。

“她家成分挺好，有个哥哥在二炮当军官。工宣队逼着她和我离婚。我们是抱头痛哭啊！”

“那你要求出来，倒也批准了？”我们说。

“我是印尼华侨，这是个条件吧。”

“来时这儿有亲戚？”

“没有。我有个哥哥在香港，还有个哥哥在新加坡。来这里时，很苦啊！睡地铺，吃了上顿没下顿哪！现在好了，我有三个诊所……可是，我还是想我的祖国。”他忽然哽咽了，放下筷子用餐巾捂住了脸。

大家都放下了筷子。窗外的阳光明媚地照耀着草地，远处公路上有汽车开过。玻璃器皿亮晶晶的……

“没什么，吃吧，没什么。”他揩干眼睛说。

大家谁都不想吃了。

天气很好。

出发，向着Hartford。下午到。开完报告会，郑愁予和这里的中文系教授带我们去意大利餐馆吃饭。这位中文系教授很年轻，是美国人，中国名字叫李文玺，他的太太是舞蹈系副主任，很柔气，是个很有钱的人家的女儿。在座的还有几位中国学生，有一个是郑愁予先生的大女儿。

这里的意大利饭很著名，十分纯真。意大利饭里最有代表性的是面。可据说那面也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学回去的。上面的时候，招待们将一只火炉推进我们的餐室，当场调拌，表演给我们看。我们有几个人不吃cheese，所以要关照他们一下不要放cheese粉。可没来得及说，他已经表演起来了。这是一个秘鲁人，黑黑胖胖的，做出许多夸张的动作，举起一个cheese筒，纷纷扬扬地撒起来，那姿态是十分洒脱的。我们一个个都呆了，绝望地看着他。陈幼石对我说：“算了，这会儿，你要是叫他不要撒，他会把你杀掉的。”于是，一盘cheese味浓浓的面到了面前，我顿时感到困难。

“这顿饭是系里请我们的吗？”我问郑太太。

“是愁予和老李合请的。”梅芳回答我。她是学声乐的，人长得大方而端庄。

“那何必呢！这很贵啊！”

“难得呢！”

“你们不容易，要供女儿读书。这儿的学费很贵吧？”

“一年需要一万多，包括食宿。所以，愁予在三个地方做事呢！”

“呀，你们得熬几年呢！”

“何止几年，大的毕业了，还有老二，老三。”

“挺辛苦。”

“反正，我的专业是不要了，我的生活全交给他们了。”她微微笑了一下。

晚上，我们就住在老李家，他们的房子很大，三层楼。一进门，李太太就从邻人家接回他们的一只狗：拉非，抱在怀里。那狗嗲得不得了，又摇尾巴又甩头，啃着她的手指头，不晓得怎么才好了。

“这是两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孩子，”陈幼石对我说。今天她一定要回去了，后天她将在波士顿等我们，“他们只能在这种生活环境里生活。”

“可是难道他们能保证永远有这种环境？”

“就是说不能呀！他们也许就会垮掉。这种人我见多了。”她说。

壁炉里的火生起来了，暖暖的。

12月2日 晴

一早，李文玺的夫人已去学校，他在厨房的餐桌上，已整整齐齐地摆好了杯盘，吃的是橘子汁和甜面包。他们的厨房，很少烟火气，可能两人平时生活很简单。

昨夜陈幼石已回去，她将在波士顿等我们。讲定今天上午由郑清茂先生来接我们，下午在麻省州立大学讲演。

乘郑先生还没有来之前，我们跟了李文玺，带了他们家里那一条小狗去公园散步。空气清澈，露珠满地，小狗撒着欢，人的精神也好了许多。

十一时，郑清茂先生和他夫人来接我们，下午参观了麻省大学，见有许多学生在摆地摊，出售自己做的东西，这是学校鼓励的。下午讲演，听众约百余人。

夜宿郑先生家。

12月2日 晴

早上起晚了。下楼来，李太太已经去上班。老李正和妈妈、吴伯伯一起吃早饭。拉非钻在他的怀里，这是一条哈巴狗，长长的脸，温和的褐色眼睛。我说："李文玺，我发现拉非很像你。"他大笑起来，亲着拉非说："他是我的小儿子。"然后又正色说，"人家是说，狗会像它的主人。"拉非不认生，谁抱它都愿意，是挺可爱的。

"报纸上说，北京最近杀了三千只狗。真是太可怕了。"他说。拉非从他脖子下伸出脸，在他的脸上蹭来蹭去。

我们不响。

"幸亏我的小拉非不在中国。"他说。

我们不响。

我们一起去公园走走，拉非也去，用一条链子拴着它，一走出家门，它便像疯了似的，狂奔乱跑。隔壁有一条大黄狗，期待地看着拉非，希望它过去和它玩玩，可拉非不屑于看它一眼，径直去了。

天很冷。太阳很好。湖边结了薄冰。一个跑步者过来了，向老李打招呼，然后向我们介绍老李："这是个好男人，头脑好，心也好。"

好男人天真地微笑着。拉非跑远了，他叫："Come, come！""你说中文，它能懂吗？"我说。

"你来！你来！"他叫。拉非不理会，没听懂，在前边乱跑。

中午，郑清茂教授和郑太太从麻省大学来接我们去。

下午，报告会。

晚上，住郑先生家。

他养了两条狗，一条北京狗，一条洋种狗。北京狗住在家里，有一个小小的卧室，挂着门帘，沙发是它的瞭望台，它常常站在沙发上，趴着窗台，看风景。洋种狗住在车房，只有一条毯子。

郑太太对我说：“北京怎么在杀狗？”

我依然不回答。

12月3日 阴

郑清茂先生给我们的印象，是属于那种一点一画，方方正正，写字仍用毛笔的中国学者。虽然在美时间很长，也穿着西装，但通身仍是中国气息，是一位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忠厚长者。他夫人是一位珠宝鉴定家，是位能干人。

午后，由郑清茂开车，送我们到波士顿。

到达波士顿，找到赵如兰教授家，已是上灯时候了。可亲可佩的陈幼石，已在那里作为主人等候我们久矣！

赵如兰是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女儿，是教授音乐历史的。她丈夫卞教授在哈佛教授及研究航天，曾来过中国。他们这个家，实实在在说来，已不是他们俩的家，可以称之为波士顿的“中国人之家”，如果再扩大一点，可以称为“东方人之家”。一年到头，总有几批客人住在他家。过去常有一些穷研究生住他们家里，客厅里横躺一个，竖躺一个，再进来一个，互相瞄一眼，谁也不认识谁。我们到时，家里已有两位客人，其中一位是日本学生，来美研究中国音乐的。

在这里，客人多于主人，而且常常是只见客人不见主人。于是客人接待客人，客人接待客人的客人。主人回来，倒真正像个客人。我们到达时就这样，陈幼石里里外外地招呼，卞教授恰巧在家，他不声不响地坐在一边静听。

晚上赵如兰回来，我们建议她立一个来客登记签名册。她欣然同意，拿来了一本软面册子，我们首批签名，就有十余人。

12月3日 晴

麻省大学一位教授请我们吃午饭。大家聊天，说起将要来临的圣诞节。今年圣诞节最热门的礼物，是一种蔬菜娃娃。这种娃娃很难看，顶着一头白菜似的乱蓬蓬的头发，五官分布也不合比例，一鼻子的雀斑。它有一个出生证，写着它的出生年月，名字。你将它买下时，必须再填写一张领养证，从此，你就担负着抚养它的责任了，你要保证在任何境地都不抛弃它。抢得厉害，柜台前差点儿挤死了人。昨天的电视新闻里，报道了一则关于蔬菜娃娃的绑架案——一个娃娃放在汽车后座上，被劫走了。失主便以绑架案而起诉。闹得不亦乐乎。唉，这些快活的美国人。

下午三点钟，出发，去波士顿。

实在太累了。这三天里，一天换一处地方，一天行驰几十里，一天一次座谈会。在车上睡着了。心里实在是很抱歉——对开车的郑清茂先生。可实在撑不住了。而且，还有点感冒。睁开眼睛时，天已经黑了，汽车开在拥挤的车队里，进波士顿了。开上了波士顿的街道，一辆车从横里蹿了出来，抢了路飞驰而去。郑先生摇头："波士顿的人开车最不讲理了，野蛮！""可他们不是最有历史，最有文化的吗？"我说。"实际上他们最野蛮。"他说。

汽车上了一条石板路，这里的街道窄而不规则。车停了，那边篱笆上挂了一盏汽灯，便是赵如兰老师的房子了，陈幼石在那里等我们。

赵如兰老师不在家，在哈佛开一个庆祝会，只有她先生卞教授在，他不爱说话，在屋里走来走去。陈幼石在厨房里烧饭，她下午从

纽约开车来，开来一车的肉、菜、水果、面团，供我们三天在波士顿食用。这房子很大，客厅、餐厅、厨房、三个卧室，每个卧室都带澡房。然后，还有地下的一层，从一个螺旋形的楼梯走下去，楼梯边是很多盆花草，郁郁葱葱地，掩住了那弯楼梯。陈幼石告诉我们，这楼梯是专为赵如兰老师的母亲修的，她母亲和她的父亲赵元任老先生住在西岸，赵如兰老师要把他们接来一起生活。她母亲喜欢螺旋形的楼梯，可是没等那楼梯修好，她却故世了。赵太太是个喜欢热闹的人，家里常常是宾客满座，她烧菜，聊天，并且骂人，赵先生则静静地坐在一边，一声不响。赵如兰说："以前我觉得妈妈太喜欢客人，打扰了爸爸的安静。可是妈妈故世以后，我才明白，那热闹实在是爸爸喜欢的，他喜欢坐在人群旁边，看热闹，听妈妈骂人。"

他们家很热闹，而且是喧宾夺主，卞教授出去赴晚宴了，家里便剩了我们这一大帮客人，"是恶客。"祁莲说。她和郑培凯一起来了，为大家做火锅。一起吃火锅的还有张光直夫妇，杜维明夫妇——杜太太是一个高大的美国人，怀了孕，马上要做妈妈了。杜维明谈他回国玩普陀山，和一群农民作伴，他没有粮票，农民送了他几张，还是全国通用的。

12月4日 雨

郑培凯从纽约来波士顿，因为徐祁莲在这里工作。又是他带我们逛波士顿。天下着雨，汽车沿着查礼士河慢慢地兜了一圈。雨越下越大，我们只好进百货公司。这家公司的底层是廉价部，是每年感恩节后都有的，在这里的东西，每隔七天便削价一次，削到第三次还卖不出，便送往慈善机关。十一点公司刚刚开门，很多顾客都往下走。我们也就跟了下去。这里以衣服、鞋子居多，也有一些瓷器摆设。价格并不便宜，恐怕还未到第二次削价的时候。我买了一把伞，完全是为了应急。在纽约街头小贩拿着卖，是三元一把，这里却花了十元代价。

有了一把伞，走路就不那么狼狈了。我们又去了类似上海城隍庙的一个地方，不过规模更大，各种摊位统一整齐，而且在一个大厦里面，不是露天的。进门处便是一棵挂满小灯泡的圣诞树，上面是半圆形的楼厅，栏杆边聚着几位戴红色绒线帽的老人和少年，唱着圣诗，进去便是各国风味的各种点心。凡是来这里的人，无一例外，都手里拿着各种吃食，边吃边逛。我们也就入乡随俗，尝了美国的煮豆、希腊的甜点，安忆买了一大杯水果杂拌，最后给陈幼石买了两盒各种花式的蛋糕，作为慰劳。虽然下着雨，大家尽兴而归。回来后，便在陈幼石率领下包饺子。卞教授也不声不响地参加进来，包的速度不在吴祖光之下。

郑培凯还需开四小时的汽车返回纽约，不能停下吃饭了。就让他这样走，怕他半路会饿。让他吃饱了走，又怕他开车发困。大家协商以后，给他先煮了六只小饺子，认为这个分量既不会饱得发困，又不

至太饿。郑培凯吃完便和我们告别了。我们在纽约到波士顿这一个星期里，除了陈幼石就数他最辛苦了，心里实在感谢。

不久，隔着玻璃墙，见外面纷纷扬扬飘起大雪来，心里着实惦念，郑培凯这四小时路程是更艰苦了，还有那位不知浪迹何处的同胞，还有冷清清住在八楼的潘耀明……唉！身在异国，却仍有牵肠挂肚。

12月4日 雨

下着雨，郑培凯开车带我们去逛波士顿，过了康桥，那边市中心，一排楼——“那座楼，本来是波士顿最高的楼，那式样有点傻里傻气的，不是吗？”烟雨茫茫中，郑培凯指给我们看，“不晓得设计和施工出了什么毛病，刚造好的半年之内，那楼上老往下掉玻璃，玻璃窗总是碎，只好把下面圈起来禁止通行了。旁边那幢楼，就要漂亮多了，这是中国人贝聿铭设计的。”那果然是秀丽得多的建筑，“从不同的角度看，它会变幻形态，变幻颜色。”这会儿，在雨雾中，它是灰蓝色的。

去一个奇怪的商场。这商场专门收购别的商店的囤积货，买来之后，重新标价，是这样标的——十二月一日至十二月九日：售价二十元；十二月十日至十二月十八日：售价十六元；十二月十九日至十二月二十六日：售价十元。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后：不售。于是，每日里，顾客盈门，挤破了脑袋。我们去那里买东西，发现这些商品往往是在第一阶段就售出了，最迟迟不过第二阶段，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一件东西处在第三阶段的售价中的，除非是已经损坏了的。不明白，这是一种什么顾客心理。

吴祖光伯伯买了双皮鞋，他的鞋完全崩溃了，这一路来，走的路不少。我想买一双靴子，可是，靴子真贵。

去一个名叫Quincy的商场，一个像城隍庙一样的地方，很多很多小吃摊，人们手里捧着东西吃，一边慢慢地走着，很悠闲，又很拥挤，熙熙攘攘的。吃了一个水果杯，又吃了一种奇怪的蛋糕，郑培凯说是荠菜的，可实在不像。外面下着雨。

走过一个鞋店，终于抵制不住那靴子对我的诱惑了，我喜欢它。也经不住旁人对我的鼓劲。一个高而英俊的黑人殷勤地帮助我试穿。“买吧！”终于下了决心。成交了一笔买卖，他很高兴，又去挑选了一只与靴子同样颜色的皮包向我推销：“这是很匹配的。”我谢绝了。靴子很贵，因为是真皮的，这里，凡是直接来源于自然的东西都很贵：牛皮，羊毛，棉布。

回到赵家，已很晚，郑培凯还要赶回纽约，他明天有课。大家劝他吃一些饺子再走。只有陈幼石不劝他，她说：“吃饱了开车很危险，因为吃饱了很容易打瞌睡，在高速公路上开车，很单调，常常会走神、会睡觉，那是要出事的。”不过，郑培凯受不了饺子的引诱，还是吃了几个，本来说吃十个，结果吃了十五个。愿他不要瞌睡。天下着雨，不好开车，他又是个近视眼。祝他顺风。

晚上，有对夫妇来看我们，女的是美国人，说了一口流利标准极了的北京话——是有四声的中国话——吴祖光伯伯说。因为外国人说中文常常没有四声。男的是中国人，原本是中央广播文工团拉手风琴的——人家说，可他自己则说是弹钢琴和作曲的；姓陈，一边教中文，一边选修电脑音乐的课程。女孩子叫苏珊，长得大方，也比较含蓄，已经读得了学位，一边任教一边学习，她写的论文是评论冯骥才的作品。他们是在北京相遇的。当时正是“文化革命”中，闹得满城风雨，阻力很大。后来还是某位中央首长批曰：“恋爱自由”嘛。然后，批准出国，双双来了美国。

赵如兰老师回来了，他家主人早早地出去，只剩下我们这些“恶客”打天下，早已忘了是谁的家。她一回来就张罗着要煮红豆稀饭，这是她对客人的热情欢迎的集中表现——陈幼石说。她们是多年的好朋友，她常常把朋友带到赵家。赵家的朋友不断，来去自便，一切自助。反正，冰箱里有吃的，床上有盖的，洗澡间有热水。主人回来得早，还有红豆稀饭。

12月5日 雨

哈佛大学图书馆的中文室里，竟悬挂的是“老佛爷”慈禧的画像。这面庞让我想起了杭州岳坟，前面跪着的四个人像中的王氏，面容端正，然而刻薄；集美丽、凶残、严酷于一身，比艺术还艺术。

我们就在这里讲演。一个不小的厅，倒也坐满了。

美国是崇尚“第一”的国家，第一个在树上过了多少天的；第一个在街头过了一年的；第一个用酒桶飘洋过海的；第一个在空中钢丝上举行婚礼的；第一个……我们作为母女作家访美，恐怕也占了“第一”吧！

晚上，刘年玲（木令耆）来看我们，她刚从国内回来，谈了一些她的忧虑。

12月5日 阴

这是哈佛校园了。旁边有座小房子，里面住了个孤老太，她把房子捐给了哈佛，但是说明她必须在这里住到终年。哈佛的地皮几乎都是这样得来而扩大的。小房子紧闭着门，里面住着一个老太太。

哈佛的图书馆，书架深处，有一张书桌，获得优秀成绩的学生，可以得到这里的一张书桌。书架与书架之间，一只小小的灯，有一个中国学生埋着头看书，像是在书的峡谷下面。

今天的报告会，不用翻译，全用中文说。因为在座的都是中国人和会说中文的美国人。我不喜欢没有翻译，因为这样一来，我必须说得多一倍的时间，并且翻译是限制我说话速度的一个有效手段。这样没有间隔，一任我一口气地说，我便越说越快，直至喘不过气来而后已。我仍然是讲小说。会后，便有几个人来向我打听并记下陈建功、张承志、史铁生等名字和作品。他们从来不晓得这些人，过后又说，中国没有文学。参加会的有一个美国女孩，说了一口流利的北京腔。她问我："你是第几届？""六九届。"我说，心里纳闷一个美国人怎么也知道这么发问："第几届的？"她明白这"届"的含义？"我是六八届高中的。"她紧接着说。我很惊讶，旁边的小叶告诉我："她是在北京长大的，韩丁的女儿，叫韩琼。""可她完全是一个美国女孩子呀！"我看看她的蓝眼睛，黄头发。"不，她完完全全是一个中国女孩子。"小叶说。小叶是中美混血儿，在国内长大，也经历了"文化革命"，后来到美国来了，她的母亲是美国人。那年丁玲来，是她给丁玲做翻译的。

晚上，赵如兰老师家又来了两位客人，中国人，父女俩，几年前从大陆来的。那父亲精通京剧戏曲，赵老师专为收集戏曲曲调而请他

们来。女孩子是上海人，学美术的，已经留学了三年。又来了一位美国人，也是他们音乐系的，加上我们这一帮，还有一个日本人——他住在地下室，每天早上提着小提琴去上课。他已经读得了一个理工科的学位，却毅然改学音乐，不知道中了什么魔。我问他："知道高仓健吗？""那是明星啊！""我太喜欢他了。""啊。""他从来不笑。""是的。"

唉，很憋人，来了波士顿两天，天都不好，也许看不到什么了。外面又在下雨。这么样匆匆地走着，来不及认识人，认熟地方。故事来不及开头，就要走了。我有点厌倦旅行了。

跟陈幼石和刚从国内回来的刘年全一起去酒吧坐坐，华贵的酒吧，舒适的座位，优雅的音乐，酒很甜……有些烦闷，想爱荷华，而且，想家。

12月6日 雨

一个人在“家”安静了半天。

天下雨，不到下午四点，天就黑了。晚上是哈佛请客吃饭。

12月6日 雨

陈幼石一早开车走了，去她的律师那里。说定今天要过目并签定一份关于官司的文件。她晚上再回来。来回八个小时的汽车路。我现在只希望她的官司要么马上赢，要么马上输，总之，快点结了吧。天下着雨，说不定会下雪，路上很不好走。

今天，一个哈佛的美国女学生带我上街玩。她是杜维明的学生，学中国思想史，现在正写关于朱熹的论文。中国话说得挺好，词汇很多，有个中国名字叫桂思卓。“你的名字很别扭，不好听。”我说。

“他们中国学生也说，说不像女孩子的名字。”她坐在驾驶座里点烟，点着了，夹着烟扶着方向盘，发动了汽车。这汽车很古怪，像个乌龟，背脊高高地耸起来，又像一只正在抓老鼠的猫。这是一辆德国车，不新了，她喜欢它只是因为不会和别人的车搞混。她转过头注视着我：“你好像特别年轻。”

“并不年轻了，快三十岁了。”我说。我常常忘记这里女人不爱公布年龄的习惯。

“哦。”她说，“结婚了吗？”

“结婚了。”

“你爱人做什么的？”

“你怎么也会说‘爱人’？”我笑了。

她得意地笑了：“我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了两年书呢。”

“哦，怪不得，你中文说得很好。”

“中国的年轻人好像很大了还对男女之间的事感到神秘，不了解的。我讲给他们听，还画给他们看，他们都不好意思。”

天晓得她画了些什么鬼东西给人家看了。我看看她，觉得她怪有意思的。她戴了一副框架很大的眼镜，镜片很厚，一圈又一圈，遮住了眼睛。脸色不好，显得很苍老，不晓得她有多大了。不好意思问。不能乱问，人家会生气的。“你喜欢吃冰淇淋吗？”她问我。

“非常非常喜欢。”

“那好，咱们去吃冰淇淋。”她停了车。我们下了车，雨下得不小。路灯全亮着。那是一种煤气灯式样的路灯，古色古香，在雨中发着光。我们冒着雨去找冰淇淋店。这是在哈佛广场附近，她告诉我，这里的商店都是大学生最爱光顾的。

“波士顿是古老的城市，这里是不是还存在着美国最古老的风土人情？”我问她。

她耸耸肩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我是犹太人。”

“哦，犹太人。”我站定脚看了她一眼。

“是从俄国来的。”

“我看过一个讲犹太人的电影《苦海余生》，非常棒。其中有一句台词我至今还记得：‘我们犹太人所以能活到今天，就是因为我们从来不丧失信心’。”

她认真听完我讲述电影的内容，说：“这好像是一件真事。”

“是真事，电影片头上说明的。”

“我好像是听我祖母说的。呀，你的头发湿了。”她摸摸我的头发。我把帽子拉上来戴好了。我们找到一家冰淇淋店，各人要了一份，我按照他们美国人的习惯掏钱包付自己的一份，她拦住了我：“我来付。”“不。”我说。“我Pay。”她急忙中说了个英文字，只能让她付了。当我们端着冰淇淋走到一张空桌子前时，一个形象可怕的人径直

向我走来，奇怪地笑着，我吓了一跳。一个店员过来把他带走，关在了门外，门外下着雨，他抖抖索索地站在雨里。“不要紧，是个神经病。”她安慰我，大口大口地吃着冰淇淋，“我还没吃午饭呢，饿坏了。”

“喜欢中国吗？”

“喜欢。我喜欢上海，上海有点像纽约。可是我的同学们都不喜欢上海。”

“可是你发现没有，他们买东西都要买上海的东西。”

“对！不错！就像美国人对纽约的态度。”她大叫了起来，声音有些喑哑，“从中国回来以后，我好像有些改变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我从天津回来，去我一个同学家里，她家住在一个农庄。她妈妈养了许多苗。”

“什么苗？”我问。

“苗，一种小动物。就是C、A、T，cat。”

“哦，是猫。”

“对，猫，这样很好，你要经常纠正我。”她拍拍我，又继续说，“她每天早晨要买很多牛奶给猫喝。我看到猫喝牛奶就想到我们南开的一个老师，他生了个孩子，他太太没有奶，可是奶粉不够吃，他急得没办法……”她沉默了一会儿，抬头看看我，我也看看她。门推开了，进来一对湿淋淋的男女孩子，中国人，两人买了一份冰淇淋，搂在一起，你吃一口，我吃一口，然后吻一下，再吃。说的是英文，听不懂。那模样和装束，是唐人街上的，不像学生。

我们出了门，找到汽车，她照例点着一支烟，然后发动。她说要去登一幢楼，可以鸟瞰波士顿。这大楼，底下全是商场，上面是咖啡

馆。我们找电梯。“这个电梯是上五十二层，可是，进那里要付钱。上五十三层不要付钱。”

“那为什么呢？”

她摇摇头，也茫然得很。我们都不想付那两块钱，上五十三楼吧，还高一层呢。电梯上升，耳朵嗡的一声，耳膜进去了，听觉又不灵了。楼上人很少，都坐着喝东西，我们趴在窗户上看波士顿。

“说哪条街上有一串马蹄印，是独立战争中，一个信使来报告英军来了的马蹄印？”

“在那边。”她向一个方向指了指，“是后人用铁做的。为了纪念。”

“哦。那是贝聿铭设计的楼。”我指给她看。

“对。这楼真是漂亮，它会变。有时成了一条线，有时成了一座尖塔，又像匕首。旁边的建筑映在它的身上，它显得好伟大。”她赞叹不已，“等会儿我们开车从它下面过。”她带我走到对面的玻璃窗前，“这座教堂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教堂可有意思了，他们认为生病不用医生，只要诚心对上帝，就会好。”“这不科学。”“当然不科学。”

雨蒙蒙的，波士顿的街道，湿漉漉的，路灯从玻璃灯罩里闪烁出暗淡的光。

“昨天我有课，没能听你们讲。”

“我们讲得不好，没什么可听的。你们这里来过别的作家吗？”

“来过，常来。今年年初，刘先生也来讲学的。呀，他真是，真是Handsome！帅极了！”她简直要晕过去了，“他穿得也很时髦，西装敞着，呀，简直，简直，太帅了。”

我笑了起来，她也笑了。大约是笑得有些放肆了，人家都看我们。

“别笑了，咱们走吧。”我说。

“再去哪儿呢？”

“有人告诉我，波士顿，有个花园博物馆，是吗？”于是，我们便去花园博物馆。据说，进了里面，你就好像是去了欧洲。

这是一幢普通的楼房，是一个贵族女人的家。她住在意大利，后来要回美国了，她丈夫便在美国为她造了一座完完全全意大利式的房子。走进去，暗暗的深深的走廊，环绕着一个内花园。花园中央是一个水池，池边是雕塑。花草长得很好，水，静静地喷上去，悄悄地落下来。二楼、三楼、四楼的窗户全对着花园，顶上是暗淡的天空，透过一个玻璃屋顶。有人在吹长笛，吹一支优雅的曲子。

“应该带照相机。”我说。

“拍了照可以对人说，我们到了意大利。”

我们抱着膝盖坐在门廊下，对着花园，动也不想动，这里的气氛很静谧，叫人不想动不想出声，只是愿意想点心事什么的。

不知哪儿传来潺潺的流水声。长笛在唱，一只钢琴试图伴着它，却有些犹豫。

“上楼吧！”她终于站起身来，我只好推动自己站起来，上楼。每一层都有许多的收藏，有些房间照原样子摆设着，三楼，有那贵妇人的画像，穿一件黑长袍，脸色苍白，神秘地看着我们。有人走过来，是个老人，管理人员，对我们说：“请把外套穿好，不要这样提在手里。”不明白为什么，难道在欧洲的建筑里也要像欧洲人那么讲规矩？有几个年轻学生在临摹那些名画。这博物馆对面有一个艺术院校，这都是艺术院校的学生。我们走在窗户前，跪在地上，趴在窗台上，那窗台很低，几乎要落地而又没有落地。潺潺的水声，钢琴终于和上长笛，谐和地流畅起来，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回荡，上楼，又上楼，穿过房间；回到走廊，再上楼……像一个幽灵在游荡。我说：“谁在吹笛子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为什么要吹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我们看着窗下的街，几辆汽车停在那里，有一顶红伞在移动。她忽然问我：“你想你先生吗？”

“总是要想的。”

“他还好吗？”

“不太好。他在一个职业剧团里工作，现在要和另一个职业剧团合并，就要减员了。”

“为什么要合并？”

“剧团太多了，卖座又不好。”

“为什么太多了。”

我无法回答她，扯开了话题：“你兄弟姐妹多吗？”

“有五个，全分开自己住了。我爸爸妈妈离了婚，也分开了。我妈妈也在上大学。”

“哦。”

不知哪儿来的水声，潺潺的。

上了汽车，她忽然回过头说：“你猜我有多大？”

“大概和我一样吧。”我谨慎地说。

“比你年轻四岁。”

“哦，真羡慕你。”

她得意地吹起口哨，把车打了个弯。

陈幼石回来了，居然在晚饭前赶到了。问她：“怎么样？”她说：“律师能理解我的战略了。”看起来，她心情挺好，精神也好，开了八

小时车以后，居然还这样，令人佩服。“你回来教书吧，都说你是个好老师。”我又劝她。她说：“我喜欢教书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假如回去教欧美文学，我要把学生分成小组，翻译名作。经自己亲手翻译，才能贴近作品，也可以提高英文水平。”她滔滔不绝地讲起来。我想她一定是个好老师。

晚上，哈佛请我们去教授餐厅晚餐，有小叶，桂思卓，一位女教授，陈幼石，还有苏珊小陈夫妇。小叶是个很热情的姑娘，她对我说：“我和我们指导老师说，能不能筹些钱，请你昨天说的那些作家来哈佛，和美国文学界交流交流。”“你的想法很好，可是美国大学的教育经费很紧。”我说。我一边和小叶聊一边听旁边有人在问妈妈：“你女儿和你住一起吗？”“在一起。”妈妈说。“中国人的习惯总是和父母住一起。”我扭过头去看了他一眼，我忽然怀疑了起来：他不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而仅仅来到美国几年嘛。怎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了——对中国。

12月7日 阴

吴祖光去圣路易斯，我和安忆两个应华盛顿大学之邀，傍晚到达圣路易丝。他们已为我们订了旅馆，并在学报上刊载了我们的经历，又非常周到地安排了我们在这里的三天日程。留学生都文伟也是上海人，他在这里一边学习，一边在一所中学教书，作为打工。他为我们去那里，已忙了好几天了。

12月7日 阴

今天去圣路易斯。

我们住在一个老式的旅馆里。电梯由专门的侍者操纵，而不是像所有的电梯那样：自己开。房间的墙是木板壁的，灯是煤气灯的式样。文伟说：这个旅馆马上要改装了。太古老了，都已经是过时了的。圣路易斯就是一个已经过时的城市，它的光荣已经过去了。它曾有过显赫的光荣——开发西部的必经之路。为了纪念这个，圣路易斯有一个特别的纪念碑——拱门。我一到就向文伟提出要去看看拱门。

“好的，好的。”文伟答应着，拿出一份我们在圣路易斯四天的时间表，每一个小时都安排内容，每一顿饭都安排了——今天晚上，去一个美国教授家吃饭，他的太太是上海人，家里有一个从上海来的侄女，三个月前来的。

这位教授对中国是很有兴趣的，很友好，他的上海太太对我们说：“我爱人，”——她这么说，“我爱人是最早提出和中国缔结姐妹城市的。本来想和上海结，可上海不接受，也许是因为上海是个大城市，与圣路易斯不对等，后来我们就和南京结了姐妹城市。他现在又在研究电脑中文打字机，这也是第一个有这种想法的。我爱人总是要干第一个——他想帮助国内造一个养鸡场，可是，唉，他们不懂，美国这样的养鸡场，又先进，又干净。莹莹从上海来，不吃鸡，我就拿照片给她看：美国就是这样养鸡的，多干净。她于是喜欢吃鸡了。”

莹莹长得很白净，挺秀气。“你打算学什么？”我问她。她笑笑：“学画。”“纽约有一批画家呢，你和他们有接触吗？”她摇摇头：“你见他们了？”“我见了一个。”“哦。”她脸上露出十分神往的表情。“她现

在在学英语。”她姨妈说，“我们在家里逼着她，不许讲中文，只能讲英文，每天晚上逼着她讲，讲到很晚。今天破例，有中国客人，可以讲中文。”

吃过晚饭，看电视。今天有个关于中国的电视节目。电视片拍得很好，触及了许多以前很少接触的生活角落。比如一对夫妇闹离婚，经法院、里委、各自单位的调解重归于好；一个小偷偷了邻家的电视机，经教育感化，决心改过自新；一个精神病院，一个病人痊愈出院了，和医生护士在聊天：“我回去之后，一定要好好干四化，实现四个现代化：走路汽车化，上楼电梯化，吃饭宴席化……”我一下子笑出声来：“他怎么可以出院呢？他根本没好！”可是那位教授却说：“不，他根本就是个正常人，他是很压抑，然后才说出这些话来。”我也不反驳他。看完电视后，我们下到地下室，他的工作室，看他的电脑中文打字机，他再三地说：“我不知道那对夫妇吵成这个样子还能不能和好，我很为他们担心。”他的电脑我是无论如何也看不明白的，只看得懂屏幕上显现出来的字：上海来的猴子莹莹——他们挺疼爱这个远房侄女儿的。“她来时懂英文吗？”我问。他太太做了一个手势：“是个零。”“哦，多亏你们教她。”“我回国，看她怪可怜的，上不了大学，在工厂做事，就让她出来，给她一条出路吧。她要学画画，可是这有什么意思，纽约是世界艺术中心，聚集了全世界最优秀的画家，她拼得过人家吗？我们要她学电脑设计。”终于结束了对他电脑的参观，上了楼。莹莹一个人坐在餐桌前，手托着腮在想什么，看到我们就微笑了一下。她是我在美国看到的唯一的住在亲戚家的中国学生，她不愁吃，不愁住，不愁学费，可是我不知道她快活不快活。

回到旅馆，暗暗的灯，黑黑的板壁，阴森森的。夜里很冷，好像停了暖气。这里烧的是热水汀。

12月8日 晴

华盛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似乎不少，美国人研究中文的也多。这里中文系的主任，就是一位中国话说得很好的美国人，他的中文名字叫何谷理，待人恳切、自然，面貌有点像耶稣。他曾翻译过我的《百合花》。

去听了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课，教师是刘勤捷女士。约有十来个学生，一个个羞答答、傻乎乎的，读着中国小学生的语文课本。我又提出关于那个晒太阳的学生在想些什么的问题。他们的回答，比耶鲁的学生踊跃得多，也就事论事得多。

“他要把皮肤晒黑，想着那会漂亮得多。”

“他在尽情享受阳光，和大自然在一起。”

“……”

这些孩子才一年级，离毕业还早。他们还没来得及去想大学毕业以后的问题。

中午在他们的教授俱乐部和中国教授以及研究中文的美国教授聚餐。有一位陕西籍的杨日旭教授，十分关切地打听陕西有哪些知名作家，又独自说了许多家乡的土话，别人听不懂，他似乎很过瘾。他怀念和自己童年交织在一起的家乡。但他又坦率地承认，他一直反对共产党，要回去是困难了……他似乎有点惆怅。

在华大的讲演，不是人数最多的一次，但是出席的美国人较多。有些留学生，把他们的房东老大娘都请来听了。留学生请了一位英语最好的北京人叶坦，作为我们的翻译。

晚上是留学生请我们在中国餐馆聚餐。

来美以后，无论在纽约、华盛顿、波士顿，来来去去都有汽车接送。汽车的主人都是三四十年代、五六十年代，从台湾来美的学生和教授。他们在美已成家立业，站稳了脚跟。而从大陆来的学生，都正在半工半读，苦苦奋斗之中。除了爱荷华的叶向东有了一部旧汽车之外，没见过别人有车。在这里，我第一次坐了大陆学生的车，是三位学生合资买的。虽然已破旧不堪，后部的车皮已经七翘八裂，停在那里，都会引起警察的干涉，可是居然还能开得动。和大家挤坐在一起，热热闹闹，心里别是一种滋味。

12月8日 晴

上午，和文伟去他任教的一所高中，他和我商量，让我和他的学生们座谈一堂课。他教的是高中毕业班的学生，马上要上大学了。本来的聘期已经满，但是因为他工作得很好，又聘了他一学年。他们似乎没有统一的教材，他自己选编了一本中国作家的作品，给同学们读。学生和家长都很高兴这样的教学，他们非常重视扩大知识面。他的学生们看上去都十分成熟了，有几个女孩子已俨然是大姑娘了，金色的长发披在丰满的肩膀上，很美，不过张口说话时，我看到她们牙齿上箍着一排亮晶晶的矫正器。还是未长好的孩子哪，我想。他们对文伟很随便，因此也对我很随便，喜欢听我们用中国话对话。所以我们聊得很有意思。他们都看了昨晚上的电视，觉得一对夫妇自己的事，却有那么多人来插入，很奇怪，似乎不太好。这是私事呀！也有一个学生说："也挺好的。"不过，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，他们不相信一对夫妇这样大闹之后还能和好，尤其是因为在众人面前大闹之后。他们问我："爱荷华怎么样？"我说："挺好。可是当我们走出爱荷华后，纽约人叫我们乡下人。"他们说："纽约人，哼，他们也叫我们圣路易斯乡下。"我问他们喜欢自己的学校吗？"喜欢。"他们说。有个女孩子说："这是个私立学校，学费很贵，为了让自己受到良好的教育，我自己挣钱交学费。我打工，夏天去做救生员，冬天做女招待。"有个男孩子在电视台做电工，有个女孩子做服装模特儿，更多的女孩子是做女招待。我问他们长大了想当什么，一位表情严肃的男孩子回答我：他要当个作家。我注意到他手里一直拿着一支笔，不时地在纸上记下点什么，而且，那样的严肃，没有一丝丝笑容。"为什么呢？"我好奇地问。他说："我觉得写文章很有意思，假如我能做个记者，可以

接触很多人。再说，也可以挣点钱。”可是我听说在美国作家挣不了多少钱。“要挣钱得做医生，做律师！”同学们起哄，他终于严肃地微笑了一下：“当然，主要不为了钱。”临走时，我对最漂亮的一个女孩子说：“你可以当个演员，你很美。”她高兴地大叫起来，把我抱住了。

放学时间，走廊里，孩子们在穿外衣，每人有一只衣箱，闹闹哄哄的。有的孩子开着车走了，规定十六岁可以考驾照，假如家长同意。

中午，中国系主任黑格尔先生和几位中国教授请我们在教授餐厅吃饭。女招待正是一个教授班上的学生，一个很可爱的圆脸蛋女孩子，她高高兴兴、落落大方地和老师们打招呼，一无羞怯。我记得曾有人和我说，她在餐馆打工，老板安慰她：没什么，艾森豪威尔当年也打过工。可是，他们说，中国学生是最抹不开脸的，总觉得打工有点见不得人。

在座的有一位杨教授，早年离开大陆去了台湾，又来了美国，他大谈家乡事：那茶馆，那酒楼，那戏台，那人情……“您可以回去看看嘛！”我说。他不搭腔，只看看我。过了一会儿，忍不住又谈了起来：茶馆，酒楼，戏台。“你回去看看嘛！”他停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是不赞成共产党的，我写过文章。回去要紧吗？”“没关系。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。”“我不仅写过文章，而且，很早以前，搞学生运动的时候，我，我还……我不晓得我能不能回去看看。”“能回去。”我说。他不响，低下头吃饭。这时，我旁边的那位上海太太轻声对我说：“那时，台湾被赶出联合国的时候，他和我爱人大吵，我爱人是双手拥护大陆的。”她口口声声“我爱人”，总有点不自然，我宁愿她说“我先生”。

吃过饭，我们去参观了一座名叫Stick的房子。这是一个名叫stick的老太太死后捐出来的。现在是国际学生中心。楼下有一间房子，住着一个大陆来学音乐的女学生，她免费住在这里，但有时要打扫房子并看房子。她不在，门锁着。每星期二，教会里有些妇女带着食物来，让留学生免费午餐一顿。

下午报告会。

报告会后，一群中国学生请我们吃饭。他们乱哄哄地把我和妈妈围着站成一堆，七嘴八舌地商量着：谁坐谁的车，上哪个餐馆，还有，钱，要去银行取钱——为我们作翻译的叶坦说，他曾在多伦多学了两年戏剧，来美才一年多。终于安排妥了，我们坐刘小连的车。这是一辆非常破的车，撞过一次，龇牙咧嘴的。是他们三个人合买的。曾有一次，开在街上，被警察盯上了："这车太破了，要换！"他们问我们今后的旅行路线。我告诉他们：——达拉斯——洛杉矶——旧金山——香港——北京，另外，到洛杉矶以后，还想去一次拉斯维加斯。"呀，那里有意思。"他们说，"我可教你噢，你去拉吃角子机器，你先站着看一会儿，见谁玩了好久还没掉下钱，走了，你就上去拉，保你一会儿就拉下钱来了。因为这一定有个概率的。有一次，我就这样，第二下就拉下一百个二十五分的分币，哗啦啦，从来没听过这么样的钱声。""那里是结婚城，结婚容易离婚也容易。""那里吃住都便宜得要命。那次我去，门口有个人还给了我一张十美金，让我做本。""那儿有妓女，妓女还出报纸呢！""那里有全美最好的脱衣舞。"

叶坦大谈艺术和戏剧——世界戏剧已经到了什么样的阶段，我们落后了不少。可是——他说，你今天讲的那些小说挺棒，真的，我没想到，比如，《轱辘把胡同九号》，真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。

刘小连在抒发他的理想——他只想做两桩事情：一是做托儿所阿姨，二是做玩具厂厂长。这全是由于想念他的儿子而生起的。他是公费生，明年可以探亲了。

在座只有一个美国人，却有个中国名字——朴端南，他是台湾女生子晏的先生，大家有点担心他不会用筷子，文伟说："他当然会的。他要不会，咱们把他赶出去。"他很努力地使用筷子，经常注意使两根筷子平齐，而不要一根长一根短。

12月9日 阴

参加何谷理先生教授的哲学课，他从中国的道教讲到毛泽东思想。在课堂上有学生问我：“你去过美国的贫民区吗？”

我想起了潘耀明那急促摇下车窗的动作，隔着玻璃，那雨中的街道反着黑油油的光。拐角上站着几个青少年，淋在雨里嬉笑着，冷清的街道便更加冷清了。更加冷清的街道，更显得危机四伏，不知哪里会伸出一支黑洞洞的枪口。摇下车窗吧！只剩下那个臃容的黑女人，嘻着嘴，喝着什么饮料，独自高高地站在那里做着广告……

我说：“我去了，不过是隔着玻璃。因为人们告诫我们，必须把车窗摇下。”

引起了一阵大笑，他们比我更熟悉情况。不过是熟悉而已，坐在这里的学生当中，恐怕不会有来自那种区域的人吧！我忘了，我应该问问他们的。

都文伟、叶坦、刘小连，来自上海和北京的三位留学生，陪我们参观拱桥纪念碑。这个碑，表明了这个城市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，这里正是美国开发西部的必经之路。高约几十丈的钢铁拱桥纪念碑，纪念着西部的繁荣。在繁荣前面打冲锋的，可能就是对印地安人的杀戮。

圣路易斯为西部的繁荣提供了道路，也可能因此带来了自己的衰退。这个城市许多大房子都空关着，主人不是他迁，就是亡故。整个城市有些萧条感。

12月9日 晴

上午，黑格尔教授带我去他儿子的幼儿园。他是德国人，生有一对温柔的蓝眼睛，大胡子，中国话说得很柔和。说来也奇怪，德国怎么会是个好打仗的国家呢？我见过两个德国人都特别温和——汉斯和黑格尔。

幼儿园在一所教堂里，三四个老师负责管理二十来个孩子。他的儿子彼尔一见爸爸，马上要抱，紧紧地搂住爸爸的脖子再不松开了。老师将一个中国女孩子领到我跟前，这是从台湾来的，才来不久，刚来时不会说英文，这会儿，却不会说中文了。她显然对环境还不熟悉，总是怯怯地站在旁边，不大笑，不大响。孩子们玩的花样很多：做饭，做医生，做手工，搭积木，玩水——在一个水槽里，玩沙子——有一个沙坑，画画——有书架、笔、颜料，还有工作服：一块塑料布，中间一个窟窿，透进头，披在身上，就再不怕弄脏衣服了，还有一个铁网罩住两个软垫子，谁要打架摔跤，老师就把他们放进去，尽可以打而不会出什么危险。

离开幼儿园，黑格尔教授带我回学校，去找妈妈。妈妈在听杨教授的课。杨教授请我将昨天谈到的几个作家的名字和作品为他写下来，他说他要去图书馆找来看。然后，一位年轻的教授周文龙先生陪我们去吃饭，今天是一个吴教授请吃饭。周文龙是个美国人，会说中国话，口音土里土气的，名字也土里土气的，不晓得是哪一位替他起的，像一个乡下人。他告诉我们，这位吴教授很有名望，以鹿桥笔名出过好几本畅销的小说，非常有学问。他刚来这大学时，就被吴教授考住了，至今想起来，还有点后怕。

吴教授果然有学问，并且十分健谈，他近几年回了国。天南海北地谈了许多，谈到美国社会人情淡薄的问题，他说："这是一个非常便利的社会，你完全可以从社会设施方面解决你一切的困难，当人们将这些困难向社会设施交付出的同时，其实也把人情一起交付出去了。要知道，人情常常是和需要联系在一起的。"我想，他的话有些道理。他送了我们每人一本书，包括周文龙。可他老不相信他也能得一本书，再三问："这是给我的吗？这是给我的吗？"吴教授上了汽车走了，他还在问："这是给我的吗？""是的！"我大声对他强调。"很奇怪。"他低头看着书。

下午，在黑格尔教授的哲学课上开座谈会，有个学生向我们提问："你们看见过美国的穷人吗？"

会后，我们去拱门。一个校报的通讯员要采访我们，我们说："一边参观拱门一边采访吧。"他也同意，就坐他的车。这是个美国学生，憨乎乎的。问他："你是校报的负责人吗？""不是，我只是一个通讯员。不过我挺想负责的。"他认真地说。我们只好笑。

穿过市中心，远远地便看见拱桥，像一道银色的虹。这边是圣路易斯，那边是密西西比河。哦，密西西比河，我这是第四次看到你，你又变了。你身上有一架铁桥。

上拱门，五个人一个电梯，挤挤地坐在一起，上，上，上到最顶上，到了。往下看，哦，密西西比河，像一条白蒙蒙的带子，一下子撒到看也看不见的地方了。"当年，开发西部的人们从这里过来，这是东西部的大门。"叶坦告诉我，"很奇怪，河那边，要比圣路易斯开放得多，圣路易丝十分保守。唉，它曾经十分的荣耀过，可是现在衰败了。你看，这些街道，房子。你们去过火车站吗？""政府已经决定要开始修建这个城市了。"那位校报的通讯员说，"以前有作家来过吗？"我问。"没有。"他们说，"我们这里不常有人来。来美国的人常常以为去了芝加哥就算是到过美国中部了。其实要代表美国中部的，是圣路易斯。圣路易斯人说的英文是最标准的美国英语，不像纽约，你在街

上听不到一句标准的英语。对吗？”他们问校报通讯员。他是圣路易斯人，最有发言权：“我不知道，可是美国的广播员，电视播音员常常是圣路易斯人。”“你看！”我们相信了。

圣路易斯是个法国名字，最早来的开发者是个法国人。

晚上，一位中国教师刘勤捷女士请我们去她家吃饭。周文龙送我们去。他稀里糊涂的，忘了她家的门牌号码，他就挨门挨户的往人家家里看，好像这能看出什么名堂似的。街上很安静，有几家门口已装饰得火树银花，迎接圣诞节了。“是这家，是这家。”周文龙兴高采烈地从台阶上奔下来。“你凭什么这样说？”我问他。“这家的墙上挂着中国画呢！你来看。”是挂了中国画。试着敲门吧。算他运气，碰对了。

房子很大，很冷，她刚回到家，暖气还没来得及暖热房间。架子上放着两个女儿的照片，她的丈夫呢？不好问的。吃过饭，她带我们去黑格尔先生家，他今晚为我们召开party。她是个不认路的人，车子围着森林公园转了几圈，也没找到黑格尔先生的家。只能停车去敲人家的门问路，敲了一会儿，才有人推开二楼的窗户，不敢开门。看清是一个女人问路，才下楼开门，可是仍然没说清。最后，又迷失了方向。她只能下车拦了一辆车去问，开车的是一个美国女人，带了一个孩子，她说：“我带你们去吧。”说着就上车掉转车头，给我们带起路来。到了地方，她又下车，帮着找门牌，终于找到了。外面很冷，不敢下车，没看清这女人是什么模样的。只觉得她好像穿了件黑色的长裙子，袖子在车窗前飘拂过去。

黑格尔先生的太太非常年轻而漂亮，手里抱着一个一岁多的女孩子，像天使一样，蓝眼睛迷迷朦朦的。彼尔没人抱，自个儿在地上走，一旦谁抱起他，他便用双手紧紧箍着人家的脖子，再也不松开了。他还有个姐姐，十五岁了，不是他的母亲生的。女孩子很漂亮，很神气，金色的头发剪得很短，却不知为什么留出一小撮，编了一根细细长长的辫子，她便一直用手绕着这根细辫子玩弄。她告诉我：她生在台湾，小时候中国话说得比爸爸还好，可是现在全忘了。杨教授

也来了，穿了一件长衫，手里抱着一只大胖猫。文伟告诉我，他当年破坏学生运动，去了台湾，把他在国内的姐妹害得不浅，“文化革命”中，他的姐妹来信把他骂得很惨，声称与他划清界线。他现在非常想家，兴许是因为老了。

12月10日 雨

马克·吐温故居，离圣路易斯有两小时的汽车路程。都文伟和某女士以及她中文极好的丈夫，开车带我们冒雨前去参观。

这是一所很简陋的小房子。马克·吐温在这里住到十七岁。但故居里没有一件东西真是他小时候用过的，不过是按照当时的式样，布置起来的。倒是他成名以后的衣物，保存得较多。其中有一架风琴，是他妻子死后买的，这风琴可以自己弹奏，也可以放入一种带孔的纸卷，自动演奏音乐，就像现在的录音带一样。这东西曾在瑞士一个乐器博物馆里见过，但那只是一种普通乐器，一种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标记。在这里它却有了生命，有了感情。这琴是马克·吐温抚弄过的，那带孔的纸卷，是他收藏的，是他喜欢的。而且在音乐里，似乎还可寻找出他失去妻子的凄凉。

世上事物就是这样，文学更应这样。

最有趣的是，他在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里写到的那个山洞，在他小说发表一年之后，已成为游览胜地，开始是由本地居民，带了照明工具，引导游人从自然的山洞里进入。现在已人工开出一门，门外筑了一所出售纪念品的大厅，下雨天进山洞，也不会湿鞋。有向导带领，洞内一路有灯。一处岩石上刻凿了一行大字，原来是一家鞋厂的广告。当初刻字工人，需要等到晚上，没有游人时才能进行工作，所以这个广告刻了两个星期。等到工人们刻完走出洞来，那个鞋厂业已倒闭。现在常有人在洞里举行婚礼。

这个洞现属私人所有。门票是每位五元。

晚上，何谷理先生为我们举行“派对”。他的家跟他的人一样朴素。但他有一位十分美丽的妻子和三个极其可爱的孩子，就显得异常的富裕。

12月10日 阴转雨

去马克·吐温故居。

朴端南，子晏，文伟和我们，朴端南开车，是他们自己的车，很小。所以先把车开出城，在他父母家停一下，换上他父亲的车。他家在一片树林子后边，很美的风景。一开花园的栅栏，两只一黑一白的小狗便扑了上来，叼住我们的裤脚管，再继续往上攀，赶也赶不走。它们很冷清，家里只有朴端南母亲一个人。可我们很快就走了，害得它们空喜欢了一场。

车子开出小树林，开往Hannibal，马克·吐温出生在那里。

“子晏，听说你们家里失窃了，是吗？”文伟问道。“是的呀！”子晏说。“偷掉点什么东西？”我问。“我已经说过十遍了，再不想说了。”可是她还是忍不住又说了一遍：“我们家里实在没有什么可偷的呀，就是一个录音机，一个照相机。他把这些都拿走了，还拿了一包盐。很奇怪。”“一定是个女人。”我们猜测。“有人说，可能是个孩子，大人叫他来偷，他回去汇报说没什么，于是大人便叫他把盐拿来。”子晏说。“也是的，辛辛苦苦地偷一趟，总想多拿点东西。”我说。

天阴得厉害，马上要下雨了。车开得飞快。

“小晏，你和朴端南是在哪儿认识的，美国？还是台湾？”我问她。“在台湾。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到美国来，也从来没想到过这么早结婚。”“你们家听说你要和一个美国人结婚，怎么样？”“我妈妈要用头往床上撞了。”“你爸爸妈妈呢？”我们饶有兴趣地问朴端南。他说：“我写信告诉他们，他们回信说：希望你考虑考虑；我写信说我考虑过

了。他们又来信说：再考虑考虑。我说：我再考虑过了。于是我们结婚了。”小晏说：“他可会说了。我是属马的，妈妈问他是属什么的，他是属虎的，他居然说：马马虎虎嘛！我简直要昏过去了。”“你妈妈喜欢他吗？”“后来喜欢得要命。他嘴甜，他会说：你辛苦了。我们不会说，只会做，做了半天也讨不得好。”“你们挺幸福的，想要孩子吗？”我说。“现在可千万不能要。他已经够辛苦的了，再给他添个孩子。唉，咱们挺艰难。他想不读博士，可我觉得太可惜。”“是啊，昨天周文龙还夸他呢，说：‘朴端南的硕士论文比我的博士论文还深。’”“我又很难找到工作。”“你为什么不去做女招待？”“我不愿意做女招待。”她断然地说。“为什么？很多学生都做女招待呢！”“我不愿意。人家不把女招待当人看的。”她这样说。她好像偏激了一些，可我说服不了她，因为我没有做过女招待，没有发言权。

到了，这是一个可爱的小镇，小小的街，小小的房，挺纯朴。马克·吐温博物馆今天特地为我们开放，今天是星期天。参观不用买票，可是门口有一个募捐箱，假如你愿意的话，那——。先去看马克·吐温的家，小小的三间卧室，爸爸妈妈睡最外间，中间是姐姐的，里面是马克·吐温三兄弟住的，一张大床，大床下还有一个小矮床，我们讨论了一会儿究竟该谁睡那矮床，大概是他弟弟。街对面是那位马克·吐温很喜欢的女孩子的家，现在也整理出来供参观了。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孩子站在窗前，对着镜子照镜子——是模特儿，做得挺可爱。这女孩子后来结婚了，她的后代还有人在这小镇上。而马克·吐温，似乎已没有了后代，据说，在这里还有他的一个远亲。两幢小房子隔着窄窄的街，马克·吐温吹个口哨，对面也能听见。

下雨了。

博物馆里有一架管风琴，有一箱子奇怪的乐谱，只要将一卷刻着奇怪的符号的纸夹上去，只管踩好了，便能奏出音乐。博物馆副馆长给我们奏了一支民歌——《夏天最后一朵玫瑰》。吱吱哑哑的号声充满了房间。

还有两处参观的地方，一个是马克·吐温常去的密西西比河坡，一个是马克·吐温常去的山洞。今天下午怕是只能去一个地方了，究竟去哪里？吃好饭再说吧，我们都这么说。

这里有些很可爱的小店，卖各种奇奇怪怪的小玩意：贴在树根上的画，河里的小石子做成的坠子……东西摆得到处都是，像个杂货铺。

雨下得大了，我们去吃饭。吃三文治，每人一份，是装在小筐里而不是盘子里，小筐是竹编的，挺精致。我喜欢这个小筐，不好意思拿走，因为这就代替盘子了，有谁吃了饭把盘子端走的？我和妈妈说：“昨晚上潘耀明来电话，说聂华苓给爱德文开了欢送party，他要离开爱荷华了。”“哦。”“他还说Esther考试得了一个C，她从来没得过C，病了一大场。”“你是说谁？”子晏问我。“Esther。”我说。“台湾的Esther?”“是呀！”“啊！”她大叫了一声，“快说说她，我们是好朋友啊！她还是戴眼镜？”“戴眼镜。”“长头发？”“不，短短的，后来又剪短了一次。”“呀，她太好了，我很喜欢她。”“我也喜欢她。”“他们家是做房地产生意的，很有钱。她要来美国读书，她妈妈对她说：‘假如你是读电脑，我给你一百万新台币。’一百万哪！要知道，我们台湾允许留美读书的经济标准只是一万美元。可是，假如她要学文学的话，一分也不给。”哦，我想起了，有一次她告诉我，他们家要她男朋友打电话问她：“到底在美国搞什么鬼呀！”我终于还是没把那歌教给她，那东北小调《送情郎》。

我们都激动了一阵子，然后商量究竟去哪里，山洞还是河坡。“让客人决定吧。”朴端南说。妈妈说随便，我说：“去山洞。”于是，去山洞。

这是马克·吐温小时候经常去玩的山洞，也是他曾在作品中描写过的山洞，如今，这山洞叫做马克·吐温山洞，是一个长而神秘的山洞。一个向导带领我们进去，里面装上了灯。过去，当然没有灯的，那会黑成什么样子！

第一条带人观光的路，现在已经废止了，只作为一个历史遗迹而被向导提起，那个最早的向导每带一个人进洞，就收一角钱。这是一个小小的邮局——孩子们这么叫。常常是这样，进了洞走过这里，便留下一封信给后边的探险家。这是一个孩子们的客厅，瞧，这是一架钢琴，这是沙发，这是舞池……这是结婚角，常常有新婚夫妻在这里举行婚礼，最早是这样发生的：有个女孩子在这个角落的石壁上，看到了她祖父的名字，在一些探险者的名字中间。那还是她祖父孩提时代留下的，于是，她决定在这里举行她的婚礼。那边，另一个洞口，那尽头，黑幽幽的，曾经是一个少女的墓穴，那是一个乡村医生心爱的女儿，早早死了，他将她的尸体放在这里。这块石头上，刻着广告，关于鞋的广告。有个鞋子公司的推销员别出心裁地想在这里刻一则广告，可是白天有旅游者，他只能在晚上挑灯夜战，直至两个星期才完成，当他回去之后，那公司已经倒闭了。这则广告倒是留下了，为马克·吐温山洞留下了一则故事。

这山洞非常曲折，有一个手掌般的岔路口，伸出五条岔路，不小心就会迷失，我们紧紧地跟着那向导，安全出洞了。

上车，回圣路易斯。雨下得很大，白茫茫的，路很滑。再见了，马克·吐温。雨水从车窗上泻下来，我好像嗅到了密西西比河的气息。奇怪，我去过四次密西西比河岸，它并没叫我如何地感动。可是，这会儿，在这个小小的镇上，密西西比河却一下子和我亲切了起来，虽然，并没有去河岸。是因为那古朴的小杂货店，那用小筐子盛的三文治，那山洞，山洞里今今昔昔的故事，那古风琴，那马克·吐温的小屋子……不知道。我认识密西西比河了。

汽车在越来越暗的雨雾里行驶着，寒冷的雨打在温暖的车窗上。

“子晏，你是哪里人？”我问。

“福建。我的外婆还在那里呢！”

“通信吗？”

“不。你知道吗？我妈妈、我外婆都是那种连自己的名字、自己的地址都不知道的人。”

“你妈妈是怎么到台湾去的呢？”我很好奇。

“说起来很奇怪。我的外祖父从小就和我的外祖母定了亲，在结婚前，我外公出了洋，认识了一个番人女子，两个人很好。后来，家里要我外公回去和外婆圆房，他们就要分手了，分手之前，那番人女子给我外公吃了蛊。”

“蛊？”

“一种很奇特的毒药，据说是用很多最毒的毒虫配制成的。吃下去以后，当时不会怎么，可过了一定的时间就不行了，除非吃解药，而解药只有配蛊的人才知道。南洋女子常常用这种办法拉住远行的情人。那番人女子就让外公吃了蛊，和他说：半年以后你必须回来。可是半年以后，外公没有回去，那蛊终于发作了。从此他就成了一个废人，每个月他都这么巡回一遍：第一阶段，安然无事，第二阶段，不吃不喝，屎尿都失禁了，第三阶段，发疯，上树滚地，丑态毕露……后来，他们便领养了一个女孩子，就是我妈妈。那一年，国民党在内战中打败了，残兵败将溃逃到福建山里，家家住上了一伙兵。我外公不晓得是清醒还是糊涂，忽然指定了一个人，决定把我妈妈嫁给他，说：‘就是他，就是他。’于是，我妈妈就跟了他，跟着军队跑，跑到了台湾，她还以为去了就能回来的呢，谁知道一去便再不能回了。那年她才十七岁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那就是我爸爸了。我爸爸倒真是很好，也许那一瞬间，外公很清醒。”

“不能写信去福建找找看吗？”

“我妈妈不知道外婆的名字。”

车窗外已是黑黑的了，雨下得很大，洗净了公路，路灯和车灯映在路面上。车很多。

“刷”的，车后面忽然响了一下，又是一下。车停了，朴端南打开车门走出去检查车子，子晏向我们道歉：“对不起。”她笑得勉强。“没关系。”我们说。停了一会儿，她说：“这就是美国人的生活，开着汽车飞驶在高速公路上，神气飞扬，可是车一坏，脸就变了。送去车行，一张账单开来了：六十达拉思（美金）！”她自嘲地笑了笑。

文伟下车给朴端南打伞，他在修车。雨打在伞上，啪啪作响。

12月11日 晴（王安忆）

今天去达拉斯。

文伟和黑格尔教授送我们到机场。黑格尔教授告诉我们，那个杨教授是个国民党的特务。呀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特务呢！多么奇怪的事。

达拉斯，天暖如春，吴祖光伯伯和他的外甥潘先生来接我们。吴伯伯是一小时之前从堪萨斯飞到的，他来看他的外甥，而我们，这三天里也没有什么地方去，便也一起来了。

达拉斯，是个新型城市。潘先生说："我们来达拉斯是错了时机，假如早来十几年，就可以发大财了。达拉斯的地皮近几年飞涨。"

"为什么不早来十几年呢？"我问。问得没道理。可是潘先生还是回答了我："我们嫌这里没有文化。"

到家了。房子十分漂亮，是我们所到过的房子里最漂亮的之一。可是，潘先生说："这不算漂亮，我明天带你们去看房子，售价五十万、六十万的房子。房子好不好，主要看厕所。"

"呀，你们的厕所就很漂亮了。"我们说。他们家的厕所确实很讲究，分两进。里面是厕所和浴盆，外面是两个洗脸池，是大理石的洗脸池，那边是雕花的壁橱、大镜子，两面墙的镜子。

"爸爸，舅公来了，明天我可以不上学吗？"儿子小牛向爸爸申请。

"不行。"

“舅公你吃过pizza吗？”他问吴伯伯。

“吃过。”

“你喜欢吗？我做pizza给你吃好吗？我会做，要cheese粉，还要番茄汁，很容易的……”他喜欢说话，一说起来就没完，爸爸就要喝住他：“牛！”

“唉！”他叹气，“就我一个人，我很惨。”

我们都笑了，他确实挺寂寞。

12月12日 晴

昨天来达拉斯，和吴祖光同志会合，将于十四日同去洛杉矶，住吴祖光的外甥潘会理先生家。

这个城市和圣路易斯相反，是个新兴城市，到处在建筑住宅。潘先生竭尽地主之谊，用汽车载了我们去逛，没其他地方可看，就带我们去看出售的新住宅，有一种新房子门口写明开放，那就是欢迎人们进去参观的。一幢幢样式各异的住宅，一般都有十分漂亮的浴间和客厅，有游泳池，有三到四个卧室，售价都在五十至六十万之间。这需要相当的富翁才能买得起了。潘先生是银行搞电脑软件的，夫人也是相当高的职员，收入不错，只一个孩子，他们家里住的房子，当初是七八万元分期付款买进，现在涨价了，值十五六万，也只能住得起这样价格的。

这些新房子旁边还在施工建造，但他们的建筑工地好像很干净。不像我们国内，就是造一个厕所，也要搞得尘土飞扬，挖地三尺，建筑材料狼藉满地。

看新房子，这种游览很有趣，恰恰倒是看到了一个新兴城市的特点部分。

12月12日 晴

天气暖得出奇。冬天暖，夏天一定凉了。可他们说并不是，夏天热得呱呱叫。潘先生带我们去看房子——这是最最“达拉斯”的游览了。出发之前，先在他家房子前照几张像，说实在的，他的房子也已经够漂亮的了。不知从哪里跑来一只狗，围着我们撒欢，我们照相，它也硬挤进来，最后我们上了汽车走了，它也恋恋不舍地蹲着目送我们。狗也寂寞。

一排一排的新房子，有的已经售出住了人，有的还没有，门口便立着牌子——Open！尽可以进去参观，看中了，也可以买。那是极漂亮的房子，一比较，才明白潘先生家确实不怎么样。豪华的客厅，门外是游泳池，池水碧蓝碧蓝，厨房宽敞而舒适，高大的冰箱，多种功用的煤气炉，雕花的食橱、酒柜。洗澡间果然妙不可言：莲花式的浴盆，金龙头，另有淋浴室，穿衣间。还有一种小型的公寓，往往是一对夫妻居住的，有一套样品房间，已经摆设好了——一个卧室，一个客餐厅，一个书房，两个洗澡间，极尽天下之豪华。“这是阔少们住的。”潘先生说。有些房间还放着音乐，冰箱里亮着灯，从早到晚。“假如晚上在这里宿夜，也不会有人干涉吧。”我问。“有时候，家里来了客人，就可以到这里来住一个晚上。”潘先生说。

我坐在台阶上，这是客厅里的台阶，前边有一排白色的栏杆。这里可以供二百人开舞会。哪里有这么多人啊！太阳照进来，洒了个满地，窗外的池水碧蓝碧蓝。录音机里放着音乐，是一支合唱。

“达拉斯为什么会这么有钱呢？因为有石油？”

“不知道，也许吧。不过，这里的有钱人真是多。”他说。我想起小叶那个有钱的表弟也在达拉斯，他有两幢房子，一个大公司。

“可是，有时候我觉得事情变得滑稽起来。一个人买了一幢漂亮房子，为了能够按时付清分期付款，他必须努力工作，上几处地方做事，从早做到晚。于是，他能够在房子里呆的时间就非常少了，他不能够好好地享受这房子。”潘先生摇摇头笑了。

汽车往前开，开过一排排的新房子，开过一片片空地。太阳很热，很干燥，外套穿不住。

12月13日 多云转阴（王安忆）

上午，潘先生去公司了。为了这几天他能陪我们，在我们到的前一天，他工作了二十小时。

下午，他带我们一起去接小牛从学校放学，然后，由小牛陪我们看电影《星球大战》，这是小牛提议的，他非常喜欢看《星球大战》，那是一部大人看不懂，而孩子则懂得不得了的电影。

“上午去公司，没有什么意外的事吧？”我们问潘先生。

“没什么。说有个人打电话找我一定要和我面谈。我想那一定是看了我登的求职启事来的。”他说。

“你想换一家公司做？”

“是啊！我这个老板当时答应我的条件现在却不肯兑现了。当时我说：薪水多一点少一点，我可以不争，但你要给我权利，让我按自己的意志任用人。可是当我找来了我满意的人，他却不肯付我要求的薪水。”

“哦。他嫌你开的薪水太高？”

“他表面上自然不会这么说。他不敢得罪我。在美国，很多企业里，重要的工作，常常是中国人担任的。”他露出一丝骄傲。

这条路的车速限制是每小时三十英里，很慢的速度，因为这是小学校的附近了。一个女人站在路边，来回护送小孩子过马路。

“是警察？”我们问。

“不，是一个母亲，她是尽义务的。”

车子慢慢地从母亲身边开过，她微笑着。

学校到了，小牛已经等在门口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送他走到车跟前，是他的老师。这是所私立小学，几乎是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，对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教学计划。学费贵得吓人，快抵得上一所州立大学了。

走过唐人街，不甚热闹，也不拥挤，尚有着大片的空地有待兴建。据说达拉斯要建造一个与各城市的唐人街都不同的唐人街，它决无那脏，那乱，那闭锁，那不景气。

看《星球大战》，电影院里有好几个场子，放映不同场次不同内容的电影，人少得可怜，不到三十个。假如你愿意，可以从这个场到那个场，看好几场不同的电影，当然，这是原则上不允许的，但是无人干涉。然而，没看见一个人这么干的。也许是看一场就尽够了，家家都有电视。

看完电影，潘先生和潘太太已经等在门外了，一起去吃晚饭，去“星期五餐馆”。这餐馆是全美国都有的，全名叫“感谢上帝给予星期五”。星期五是周末，是领薪水的日子。餐馆吵得厉害，必须大声说话对方才能听见。据说这是刚毕业做事的单身男女爱来的地方。果然，在座的都十分年轻，无所顾忌，大吵大闹。很挤，桌子挨着桌子，墙上装饰着奇奇怪怪的东西，牛角，镰刀，车轮，还有一架十字街口的红绿灯，依次亮着。红绿灯下坐着一个年轻人，一个人坐着，往一张纸上写着什么。“在写诗。”我们说，这才显得有情调，有故事。过了一会儿，来了一位穿灰衣服的女人，他们便喝酒。故事发展了。

菜很粗，都吃不完，请他们拿来盒子装回去，美国不习惯剩菜。侍者拿来盒子的同时，又拿来一只大汽球，拴在牛的椅背上。

走出“星期五”，耳根刷的清静下来。对面是一幢大百货公司，里面的东西奇贵无比，看看而已，买是绝对买不起的。一件粗制滥造的毛衣要三百美金，贵就贵在它是手织的。手工很贵。商品价格是由劳

动时间来决定。没错，政治经济教科书上这么写。手织远不如机器织的整齐，也许是故意织不整齐，以免被误会是机器织的产品。何必呢！也许觉得手织品有了一点儿人文气氛。

开车回家。好多门前装饰起了彩灯，十分辉煌。可潘先生家一无动静。我们劝他给小牛买一棵圣诞树，他挺寂寞。

12月14日 晴

从达拉斯到洛杉矶，是一小时的飞机路程。我正好签到了一个靠机窗的位置。飞机刚起飞，还能看到地面上一些绿的颜色，不久，飞机就进入一个黑黄两色组成的山群。有些地方像沙漠，看不到一点绿意。在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，上面已划了笔直的线和一些大的圆圈，也许这是开发的第一步吧！

洛杉矶就坐落在群山当中，从飞机上看，整个城市上空覆盖着厚厚一层褐色的气雾。从地面看太阳，只是一个赤红的球，浮挂在天边，真有点世界末日的恐怖感。

这里，是全美污染最严重的一个城市。全市一千万人口，汽车倒有六百万辆，平均一个多人一辆车。一位洛杉矶的美国公民对我们说："美国的人口是世界的六十分之一，而他消耗的能量，却是全世界生产的石油的百分之四十五。阿拉伯的全部石油储量，只够美国用一百年。石油的形成，要经过几千万年，而消耗起来却是转眼之间……"

朦朦胧胧的红球，已将沉落，电灯立即替代了日光。夜晚，确实比白天美。明明暗暗，闪闪烁烁，璀璀璨璨，经过了选择，经过了加工，呈现在人们面前。电，给城市化了妆。

12月14日 晴

——洛杉矶。

这是很长的一段旅途，从中部飞到了西部。一上飞机就想睡觉，老是睡不够。累得很，印象纷乱，来得太快。印象与印象之间没有了距离——也许因为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磨灭了距离。印象交叉重叠在一起，来不及去考虑它的意味了。只顾着看，看，看得真累人。

来机场接我们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留学生老沈、小李，还有一位台湾的曾先生，我们就住在他家。“您在哪里做事？”我问他，他笑笑说：“给美国人做事。”便再不愿提了，只顾忙着为我们提行李，开车。他的一辆车很旧，形状像吉普，可以装很多东西。我们的行李全上了他的车，我们坐老沈开的车，小李坐在他旁边为他指路，老沈开车开得谨慎，小李悄悄告诉我们：“他刚学会开车，但不让我和你们说，怕你们担心。”洛杉矶实际上是一群城，七十几个城呢。城与城之间，全由高速公路联系着，这里的高速公路是全美最棒的，纵横交错，四通八达，而且免费，因此这里的高速公路叫作free way，而别处，都叫作high way。洛杉矶没有公共交通，只有高速公路。因此每个人，都必须有一辆车。

路边是高高的椰子树，还有棕榈树，很暖和，太阳普照，而天却是黄黄的，不那么蓝。也许是周围都是沙漠的缘故，也许是空气污染——这么多的汽车。

晚上，曾先生请我们去一家香港饭店吃饭，香港饭店在“小台北”，这也是一条唐人街，都是台湾人。问他远不远，回说：“不远，只二十多分钟汽车路。”我们都吐了吐舌头。一位蔡先生带我走，他

说："假如可能的话，你不要和你妈妈坐同一辆车。""为什么？"我好奇。"那就不要问了，以防万一嘛。""哦——"蔡先生很年轻，几乎和我同年，他一边开车一边说话，毫不影响速度："我也刚来洛杉矶不久，以前在纽约。那里的工作不好找，我住了十一年，换了十四次工作。""呀，不到一年换一次。""有一次几个星期就换了。可我还是喜欢纽约，纽约有人文气氛，而这里，你好好玩儿吧，你会发现，全是人和机器在玩。""我想去迪士尼乐园玩。"我说。来美之前看了蒋子龙的《过海回忆》，对迪士尼乐园的鬼好奇得不得了。不晓得美国的鬼是怎么样的。车子开得飞快，要慢的话就得到最旁边的车道去。

"你是哪里人？"我问小蔡。

"我啊，爸爸是外省人，妈妈是台湾人。所以，小时候，外省人揍台湾人，要揍我；台湾人要揍外省人，也要揍我。"

"你怎么那样倒霉？"

香港饭店终于到了。曾先生的太太和儿子也来了，他太太是台湾客家人，长得小巧纯朴。我记得小亮的太太也是客家人，客家人是台湾比较受压迫的族群，他们都非常吃苦耐劳，并且民情习俗还保留了一些古风。而客家男人是最最大男子主义了。

他们问我对美国的感觉，我说："它真是富得够呛，怎么可以这样富呢？"曾先生笑了："我是二十年前来美国的，比起那时候，美国这会儿是穷了。它在走下坡路。"小蔡插嘴道："你看美国，不能只看美国，要看整个亚美加。美国的富裕绝不是建立在一个美国上的，你看，这屋子里，有哪一样东西是美国制造的！"

屋子里很乱，是我在美国看到的最乱的房间。"美国难道自己不生产吗？"我不明白。

"美金比生产值钱哪！"

"要是有一天，全世界各国，全拿着美金要来兑现，那会怎么样呢？"我还是不明白。

小蔡耸耸肩：“你自己去想象吧！”

曾先生对我说：“你应该去这里附近的印第安人保护区看看。美国，实际上是印第安人的。你还应该去墨西哥看看，墨西哥离这儿很近，开车就能过去，办签证也容易。墨西哥很穷，那是另一个世界。美国有许多苦力活，专门雇墨西哥人干，干得又好，工钱又低。

“我去过印度，孟买的机场上住满了人，流浪者，无家可归的，就在飞机跑道边生炉子。男女在街头野合，生下了孩子，孩子在街头长大……世界很大啊！这是个疯狂的世界，你明白吗？你们要看世界。你们也许会看开了，你们的‘文化革命’，插队落户，小意思！小意思了。日本，两颗原子弹。你们那十年，小意思了，算了！”

直聊到近两点，小蔡才回去。他的车窗破了一块玻璃，昨天晚上有人打碎玻璃开了门，进去睡了一晚上。车灯刷过拐角，不见了。雾蒙蒙的。下露水了。

12月15日 晴

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方语言系，讲演了最后的一场。明天，美国各大学开始放寒假了。

回家，学生都要回家了。我也想回家了。

上午由学生杨女士陪我们去了好莱坞环球制片公司。这里已不拍电影，除了拍一些电视片外，主要是供游览，门票是十一元一张。

这里有各种样式、各种时代的建筑硬景，正面看去像真的一样，背后却是乱七八糟。这里一切都好像是假的，可是出售纪念品的各式小房子，却又是真的。真真假假，搅和一起，弄得自己也不知道是在某一个“舞台小世界”里，还是在“世界大舞台”上。这里随时还会出现“僵尸”，他们站在墙后，或慢慢向你走来。大人看见他们会大吃一惊，但他们绝不会吓着孩子。呆板的、死白的脸，带着刀伤，但随和地愿意跟每个游人照相。载你的车涉水，会碰到鲨鱼，假的；过桥，一座古老破败的木桥，桥塌了，车侧了，是机械操纵的。这里有滑稽打斗，有请观众充当电影演员，拍成短片后立即放映给大家看。观众当一次电影演员，十分过瘾，观众看观众表演也十分过瘾。尤其是看到他们被海浪——一桶一桶的水，浇得浑身淋漓时，就更加开心。

12月15日 晴

天好得惊人，忘了是冬天。去影城，加州大学的留学生小杨和小陈陪我们去。小杨是台湾人，小陈是广州人，都在学文学。

这里原是电影拍摄中心，如今废了，便改作一个游乐场。美国没有太多的风景区，无山水可游，所以就别出心裁，想出各种玩意儿来玩。这些玩意儿常常是孩子会的，天真得叫人感动。影城里各处走动着一些电影人物和卡通人物：米老鼠，唐老鸭，还有一个鬼，是美国一个系列片里著名的鬼，面色阴沉灰白，额头上有一道可怕的血痕。上前要求和他合影，他沉默不语，把手沉重地搁在你肩上，叫人好一阵心惊肉跳。那唐老鸭则是憨态可掬，颇献殷勤。我们先坐上一列游览车，这车带我们上各处逛一圈：墨西哥城，忽然来了暴雨，冲倒一棵树；一座古老的破桥，正当车子到了中间，突然桥断了，塌陷下去；车子穿过大海，破浪而行——原来水中有一座隐槽；一座房子在着火，火舌从窗口伸出来，我想起了《蝴蝶梦》；……这一切都是旧日电影布景的废墟。

车子在一个表演场停下来，观看表演，介绍许多拍摄电影的特技：人在墙上行走，在天上飞，当场表演著名电影“ET”的一个镜头，孩子送外星人“ET”飞走了。

然后再上车，去第二个表演场，我们坐错了车，这是一个台湾的旅游团。大家都回头看我们，好奇而友好。那年轻的向导说：“你们就跟着我们吧，不过，别走丢了。”

最精彩的表演是中午这一场：邀请观众们上台去，立即有很多人举手要求参加演出，兴高采烈地上场了。有一名导演为他们讲解着剧

情，告诉他们应该做的事情……

一个酒店里，忽然来了一伙强盗，抢了东西就走，警察来了，追捕开始了。强盗们乘在四匹马的模型上，马上下起伏着，身后的天幕景飞快地过去，强盗们一边作骑马状，一边朝后开枪。然后强盗们跑到一个水池边，没有退路了，只有跳海，他们作出害怕的样子，绝望的样子，英勇的样子，纷纷跳水。这时，有一对情人在划船，忽然发现一个包。强盗在水里了，警察追到了，朝水里开枪，激起水花；大家从四面八方将一桶桶水朝那对情人泼去，他们乐不可支，哈哈大笑……表演完毕，银幕上立刻放映出来，像模像样的一个短片。演员很棒，每个美国人都能做演员——这是我看完这场表演后所做的结论。

从影城出来，便去商场，给妈妈买鞋，她的鞋即将崩溃，这旅行啊！我的鞋虽然没崩溃，也是不成样子，惨不忍睹。先去一个廉价的商场，虽然没看到合意的鞋，却看到许多别的玩意儿，确实便宜得惊人，小镜子，牙刷插，咪咪笔……“为什么这样便宜？”我问小杨，小杨也说不清楚，很多人在挑选。商场门口放了一堆圣诞树。要过圣诞节了。再去另一家鞋店，终于买到了，那招待员又拿来一双袜子，说：“这对鞋子很适合。”我们谢绝了。

然后去学校。

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园很美，有一个雕塑园，立了好多雕塑，在月光下看起来，十分神秘。

晚上，报告会。来了好多中国学生，《上海文学》编辑部的孙小兰也来了，她是两三年前来美，以陪读的身份。如今，她丈夫读书，她在唐人街的一个中国书店里当售货员。她有些苍老，很辛苦。

今天又是不用翻译，因为几乎全是中国学生，对国内的情况很熟悉，很关心，他们要我多讲一些，于是我就讲史铁生、张承志，孔捷生、铁凝、陈建功，把我喜欢的作品和作家全讲出来，越讲越快，快

到不能再快的时候，只好停了下来。问题很多，有一个奇怪的问题：“你在美国过了四个月，回去之后，再写东西，会不会带了点洋味。”“不会。”我很快地回答他。大家笑了，这个问题过去了。可是我却还在想：我想我不会。很奇怪，我原先以为自己挺“洋”的，而如今才知道自己实际上非常中国式。我原以为自己喜欢吃西餐，现在才明白自己实在是喜欢吃小笼包子、馄饨、油条、清蒸鱼，我厌恶牛排。不过，我喜欢牛仔裤。

回去的路上，忽然下起雾来，雾大得可怕，三米以外就什么也看不清了。车子在雾里开。

12月16日 晴

去闻名已久的迪斯尼乐园，门票是每位十三元。

昨天环球制片厂的玩法和这里比较之下，那就太文质彬彬了。这里的一切都叫人动、转、飞，它让青少年大叫大嚷大笑。电动车载着你冲下瀑布似的悬崖，穿过无法穿越的岩洞，让你经历一切凶险，但一切具有科学的保证。坐上各种电动椅，椅子转着、旋着，让你看各种灯光的变幻，电动的技术。古代的战争，宫殿的生活，童话的世界，强盗的洞窟，女鬼的舞蹈，总之，让你在自身的平安中，取得各种冒险的乐趣。

即使这样，我还是没上宇宙飞船。我很相信科学的计算，它会保证人的平安，不过它同时也知道人的极限，因此不达极限不罢休。从那里玩了出来的人，脸色发白，笑不出来了，一个个都很沉默。两个日本姑娘，干脆就在休息厅里坐下，像要呕吐的样子。

我庆幸自己有点自知之明。

12月16日 多云

今天去迪士尼乐园，本来请老沈带我们去，可是他从来没在高速公路上开过车，于是，便由小李带我们去。小李的车很破，是六百美金买来的，曾先生检查了一下车，保证不会在路上抛锚，可是，他留了个电话给我们，万一有事，让打电话给他，他会来接。

车走得很好。小李得意地说：“我今天加的是好油。”两个小时以后，迪士尼乐园在前面了，好大好大的停车场，立即有人迎上来，带领我们停车。

鬼使我很失望，一点儿没把我吓着。是这样在鬼的世界旅行的：两个人坐一排，那轮椅前进并转动着。进了一个普通的房间，地下放着洋娃娃，或许是孩子的卧室，穿过房间，进到走廊，哦，门上的敲门环在动，自动地“啪啪”打着门。蜘蛛网，成年无人居住的老房子，阴惨惨的，轮椅带着我们滑行过去，前面是一片鬼哭狼嚎，坟地，一块石头后，蓦地伸出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，椅子转弯时，我看见那鬼的身下有一根弹簧，不由得扫兴。一个棺材盖慢慢顶起，伸出一只干瘦的手，然后一个大厅，蜘蛛网，灰垢，一群浅蓝色的穿着古装的人影翩翩起舞，忽隐忽现，我期待着有人来掐我脖子。一个女鬼在惨笑，我们经过一面灰蒙蒙的镜子，镜子里的我们中间，得意洋洋地坐了一个鬼……从头至尾，一直非常喧闹，鬼大声地叫着，笑着，声势很磅礴。远没有我们家老保姆的鬼故事精彩。吴伯伯说：“我们中国要搞鬼魂馆，准盖过他们，咱们把聊斋里的故事全用上。”深宅大院，荒庙古柏……那才是鬼魂出没的场所。我和Esther早就说过了，美国没有鬼。

把我吓住的是速度。真的。一开始，乘一艘船游原始森林，船兀的滑下一个笔陡的斜坡——这是一个预告。我们坐小火车，小火车盘着山，快速地上而又快速地下，把你甩向左边，你还没摔好又被甩向右边，然后猛地往下，一片尖叫尖笑声。再坐小轮船，小李告诉我："你要大声地叫，这样比较容易忍受一些。"妈妈不愿再坐了，说："何苦呢？"小轮船的速度比小火车更高上一筹，穿过山洞时，还有狮子吼叫。同样的更加激烈地甩上又甩下，甩左又甩右，折腾得够受。却有那么多的人排队等待坐乘小轮船。

然后，吃午饭，准备去乘宇宙飞船，这是迪士尼节目的高潮。小李又叮嘱我："你要大声叫，实在受不了了，就闭上眼睛。"妈妈劝我量力而行。"不，既然来了迪士尼，我是一定要乘宇宙飞船的。"我嘴硬，心里难免有点发虚。走进宇宙馆，暗暗的，空空旷旷，一说话有回声，一列飞船开走了，在黑暗的甬道深处消失了，像是吞没在一个大口里。这时候，我心里忽然升起一个强烈的愿望，就是希望这飞船马上完蛋，今天停止飞行。可是，自从迪士尼建立以来，它从来不曾坏过，今天也不可能坏。只能上去了。坐定，将一个铁夹子拦在身上，船开了几步，忽然那夹子夹紧了，死死的，再也松不开了。船开了，只听到风声，叫声，什么感觉都休止了，我恐怕完了——我想。当这念头苏醒时，船速慢了，稳稳地停住了。铁夹子啪的弹了上去，站起来，跌跌绊绊地走上了岸，妈妈在吃爆米花。她惊讶我们这么快就归来，她只吃了没几颗玉米花。呀，我们好像过了一世纪。镇定了半天，吴伯伯说了一句："我想，我们可以当宇航员了。"

哦，真正叫人恐怖的是速度。

遇到一群台湾旅游者，他们老是朝我们笑，然后渐渐地搭上话来："你们是北京的？上海的？""你们去过黄山吗？"这里刚放映过《火烧圆明园》，同映的还有《黄山》。他们说："我们终有一天会回去的，我们一定要去黄山。"他们去过很多国家，欧洲、日本，却不能来大陆，而他们明明是中国人。一群高中学生在这里举行毕业典礼，

为大家表演了许多节目。女孩子穿着大红的裙子，又年轻又漂亮，歌声很美，跳舞跳得有活力。大家围着看，欣赏并羡慕着他们的青春。我们为他们鼓掌，真心地祝愿他们。

走出迪士尼乐园，上高速公路。

晚上，小蔡夫妇带着孩子来玩。那孩子又白又胖，愣愣的，快两岁了，却不会说话。曾先生说："也许是他爸爸妈妈说的话太高深了，他没有锻炼语言的机会。"我想，他会不会有一天，突然开口说起政治经济学来了。还来了一个台湾留学生小王，他听说我们想去拉斯维加斯，但是还没找到人开车时，便说："我去好了，我以前打工，就是做拉斯维加斯的导游。"那太好了，这样，后天我们便可以去拉斯维加斯，大后天回来，大大后天去旧金山，一天都没浪费，我很高兴。

聊天，聊中国。小蔡对我说："中国挺不容易的，不容易。一九四九年，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接过来的是个烂摊子，没有工业，少得可怜的一点，资本薄得不经一击。建设得很快啊！看，我这儿都是有数字的——"他从一个大包里掏出一叠表格和文件，"工业产值增长得很快啊！有个美国经济学家说过：中国这二十多年增长的产值，超过英国工业革命一百年所增长的。这都是有数字的，这不仅是中国方面统计的，也有美国方面统计的。不得了啊！当然，民生很苦，可是，国家要强大，要有经济实力，要搞工业！当然，我知道，民生很苦，也许我没有发言权，中国人不容易，吃了很多苦。也不要老怨人口生长快，哪里不在生哪！只是中国的生出来不死，医疗免费，公费，劳保，合作医疗。我这儿也有数字，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——"他又找出一份表，"和美国差不多了，美国人吃什么？吃牛排，吃白脱，吃牛奶！中国人了不起啊！你们要有信心！为什么基辛格跑到中国去和周总理握手？为什么每一届总统都把中美关系当作竞选的内容？明年里根要去中国了，他还想连任总统呢！"

我给他说得一愣一愣的。他越说越激动，不防，儿子在背后捅了他一拳，他一怔，回头看看，儿子瞪着他，撅着嘴。他回过头继续

说："别看台湾这些年生活不错，挺繁荣，可是那靠不住，台湾没有自己的基础工业，它为别的国家装配、组合，万一别的国家不要它了，那么——他的经济是依附在别人的身上，靠不住。你们老人家很伟大，自力更生有道理的。不要因为十年"文化大革命"怨死了他，十年'文化革命'，小意思，算了！我碰到大陆来的学生，想和他们谈谈，可他们总说：我们生活多么苦！我没有话说了，我没权利说了。可是，中国苦了这么多年，有收获，大有收获，没有白苦。中国不但是自己一个国家的问题，好多第三世界国家都看着中国呢！我做管理员，是半体力劳动啊，每天白天做苦工，晚上回来，就看资料，到处去找资料，其实我又何苦呢！我又不是中国人，我也不是美国人，我什么也不是。"他好像有点哽咽，低头整理他的资料，把它们塞进挎包。我们看着他，默不作声。他的胖儿子拖着一床又脏又破的小被子走来走去，一边吃着一根手指头。

"他为什么老抱着这被子？"我问他妈妈。

"安全被，每个孩子都有一条。"

哦，我想起，上次在什么地方还说起过呢！因为美国主张孩子自己生活，大人不常陪伴在身边，他们只能抱住自己的被子，似乎这能代替爱抚和偎依。慢慢长大了，他们就再丢不开这被子了，这被子成了他最初最可靠的保护人，真是奇怪。可却是事实。

小蔡低着头整理他的挎包，曾先生的儿子在沙发上睡熟了，他安静得出奇。曾先生说："他一点儿不像我，长这么大，身上居然没有一点伤疤。唯一的一次像我，那是我的朋友带了他女儿来，他太太是美国人，这孩子是中西合璧的，像个洋娃娃。他看见了，毫不犹豫地爬过去抱住了她。"曾先生过两天要出远门了，祝他一切顺利。



茹志鹃王安忆母女在圣·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演讲



母女同游迪斯尼乐园

12月17日 阴

今天去圣地亚哥的海洋公园。又是高速公路。小杨的先生开车。她先生是学电脑的，已经在一家公司里做事，十分厚道。“他反应比较慢，”小杨说，“我的火已经发完了，他还没有发起来。”

海洋公园挺大，有许多动物表演，还穿插着故事。比如海狮表演，两只海狮争一份遗产，可是遗嘱找不着了，争了半天，结果老海狮并没死。挺逗。还有大海豚的表演，跳高，走路，等等……也难为它们了。只是把这些庞然大物圈起在小小的池子里，总觉得别扭。也许是前两天玩得太厉害，海洋公园有点儿提不起劲儿了。等着明天吧，明天去拉斯维加斯。

12月18日 晴

中午出发，向拉斯维加斯，小王开车，我、祖光伯伯、小李一行四人。大家都说，最好是在晚上华灯初上的时刻赶到那里。因为——你们等着看吧。

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，有五个半小时的路呢！车是从车行租来的，一整天的租金是四十七元。因为是借来的车，就用不着心疼，时速一小时八十里。太阳热烘烘的，只穿一件薄薄的羊毛衫都热，汽车慢慢出了城，公路边有个背着旅行袋的男人向汽车伸出两个手指，是要搭车的，可是谁也没有停留。小王说："现在搭车多半是搭不到的，不像过去。谁知道他是真是假。发生过这种事，半路上他把你干掉了。"车上了高速公路。

月亮升起了，弯弯的一勾，荒地出现了，在凄清的月光下，黑幽幽的，看不到边。从拉斯维加斯方向来的汽车飞驰而来，擦身而去。"输得落花流水的！"我们望着那些车，幸灾乐祸地说，似乎我们准能赢一大笔似的。"有没有在那里发财的呢？"我又好奇。

"也有。前年吧，有几个中国人在拉斯维加斯赢了八十三万。那都是些职业赌家。"小王说。

"这里有技巧？"

"稍有一点。并且，和下的赌注有多少很有关系。"小王在那里当过导游，多少懂一点。

凄清的月亮照着荒凉的沙漠，汽车飞驰，轮子几乎要离地。一盏一盏的小灯从车轮下消失，像是给轮胎压灭的。路边开始出现巨幅的

广告牌，城里的赌场，开始争取游客了。

荒凉的沙漠，一弯冷月淡淡地照着。呀，地平线，灿烂的地平线。地平线在闪烁，璀灿无比。灿烂的地平线渐渐突起，突起，突起一座海市蜃楼，拉斯维加斯！原来它是这样地出现在我们眼前，怪不得都说要黑了天到。这是一座夜的城。

进城，下车，去旅馆，洗了脸，便去吃饭，吃的是自助餐，每人三元多钱，随你吃：肉、鱼、生菜、面、饭、水果……爱吃多少吃多少——这是一个日本餐馆，黑女人，洋女人，全穿着和服，看上去挺奇怪。吃了饭便去赌场。这里的一切都和赌场联系着，旅馆、饭店、剧院，都设赌场。我们先到吃分币机器那里去试试运气。我找了一个二十五分的机器，试着投进一个二十五分的硬币，“当当”，居然掉下来两个。“呀！安忆，你挺有财运的。”大家都说，于是信心十足，又投进一个硬币，“当当”，两个；再投一个，没有，再投一个，没有，没有，刚想丢手，却又——“当当”，来了，“当当”，来了，只来两个，再不多了，却又不让人丢手，让人总怀着希望。没有——没有——没有——硬币眼看着要丢完了，心里说：“丢完这些就罢。”“当当”——来了两个，又来了两个，“它不让你走。”小李叫道。“是啊，它不让我走。”没有——没有——“当当”——又丢不开手了，直到把十元美金的硬币都丢了进去，再没得可出来了。那边，祖光伯伯也都丢完了，大家才站起身来——“去看看吧！”

很大很大的赌场，霓虹灯闪闪地滚动着，数不清的赌局。这是一个中国人开的赌局，来的是押宝，看不太懂；这里是二十一点，用扑克牌玩。“这个好玩。”小王说，“要有点技巧。”他掏出几元美金，输了。这里玩的比较简单，我看懂了，把钱放在数字上，看到小球滚到哪里，假如滚到同一个数字，便能翻三十六倍。一个外国女人坐在那里，她同时放四块钱，每一块钱压在两个数字上，这样机会多了一半，但只能翻十八倍了，没有，把钱全撸进去了，她又放四块钱，总放那八个数字，又没有，她再放上，还是那八个数字……她很沉着，

很安静，可那固执却似乎有股恶狠狠的劲儿！那边嚷得好凶，都是男人。一帮男人围着一张赌桌，叫得震天震地的响。赶紧跑过去，挤进去看。一小伙子问我：“你玩吗？”“不。”我摇摇头，打量了他一下，他大约是十七八岁的年龄，很瘦，骨骼很大，是刚长骨头还来不及长肉的年龄，面色苍白，手里拿着一本学生用的讲义夹，淡蓝的眼睛很胆怯，有一种受了惊的兔子的神情。他为什么站到这里来？他和这群大男人很不协调。我有点可怜他。他又和我说话，大约是劝我玩。很便宜，而机会也多，并且不难，他教我，我不搭理他，他凑到我耳边上，轻声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只对他笑笑。对面的一个男人大声叫着，他赢得很多，眼睛都红了。我盯着他，他看看我，眼神是疯狂而涣散的。汗珠在他额上发亮，他只穿了一件衬衫。当我们离开这里时，我回头看看那小伙子，他还站在那里，瘦瘦的身子，裤腿吊在脚踝上。怯怯地站着，我忽然想对他说一声：“快回家去吧！”

我们去逛街，街上的霓虹灯是一排一排、一方一方地变幻，闪烁，好像是在深蓝的天幕上放映着卡通片。一个赌场门口的旧橱窗里，飞扬着钞票，钞票像暴风中的雪片，狂乱地飞舞着，头昏。霓虹灯，刷刷刷地变成红的，又刷刷刷地变成蓝的。

“这个剧场，邓丽君曾在这里演出，很多华侨坐飞机来听。”小王作着导游。

“这里挺可怕的。”我说，“是个疯狂的世界。”

“可是这里的治安出奇的好，你完全不用担心人身安全。”小王说。

“真的？很奇怪。可是想想也对，这里的疯狂是需要一种清醒的秩序保护着。”

“据说，拉斯维加斯的居民从来不赌！”

“我也听说。”

“拉斯维加斯大学有个系叫做旅馆系。”

“拉斯维加斯……”

又到一个赌场，离看表演还有一个多小时，再玩会儿吧。本来并不想玩，可是都在玩，不玩，做什么呢？咬咬牙，去兑换了五元钱的五美分的分币，找一架机器。一个老头在玩，只听到一会儿“当当当当”，一会儿“当当当当”，赢得好痛快。他不敢再玩了，起身离去，我便坐在他的高凳上继续玩，运气果然好，一会儿，下来二十个，一会儿，下来十个，居然，下来了一百个。“呀，安忆，见好就收啊！”小李对我叫。可是，还想碰碰运气呢！我又继续玩，渐渐的再也下不来了，那一百个又输了进去，可它总是不让人绝望，一会儿，来个二十个，一会儿，来个十个，让你想丢也丢不开手。我开始后悔不该不听小李的话：见好就收。继续拉，居然，五十个下来了，终于又来了一次一百个……谢天谢地，看演出的时间到了，不得不离去了。哦，这该诅咒的赌场。我们总算得以离去了。

小王把我们带到剧场以前，说：“你们看吧，我已经看过三遍了。”“一块儿玩玩嘛！”大家劝他。“我要去找个朋友呢！”“你的朋友？在这里？”“他是三天前到这里的，带了一万多元美金来赌。”“呀！他要完蛋的，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会输光的。”“他去年曾经带了三千元来赌，结果赢了一万元。”“好运气不会都轮着他的。把他拉出来，不要让他赌了。”我们说。

演出是辉煌无比的。

看完演出，赌场里仍然人声鼎沸。街上，灯火通明，形同白昼，一排大字在天幕上变幻着刺目的颜色：黄金大门，黄金大门，黄金大门！这是不夜的城。

12月19日 晴

只是微微地打了个盹。早晨，天亮了，霓虹灯灭了。天色苍白，像是疲倦了，有点憔悴。去吃早饭，穿过赌场。赌场里依然人声鼎沸，黄色的霓光灯闪闪滚动，人们在拉机器，“当当当当”的钱响。这里没有白天和黑夜，这里没有时间，只有钱。饭厅里人很多，全世界各地的，白种人，黄种人，黑种人。每人只须付一元九角钱，尽吃尽喝，饮料是鲜橘汁，眼看着他们将一箱箱完美硕大的橘子，草草地榨出浓汁便扔在了一边。有点造孽，我不由地想。造孽，我又想。造孽，我老在想。

太阳还没升起，凉凉的，很有些寒意。拉斯维加斯面容苍白，像是沉睡了。睡得不安。我们走了。

汽车开进荒原，太阳升起了。

我们开始总结——我输了五六元钱，祖光伯伯输了二十元，唯有小王赢了十几元。他们说：“吴老就算是不输，安忆则已经是赢了。”当然，我们真可说是没输什么，有多少人在那里破产，还有人自杀。

太阳明晃晃的，汽车在飞跑。我们不说话，觉得困，睡了。我们像是从一个疯狂的梦里醒来，小李和小王换着开车，轮流睡。旁边一辆车像是要和我们比赛，追上我们，又落后，再追上，再落后。那车的后窗里并排放着一对粉红的熊。熊倒了一个。太阳到了头顶上，正午了。前边是关卡，要进加州了。

“把水果塞到车座底下。”小王回过头吩咐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一边塞一边问。

“加州不许让别的州把水果带进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追问。

“他们怕把什么病菌带进去。这里离墨西哥太近，他们觉得墨西哥有很多病菌。”

通过关卡，再走，走，进了洛杉矶，这是下午三点。

晚上，吴祖光伯伯的朋友卢燕请他吃饭，也邀请了我们，吴祖光伯伯的另一位朋友，周信芳老先生的儿子也请大家上他的餐馆里晚餐。我们便去了那餐馆，那是在最有钱的人家的街上。一辆汽车不紧不慢地在我们前边，小李急得拍方向盘，终于超过了，与它并行。车里坐一个女人，无耻地朝我们笑——“这是妓女。”小李说，“这里的妓女很阔，开着汽车拉客。”到了周先生的餐馆，那餐馆很豪华，他出来迎接了我们。他是个典型的上海人，原来在上海京剧团，后来到了美国，他的弟弟将这个餐馆送给了他。餐馆里的招待全是美国人，而中国人在厨房里掌勺，他是有意这么安排的。那位卢燕女士还没有来，她在等一个日本的长途电话，她是一位电影明星，据说十分漂亮，而且风度优雅。极想看看她。电影明星对于我始终是神秘的。可是，等等不来，等等不来，我们便不客气地先吃了起来。菜很精致，而且昂贵，我们夸菜好，周先生得意起来，拿来报纸：“看，我们和一个法国人打官司，我们胜诉了。一个法国记者在刊物上发表文章，说我们的菜不好，哼，我们可不那么好惹。”法国菜也十分讲究，据说，敢与中国菜抗衡的只有法国菜。当然，我想，它还是抵不过中国菜的，我听说过这么几句对理想生活的描绘：住在美国，吃中国菜，娶个日本老婆，找个法国情妇。

“那位账房里的先生也是上海人？”我问。刚才我和王亚平打电话，他和我说上海话呢。

“原先是我们团的，出来以后，就在我们这里做账房。开始，他不太会说英语，经理就说：‘他这样一点儿都不懂怎么可以做账？’我对

他说：‘他并不是不懂簿记出纳，而只是不懂英语。’他说：‘可是，这是在美国。’我对他说：‘可是，这是在中国餐馆。’他是个犹太人，很可恶，常常说：瞧，全美国最上等的街，都是犹太人开的店！我对他说：‘那是因为犹太人没有国，你们没有异国的感觉。而我们，在美国总觉得身是客。不能这样一无牵挂地去赚钱。”

“你回答得很棒！”我说。

“他们美国人不要老以为中国人还是唐人街上的中国人，现在的中国人有文化了。”他说。

他神气活现地指挥着美国人，为我们上这上那，美国人给指使得团团转。

卢燕女士还没来，王亚平倒来了，我只能退出。王亚平想和我聊聊，问问我这几年国内的情况。我还是八〇年在北京文学讲习所时见过他几次，他似乎成熟了不少。他告诉我，他已经取得了绿卡，这个学期没有选修任何课，而是在筹划搞一个故事片，这筹划包括：募款写剧本，找演员等等。他挺能干，已经拍好了一个风光片，被迪士尼电影公司接受了。

收到潘耀明从东岸来的电话，他近日里从爱荷华到了纽约，要为三联书店组一套“海外画丛”。他告诉我，离爱荷华以前，“五月花”公寓的六楼又着火了，唉，六楼的这些男孩子们！记得第一个“五月花”的夜晚，也是着火，现在想起来，像是上一世的事情了。

“怎么样？玩得开心吗？”他问我。

“太匆忙了，来不及看，来不及想，真的，来不及想，好像，这会儿，我什么感想也没有。没有。”我说。

“我早说过，你们旅行的日程安排得太紧。”

“可是，我有点急着回家了。

“想家？”

“想得厉害。”

“不是有点没出息吗？”

“唉，没有办法。”

12月20日 晴

——旧金山。

这是最不顺利的旅途，丢了一只箱子，妈妈的，里面有她两份手稿。这是飞机场常出的事情，运送行李时，送错一条传送带，行李就会去完全不同的地方，这样的故事听了很多了。有一次，谁的行李上了巴勒斯坦；有一次，谁的行李上了台北……天知道我们的行李上了哪里，要是上了北京倒也罢了。侯北人先生陪我登记，排了不长不短的队，那工作人员问了这箱子的号码、大小、式样、颜色、特征，打进电脑，然后要我们留下地址和电话，说一两天之内就可以送到。看她说得那么有把握，稍稍安慰了一些。心情全破坏了。好多人安慰我们：这是常有的事，还没听说过有谁的行李最终没有找回来的呢！并且，这个联合公司是家大公司，它一定会保护自己的信誉的。这时候是最乱的时候，要过圣诞节了，来往的旅客量增加了许多。

陈若曦将我们接到她家，她家在旧金山外边的Berkeley，那也是大学城，不过，现在学校都放假了。她家住在山腰里，汽车盘山上去，往下看，旧金山层层灯光，姣美得很。

晚上给领事馆的陈领事打电话，因为给飞机场留的是领事馆的地址和电话。回说，没有任何箱子送来。唉，我们的箱子！

12月21日 阴有小雨

早上给领事馆打电话，依然没有什么箱子送到。不晓得这箱子到了哪里：巴勒斯坦？台北？

吃过早饭，陈若曦带我们逛Berkeley。她告诉我："人家都说Berkeley是美国的良心。它总是伸张正义。因为这里大部分居民都是大学生。法律规定，在某处居留一年以上就获得在这里的居民权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。他们总是积极参加竞选，提出很多议案：改革税收啦，改革房租啦，其实他们是不会受到一点儿损失的，因为他们总是要毕业离去的。他们可以一无顾虑地伸张正义。越战的时候，也是这里的学生开始反越战游行，闹事。警察就要管，弄到最后，就成了学生和警察的冲突。到了假日，警察非常紧张，早早作好准备，等待学生们来抗议啦，游行啦，可是却并没学生来，因为是假日，都玩去啦！"她大笑起来，我也笑了。

这个大学现在几乎是全美国的公办大学中数一数二棒的了。我们盘山而上，临着海湾站住了，海。中国人来美国，总是在这里登岸，旧金山是中国人最多的城市。我想象不出第一批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的人，是怎么生活的。

"那边的一个小岛，看见了吗？"陈若曦指点着，那里有一群小岛，不知道她指的究竟是哪一个，"原来那上面是一个监狱，没有人能活着回来。只有一个人越狱，游了回来，活着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后来有人为他写了个电影。"雾蒙蒙的，小岛隐隐约约的，有一群。

下了山，校园里挺寂静，学生们都回家度寒假了。广场中间立了一个人，披着雨衣，直挺挺地立着，低着头，脸上有一点微笑。"这是

个疯子。”她说，“这片广场，可热闹了，每天中午，都有演讲，各种各样论点的演讲：共产主义理论的演讲，反共的演讲，什么什么主义的演讲，有时，还有乐队在演奏音乐。”

“今天不会有了吧？”

“今天不会了，放假了嘛。”

那里立了一只熊，这是Berkeley大学的校徽，这学校的足球队的死对头是斯坦福大学，他们的校徽是只鸟。

雨下得有点大了，那疯子还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他在想什么？

这是个小镇似的小城，挺亲切的，据说，平时这里摆满了小摊子，卖各种小玩意，现在很冷清。

下午搬进了旧金山城里，住在一位魏先生家里，他是东风书店的股东之一，我们就在东风书店等他来接我们。东风书店是一个中国书店，在唐人街上，那里全是中文书：大陆的，台湾的，香港的。看到一本小说集，名叫《反修楼》，是一群在国内经历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然后来了美国的年轻人写的，便拿起来看了。看后十分失望，那就像是一篇篇忆苦报告，除了满腔的怨忿，一无其他。难道这就是海外所以为的中国文学，而且是“真正现实主义”的文学？收到潘耀明寄来的圣诞卡。这是一张会唱歌的卡，可它不知怎么，竟唱个不停，不知道该怎么制止它，只能一由它唱去。

傍晚，到了魏先生家，他告诉我们：“那电视塔的高灯下边，就是我们家。”旧金山的夜晚，很美。一层一层的灯光，濒着海湾。

魏先生家已经住了一对客人，国内的画家关良先生和他儿子，再加上我和妈妈，便是两家人。魏太太说：“有一次，我们家同时住过三家人。”

和周海瑞通电话，他说要接我去玩，便请魏先生告诉了他这里的地址。他很快就和弟弟来到了，“怎么会这么迅速？我怕你找不到

呢！”我坐上他的车，我注意到这不是上回的车了，上回的车是桔黄色，而这回是大红色的。

“这里我曾经来过，我过去的老板住这里。”他说。倒车，调头，开快了。

“这车不是上次的吧？”

“这是我买的。”他很得意。

“哟，接下来要买房子了吧？”

他笑了。车子开到一个斜坡下面，却上不了坡了，只得退回来，从别的路绕。“这不是新车。在旧金山，要买好车才行，这里上坡下坡太多了。”

“考试怎么样？”

“他考了A。”他弟弟说。

“今天考的还不晓得分数呢！”他说。

“你从小读书就读得很棒的。”我说。

“我不行，我读书并不聪明，只不过死用功。”

车子开进了市中心，“记得吗？这就是你们上次住的旅馆。”

“呀，真是的。”我看见了那小小的门，门前有一个小小的篷。哦，好快啊，这是我的最后一站了。

车子停在一幢大楼跟前，这是他们的家了。进门，正出来一个中国女孩子，打了招呼过去，上楼。房间很小，两张床之间放了一张桌子，其余便没有什么了。“租金多少啊？”我问。

“一百六十美元一月。”

“呀，在爱荷华，这租金可以租很好的房子了。”我想起Esther的小窝。

“那是爱荷华呀，这里是旧金山，大城市。”

“倒也是的。你们的洗澡间、厨房在哪里呢？”

“都在下面，公用。这栋房子住的都是中国人，而且奇怪，都是上海人。”他打电话给他的一个朋友，我们一起出去吃饭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的朋友驾着一辆又大又旧的汽车来了，他姓王，也是上海人。现在已经取得绿卡，结了婚，不再读书了，做工。

“今天可叫我气死了，”他上来便说，“五点钟了，老板还要我送一次货去机场。要过圣诞节了，机场里乱得要命，不收货了，什么也不收。”我们都上了他的车，然后向唐人街去，去一家叫做“红棉”的餐馆。

餐馆里人不多。点了三菜一汤，一大碗饭。他便闷头吃饭，很快地吃了两碗，一大碗饭空了，便让侍者再添。添了一次，又添了一次，然后，他才喘过一口气：“今天可饿坏了。”

“周海瑞，你毕业以后怎么打算呢？想不想开餐馆？”我问他。

“我也想过，不过要开的话，不能在旧金山，旧金山的中国餐馆太多太多。为了争生意，都压低价格。真不明白，为什么要这样竞争，自己人挤自己人，唐人街的餐馆是最便宜的。”

“去爱荷华好了，那儿只有三两家中国餐馆，都难吃。”

“是吗？开餐馆挣的是辛苦钱。”

吃完饭，我们逛街，吃冰淇淋，去加油。——他们全下车，加油的加油，洗车的洗车，水从玻璃窗上流下来，我觉得我一个人坐在车里很别扭。便出来了。“你出来干吗？”他的朋友问。

“我帮你干点什么活吧。”

“美国的人工很贵，就他们两个我已经开销不起了。”他开玩笑，我只得站在旁边看。

然后，他们送我回魏先生家。一下车，那朋友就叫了起来：“这里的房子真棒啊！”

“当然，这是最有钱的人住的地方。”周海瑞比较沉着，“我过去的老板住在这里。”

“太漂亮了！”他还在感叹。

12月22日 雨

下午去斯坦福大学参观。中午，在领事馆等那中文系主任王教授来接。陈领事已打电话到飞机场询问，回说，这只箱子目前还没找到。他对我说：“要叫他们赔偿。”“可是里面的手稿，怎么计算损失呢？”“那反正不能吃了眼前亏。”我的心凉了半截，似乎那箱子是再没希望找来了。我只能安慰妈妈：“或许你已经够得上伟大的作家了，许多大作家都丢过手稿，比如老舍，他的《鼓书艺人》至今没找到中文原稿。”妈妈哭笑不得：“你算了吧！”

陈幼石给我寄来一件滑雪衫，她老是不相信我身上这件外套，叫它作“毛衣”。我向她解释过，这不仅仅是毛衣，里面有厚厚的人造毛里子。她不信，唉，这个人哪！

参观斯坦福大学，下雨，这建筑像个修道院。有一座教堂，很美，像是天主教堂，可是说任何教都可以用这教堂。有个学生跪在最后一排，他在祈祷什么？教堂门前，是一排铜砖，每毕业一届学生，都将一方地砖换成铜的，从第一届起，已经有长长的一排，一百来块了。

下雨，地上有一排黄漆的熊掌，“这是Berkeley足球队来涂的，他们总是来捣蛋，当然，我们学校也去他们那里涂的。”王教授说。

那一串熊掌印，似乎使整个寂寥的校园都生动起来，活泼起来了。

晚上，几位教授请我们吃饭。

12月23日 阴

下午，东风书店召开了一个作家与读者的见面会，就在书店的店堂里，摆一张桌子，几把椅子，来买书的读者可以自愿加入，大家随便聊。我想起，周海瑞知道我的下落，就是在这书店里看到了我的《苦果》。

晚上，潘耀明从纽约来电话，他在纽约地铁遭打劫了。“呀！你真是太幸福了。”我从床上跳了起来。“你，你怎么这样残酷。”他气了。他不知道我是多么渴望经历一次冒险。昨天夜里，他和薇薇——华苓阿姨的大女儿，还有一位名叫夏晓兰的小姐，三个人一起去看戏，回来时已是夜里十二点，下了地铁，那站上只有他们三个人。这时候，忽然蹿出三个黑人，一个黑人逼近潘耀明，把他逼到墙根，然后撕烂他的裤袋，夺了他的钱夹子，里面有学生证，信用卡，一百来块现金。另一个黑人去抢夏晓兰的皮包（她的皮包斜背在肩上的），他便把她按倒在地，结果她的左肩膀骨折了。薇薇拼命跑，跑上地铁，则也被第三个黑人追了回来，夺了东西，那三个人便一溜烟似的跑了。夏晓兰躺在地上起不来了，薇薇跑上地铁，再不敢下来了，潘耀明抬不动夏晓兰，只好跑上去，拦住一辆车。然后，便是上医院，上警察局，一直搞到三点多钟，好惊险！

12月24日 雨

今天是圣诞节，很冷清。魏先生一家都出去工作了，那是他们自己的生意：魏先生去加油站，魏太太和女儿去美容院。他们家并没有过节的气氛，这一整条街也都没有过节的气氛。没有一家门口张灯结彩的。门都紧闭着，不见有人进出。细雨把马路洗得明镜似的，天阴。

周海瑞打电话来，说："很抱歉，今天不能陪你玩了，我要打工。""你在中国餐馆还是外国餐馆打？""是一家外国餐馆，做Waiter。"他说。"累吗？听说那盘子很沉。""我已经练出来了。""收入好吗？""还可以。像今天，生意一定好，我的收入也能多了。"

圣诞节，怎么大家都去工作？街上一定热闹，可惜这里离市中心太远，再说也很不熟，出去不了。只好呆在屋里。

12月25日 阴，有时小雨

二十日离洛杉矶到旧金山，这是我们在美国的最后一站，后天即将经香港回国。

这段日子，翻了翻自己写的日记，发现记来记去，无非是记一个陌生过客徘徊在五花八门的橱窗外的所见所闻。当然，橱窗要比谜实在，它很具体，明码标价，多少多少。在这里不用费心搞什么“出入证”，什么“纠察”，人们自然会根据自己的荷包，分流汇入。多少收入的人，进多少收入的商店，绝不会认错门。洛杉矶的蔡建仁先生说：“美国真正有钱的富翁，你们见不着。”

是的。他们行动要保密，要直升飞机，要保镖，我们当然见不着他们。不过，我们可见到了他们前后左右的影子。比如为他们准备的商品，以千计的服装，以万计的饰物，还有他们住过的房子，收藏的艺术品，他们开设的公司、企业，美国离开他们还有什么呢！我见到了他们的身影。

蔡建仁又说：“美国真正的穷人，你们也看不到。”

可能是的。我又想起那急促摇起的车窗，珠宝店里踱着步的武装警卫，还有那人手一册的支票本，身无分文现金的习惯……应该说，我也是看到了一些他们的影子。这影子有时就直接投射在晶莹闪光的珠宝上，金碧辉煌的豪华之中。

在旧金山，我们在陈若曦家里住了一夜，第二天就搬到魏需逊先生家里。魏先生管理两个汽车加油站，是东风书店的老板之一。他家住在市郊的半山坡上，环境幽静，房子也相当高级。我们去时，上海的老画家关良先生和他的公子，已住在他家好几天了。加上我和安

忆，于是三口之家的魏先生家里，顿时客多于主，喧宾夺主。白天，主人们都去上班了，丢下一个宽敞、整齐、安静、一尘不染、应有尽有的家。关老先生八十高龄了，走动不便，不大想动了。小关先生不懂英语，亦无交通工具，也只能困守在“家”。翻翻报纸，买了个用耳塞的小半导体，听听音乐。每天趿了一双拖鞋，从楼上的卧室，悄无声息地走到厨房里的餐桌边，又从餐桌边悄无声息地走回卧室。

今天早上，他好像怕惊吓了这份寂静，轻声细语地对我说：“美国……好像，也勿是想格……好像，也不过这样……哦？”

“嗯！……嗳！……”我做着自己的早饭——往面包上涂着花生酱，想起家里弄堂口的现氽热油条。我想家了。

今天是美国的圣诞节，就像中国的春节那么大的节日。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，也许小关先生也想家了吧！正好安忆约了她小学同学周海瑞来。周海瑞在念图书馆系，一面在餐馆打工，还要供他弟弟念书，日子过得可想而知。今天他特地借了一辆汽车，带了他的女朋友，——一位来自北京的学生，和他弟弟三个人一起来接我们出去玩，竭力想尽一尽地主之谊。

天是阴的，有时下一点蒙蒙细雨。我们又请了小关先生，一辆车上挤了六个人，六个身在客边的人。从年龄上排列，我是自然的主人，请大家看了一场电影，在中国餐馆吃了晚饭。

雨下大了，他们跑去停车处，开车来接我们。我站在餐馆里，隔着玻璃门，见外面雨里站着一个矮小的老人，帽檐压得低低的，伸出一只带把的塑料茶杯，泥塑木雕似的站在那里。我走出去，在他杯里放下一把稍有分量的硬币，他往横里挪了一步，抬起一对浑浊的蓝眼珠，朝我这个东方客人投了匆匆一瞥，眼睛里惊讶多于感谢，羞赧胜于喜悦。我在心里说：“我也在客边。这帮不了你什么忙，不过是留个纪念。”

一车六个客人，又在雨里飞驰。汽车左绕右绕，盘山而上。我们站在竖着电视塔的山上，俯望旧金山的夜景。灯光，依旧是那闪闪烁烁的灯光。蒙蒙细雨，越来越密了。我回到车里，计算着还有几天，我将结束这旅程，回到家里。他们几位都还未有归期，他们还将处于客边，紧紧张张工作，冷冷清清生活。中国人在美国的生活，大概也就这样。

12月25日 阴

周海瑞和我们一起出去玩，同去的有他弟弟，还有他的女朋友，一个北京姑娘，叫花溪。“好像贵阳有一条河，叫花溪。”我说。我想起叶辛向我描绘过那条溪水，到了春天，五颜六色的花映在水上，真正是一条花溪。“对，”她说，“我舅舅曾在那里生活过，他为我起了这名字。”她在中部上学，读的是电脑。她长得挺秀气，也挺和气。可是毕竟有点生分。看到她，我才意识到，我与周海瑞之间，毕竟相隔了十几年的时间和生活。我感到了陌生。

去金门公园，天阴沉沉的，倒是没下雨，有一个静静的湖，湖边有树林。

去金门桥，走到了金门桥中央，看海湾。记得刚到美国那晚上，人行道的铁门关了，我们没能走过来。

然后去唐人街，妈妈想看电影。

看完电影，去吃晚饭。汽车开过我们上回住的旅馆，开过中国领事馆，他问我：“你去过纽约的领事馆吗？”“没去过，但经过那里了，就在四十二条街旁边。”“你应该去一下，那是‘人民圣殿教’过去的大本营。”“哦，人民圣殿教！”我知道，那可怕的人民圣殿教，最后在丛林里集体自杀了，他们是怎么了？他们信奉的究竟是什么？

汽车盘山而上，我们要去高处，看看旧金山的夜容。汽车停在电视塔底下，旧金山的灯，像是缀在天上的星星。天很黑，雾蒙蒙的，雾绕着脚，我们好像站在烟云里，周围还停了几辆汽车，却不见人。一辆汽车上来了，车灯扫开了烟雾。

“走吧，挺冷的。”我们这样说。雾气，越来越浓，缭绕着我们的脚，拨也拨不开。我们上了车，盘山而下，旧金山的灯围着我们一圈一圈，一圈一圈。

“你们什么时候走？”他问我。

“后天。”我说，“你可以回去看看吗？”

“我也想，毕业了回一次上海。”

“回去看看吧。你记得董小萍吧，她分在了向明中学。”

“记得，她从小打扮得就很漂亮，很娇。”

“现在可大变了。我们的小学也迁了，迁到十二女中里面。”

“哦。那个大头怎么样了？他坐了牢，放出以后怎么了？”

“哟，我连他坐牢都不知道。”哦，那是个男生，是他的好朋友。我们毕竟分手了十几年，对彼此的生活有了很多生疏，靠一两篇小说，是沟通不了的。“我记得你小时候，在班上威信很高的。”我说，我极力把那些远处的拉近。

“你听见吧！”他拍拍花溪的头，“你听见吧。她还老以为我是这样的油腔滑调。”他又对我说。

我还不曾知道他已经是油腔滑调的了。他蓦地又远了，哦，毕竟是十几年的时间和生活啊！

“再见。”我说。

“再见。”他说。

“再见。”我们纷纷说。分别很平静也很喧闹。

12月26日 雨

华苓阿姨的小妹妹，和她的先生，还有他们家的一位至交陈先生，陪我们上街。她说要带我们去一个旧金山最奢华的咖啡馆喝咖啡。那确是非常之豪华，咖啡厅旁边是旅馆，那电梯是吊笼似的，吊在楼外面，上上下下。电梯里的人可以欣赏这一片豪华，而外面的人，看着那吊笼里的人，却觉着有几分滑稽。华苓的小妹妹很漂亮，又年轻，简直像是小球的姐姐，而不像小球的妈妈。他们从台湾来美国也不过几年。我曾问过小球："为什么来美国？"他指着自己的鼻子说："全因为小子不长进。"在台湾上大学没成，便来美国了。而他们一家来美，那陈先生也将自己的产业卖了，到美国来了。他一辈子没结婚。他们三个人坐在一起，我觉着，那里一定有一个动人的故事。陈先生不太会说英语，而在旧金山，不会说英语也能生活，这里的中国人多。

晚上，去唐人街吃饭。又是唐人街，旧金山充满了唐人街。

12月27日 晴

今天去香港，今天离开旧金山，今天离开美国。

早上潘耀明来电话，向我告别：“祝你顺风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回爱荷华？”我问他。

“明天，我搬到‘五月花’的地下室了，和一个北京学生同住，他是清华大学的，说和你聊过天。”

“我想起来了。向他问好吧。再有，代我向华苓、安格尔先生问好，还有，谭嘉，吕嘉行，Esther，安娜，艾恩，瑞克，美尼塔——我那盒小鸡送给她老四了吗？”

“我代你向所有的人问候。从这里去香港，要十几个小时呢，你可以休息休息，回味一下，想一想了。”

“是啊！这一路上没来得及想呢！”

飞机起飞了，飞上云层，旧金山在下面了，美国在下面了。我闭上眼睛，想些什么。可是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似乎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一些遗憾，是的，遗憾：没有去夏威夷，没有去大瀑布，没有去爵士乐的摇篮新奥尔良，没有去富裕的休斯顿，没有越过芝加哥的大湖去到加拿大，没有穿过西部的沙漠去到墨西哥……哦，世界！

脑子里除了遗憾，便是空白了。我不明白美国，我越看得多，就越是不明白。一边是马奈的展览前排起里盘三、外盘三的长龙阵，一边是四十二条街上的滚滚闪动的霓虹灯——X电影；一边是电脑、精密仪器严格运转的大工业巨轮，一边是电影明星出身的总统吊儿郎当

地应付记者招待会；一边是移民们赠送的雕像，感谢新大陆收容了劫后余生的难民，一边是飞机轰炸格林耐得岛；一边是充满活力的牛仔裤，一边是大麻；一边是快乐的爵士乐，一边是精神崩溃的精神病患者；……这就是美国，这又不是美国。这是美国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一点都不知道。

飞机又升上一层云，白云将美国淹没了。

Bye—bye，America。

整理于1984年3月7日。上海
二次整理于1984年11月1日。上海

跋

王安忆

我母亲茹志鹃，生于乙丑年九月十三，即公历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日，一九九八年十月七日去世，距七十三岁尚欠二十三天。岁月如梭，似乎还是昨日的痛创，不料想，二十年光阴过去。我们至亲以为仓促的时间，在瞬息万变的世事里，大约是相当漫长的，以至于人们——我指的不是陌路，而是文学从业者，似已不记得母亲名字的准确写法，常常将名字里的“鹃”改作“娟”。一个用文字留下生命痕迹的人，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沮丧又无奈的事。也因此，当“中信大方”年轻的出版人提出重版《母女漫游美利坚》，以纪念母亲周年，心中是十分感动和欣慰的。

一九八三年，随母亲茹志鹃和吴祖光先生赴美国爱荷华大学“国际写作计划”，所以叨忝受邀之列，一半出自年轻写作人的身份，另一半，则因是母亲的女儿。事实上，我可能更早于母亲知道爱荷华大学的这个计划项目。一九八零年，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文学讲习所受培，保罗·安格尔和聂华苓就曾经来到课上，向我们介绍“国际写作计划”，同行者还有李欧梵，这位年轻的华裔美国教授，风流倜傥，一身白色的西装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开放之初，仿佛来自于未来，这个“未来”的名字就叫作“现代化”。来宾演讲完毕，请大家提问，现场顿时陷入沉默，不是我们没有问题，而是不知从何问起，那时候，我们又羞怯，又有那么点倨傲。局面多少是尴尬的，僵持一段，终于有一位学员举手提问——他来自广州，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

地带，比较有眼界，因而也自信一些，他的问题是关于“琼瑶”。天哪，我们大多数人甚至连“琼瑶”都是陌生的。

这个演讲会大概可用来做隐喻，隐喻我去到美国爱荷华的中国背景。母亲对于旅行美国，显然有准备得多。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六十年代，她堪称中国年轻作家的翘楚，一九六二年，即访问苏联；一九六五年参加老舍为团长的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；文革结束后的一九八零年，作为中国友好协会的作家成员访欧洲五国，出国对于她不是新鲜事。但是这一回，与女儿我同行，使她格外的开心。相反，我总是极力挣脱与母亲的捆绑，身为著名作家的女儿，成长中的反叛期延长并且加剧。可是，怎么办呢？去爱荷华，就是因母亲而成行，不承认也得承认。合出一本旅美日记，是母亲的创意，我无法反对，因为内心受着诱惑，同时，不得不再次接受捆绑。

虽然事先有杂志和出版社的约定，但到了落实阶段，还是遇到挫折。多半的原因在我，如果单是母亲的日记，一定更受欢迎。不能不正视生活和文学的阅历，无论是对外部世界的看和认识，还是内部精神的立场观念，母亲不知高我多少筹。她向来又是个讲究文字的写者，从不随便下笔。相比之下，我的日记就是一本流水账，事无巨细，来不及思考、提炼、去芜存菁，文字且“水”得可怕。就像一个饥渴的人，面对盛宴，什么都好，什么都要。多少年来，我都不敢回头看这份记录，所谓“不忍卒读”，就是这种状态吧！母亲的日记顺利地刊登了，我的，则经过几番周折，分散分期终于也发出了。上海文艺出版社接下了出版的计划，责任编辑，一位与母亲齐辈的女性，具有多年的工作经验，实在看不过去，删去几段，我埋怨着又全部捞回来，边上旁观的人都想打我。时常想起这一幕，很想说一声“抱歉”，可我都不知道这位老师的名字，那时候，责任编辑又不署名，真可谓“替他人作嫁衣裳”。这是简体字的归宿。繁体字版，是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。三联的副总编辑潘耀明与我们同期计划中人，我和母亲的日记里时不时提到，我想，这大约是他接受此书的原因之一，因为，不管好坏，日记也帮助他记录了这段日子。

十八年后的二〇〇一年秋天，我再次去到爱荷华，“计划”的行政人员比尔，一位印度教授，“计划”的工作多是兼职——比尔看见我，对聂华苓说：“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人”，可见，当时我给人们的印象是多么幼稚，几乎无法认为我也是写作人，而只是妈妈的女儿，老是和妈妈斗气、拌嘴、独断专行的女儿。时年，母亲五十八岁，携带着她进行中的长篇《她从那条路上来》第二部，每天早晨，喝一壶咖啡，在书桌前坐下，开始写作。在她的年纪，家事世事都是纷扰的，这一段的安静实是难得。窗外爱荷华河熠熠流淌，学生们都在课堂上。我呢，郑重其事地出门去，仿佛要事在身，其实不过是乱走乱看，爱荷华，一层一层的绿过去，再绿回来，耳边是鸟的啁啾，看不见人影。十一时刚过，母亲她站起身，离开书桌，到厨房烧煮，等我回去吃饭。我的胃口不怎么样，一直念叨要喝一碗真正的母鸡汤，这个执念苦恼着母亲，也苦恼着自己。美国的鸡，无论哪一种，都没法炖出那种碧清又醇厚的颜色和气味。其实，我们母女都不知道，其实是乡愁作祟，乡愁在味觉上的显现。身在异乡异土，不同空间里的时间，会改变形状，我们都有些想家。

重读这些日记，母亲的依然是好，她能够准确地窥察并且表达美国，还有她自己，一个观看美国的人。我的，依然不好，冗长、拉杂、琐碎、无趣，要说有什么价值，大概就是老实，老实地记录了那段生活，其中的人和事正超时速地退去，退去，退成历史。

2018年7月27日上海